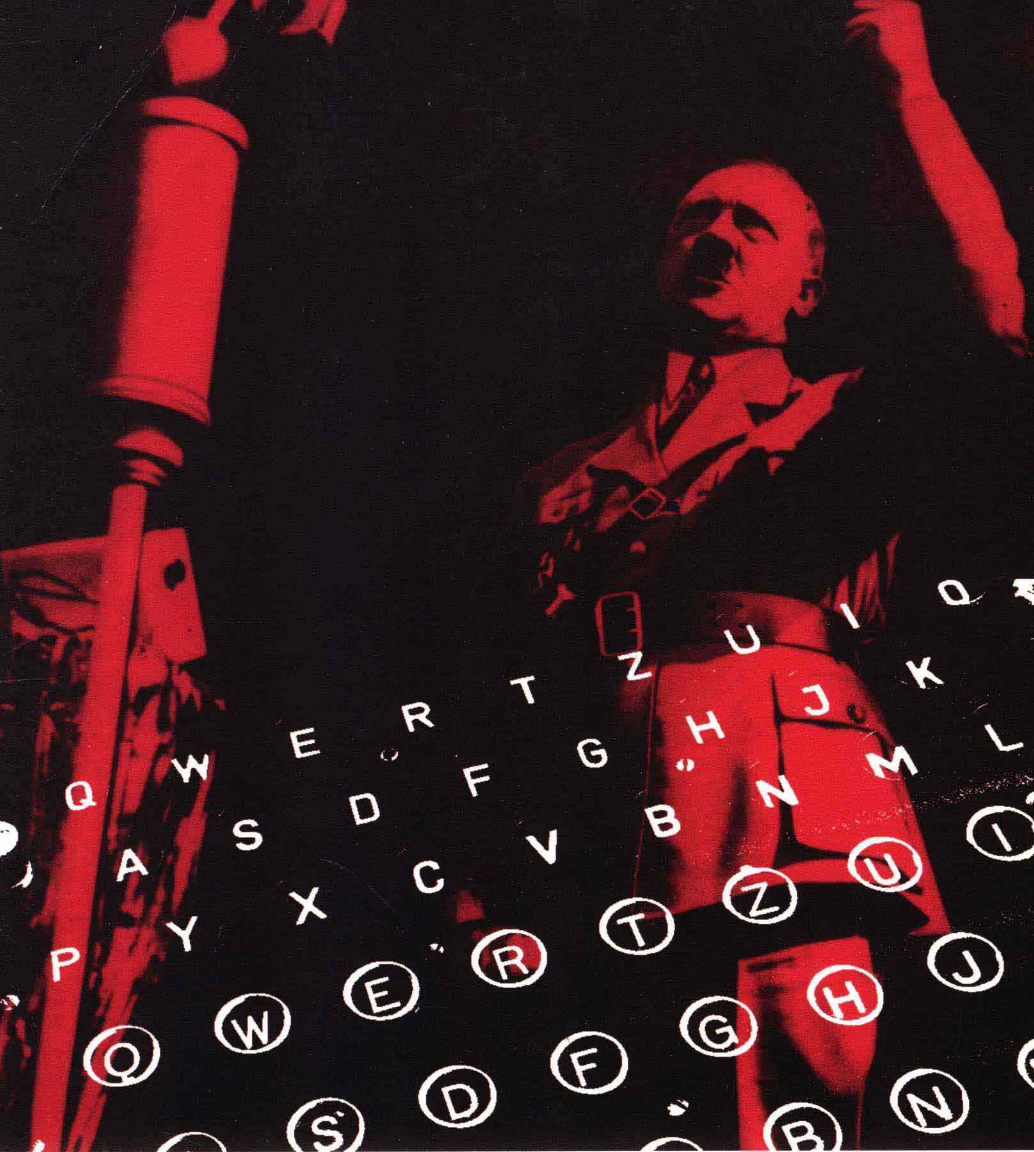


[德] 维克多·克莱普勒 著

Victor Klemperer

印芝虹 译

第三帝国的语言

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書館
ercial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第三帝国的语言

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德] 维克多·克莱普勒 著

印芝虹 译

Victor Klemperer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德)克莱普勒著；印芝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990-5

Ⅰ．①第… Ⅱ．①克… ②印…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话语语言学－研究 Ⅳ．①K516.44 ②H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507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第三帝国的语言
——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
〔德〕维克多·克莱普勒 著
印芝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90-5

2013年9月第1版　　开本960×1300 1/32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12¾
定价：52.00元

LTI Lingua Tertii Imperii
by Victor Klemperer
Copyright © 2010 Philipp Reclam jun. GmbH & Co. KG, Stuttgar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我的夫人　爱娃·克莱普勒

早在二十年前，亲爱的爱娃，在一个研究文集的献词前，我就对你写道，你我之间无所谓一般赠送意义上的献词，因为你本身已经是我著作的共同主人，它们全都是一个精神财富共同体的成果。这一点保持至今。

不过这一次的情况还是与我以往所有的出版物有所不同，这一次，比之我们在和平时期的语文工作，我更加没有权利献词与你，同时又有太多的义务写这个献词。因为如果没有你，这本书今天就不会存在，同样，它的作者也早已消失。

我需要很多页纸才能把这中间的细节解释清楚，那是我们之间的私语。替代它们的，作为这些手稿的序言，是一个语文学和教育学者所做的一般意义上的思考，请你接受。你知道的，当我在我的听众面前谈论英雄主义时，想到的是谁，而一个盲人则必须用手杖去感觉。

德累斯顿，1946 年圣诞节

维克多·克莱普勒

语言

甚于血液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

代序

英雄主义

第三帝国的语言让拉开距离的、带有“去”（ent）前缀的词汇有所增长（尽管每一次都无从得知，那些词语是新造的，还是一般用语吸收了专业圈子里本已熟知的表达，以满足新的需求）。为防备空袭，必须将窗户弄暗，于是就有了每日的“去暗”（Entdunkeln）工作。房顶燃烧时，不可以让房顶隔层里堆放的物什给灭火者制造障碍，于是房顶被“去杂物”了（entrümpelt）。因为需要开发新的食品资源，于是：七叶树被“去苦了”（entbittert）……

为了全面地表述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人们又广泛地引入了一个以同样方式构成的词语：纳粹主义几乎导致德国毁灭；如今，人们正努力使国家从这个致命的病患中得到康复，而这一努力就被称为“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我不希望，并且也不相信，这个丑陋的词语将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一旦当下的任务完成，它就会沉寂，成为一个历史的过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再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过程，即一个刚刚还具有

超强生命力、仿佛注定将永世长存的表达，是如何突然间就无声无息的：它与制造它的局势一同沉没了，并会在日后为这个时局提供一个证据，犹如一具化石。“闪电战”（Blitzkrieg）和隶属它的形容词“迅疾地”（schlagartig）是这样，“歼灭战役”（Vernichtungsschlachten）和从属于之的“围剿”（Einkesselungen）是如此，“迂回困局”（wandernder Kessel）亦是如此—— 这个词今天甚至已经需要予以解说，它指的是被包围的部队绝望的撤退尝试——，“拉锯战”（Nervenkrieg）是这样，甚至“最终的胜利”（Endsieg）亦复如此。“登陆滩头”（Landekopf）从 1944 年年初存活到 1944 年夏天，当它膨胀成一个走形的庞然大物时，还依旧活着；然而，当巴黎失守，当整个法兰西成了登陆滩头时，这个词突然整个消失，只有在以后的历史课堂上，它的化石才会再次浮现。

同样，我们的过渡时期最为沉重的决定性词语也将是这个命运：“去纳粹化”这个词有一天也会沉寂下去，因为它要结束的这个状态不复存在。

但是到达那一天还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必须消失的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纳粹的思维习惯及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

这个语言蹂躏和毒化了多少概念和感情！在德累斯顿业余大学的所谓夜中学里，在文化联盟和自由德意志青年团组织的讨论中，我一再地注意到，那些年轻人是如何在全然的单纯之中，在为弥补疏怠学业带来的缺憾和谬误而进行的正直的努力中，坚持着纳粹的思想套路；他们对此完全无知无察；那一时期形成的语言习惯迷惑并诱导了他们。我们当时谈论文化的意义、人道主义、民主，我感觉到，有光亮照进了，某些东西在有追求的头脑中开启了——然而，只要随便什么人提起了随便哪一个英雄行为或者英勇的反抗，或者只要是谈英雄主义——这种情况太容易发生了——就在这一刻，只要这个概念稍一露头，所有的清醒旋即消失，我们又深深地陷入纳粹意识形态中，被其乌云所笼罩。而且不仅仅是刚刚从战场上和战俘营里回来的年轻人；那些感到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更别说获得足够的欢呼的男孩子；那些没有从军入伍的女孩

子们也都一样，她们同样完全束缚在这种可疑至极的英雄观念中。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一个人对英雄主义作如是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南辕北辙观时，那他的确不可能会与人道、文化和民主的本质发生一种真正正确的联系。

然而，这个在 1933 年几乎才刚刚学会了 ABC 的一代人，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单单撞上了“英勇的”（herorisch）这个词、以及这个词全部的家族系统的呢？对此，首先要给予的回答是，这个词始终是栖身于制服之中的，并且在三种不同的制服里，而从来不曾身着便装。

在希特勒的奋斗书所确立的总教育方针里，体能方面的东西遥遥领先，占据显要地位。他从魏玛保守党人的辞典里摘引出“强化体魄”（körperliche Ertüchtigung）这个表达，对其情有独钟。他颂扬威廉军队，声称这支队伍是一个正在腐烂的国民肌体上唯一健康的、并为之注入生命活力的组织，认为部队的任务首先、甚至唯独就在于培育体能。对于希特勒来说，性格的培养只占据第二位；在他看来，这一点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因为体能训练统领了教育，精神方面的东西自然退居其后。而这个教育纲领中最末位的、而且只是十分勉强地被纳入的、显得可疑并可鄙的一项工作是培养智力，为头脑输送知识养料。越来越多的新语汇表现出对思考者的惧怕和对思考的仇恨。每当希特勒谈到他的上升和他最初的那些集会成就的时候，在夸耀自己的演说才能的同时，他还会大肆渲染那些追随他的斗士的战斗能力，正是这个小团队很快发展成了冲锋队。这些“棕色的冲锋支队们”视一种纯粹粗暴的事业为己任，袭击集会上的政敌，将他们赶出大厅：这就是希特勒在争取民心的战斗中最基本、最得力的助手，是他的第一批英雄，被他描述为浴血奋战、击败强大政敌的胜利使者，描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战役的英勇的榜样。类似的描述、相同的思想和同样的词汇也出现在戈培尔对他的柏林之战的叙述中。并非精神为胜利者，也无关信念，甚至不是修辞障眼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支持了新的学说，而是这些最早的冲锋队队员、这些“老战士”的英雄作为。

而对我来说，再加上我们一位朋友所作的专业的区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报告就更加完整了。这位朋友当时在一个萨克森工业区的医院里做医生助理，她经常讲道，“每当晚间集会后有伤员送过来，我总是一眼便能看出他们各属于什么党派，虽然这些人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被啤酒瓶或者椅腿击中、头部负伤的是纳粹，胸部被匕首刺中的是共产党人。”在荣耀这个问题上，冲锋队和意大利文学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在其最初的阶段到达了顶峰，如此强烈的光芒再也无可复制。

按时间的排序，纳粹的英雄之义（Heldentum）登场时身着的第二套制服，是赛车手的蒙面服，他的冲锋头盔，他的眼镜面具，他的厚手套。纳粹主义培育促进了所有的体育项目，但是纯粹从语言上看，它受拳击运动的影响最大，所有其他项目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拳击这一项；然而，三十年代中期，最充满英雄气概的画面却是车手，他们给人的印象最深，出现的频率也最高：在贝昂特·罗塞玛耶（Bernd Rosemeyer）的死亡坠落之后，有一段时间，在民众的幻想面前，他几乎就和豪斯特·维塞尔（Horst Wessel）一样高不可及。（这里要对我的大学同事们说：关于戈培尔的语言风格和女飞行员艾丽·巴因霍恩［Elly Beinhorn］回忆录《我的赛车手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最为有趣的课堂分析材料。）有段时间，那些国际赛车竞技中的赢家，不论他们是坐在战车的方向盘面前，还是倚在车旁，或者即便是埋在车底下，都是出镜最为频繁的英雄。假如年轻人头脑中的英雄形象不是来自于这些日子的广告牌和纪念币，来自于那上面肌肉发达的斗士形象，赤裸着身体或是裹着冲锋队的制服，就必然是来自那些赛车手；这两种英雄的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呆板的目光，它表达了一往无前的冷酷的决绝和夺取、攻占的意志。

从1939年起，坦克取代了赛车，坦克手取代了赛车手。（普通士兵不仅这样称呼开坦克的人，而且也如此称呼那些与之相关的特种部队。）从战争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第三帝国灭亡，所有海上的、陆地的和空中的英雄形态全部身着军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的背后尚有一种民间的英雄形态。而如今哪儿还有前线之背后？哪儿还有非军事之

存在？总体战的学说可怕地转而对准了其肇始者：一切都成了战场，每一间工厂、每一个地下室里都在体现着军事的英雄精神，孩子、妇女和老人都英勇地死于完全同样的战斗形态，甚至经常身着完全同样的军服，而那本来只应该出现在战场上年轻的士兵身上，或者说他们被要求那样。

经过十二年的时间，“英雄的”(Herorisches)这个概念和这一类词汇，越来越大量的、日益狭隘地转为战争的勇气，转为任何一场战斗行动中的鲁莽的、蔑视死亡的态度。“战斗的”（kämpferisch）原本是新浪漫主义美学家们使用的一个新形容词，很是稀见；纳粹主义的语言使其广泛地投入使用，变成他们最宠爱的词条之一，这背后是有用意的。“好战的”这个词过于狭隘，让人只想到战争，而且大概也过于直白，暴露了好斗之性和攻占之欲。“战斗的”则正相反！它表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紧张状态和在任何生活境遇中都决不放弃，而是进行抵抗和攻击、树立自我的意志。对“战斗的”一词的糟蹋，与对“英雄主义”（Heroismus）的滥用和谬解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您对我们真是不公平，教授先生！我们——我指的不是纳粹，我不是纳粹。但是这么多年，除了有几次中断，我都在战场上。战争时期频繁地讲英雄主义，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为什么在那里显示出来的英雄主义就是一种错误的英雄主义呢？”

“英雄主义不仅是指勇气和敢于押上自己的生命。这种事情每个斗殴者和罪犯都能干。英雄原本是一个促进人类事业的行动的实施者。一场侵略战争，甚至于一场希特勒这样的、以如此众多的残忍进行的战争，与英雄主义毫无干系。”

“但是，在我的战友中，有那么多人没有参与到残忍行径中去，并且坚信——从来也没有人对我们说过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即便是在进攻和占领的时候，只是在进行着一场自卫的战争，我们的胜利也将造福于世界。事情的真相，我们是在很久以后、在太迟之后才认识到的……您不相信从体育中也是会发展出真正的英雄主义的吗？不相信一项体育上的建树也具有榜样的力量，是可以对人类产生促进作用的吗？”

“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在纳粹德国，在运动员和战士中间有时也有真的英雄存在。我只是在整体上恰恰对这两个职业群的英雄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两者都是太过喧哗、太过赢利、太过满足虚荣心的英雄主义，因而常常难以真实。毋庸置疑，这些赛车手都是确凿的工业骑士，他们以生命为赌注的飞车会给德国工厂、于是也给祖国带来好处，也许，由于他们为完善汽车建造提供经验，他们甚至能给大众带来利益。然而这里却有着这么多的虚荣，这么多的角斗者的赢誉！赛车手赢得花环和奖金，士兵们则获得奖章和提升。不，当英雄主义在一切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地表现时，当它在成功的情况下为自己斩获太多时，我不相信它。而当英雄主义越是沉静，越少面对公众，英雄本身越少获得补偿，越少有装饰性时，才越是纯洁、越具有意义。我之所以指斥纳粹主义的英雄概念，正是因为它无时无刻不能脱离的装饰性，正是针对它的粉墨登场。对于正义的、真实的英雄主义，纳粹主义从来就没有公开地提及过。由此，它篡改了整个概念，并毁坏了其名声。”

“您完全排除在希特勒年代里也存在着安静的、真正的英雄主义吗？”

“不是这样，正相反，这个年代呈现了最纯粹的英雄主义，但是是在对立的一面，不妨这么说。我想到集中营（KZ）里许多勇敢的人们，想到很多提着脑袋的地下工作者。这里的死亡威胁，这里的磨难比在前线要大得多，而且看不见任何装饰的光芒！那不是人们眼前的、被大肆歌颂的‘荣誉战场’上的阵亡，而是比如上绞刑架，这还是在相对幸运的情况下。然而，即便缺少了装饰物，并且这种英雄之义无疑是真实的，即便如此，这些英雄的内心也还是有一种支撑和安慰的：他们同样相信自己归属于一支队伍，他们具有坚定的根基牢固的信仰，相信自己的事业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能够将自己骄傲的信仰带进坟墓，自信总有一天将要重生，人们眼下越是辱没、残害他们，日后他们的名字就会愈加光彩夺目。

“而我还知道一种要黯淡无望得多、寂静无声得多的英雄气质，一种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彻底地无所支撑，没有任何的与某个队伍、

某个政治集团的同心同德可以依靠，毫无对未来光芒四射的期望，而是完完全全地依赖自己。这是几个雅利安妇女（不曾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她们抵抗住了种种压力，拒绝离弃她们犹太血统的丈夫。这些妇女过得是怎样的日子啊！她们忍受了怎样的辱骂、威胁、殴打、唾啐，又承受了怎样的匮乏，因为她们要将自己本来就紧张的生活物资与她们的爱人分享，她们的男人被划归到低于一般配额的犹太卡类别，虽然他们工厂的雅利安同事还能领到重体力工的补助。当她们在这一切耻辱和折磨人的苦痛打击下病倒在床时，当她们周围频繁发生的自杀事件引诱她们逃向永恒的安宁，以躲避盖世太保的时候，她们需要鼓起怎样的生存意志啊！她们明白，她们的死亡将无可避免地将她们的丈夫拖入绝境，因为雅利安妻子的尸体未寒，犹太丈夫就要被拉走，运往屠宰场般的流亡地。而要将那个精疲力竭的、超越了负荷极限的、完全陷入绝望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扶立起来，这需要怎样的斯多葛主义、需要多么强的自我控制力！在战场的枪林弹火中，在防弹地下室里抵挡不住的沙石雨下，甚至在绞刑架面前，也还有激情的一刻，起着一种支撑的作用——但是，在日复一日、望不到头的污秽的日常中，在这种日常令人作呕的折磨中，支撑她们挺下来的是什么？是保持坚强，坚强到能够一直不断地对另一个人宣讲，一次又一次地强迫那个人记住，那个时刻会到来的，我们有义务期待那个时刻；是在孤独无群、完全只能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依旧保持坚强，因为犹太人居所尽管有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命运，也有共同的群体语言，但是不组成团体：这就是超越任何一种英雄之义的英雄主义。

“不：希特勒年代真的不缺少英雄之义，但是，在真正的希特勒主义里，在希特勒信徒的共同体里，却只有过一种外在的、畸形的和毒化了的英雄主义，它让人们想到的是张扬炫耀的奖杯和丁零当啷的勋章，是大肆吹捧的虚夸膨胀的话语，是残酷无情的屠杀……”

英雄之义的语汇族群也属于第三帝国的语言（LTI）吗？其实是的，因为它们密播细植，且到处彰显了纳粹的欺骗性和粗暴特性。它们也同样与颂扬日耳曼作为特选种族的那些话语纠结在一起：一切英勇的东西

都唯独属于日耳曼种族。其实又不是的，因为早在第三帝国之前，所有的畸形和外化就已经黏附上了这个自我炫耀的语汇族群。所以就在这个序言里给它一个边缘的位置。

当然，有一个词语是必须专门记在纳粹名下的。单从它带来的宽慰就得这样做。1941 年 12 月，保尔 •K 有一次下班后兴高采烈地跑过来。他在路上刚读了部队报道。“他们在非洲的日子很不好过”，他说。他们真的这样承认了吗，我问道——他们平日总是只报告胜利的呀。

“他们写道：‘我们英勇战斗的部队。’‘英勇’（heldenhaft）听上去像是悼词。您尽管相信这一点好了。”

此后，“英勇”在日报上还出现过很多次、很多次，听着像是悼词，它传达的信息从未有误。

目 录

代序　英雄主义　001

1　第三帝国的语言　001

2　前奏　009

3　基本特征：贫瘠　012

4　帕尔特瑙　018

5　摘自第一年的日记　023

6　三个最早的纳粹词　035

7　炫／扩展　040

8　十年法西斯主义　044

9　狂热的　051

10 本源诗文 057

11 模糊界限 061

12 标点应用 067

13 名字 070

14 煤耗子 080

15 不可能 085

16 在一个独有的工作日 090

17 体系和组织 094

18 我相信他 100

19 家庭告示：
第三帝国语言的复习小资料 116

20 留下了什么？ 122

21 德意志之根 126

22 阳光的世界观
(来自偶然的阅读) 139

23 如果两人做同一件事…… 146

24 欧洲咖啡馆 156

25 黄星 164

26 犹太人的战争 170

27 犹太人眼镜 180

28 胜利者的语言 188

29 犹太复国主义 199

30 词语最高级的诅咒 213

31 从运动中走出…… 223

32 拳击 230

33 追随者 236

34 那一个音节 246

35 交替冲淋 252

36 现场检验 260

也作后记 “因为言论” 285

附录

关于这一版 289

评注 291

代后记 384

译后记 391

1

第三帝国的语言

曾经有过 BDM、HJ 和 DAF 以及无数的其他类似的缩略符号。

在我的日记本里，LTI（第三帝国的语言）这个符号最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作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成为那全部苦难岁月里的一种正当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 SOS 呼叫。一个很有学问的标记，就像第三帝国不时地喜欢响亮的外来词语一样："确保"（Garant）听起来比"担保"（Bürge）更重要，而"诋毁"（diffamieren）比"搞坏名声"（schlechtmachen）更有力。（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懂它们，但正是对于不懂的人来说，其作用才更为显著。）

LTI：Lingua Tertii Imperii，第三帝国的语言。我那时老是会想到一则老柏林人轶事，那应该是出自我那本格拉斯布莱诺（Glaßbrenner）的漂亮绘本，那位三月革命的幽默大师的作品——然而，我的藏书到哪里去了，我到哪儿去查阅它？到盖世太保那儿寻问我的藏书有意义

吗？……“爸爸”，一个小男孩在看马戏表演时问道，“绳索上的那个人拿着杆子在干什么呢？”——“傻孩子，那是根平衡杆，他靠它稳住自己。”——“哦，爸爸，如果他把它弄掉了怎么办呢？”“傻孩子，他紧紧地抓着它呢！”

我的日记在这些年里一直是我的平衡杆，没有它我早已经摔下去上百次了。在感到恶心和渺无希望的时候，在机械的工厂劳动无尽的荒凉中，在病人和死去者的床边，在一个个墓碑旁，在自己内心的困窘中，在极端耻辱的时刻，当心脏在物理意义上停止工作时——总有这个自我要求来帮助我观察、研究、记住正在发生着什么——明天它就会是另一副样子，明天你对它的感觉就会不同；记下它现在的样子和表现。然后很快，这一呼唤就会密集起来，它要我将自己凌驾在那个境遇之上，维护内心的自由，进入那个始终发挥着效用的秘密公式：LTI，LTI！

即便我有意，要发表这个时期全部的、记录了所有日常经历的日记，我仍然会以这个标记作为它的书名，不过我并没有这种打算。

人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比喻。因为正如常常会有“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面目”这样的说法一样，一个时期的表达同样被视为这个时期的语言。第三帝国的语言带有一种十分可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出自它所有的生存表述和遗物：出自它豪华建筑无度的夸耀及其废墟，出自它的战士类型，那些被他们作为理想的形象定格在总是不同的、又总是相同的广告牌上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士兵，出自它的高速公路和群葬合墓。这些都是第三帝国的语言，这一切当然都会在这本书稿中谈到。只是，当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已经几十年，而且是非常喜爱地从事它的，那么这个职业最后必然会给他留下深深的烙印，甚于其他任何东西的影响，所以，这确确实实是语文学原本意义上的第三帝国的语言，是我紧紧抓牢的东西，是我的平衡杆，它帮助我度过了荒凉的十小时工厂劳动，挺过了抄家、逮捕、虐待等等等等带来的恐惧。

人们总是不断地引述塔列朗（Talleyrand）的句子，说语言是用来掩饰外交官的（或者干脆说某个狡猾的和值得怀疑的人的）思想的。然

而正确的说法应该正好相反。不管在别人面前还是在自己面前，一个人故意要掩饰的东西，包括他不自觉隐藏于内心的东西：其语言会令之昭示于天下。这应该也是这句话的含义：*le style c'est l'hommele*；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谎言——但是在其语言风格中，他的本质会暴露无遗。

这个原本意义（语文学的“原本意义”）上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在我的感觉中是很特别的。

刚开始的时候，当我还没怎么遭遇到、或者只遭遇到很轻微的迫害时，我就想要尽量避开它。我厌烦了橱窗的语言，广告牌的、棕黄色军装的、旗帜的语言，向希特勒致敬伸直的手臂的、修剪整齐的希特勒胡须的语言。我逃避，埋头沉潜进自己的职业，我讲着我的课，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面对着眼前越来越空荡的课桌椅，仿佛视而不见。我全神贯注地写作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普遍的状况已经够让人窝火的了，为什么还要让纳粹的文字来进一步破坏我的生活？假使我偶然或者是因为误会拿到了一本纳粹的书，读了第一段我就会把它扔到一边去。街上若有什么地方响起领袖的或者是他的宣传部长的声嘶力竭的怪叫，我总要绕一个大圈子避开高音喇叭；而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揣测不安地尽力将赤裸裸的事实——它们的赤裸裸表现已经令人心寒无比——从那些讲话、评论和文章的令人作呕的浑汤中打捞出来。而当公务员遭遇清洗，我失去了我的讲台之后，我就直接想办法把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了。那些如此落伍的、早已被每一个顾惜自己的羽毛、在意自己形象和身份的人加以诋毁的启蒙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一直是我的最爱。现在，我可以把我的全部时间和工作精力都转向我已有长足进展的学术作品；要说涉及十八世纪的资料，我坐在德累斯顿的日本宫里，就如同“身居肥油里的蛆虫”[1]；任何一家德国的图书馆，甚至巴黎国家图书馆，都不可能给我提供更好的养料了。

---

1 德语俗语，比喻生活条件优裕。（本书页下注均为译注）

但是很快，使用图书馆的禁令降临到我头上，于是我手中的生命之作被剥夺。接着是我被扫地出户，再接着就是一切随之而来的东西，每天一个新的随之而来的东西。这时，这根平衡杆便成了我最须臾不可离弃的器械，时代的语言成了我最大的、第一位的兴趣所在。

我越来越仔细地观察，工人们在工厂里是怎样说话的，盖世太保畜生们怎么说话，在我们这儿，在犹太人牢笼的动物园，人们怎样说话。我察觉不到很大的区别；不，其实完全没有区别。所有的人，追随者和反对者，既得利益者和牺牲者，都毫无疑问地接受同样的样板引导。

我试图寻获这些样板，这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无比简单的，因为在德国印刷和谈论的所有东西，完全都是从党政一体的统一模子里出来的；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偏离这一种被允许的形式，都不可能跻身进入公众视野；书籍、报纸、给政府部门的信件和服务行业的表格——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棕色的汤汁里漂浮，而书面语言的这种绝对的统一性也解释了演讲形式的同一性问题。

然而，如果说寻找样板这样的事，对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来说不过形同儿戏的话，对我来说则艰难无比，而且总有风险，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可能。购买、包括借阅任何种类的书籍、杂志和报纸，都是佩戴黄星标志的人所不允许的。偷偷收在家里的书报意味着危险，它们被藏在橱柜和地毯下面，炉顶和窗帘架上面，或者作为点火材料储存在煤堆边上。当然，类似的做法只有在运气好的情况下才行得通。

从来没有哪一本书，我这一生都没有，像罗森贝尔格（Rosenberg）的神话书那样，令我的头脑如此震动。并不是因为他意味着一种特别深刻的、难以理解的或者震撼心灵的阅读，而是因为克莱门斯拿着这本书往我头上足足夯了好几分钟。（克莱门斯和魏瑟是德累斯顿专门折磨拷打犹太人的家奴。人们一般分别称他们为打手和啐嘴。）“反了，你这个犹太猪竟敢读这样一本书？”克莱门斯吼道。在他眼中，这简直是一种对贡品的亵渎。“你怎么胆敢把图书馆的书拿到这儿来？”我之所以得以解脱，没有被送进集中营，是因为可以证明这本书是在雅利安妻子

的名下借出来的，而且关于这本书的笔记被撕得粉碎，完全无法辨认。

所有的资料都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弄来，被悄声无息地吸纳汲取。而同时又有多少资料我根本无从获取！因为，每当我为一个问题试图深入源头、寻根究底的时候，当我，简单地说，需要专业知识方面的工作资料的时候，那些小图书借阅室就对我失去了意义，而公共图书馆则将我拒之门外。

有些人可能会想，专业上的同事们或者那些年龄较大的、在此期间有了公职的学生，应该是能够帮助我克服这种困境的，他们应该可以作为中转者，帮助我借阅书籍。唉，亲爱的上帝！那可是要求个人勇气、承担个人风险的一种行为。我曾经常常在讲台上引述一句漂亮的法语古诗，然而直到此后，在失去了讲台的时间里，我才能够真实地感受这句诗。一位落难的诗人伤痛地回想众多的 *amis que vent emporte*，*et il ventait devant ma porte*，“被风刮走的朋友，那时我的门前风正急骤。”不过，我必须公正地说，我也找到了忠实勇敢的朋友，只是，这中间正好没有关系密切的专业同事或者职业相近的人。

所以，在我的笔记和摘要里总留有类似这样的注脚：以后确认！……以后补充！……以后回答！……而后来，当经历这个以后的希望越来越小时，我改写道：这里以后还需要加以充实……

而在今天，当这个“以后”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但是马上就会变成现实的时候，因为书籍从瓦砾和交通的困境中重新浮现出来（同时，因为可以问心无愧地从共同建设者的 Vita activa[1] 中重返书斋），而我今天却知道，我将不会有这个能力，将我关于第三帝国的语言的观察，我的反思和问题，从勾勒描述的状态提升到一个完整的科学著作的形态了。

做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知识，并且也应该需要更多的生存时间，这

1　这个被译为“积极生活”的短语表达了基督徒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爱身边人的、为他人的日常生活。

不是我，也不是（目前情况下）任何一个个人所拥有的。因为这里需要完成非常多的极为不同的专业劳动，日耳曼语学者和罗马语族语文学者，英语语言学者和斯拉夫语语言学者，历史学者，民族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和神学学者，技术工作者和科学家们，他们得首先进行很多的相关研究，通过一系列博士论文解决很多的个别问题，然后才可能有一个勇敢的和无所不包的头脑来进行大胆的尝试，全方位地把这个 Lingua Tertii Imperii 表现出来，这个全方位涵盖了它最贫困不堪的和最富有丰盛的一面。不过，一个最初的尝试和探寻，探查那些因为尚在流动不定而未能定位的事物，这种法国人称之为第一时间的工作，对于未来真正的研究者们总是有其价值的，而且我相信，对于他们将同样具有价值的，也包括这些以半成品状态呈现的研究对象，它们一半是具体的经历讲述，一半已经进入到形而上的科学观察阶段。

然而，如果这就是我的出书意图，那我为什么不让这本语文学者的记录，直接从那本艰难年代留下的、更加私人也更加一般性的日记里剥离出来，交付出版？为什么还要从整体的角度对这一点和那一点进行概括？为什么还如此频繁地把今天的、希特勒后第一时间的观点与当时的观点放在一起呢？

我将细致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中有一种倾向，因为我在寻求科学之用的同时，还怀有教育之图。

目前，人们老挂在嘴边的话题是清除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战犯们被绳之以法，“小党员同志”（kleine PG.s）（第四帝国的语言！）被开除了公职，纳粹书籍也从公共视野中消失，那些希特勒广场和戈林大街都改了名，希特勒橡树也被砍了。但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似乎仍然要在一些富有特征的表述里保持下去；它们渗透之深，似乎将在德语语言中占有一席永久之地。比如说，1945 年 5 月以来，我在多少次广播讲话中，在多少次激情洋溢的反法西斯主义集会上，听到人们说诸如“性格明显的”（charakterlich）特征，或者是民主的“战斗的”(kämpferisch)本质！这些表达来自于LTI的中心——第三帝国会说：

“来自于本质中心”。我反感这些词语，是因为我迂腐吗？是我在这里暴露出了好为人师的本性吗？因为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每一个语言学者的内心都隐藏着一个指手画脚的教书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通过第二个问题来加以澄清。

什么是希特勒之流最强大的宣传手段？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一个个演讲？是他们对这个或者那个事物的阐述解说？或者是他们反犹、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蛊惑？

毫无疑问不是的。因为对于很多东西，大众都是懵懵懂懂、不知所云的，希特勒永无休止的重复也令他们丧失兴趣。在空袭期间，雅利安人有他们自己的房间，犹太人也要待在自己的屋子里，雅利安人的房间里有收音机（还有暖气和食物）——多少次，在旅店里（那时我还没有佩戴黄星，还可以出入旅店），后来又有多少次在工厂里，我都听见从隔壁房间传来扑克牌甩到桌面的声音，听到他们高声谈论关于肉和烟的配给、谈论电影，尽管领袖或者他的某个忠实党徒在那里长篇大论地讲话，而在这之后报纸则是宣称，全体人民倾听了他们的报告。

不，纳粹最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一个个演讲，也不是通过大量的文章或者传单、无数的标语牌或者旗帜实现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必须有意识地思考或者有意识地感受才能够吸收接纳的东西。

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人们习惯于从纯美学的、平和无害的角度理解席勒的诗句“教养之语言，为你吟诗和思考”。而用一种“教养之语言”吟作一个成功的诗句，尚无以证明其创作者具有诗人的力量；用一种高度文明化了的语言赋予自己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神态，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然而，语言并非只为我吟诗和思考，它也导控着我的情感，驾驭着我的全部心灵，我越是想当然地、越是无意识地将自己交付给它，就越是如此。而假如这个教养之语言由毒性成分组成，或者是被制成毒性材

料的载体了呢？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言说狂热，以为这就是英勇和道德，最终他就会真的相信，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位有道德的英雄，没有狂热的激情，就无法成为英雄。

词语“狂热”（fanatisch）和“狂热主义”（Fanatismus）不是第三帝国发明的，第三帝国只是改变了这些词语的价值，并且频繁地运用它们，其一天的使用率往往比其他时代一年的使用率还要高。第三帝国的语言里很少有自产自销的词语，也许、甚至基本上可以说根本没有。纳粹的语言很多时候都可以溯源到国外，其余部分里最主要的是从希特勒时代以前的德语里接收下来的。但是，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

揭示第三帝国语言的毒性，以此警示人们——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好为人师之举。怀有虔诚信仰的犹太人，当他们认为一件餐具已经沦为宗教意义上的不净之物时，他们便会把它埋入地下，以清洁之。我们应当将纳粹语言中的很多词语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要永远掩埋。

2

前奏

1932 年 6 月 8 日，我们去看了那部（正如我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几乎成为经典的”有声电影《蓝天使》。以小说构思并完成的作品，在剧作、甚至是电影的形式里，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地粗糙化，所以亨利希·曼的《垃圾教授》毫无疑问是一部比《蓝天使》更加伟大的作品；但是从演员的艺术成就来看，这部电影的确是一件大师级的制作。这里饰演主要角色的有亚宁斯（Jannings）、玛蕾娜·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和罗萨·瓦莱缇（Rosa Valetti），配角们的表演也很逼真，令人难忘。尽管如此，银幕上发生的事情只在有限的几个片刻里抓住了我或者说是吸引了我；片子前面放映了每周新闻，其中的一个场景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个鼓手长不停地在《蓝天使》的演员前面或者在他们之间舞来舞去——肯定是那种舞动搅扰了我。

这个场景发生在帕蓬（Papen）内阁上台之后；那段新闻叫作：“斯卡格拉克战役之日，总统府海军卫士穿过布兰登堡门。”

我这一生见过很多列队的情景，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里；我知道普鲁士的列队步伐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慕尼黑的上威森费尔德军训时，受到的训导就是，你们在这里至少要做到柏林那边的水准！然而，不仅是在此前，而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此后我也从未见过类似于那天晚上的列队，所有的列队，无论是从领袖面前走过的，还是穿行于纽伦堡的。那帮人甩腿踢脚，靴子的尖头似乎越过了鼻尖，整齐划一犹如唯一之举，犹如唯一之腿，所有这些人的身体摆出的姿势，不，是这唯一的身体摆出的姿势，充满着一种痉挛的紧绷，令那动作显得十分僵硬，如同那些已经凝固了的面孔，让整个队伍给人以极端反差的印象：既是生息已尽，又是生命力极其旺盛。只是我当时没有时间，准确地说是我当时没有自由的心灵空间，无法解开这支队伍之谜，因为这支队伍只不过充作了那一个人的背景，它被这个人物，我也被这个人物控制和掌握着，这个人就是鼓手长。

这个走在前面的人将左手抵在臀部，手指尽力伸展开，应该说，他是用左手支撑着向左弯曲过来的、寻求平衡的身体，同时，他的右臂高高地举向天空，手中握着鼓槌，而他的靴尖随着向上甩动的腿似乎在追逐那根棍棒。于是，这个人斜着身子在空荡里飘移，犹如一座没有底座的塑像，由一种贯穿其手指和双脚、从头至脚绷紧全身的痉挛，神秘地维持着不倒。他在前面所演示的，不是单纯的军事演练，而是一种类似于列队行进的上古风格的舞蹈，这个人集魔术师和特种士兵于一身。与其类似的紧张态和痉挛变形的扭曲状在那个年代里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中可以见到。在那个时代的表现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听到。但是在生活本身，在这个最冷静的城市的冷静的生活里，它令人感受到一种绝对新事物的暴力。同时它还散发出一种传染性力量。吼叫着的人们挤向这支队伍，逼近这支队伍，张狂的手臂似乎要抓进队伍里去，最前排一个年轻人瞪大的双眼里显露着宗教的痴迷神情。

这个鼓手长是国家社会主义给我的第一个颠覆性经历。此前，虽然它已经四处出击，我却一直视其为一群心怀不满的心智未启者的一时迷

误，不足挂齿。在这里，我第一次见识了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下的狂热主义；从鼓手长这个无言的形象里，第三帝国的语言第一次迎面朝我袭来。

3

基本特征：贫瘠

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它的贫瘠是根本性的；就仿佛它立下过一个贫困的誓言。

《我的奋斗》，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1925年开始出版，从此，第三帝国语言所有的基本特征已然确定无疑。当这个政党“接手政权”之后，这种语言就从一个集团的语言变成为一个国民的语言，也就是说，它掌控了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政治，法庭判决，经济，艺术，科学，学校，体育，家庭，幼儿园和托儿所。（一个群组的语言总是只包含这个群组所关联的领域，而不是生活的全部。）自然，第三帝国的语言也掌控了军队，而且在这里尤为花费力气；不过，在军队语言和第三帝国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的作用，准确地说就是：起初是军队语言影响了第三帝国的语言，后来军队语言又被第三帝国的语言腐蚀了。所以我要特别提及这种放射作用。

一直到1945年里，几乎是直到最后一天——当德国已经变成一片

废墟，柏林陷入重围的时候，《帝国》仍然在出版——他们印刷了无数的各类文字。传单，报纸，杂志，教科书，科学著作和高雅的人文作品。

在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广泛的传播中，第三帝国的语言始终贫瘠而单调，而且，与前面的那个“定位”一样，“单调”在这里，也要完全从词的本义来理解。我在这些年里的阅读是一种随遇而安式的，听凭我正好遇上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多次把我的阅读比作乘坐热气球飞行，热气球必须将自己交付给任意的一阵风向，放弃真正意义上的掌舵——，我就是这样，这会儿读了《二十世纪的神话》，那会儿又研究起一本《简明零售商年鉴》来，此刻拿到一本法学杂志翻过来读过去，下一刻又捧起一本药学杂志浏览一遍，我阅读了这些年里允许出版的长篇小说和诗歌。在扫马路的时候，在机械车间里，我听着工人们的谈话：所有的话语，不论是印刷的还是言说的，不论是跟文化人还是跟没什么文化的人在一块儿，都是同样的陈词套话，同样的口气腔调。甚至在那些被虐待得最厉害的受害者那里，在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必然的死敌那里，甚至在犹太人那里，到处都笼罩着第三帝国的语言，包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信件，也包括他们的著作，只要他们还允许发表东西，全都一样，这个语言一方面独霸天下，一方面贫瘠可怜，而且正是通过其贫瘠而威淫四方。

我经历过德国历史上的三个时期，威廉时代、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时代。

共和国对话语和文字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自杀式的开放；国家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各种书籍和报纸上，对这个国家的所有的机构和指导思想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竭尽嘲讽之能事，并用煽动性的语言进行宣教，对此，他们常常调侃道，他们只不过是运用了宪法所给予他们的权利。那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在美学和哲学领域，不存在丝毫的限制。没有人被束缚于某一个特定的风俗或者关于美丑的教条里，每个人都可以作自由的选择。人们很喜欢赞美这种“多调”的精神上的自由，视其为相对于皇帝时代的巨大的、决定性的进步。

然而，威廉时代真的那么不自由吗？

在对法国启蒙时代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注意到，在 ancien regime 的最后几十年和威廉二世时期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亲缘关系。诚然，在路易十五和十六的统治下实行了一种审查制度，用巴士底狱、甚至刽子手来对付国王的敌人和上帝的否定者，发生过一系列十分严厉的判决——但是，分散在这一时期的整个长度看，这些并不算特别多。同时启蒙者们却能够不断地、而且往往是几乎不受阻碍地发表和传播他们的文字，而每一次对他们中间某个人实施的惩罚，都只会引来更加激烈的反叛檄文及其更大范围的传播。

同样十分相似的还有，威廉二世的治下还公开实行着专制的、道德的严厉管束，不时会有针对亵渎皇权或者冒犯上帝或者伤风败俗的审判发生。然而公共舆论的真正统治者是《辛普里齐西木斯》。不错，路德维希•福尔达（Ludwig Fulda）本来已经因为童话剧《护佑符》而收获席勒奖，结果却由于皇帝的干预得而复失；但是，相对于温良的《护佑符》，戏剧、新闻报章和幽默杂志对现状的批评其实要尖锐百倍。而且，在威廉二世时代，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全身心地投入每一种源自国外的思潮，同样，在文学、哲学、艺术领域进行实验也不受任何阻碍。只是在这个皇朝的最后几年里，才因为战争形势所迫而出现审查制度。我自己从野战医院出院后，曾经长时间在东战区最高指挥官辖区的书籍审查局做鉴定工作，所有给这个广大管辖区域的平民和军人阅读的书籍，都要按照战时审查的规定在那里过一遍，也就是说这地方会比那些国内的审查站点严格几分。而我知道这里的审查情形实际上有多么宽松，即便在这里，发出一道禁令也是十分罕见的！

不，以亲身经历通观这两个时期，我要说，那时有着广泛的文字自由，很少的几个言论禁忌案例应该可以视作例外。

这种情形的结果就是，不仅是语言的大的门类，演讲和文字，新闻报道的、科学的、文学的形式，得到了自由的发展，不仅有总体的文学流派，如自然主义、新浪漫派、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而且在所有的领域里，充满个性的语言风格都能够获得发展。

人们必须把这个直到1933年都繁荣昌盛、其后却一下子坏死的财富拉近了仔细观赏，才能完全理解那个整体划一化了的奴役何等贫瘠，这种贫瘠是第三帝国语言的一个主要特征。

这种贫瘠的原因似乎一目了然。人们以一个彻头彻尾组织严密的暴君体制进行监控，声称要保证国家社会主义的学说在每一点上、同样也在其语言上保持原貌。以教皇的审查为样板，在那些与党有关的书籍的书名页上写有如下字样："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对这一文稿的出版不持异议。旨在维护国家社会主义的党务监察委员会主席。"只有属于帝国文献协会的人才能发表言论，所有的报刊只允许发表一个中心站交付给他们的东西，顶多只能对文本做极为谨慎的微调，因为它与各个方面的密切相关——而这个微调也只局限于更换一下陈词滥调，所有人必须沿用的固定的陈词滥调。在第三帝国的后期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周五的晚上，在《帝国》周报出版的前一天，柏林电台都要播送戈培尔最新的《帝国》文章，这样每一次就从思想上确定了所有纳粹权力范围内的报刊到下一周该写些什么。于是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因为一方面他要像无声的上帝一样沉默，另一方面也不再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要说了；而戈林和罗森伯格尚能找到的自己的微小区别，也已经被这位宣传部长罗织进他的语言体系中去了。

这个小小的团队的语言法则，甚至是这一个人的语言法则，它所施行的绝对的统治覆盖了整个德语语言区域，而由于第三帝国的语言不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它便具有了更为决定性的影响力。尤为严重的是：它所含的一切都是演讲，必然是称呼，呼唤，忽悠。在这个宣传部长的讲话和文章之间不存在丝毫风格上的差别，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才很容易用来作激情演说。激情演说的字面意思是：高声的、抑扬顿挫地夸夸其谈，更加严格的字面意义是：呼喊出来。所以说，这个与天下人相

关的风格，就是这位鼓动者的市场叫卖式的风格。

这里，在表面的原因底下，一个导致第三帝国语言贫瘠的更加深层的原因浮上了水面。这个语言之所以贫瘠，不仅仅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向那个同样的榜样看齐，而且首先是由于它在自我选择的限制中，完全只将人性本质中的一面表达了出来。

每一种得以自由行为的语言，服务于一切人性的需求，服务于感情，也服务于理性，它是告知和谈话，自语和祈祷，请求，命令和起誓。第三帝国的语言唯有服务于起誓。无论这个主题属于什么领域，私人的或者是公共的——不，错了，对第三帝国的语言来说，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就像它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不加区分一样——一切都是演讲，一切都是公众的。“你什么都不是，你的人民才是一切”，它的一个标语口号就是这么说的。这意味着：你永远也不是与你自己、永远也不是与你的亲人独在，你始终在你的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

所以，我想说，认为在所有的领域里，第三帝国的语言全然只面向意志，这也是一种误导。因为，如果有谁呼唤意志，呼唤的总是个人，即便他是朝向由个人组合起来的全体。第三帝国的语言完全是针对个人的，扼杀个体的本质，麻木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致使他成为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动物中的一只，任人驱赶着涌向某一个规定的方向，令他变为一块滚动着的巨石的原子。第三帝国的语言是群体狂热主义的语言。当它转而面向个人的时候，不仅仅面向他的意志，而且也面向他的思维，当它在教导人的时候，它便是在传授狂热的方式和教唆群众的方法。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有两个最钟爱的表达，最钟爱的主题和最钟爱的替罪羊：神父欺蒙和狂热主义。启蒙主义不相信神父观念的真实性，视所有的崇拜为一场欺骗，是为了使一个共同体狂热起来、为了盘剥利用狂热者而发明的蒙蔽术。

从来没有一本神父欺蒙的著述——只不过第三帝国的语言中不讲神父欺蒙，而代之以“宣传”——写得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样赤裸

裸的恬不知耻。这对我来说将一直是第三帝国的最大的谜团：既然这本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在这个党掌权之前就已经流传多年，那么这本书是何以被允许，并且必然地全面传播开来的？而希特勒又为何依然得以上台、并能够持续统治了十二年？从来没有，整个法国的十八世纪也从来没有像第三帝国的十二年这样，让狂热这个词（连同那个隶属于它的形容词）占据如此中心的位置，在完全的价值颠倒之中，运用得如此频繁。

4

帕尔特瑙

在二十年代的后半期，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刚刚作为见习军官报名参加了帝国国防军。他的舅妈，一位大学同事的遗孀，是个激进的左派，苏维埃俄国的热情崇拜者。她把他介绍给我们的时候，语气里带有一种歉意。她说，他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很和善的年轻人，完全心地纯洁地选择了这个职业，没有沾染任何沙文主义和嗜血习性。在他的家庭里，儿子们历来都是做牧师和军官的，已经延续了几代人。他的父亲生前就是牧师，而他的哥哥已经在读神学了，于是他，盖奥尔格·M.，便把帝国国防军视为自己命定的用武之地，特别是因为他体操技能杰出，拉丁语却十分糟糕；相信他手下的人日子一定好过。

我们后来经常跟盖奥尔格在一起，觉得他舅妈的评价十分恰当。

是的，当他的周遭已然不再理会基本的正直操守时，他还表现出了一种单纯的、自然而然的正直品格。他当时正在位于史代廷的军营里等

候晋升少尉军衔，却多次到海林斯多夫来看我们，尽管那时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大肆蔓延开来，谨慎的学者和军官们已经避免与左倾人士交往，更不要说在犹太人的圈子里交往了。

很快，M. 就作为少尉军官被调往科尼希贝尔格的一个团里去了，我们好几年都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后来他的舅妈告诉我们说，他当时正在接受飞行员培训，作为运动员的他感到很幸福。

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一年——我当时尚在职，并试图与所有的纳粹读物保持距离——一本 1929 年出版的处女作偶然落到我的手上，是马克斯•瑞纳•海瑟（Max René Hesse）的《帕尔特瑙》（*Partenau*）。如今我已经不记得是在哪里、是在题页上还是只是在书的宣传夹页里写着“帝国国防军小说”的字样；反正这个总体性的指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本艺术上很弱的书：一部中篇，却占着一个未能驾驭的长篇框架，两个主要角色周围聚集了太多的不过是影子一般的人物，太多的大肆铺展的战略计划，只有那些专家和未来的总参谋长们才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找好平衡点的工程。

但是其内容，试图勾画国防军特征的内容，立刻让我震惊不已，日后又一次次地在我的记忆中浮现。中尉帕尔特瑙和容克基波尔德的友谊。中尉是个军事天才，一个钻牛角尖的爱国者和一个同性恋者。容克只想做他的弟子，而并不想做他的情人，结果中尉用手枪自杀。他完全被设想为一个悲剧人物：其性关系的迷乱在一定程度上被渲染得很具有英雄气，那种真正的男人友情的英雄气，而其未能满足的爱国主义是想让人去联想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的。整部作品是用战争和魏玛年代里表现主义的、有时是刻意神秘的风格写成的，类似于弗里茨•封•翁汝（Fritz von Unruh）的语言风格。但是，翁汝及那个时代德国表现主义作家们是和平的朋友，是人道的，他们无论怎样热爱自己的家乡也依旧怀有世界公民的理念。帕尔特瑙却相反，他脑子里装满了复仇的想法，他的计划也绝对不是单纯的大脑游戏；他谈论着已经存在的“地下

省份”[1]，谈论“组织起来的基层单位”的地下建构。唯一缺少的是一个卓越的领袖。“只需要一个人物，一个不仅仅会打仗和善营建的人物，就能够激活他们隐秘的昏睡的力量，使之变成一个巨大的灵活的工具。”如果这个领袖天才出现了，德国就会为自己创造地盘。这位领袖将会把三千五百万捷克人和其他非日耳曼民族移植到西伯利亚去，而他们目前的欧洲地盘将给德意志人民带来利益。这个民族因为其人种的优越性拥有对这些地盘的权利，尽管两千年以来，它的血液已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侵染和毒化……

容克基波尔德被他的中尉感染了，被他的观点激发得热血沸腾。“我明天就可以为了帕尔特瑙的梦想和思考去死”，他宣称；后来他又当面对帕尔特瑙说：“你是第一位让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如果我们普遍地对这个民族和国家深感不满，无法认同，那么，与之相比，良心、羞耻感、道德其实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前所述，这本书 1929 年就已经出版了。这里面，多少第三帝国的语言和观念已然率先登场！当时，在我往自己日记本里记录下这些关键句子的时候，也只能对此有所预感。而这种观念有一天竟然会落实为行动，整个军队，整个民族的“良心、羞耻感、道德”有一天真的会被关闭，这在我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我来说，这一切不过是个别人丧失了心理平衡而进行的疯狂幻想而已。然而那显然也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本煽动性的文字能够在共和国的体制下出版发行……

我把这本书拿给了我们那位热爱苏维埃的朋友；她刚刚拜访过她外甥的父母，从他们的乡村别墅度假回来。几天以后她来还书，没有表示出惊讶，说，这一切，不论是风格还是内容，她早已耳熟能详；这个作家想必作了极为细致的观察。“盖奥尔格，那么天真无邪、那么不文学

---

1 地下反对组织的民间表达。

的男孩，早已使用同样的语言写东西，脑子里早已转悠着同样的想法。”

可见平和、中庸的天性是怎样与他们的环境磨合的！事后我们记起来，早在海林斯多夫时，这位和善的年轻人就说过“清新的、快乐的战争”。我们当时以为他不过是人云亦云，信手拈来了流行的套话，根本未经过大脑思考。然而，流行的套话却对我们实施着暴力。“语言，为你吟诗，为你思考……”

我们这以后还多次听到这位舅妈谈到其外甥的发展情况。他作为空军军官变成了一个大阔佬。铺张挥霍，肆无忌惮，全身心都被他的阔佬加英雄的权利所浸淫。他穿戴奢侈的皮靴和衣物，享受高级葡萄酒。他握有审批开设赌场的决定权，于是便有好处落入囊中，也就是小人物们所谓通路子的钞票。“我们有享受生活的权利”，他写道，“我们可是每一天都在投入自己的生命。”

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这个平和的年轻人此时也在拿他兵士们的生命作赌。他对待这些生命的轻率态度，甚至越过了他的导师和榜样们的底线。作为一个飞行大队的指挥官，他让部下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进行高强度的、冒险的飞行训练，三个飞行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于这次事故还毁掉了两架造价高昂的飞机，结果这位当时的上尉军官被送上了法庭。对他的判决是将其开除出军队。——那以后不久战争就爆发了；我不知道 M. 后来怎样了，估计他们应该把他重新召回部队了。

《帕尔特瑙》在之后的文学史中几乎无人提及；比较而言，应该承认它在精神史上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在帝国军人的未酬壮志之中，植有一支第三帝国语言的深根。而年轻的一代仰望着他们，视他们为悲情英雄。

这是独特的德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关于各种民族心理的笑话：不同民族的人被要求以“大象”为主题自由作文。美国人写的文章是“我怎样射击我的第一千头大象”，德国人报告了“关于第二次普尼战争中大象的使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有很多的美式词语以及其他外来词的组成部分，多得有时几乎让人忽略了德语的核心部分。然而这个核心部分是存在的，并起着可怕的决定性作用，——

没有人可以说，这里讨论的不过是一个从外面带进来的传染病，以此作为开脱。军人帕尔特瑙不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而是许多同时代和同职业者的典型化肖像，是一位颇有学问的人士，而且并非只熟稔德军总参谋部指挥官的论著：他同样读了他的张伯伦，他的尼采和布尔克哈尔特（Burkhardt）的《文艺复兴》等等，等等。

5

摘自第一年的日记

几页纸，记述这个问题是怎样渐渐地、不间断地搅扰我，令我不安。至此为止，有关政治、vita publica 的话题基本上都是不进入日记本的。自从我获得德累斯顿的教授席位之后，我会不断警告自己，你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你现在属于你的科学研究——不要分散你的注意力，心无旁骛！然而眼下：

1933年3月21日。今天，“国家庆典”(Staatsakt)在波茨坦举行了。我怎能做得到集中心思工作而不去注意这个事件？这事之于我，就像之于《葛茨》中的弗朗茨：“整个世界，我不知道何以，总是把我推向他们。”不过我知道何以。在莱比锡，他们成立了一个将大学民族化的委员会。——我们大学的黑板布告栏上挂出了一幅长条通告（这在其他所有德国大学里也同样要挂出）：“犹太人用德语写作，即在说谎”；今后必须要强迫他，在其用德语出版的图书上标注“译自希伯来语”。——根据预告，德累斯顿在四月里要举办一个心理学家大会。于是《自由之战》

报登出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威廉·温特（Wilhelm Wund）的科学是个什么东西？……何等的犹太化……清除之！"这以后，大会就被取消了……"为了避免个别与会者带来麻烦"。

3月27日。新的词汇出现了，或者说老词赢得了新的专门的意义，或者说新的合成词在组合，它们因迅速模式化而僵化。冲锋队如今在高雅的语言里——而高雅的语言始终是 *de rigueur*，因为人们应该是十分欣赏它的——叫作"棕色的部队"（das braune Heer）。在外国的犹太人，特别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如今总是叫作"世界犹太人"（Weltjuden）。同样经常使用的还有"国际犹太属性"（Internationales Judentum），其中，世界犹太人和世界犹太属性构成这种德意志化（die Verdeutschung）。这是一种很可疑的德意志化：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在德国之外才存在犹太人吗？在德国内部他们又在哪里呢？——世界犹太人正在进行"可怖的宣传"（Greuelpropaganda）、传播"可怖的童话"（Greuelmärchen），假设我们在这儿略微讲述一点儿什么，那我们就是在进行可怖的宣传，并因此受到惩罚，这是每天都发生的事儿。此间，抵制犹太人的生意和医生的事件正蔓延开来。对"雅利安"（arisch）和"非雅利安"（nichtarisch）的区分掌控着一切。似乎可以编一部新的语言词典了。

我曾经在一家玩具商店里看见一只小孩儿玩的球，上面印有纳粹标志卐图案。这样一只球是不是也可以进入这部词典呢？

（这之后很快出了一项《保护民族象征符号》的法规，禁止这一类的玩具装饰和类似的胡来，但是我仍旧一直在思考第三帝国语言的界线问题。）

4月10日。一个人因为25%的非雅利安血统便成为"异质"（artfremd）分子。"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由种族研究专业人士决定。"Limpieza de la sangre，如同西班牙十六世纪时的情况。但是当时是因为信仰问题，而今天则是动物学 + 生意。

再说西班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笑话，"犹太人爱因斯坦"被一个西班牙大学挑衅性地聘用了，而且爱因斯坦也接受了这个聘书。

4月20日。又是一个新的节日之机，一个新的人民庆典日：希特勒的生日。“人民”（Volk）在现今的讲话和行文中使用得如此频繁，就像吃饭时用盐一样，给所有的东西都捏上一撮人民：人民的节日，人民的同志，人民团体，接近人民，背离人民，来自人民……

威斯巴登的医学大会真是可怜！他们热烈地、反复地感谢希特勒，称其为“德国的救星”（Retter Deutschlands），——尽管种族问题还没有完全获得澄清，尽管“异质人”（Fremden）瓦瑟曼（Wassermann），埃尔利希（Ehrlich），奈瑟（Neißer）都作出过伟大的成就，他们说。在我周围最近的“种族同志”（Rassegenossen）中，有些人已经将这双重的“尽管”称为勇敢的举动，而这一点正是事情最为可怜的地方。不，最最可怜的是我不得不思考这个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种族区分问题，始终不停地研究这个疯狂的观念，以至于我总是要在这一犹太的视角下考察德国全部可怕的黑暗化和奴役化。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希特勒之流对我个人赢得的一场胜利。我不愿意对他们服输。

6月17日。扬·基普拉（Jan Kiepura）究竟是哪里的国民呢？最近他准备在柏林举行的一场音乐会遭到了拒绝。这时他是犹太人基普拉。之后他在胡根贝尔格康采恩的影片中出场。此时他是“著名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然后他在布拉格用德语演唱《今夜抑或永不！》，人们嘘他。这时他是德国歌唱家基普拉。

（他是波兰人，我是在很晚以后才得知的。）

7月9日。几周前，胡根贝尔格（Hugenberg）下台了，他的德意志民族党“自行解散了”。从此我便观察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取代了“民族提升”（nationale Erhebung），人们比从前更频繁地称希特勒为“人民的总理”（Volkskanzler），人们开始说“集权国家”（totaler Staat）。

7月28日。他们在“拉特瑙清除者”（Rathenaubeseitiger）的墓前举行了一次纪念庆典。“拉特瑙清除者”，这个名词构成的背后，这种将谋杀提升为职业的背后，藏有多少蔑视，多少反道德，或者说多少刻

意强调的主人道德。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自我感觉该是多么强大！

然而，他们的自我感觉真的强大吗？事实上，政府的行动和言论里也有着很多的歇斯底里。对于这种语言里的歇斯底里，一定要进行一次特别的研究。比如那永远的死刑威胁！还有最近实行的规定，从12点到12:40中断所有的交通旅行，以便“在全德国范围内查找国家敌人的印刷品和传播者”。这其实就是半直接半间接的恐惧。我是想说，这种从美式的电影和耸人听闻小说里学来的制造紧张的绳套，自然也和直接诞生于恐惧的产品一样，是精心策划的宣传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也只有那些必须如此的人，那些感到害怕的人，才会行使这样的宣传手段。

再如为何老作那些重复来重复去的文字——不停地重复显然是他们的语言的一个主要手段——那些关于东普鲁士就业战役捷报频传的文章？他们从法西斯分子的battaglia del grano复制过来这种制造就业的方式，不需要人人皆知；但是，即使最愚笨的人也会明白，农业地区在收割期间很少有人失业，东普鲁士地区这种失业率的暂时回落并不能推演为一般性的、持续的失业人数下降。

在我看来，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最强烈的症状表现在希特勒的出场本身。昨天的每周新闻里有一个有声的电影录像；领袖在一个大集会上说了几句话。他握紧了拳头，扭曲着面孔，与其说那是一个讲话，毋宁说是一场狂吼、一阵怒火的发泄：“一月三十号他们（他当然是指犹太人）嘲笑了我——要让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他现在似乎权力无边，或许他也确实权力无边；但是从这个录像里看，他的声音和手势所表露出的，却正是昏晕失控的怒火。而且，真正确信自己有恒久、毁灭性力量的人，会像他那样不断地絮叨千年大业和被歼之敌吗？——我几乎是带着一丝希望从电影院走出来的。

*8月22日。*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了对希特勒感到厌倦的迹象。见习教师Fl.，不算什么真知灼见者，但却是一个很规矩的小伙子，他在马路上招呼我，当时他穿着便装，对我说：“如果您某一天撞见我身着钢盔制服、手臂上戴着弯钩十字的标志，可别惊讶啊。我必须得戴——

但是强制性的东西不会使我们有任何改变。钢盔依旧是钢盔，是比冲锋队好的东西。我们，德意志民族党人，将带来拯救！”——克拉朴曼女士，临时替补的清洁工，丈夫是邮局的打杂工，她告诉我：“教授先生，十月一日，A19 局的邮局职员‘喜乐’协会就要被整顿划一了。但是那些纳粹甭想拿走协会的任何财产；男士们马上要举办一次煎肠聚餐，餐后是女士们的咖啡聚会。”——阿奈玛丽（Annemarie），说话不加掩饰，一如既往的医生风格，讲她一位同事的雷语，那人冲着手臂上的弯钩十字带道：“这该怎么办？这东西就像妇女用的卡麦丽亚卫生带。”——还有库斯克，经营蔬菜的，讲述了最新的晚祷告词：“亲爱的上帝，赐我去死，让我不能前往霍恩史泰因。”……我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我从这一切中间汲取希望？当人民从醉醺醺的状态中缓过神来，开始发出清醒后的抱怨时，这个彻头彻尾的疯狂应该就难以为继了。

8 月 25 日。这些厌倦疲惫的症候有什么用啊？所有的人都心怀恐惧。我的《德意志的法国形象》说好在“柯维勒 & 迈耶”出版社出的，而且首先在《新语文学月刊》上发表。这家杂志由希卜纳校长或希卜纳教授，一位十分善于掌握尺度的、规规矩矩的学问家主编。几周前，他写信给我，口气很压抑，问我是否愿意至少是暂且不考虑发表这项研究；他说，出版社里有“企业基层组织”（Betriebszellen）（奇怪的字眼，将机械的东西和肌体的东西拼装到一起——这个新的语言！），虽然我们很想维持这份优秀的专业杂志，但是政治头头儿们却对专业形象问题毫无兴趣……这以后我转向迪斯特维克出版社，我的完全客观的、材料非常丰富的作品应该是他们求之不得的。然而我得到的却是最迅速的拒绝；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部著作“纯粹是向后看的”，而且“缺少作为种族的民族的视角”。发表作品的机会被封杀了——堵住我嘴巴的时日也即将到来？在刚刚过去的夏季学期里，是“前线战士”的资历保护了我——这个保护伞还能管用多久？

8 月 28 日。我不可以失去勇气，不可以，这个民族不会长久地跟他们合作的。人们说，希特勒特别依赖于小市民阶层的支持，这显然没

有说错。

我们参加了一个“任由驰骋”之旅。大约有八十人，坐满了两辆客车，是最容易想象的小市民群体，完全自成一体，完全清一色，没有夹杂一点工人成分，或者高层次的、思想自由一些的市民阶层。在吕宝有一个边喝咖啡边欣赏讽刺说笑的节目，表演者是旅行的陪同或者组织者；这在这类短途旅行活动中很常见。表演者先是朗诵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歌颂领袖和德国的救星（Retter des Deutschlands），歌颂新型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等等、等等，把全部的纳粹玫瑰经念诵下来。观众们很安静，很淡漠，最后只有一个人鼓掌，这个全然孤立的拍手让人察觉到全体掌声的缺失。然后那个表演者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他在理发时经历的事儿。一个犹太妇女要烫发。“很抱歉，尊敬的太太，我不可以给您烫发”，理发师说。——“您不可以？”“不可能！领袖就抵制犹太人问题作过庄严保证，在德国不允许伤害犹太人，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弄弯。这一点今天仍然适用，随便什么可怖的童话都不能改变。”这时，笑声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我难道不可以从中作出某种推断吗？这则笑话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对于各种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不都很重要吗？

*9月19日。*电影院里放映着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场景。希特勒以抚摸1923年的血旗（Blutfahne）为冲锋队新建立的支队洗礼。他每一次触摸旗帜都伴以一声礼炮。这简直就是戏院与教堂的一种混合编导！即便完全不看舞台上的场景——光是看“血旗”这个名称。“尊贵的兄弟们，请往这儿看：这流血的殉难令我们疼痛！”就这一个词语便将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活动从政治范畴提升到了宗教范畴。这个场景和这个词语发生着作用，不受任何质疑，人们坐在那里，沉浸其中，全身心投入——没有人打喷嚏或者咳嗽，听不到面包纸的窸窣声，听不到嘴里吧嗒糖果的动静。党代会成了一个顶礼膜拜的活动，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了一个宗教——而我却想要自己相信，它的根基不过很浅很松？

*10月10日。*同事罗伯特·维尔布朗特（Robert Wilbrandt）来到我

们家。问我们是否愿意接待一个危害国家的客人？他突然被解聘了。杀手锏叫作“政治上不可靠”。有人重新翻出了和平主义者古博尔（Emil Julius Gumbel）事件，而这位同事曾经在马尔堡公开站在古博尔一边。还有就是：他写过一本关于马克思的小书。现在他准备去南德，想找一处位于偏僻地区的小窠臼，一头埋进自己的研究里……如果我也能这样多好啊！强暴行为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解聘的事件在专业同事的犹太人圈子里越来越多。海德堡的奥尔士基（Leonardo Olschki），莱比锡的弗里德曼（Wilhelm Friedmann），马尔堡的史必策（Leo Spitzer），还有雷尔希（Eugen Lerch），这个住在明斯特的完全雅利安血统的雷尔希，只因为他“与一个犹太女子同居生活”。金发碧眼的哈茨菲尔德（Helmut Hatzfeld），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胆怯地问我是否仍然在职。我在回信中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完全不沾犹太血统边的人也会感到害怕。他寄给我一个他的学术文章的单行本；在他的名字下有他的墨迹：“衷心的问候——25%。”

语言学专业杂志和高等学校联合会杂志如此浸泡在第三帝国的“行话”里，以至于其中的每一页都确确实实地令人作呕。“希特勒的铁扫帚”（Hitlers eiserner Besen）——“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科学”（die Wissenschaft auf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asis）——“犹太精神”（der jüdische Geist）——“十一月之徒”（die Novemberlinge）（这是指1918年苏维埃的革命者）。

10月23日。我的工资里被扣除了一项“自愿冬季救助”（Freiwillige Winterhilfe），没有人在此之前问过我这件事。这应该是一项新的税收，是不允许拒绝的，同样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税；“自愿”只是表示人们在确定的款项之外可以增加支付，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可以”的后面已经存在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强迫。但是即使完全排除这个骗人的附加词，那个主词本身难道不也已是一种强迫的面纱了吗？不也已是一个请求、一个向情感发出的呼吁了吗？“救助”替代“纳税”：这就叫人民共同体。第三帝国的行话很煽情；而煽情总是很可疑的。

10月29日。突如其来的Ukas，将对大学的教学计划发生很大的影响：周二下午不能有课，要空出来，让全体学生在这几个小时里从事国防体育练习。我几乎在同时撞见了这个印在一个香烟盒上的词：国防体育牌（Marke Wehrsport）。一半是面具，一半是卸除面具。一般的兵役已经被凡尔赛条约禁止；运动是准许的——公开而言，我们没有做任何不允许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其实做了一点，并且从中弄出了一点威胁，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暗示了拳头，那个目前尚紧握着放在兜里的拳头。我什么时候能在这个政体的语言里发现一个真正诚实的词语呢？

昨晚古斯媞•W（Guti W.）在我们这儿，她刚回来，和姐姐玛利亚•石特林贝尔格（Maria Strindberg）一起在图瑞生活了四个月，住在卡琳•米沙艾利斯（Karin Michaelis）那儿。那里显然聚集了一小群共产主义逃亡者。古斯媞讲述了不少可怕的细节。当然是“可怖的童话”，只可以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悄悄耳语的东西。特别是现年六十岁的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在一个特别凶恶的集中营里忍受的那些苦难。人们可以把那句成语稍微变化一下，说：更坏的是坏的朋友；我真的开始将墨索里尼政府看作一个几乎人性的和欧洲的政府了。

我在想，是否可以把“流亡者”和“集中营”这样的词收纳进一个希特勒语言的词典里去。流亡者：这是一个国际流通的表达，指的是逃离法国大革命的那些人。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称他的一册欧洲文学史为流亡者文学。后来人们又谈论俄国革命的流亡者。现在则有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群体——在他们的阵营里有德国！——，而“流亡者的特性”是一种受人喜爱的*mot savant*。那么这个词在未来未必会黏附上第三帝国的尸臭味。而“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则相反。这个词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听到过，那时候，它对我真的是有一种异国－殖民地的、非德国的色彩：在布尔人战争期间经常听说“Compounds”或者“集中营”这样的词语，布尔人就是在集中营里被英国人监视着的。后来，这个词完全从日常德语中消失了。现在它又突然重新出现了，表示一种德国的机构，一种和平的设施，为在欧洲的土地上针对德国人而设

立，一种持久的设施，而不是临时的针对敌人的战争措施。我相信，无论将来这个词在哪里出现，人们都会想起希特勒德国，只会想起希特勒德国……

我这叫心肠冷酷、狭隘的好为人师吗，因为我一次一次地、越来越多地持守在这场苦难的语文学层面上？我真的在检视自己的良心。不，这是自我守护。

11月9日。今天在我的高乃依讨论课上一共只来了两位学生：戴着犹太人黄色卡片的罗若·伊萨科维茨；希尔舒维茨，非雅利安血统，父亲是土耳其人，佩戴着无国籍者的蓝卡片——真正的德国学生是棕色卡片。（又是那个界定划分的问题：这属于第三帝国的语言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听众，少得令人恐惧？法语不再是师范学生喜爱的专业了；这成了一种不爱国的选择，更不要说犹太人教授的法语文学了！到我这儿来听课几乎已经需要一点勇气了。而雪上加霜的是，眼下所有专业的课堂出勤率都很差：学生们被“国防体育”以及十来个类似的科目弄得超负荷运转。最后还有：这几天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几乎不间断地帮助作选举宣传，帮着进行各种搬迁，参加许多集会等等、等等。

这是我至今经历的戈培尔最大的哗众取宠的行径了，我很难想象还能有更夸张的情况。对领袖政治和帝国国会的“统一名单”进行的全民公投。从我的角度看，整个事情是无以复加的拙劣和愚笨。公投——认识这个词的人知道（如果谁不认识这个词，会有人给予解释），公投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拿破仑三世，而希特勒照理说并不愿意跟他有什么关联。而“统一名单”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会作为议院已经走到头了。整个宣传实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惑众游戏——人们在大衣翻开的衣襟上戴着一块写着“赞同”的小牌子，因为他们不能在这些小牌子的出售者面前说“不”，否则就会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这样的一种强奸民意之举，本来是必然达不到它企图达到的效果的，而只能走向其反面……

本来——可是我到今天也没有等到这个“本来”，我错了。我像一

个知识人那样去评判，而戈培尔先生面向的是一个被灌醉了的大众群体。此外，他还面向知识分子的恐惧。更何况没人相信他们会保守选举的秘密。

在打击犹太人方面，他已经夺取了巨大的胜利。周日那天我们邀请了必须邀请的K.夫妇到家里来喝咖啡，结果却导致了一个令人憎恶的场面。之所以说“必须”，是因为这家的夫人热衷于附庸风雅，喜欢不加思考地对每一种最新的或者是刚刚听来的观点鹦鹉学舌，早已让我们忍无可忍；不过那位先生，虽然他很爱扮演智者纳坦的角色，但我感觉他还是比较理智的。那天他用跟犹太国民中心协会完全一样的口气宣布，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在公投的时候投赞成票，他的太太补充道，魏玛共和国制度现在证明了它的不现实性，人们必须“脚踏实地，站在事实的一边”。我完全失去了自制，一拳击在桌子上，弄得咖啡杯丁零作响，冲着那男人叱问，他难道不认为这个政府推行的政治是罪恶的吗？他非常有尊严地回答道，我没有权利提这个问题，并且以嘲弄的语气反问我为什么还留在公职里。我说，我不是希特勒政府聘用的，也不为其服务，并且希望比它长命。K.太太却还要强调，人们必须要承认，领袖——她真的说“领袖”——是一位天才的人物，他非凡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也是难以抵挡的……我今天差点要让K.两口子尝尝我这人的厉害。近来，我从我们这个圈子里相当多的犹太人那里听到了十分类似的观点。持这些观点的人无疑都是属于知识阶层的，一般来说，他们无疑都算是安静地、独立地思考的人……某种雾障在那儿，正在侵蚀所有人。

11月10号，晚间。我今天中午在戴姆伯（Harry Dember）的收音机前经历了这个宣传招徕的高潮。（我们的犹太物理学家，已经被解聘，但也已经在应聘一个土耳其的教授席位，正在谈判中。）这一次是戈培尔安排的，然后他做了自己导演下的播报者，确实是一个大师的手笔。一切都是以工作与和平为出发点，为了和平的工作。先是全德国整体的汽笛呼啸和全德国的静默一分钟——这当然是他们从美国学来的，从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和平庆典上学来的。但是在这之后便是围绕着希特勒讲

话的系列活动，也许没有更多的原创性（参见意大利），但实施得是绝对完美的。位于西门子城的机械大厅。持续了数分钟的企业运行噪音，锤声，金属撞击声，轰鸣声，口哨声，碾磨声。然后是汽笛声和歌声，以及关停了的机轮逐渐暗哑下去。然后从寂静中平静地传出戈培尔低沉的声音，传出他作为领袖使者的报道。接着才是希特勒，四十五分钟都是他。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的整个讲话，本质上讲，我的印象与以前一样。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过度激动的、过分叫喊的、常常显得嘶哑的声音。只是这一次许多片段都使用了一个教派首领带着哭腔的宣讲声调。他宣讲着和平，他为和平呼吁，他宣称德国的和平意愿不是出自于个人的荣誉心，而只是为了能够保卫和平，反抗一个毫无根基的国际买办集团的袭击，后者为了他们的利润无所顾忌地挑动千百万各国民众相互敌视攻击……

这一切，再加上夹杂其间的训练有素的呼喊（犹太佬！），当然都是我早已熟悉的。然而他的这一切陈词滥调，他全部的、即便最耳聋的人也能听见的冲天嘶吼的谎言，通过一步步深入人心的宣传攻势还是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新的影响力，我认为这个宣传攻势借助它许多成功的细节极为杰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在预示的广告和预告的宣传中注明："13：00 到 14：00 庆典。阿道夫·希特勒在第十三个时辰里到工人中间去。"每一个人都能懂，这是《新约·四福音书》的语言。我主，救世主，走向穷人和失败者。这里狡猾之至，连具体时间都精心标示。十三点钟——不，是"第十三个时辰"——这听起来像是太晚了，但是，他将带来一个奇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太晚的。党代会上的血旗，那也已经表示同样的指向。但是这回，教堂仪式的局限被冲破了，时代久远的衣饰被捋下了，基督传说被直接送到了眼前：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拯救者，来到了西门子城的工人中间。

*11月14日。*我为什么要指责 K.S. 和其他那些人？昨天宣布了政府的胜利：希特勒获得 93% 的选票，四千万票支持，两百万票反对；三千九百万人支持帝国议会（臭名昭著的统一名单），三百万票"无效"。

这消息令我与许多人一样震撼不已。我可以不断地对自己说，首先这是一个强迫出来的结果；其次，在缺少任何监督的情况下，肯定还有篡改行为，正如那个来自伦敦的消息身后必定隐藏着一个篡改和讹诈的合谋一样，消息说，人们在那儿特别赞叹的是，甚至在那些集中营里，大多数人都投了赞同票——，尽管如此，我依然无以抵御希特勒这一胜利的影响，当时如此，此刻依旧如此。

我不由得想起我们二十五年前从伯恩霍尔姆往哥本哈根的航行。一夜风浪肆虐、晕船折腾之后，大海平静下来，人们在海岸的安全区内，坐在甲板上，沐浴着美丽的朝阳，享受着迎候早餐的愉快时光。这时，在长长的座椅的尽头站起来一个小姑娘，跑向船舷栏杆，呕吐起来。一秒钟之后，坐在她身边的母亲站起身来，做同样的动作。紧接着那位女士旁边的先生跟了上去。然后是一个小伙子，然后……这个行动沿着那张长椅均衡并迅速地延续下去，无一人例外。我们这一头离危险地带还很远：人们颇有兴致地瞧着这情形，笑着，做着嘲笑的表情。然后呕吐越来越近，然后笑声消失，然后我们这一翼的人也跑向船栏杆。我仔细地注视着事态，也仔细地注视着我的内心。我对自己说，有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叫客观地观察，我是有这方面的训练的，而坚定的意志也是有的，我正在期待着早餐——然而当轮上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同样的强迫，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跑向船舷杆。

*

我把我日记本里有关纳粹主义最初几个月的新状况和这个新语言的东西，以原材料的形式集中到了一起。与后来相比，我那时的情况还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还在职，我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还是几乎不受干扰的观察者。另一方面：我也还没有任何一点钝化，我还是完全习惯于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生活，所以很多在那时视作是地狱最底层的东西，在后来则顶多会看成是地狱的前院，看成但丁的凌波炼狱。总之，不论将要到来的事情有多么糟糕，日后出现的所有的纳粹主义的思想、行为和语言，在这最初的几个月都已经表现出其端倪。

6

三个最早的纳粹词

头一个咄咄逼人的、让我感觉特别纳粹的词，是与第三帝国让我痛失的第一位朋友联系在一起的。说它特别的纳粹不是因为它的构成，而是由于它的新用法。十三年前，我们和 T. 于同一个时间来到德累斯顿，进入了工大，我作为教授，他是刚入学的学生。他几乎就是那种天才少年。天才少年经常给人们带来失望，而他却好像毫发不伤地超越了天才少年的危险年龄段。他出身于底层市民家庭，从小生活十分贫困，在战争期间被人发掘出来，被发现的过程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一位外地来的著名教授要对莱比锡一家工厂里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检验，需要看一个新机器的运行；由于部队征兵，工厂里缺少工程师，当时刚巧在场的安装工懵懵懂懂，惹得教授十分生气——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油腻的学徒从机器下面爬出来，解释了必要的问题。这些东西虽然与他无关，但他是个有心人，平日里的关注和夜间的自学帮助他掌握了这些必要的知识。于是，教授伸出了援助之手，而这个年轻人的巨大潜力更通过这次

的成功得到了激发，在其后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初中生几乎在同一天内通过了他的钳工证书考试和传统高中毕业考试。这以后，他得到了边工作边学习的机会，一边从事技术职业挣取生活费用，一边进入大学深造。他的数学和技术方面的天才继续得到证明：年纪轻轻，也没有进行一般的硕士工程师的毕业考试，他就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职位。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所有数学、技术方面的东西都十分陌生，感觉它们遥不可及，而这位年轻人却让我觉得亲近，因为他的知识面很宽，思路开阔。他搬进了我们这座房子，从同一个屋檐下的邻居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义子，他半开玩笑地、同时也是十分当真地称呼我们父亲与母亲，我们对他的学养大概也有一定的帮助。他结婚很早，而我们之间真诚的亲切关系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身处其中的四个人谁也不会料想到，政治观点的分歧竟然会导致这层关系的破裂。

后来，国家社会主义向萨克森蔓延。我在 T. 身上察觉到他最初的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我问他，他怎么可以对这些人产生好感呢？“他们其实和社会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同”，他说，“他们不也是一个工人政党吗？”——“你难道看不出来，他们想要的是战争吗？”——“顶多是想要一场解放战争，这个战争必然会给整个人民大众，于是也就会给工人和小老百姓们带来好处……”

我开始对他理性的强大程度产生怀疑。我试图从另一个方面去触动他。“你在我的房子里住了多年了，你是知道我的想法的，你经常说跟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跟我们的伦理价值观也很一致——你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还去相信这样一个政党？它可以因为我的出身否定我做德国人和做人的资格。”——“你把这一切看得太严肃了，爸爸。”——（“爸爸”是用萨克森方言说的，大概是为了给这句话、或者说给整个讨论一点轻松的感觉吧。）——“这个闹腾犹太人的阵势不过是服务于宣传目的的。你等着瞧吧，一旦希特勒大权在握，他肯定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而不是去责骂犹太人……”

但是闹腾是有其影响的——同样也对我们的义子有影响。一段时间

以后，我向他询问一位他认识的年轻人。他耸耸肩膀说："在AEG那儿，你知道的，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一切都是真正的日耳曼人（Alles echte Germanen）？'"他笑起来，并奇怪我没有跟着一起笑。

后来，在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之后，他打来电话请我们吃饭，那是在希特勒上台执政不久。"你们厂里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道。"非常好！"他回答，"我们昨天经历了一个很棒的日子。在奥克利拉有几个狂妄的共产主义分子，我们在那儿进行了一场惩罚性袭击（Strafexpedition）。"——"你们进行了什么？"——"哦，就是让他们进行矛巷跑步[1]，穿过橡皮棍，和一点蓖麻，不流血的，但是还是很有作用，正所谓一场惩罚性袭击。"

"惩罚性袭击"，这就是我感觉到的第一个纳粹专用词，是我的第三帝国语言的最早的一个词，也是我听到的T.的最后一个词；我挂断了电话，甚至没有对他的邀请表示拒绝。

我所能想到的粗暴的居高临下和对陌异类型人群的蔑视，都浓缩在"惩罚性袭击"这个词里面了，它听起来如此地具有殖民色彩，让人仿佛看见一个被包围的黑人村落，听见落在非洲河马身上的皮鞭抽打声。

后来，这段回忆对我来说虽然十分苦涩，却也夹杂一点可供安慰的东西，只可惜这东西并不持久。"一点蓖麻"：这个行动显然是模仿了意大利人的法西斯习惯性做法；而整个纳粹主义在我那时看来也不外是意大利的传染病。在揭去了面纱的真相面前，这个安慰就像晨雾退去一样，消逝了；纳粹主义核心的、万劫不复的罪孽是德意志的，不是意大利的。

不过，包括对"惩罚性袭击"这个纳粹的（或者是法西斯的）词语的回忆，假如没有与个人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我也一定会像成百万计的

1　Spießruten，17、18世纪的一种军事惩罚：被惩罚者要从100—300人组成的狭道里穿行多次，裸背挨每人棍击。

其他人一样完全遗忘，因为这个词只属于第三帝国的初创时期，这个政权建立后便被甩在身后而毫无用处了，就像飞箭被航空炸弹超越了一样。半私人的、周末运动性质的惩罚性袭击很快由正规的、官方的警察行动取代，蓖麻被集中营取代。而第三帝国开张六年后，成为警察行动的德国内部的惩罚性袭击又被疯狂的世界大战覆盖了，这场大战在它的发动者心目中同样是一种对遭受蔑视的各国人民的惩罚性袭击。词语就是如此销声遁音的。——而另外两个表述却相反，它们显示了另一个极端——你什么都不是，我是一切！——它们不需要个人的回忆以保持记忆，它们一直生存到最后，任何一种第三帝国的历史叙述都不会遗忘它们。

我在日记本上记录的下一个语言案例叫作：国家庆典（Staatsakt）。这是一个几乎望不到底的系列国家庆典的头一个，由戈培尔策划，举行于 1933 年的 3 月 21 日，波斯坦军营教堂。（纳粹将自己置身于讽刺滑稽之中，很奇怪地对之毫无感觉；有时候，人们真的想相信他们并非主观恶意！他们把军营教堂的音乐钟声：“永远保持忠诚和正直！”作为其柏林电台的标志，并把他们创作的帝国议会会议的滑稽戏放进了一个戏院大厅，即科罗尔剧院里。）

假如说第三帝国语言的动词“炫 / 扩展”（aufziehen）有什么地方是用得合理的话，那一定是在这儿；国家庆典的形式总是按照同一个模式炫展开来，当然是两道队列，有或者没有棺材作为中心。旗帜，队列，彩带花环，军乐和合唱团，演讲烘托，那眩丽的景况基本都是一样的，基本都是以墨索里尼为榜样的。在战争中，棺材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中心位置，这种吸引力开始疲软的宣传手段又被扑朔迷离的东西再度张扬起来。经常有某个在战场上牺牲或者在事故中不幸遇难的将军获得国葬的礼遇，而同时又传言他是因为失宠于元首而被元首下令除掉了。这类传言，——无论它们是否合乎事实——，它们得以产生本身，就有效地证明了人们对第三帝国的语言真实性的怀疑程度，证明了人们对这个语言谎言含量的认知。然而所有国家庆典中最大的谎言，一个后来已经被证明了的谎言，是为第六军及其元帅举行的遗体告别。他们称这些

将士忠诚地坚守到最后，直至牺牲，人们将从失败中翻开未来英雄主义的新篇章；但是事实上，这些军人是归降的，他们不想像他们几千名战友那样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罪恶的事业遭受杀戮。普利威尔（Theodor Plievier）在他关于斯大林格勒的书中写到了这个国家庆典，具有震撼人心的讽刺作用。

纯粹从语言上看，这个词被双重地膨胀化了。一方面，它表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并且确认，国家社会主义授予的荣誉就是国家的认可和鼓励，也就是说它蕴含了专制主义的*L'Etat c'est moi*（法语：国家即我）。而这样一来，它又给这个表达提高了身份。一次国家庆典是进入国家历史的事情，也就是应当长久地保留在民族记忆中的东西。一次国事活动具有特别庄严的历史意义。

这个词是国家社会主义自始至终一直无度滥用的。这个党自视甚高，不可一世，极其坚信其职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或者是表现得信心十足，以至于有关于他的每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他触摸的所有事情，都具有历史意义。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来说，元首发表的每一个讲话都是历史性的，即便他同样的东西讲了一百遍；元首与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的每一次会见都是历史性的，即便会见对现存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德国的一辆赛车获胜是历史性的，一条汽车公路通车剪彩是历史性的，而每一条公路，每一条公路的每一段都要进行通车剪彩；每一次丰收感恩节是历史性的，每一次党代会是历史性的，每一个节日，无论什么形式的，都是历史性的；而由于第三帝国的眼睛里只有节庆日——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帝国患了日常缺乏症，病入膏肓，完全就像缺盐的身体会病入膏肓一样——，所以它认为它的所有的日子都是历史性的。

多少头版头条，多少社论和讲话使用了这个词，并扼杀了它荣耀的音声！如果想要它恢复元气，人们必须爱惜它，无论怎样悉心呵护都不够。

像这样去警告人们，不要滥用国事活动这个词，如今是多余的了，因为我们不再有国家。

7

炫／扩展

我给一只钟表上弦（aufziehen），我旋紧（aufziehen）织布机上的一块织品的经纱，我给一个自动玩具上发条（aufziehen）：所有这些都是机械的动作，作用于一个无反抗力的、无生命力的东西。

从一个自动玩具转动的、发出嗡嗡声的陀螺，跑动的或者点头的动物，从这里引出了这个表达的比喻用法：我炫一个人。意思是：我戏弄他，我把他弄成滑稽的人，弄成玩偶；柏格森（Henri Bergson）这样解释滑稽：滑稽就是把有生命力的东西弄得机械化。这一解释在这个语用的例子中得到了证实。

无疑，在这个意义上的“Aufziehen”，虽然含义单纯，却已经是一个贬义词。（语文学家这样称呼每一个“变坏了的”或者变微小了的词义；皇帝的名字奥古斯图斯，崇高者，作为贬义词时变成了愚蠢的奥古斯特，马戏团小丑。）

在现代，“aufziehen”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含义，既是赞扬的、同时毋庸置疑也是贬义的。人们谈论一个广告，说它炫得很好或者很大。这既表明对生意上的能干和广告技术方面能力的肯定，但同时也指示出其夸大、过度和市场叫卖式现象，以及与被举荐东西的真实价值不完全符合的情况。而当戏剧评论家断言道，某剧作者把这个或者那个场景大大地炫了一把时，这个动词便是完完全全、毫无疑问的贬义词了。它意味着，这个作者与其说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毋宁说是个肆无忌惮的工匠（和误导观众的诱惑者）。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阶段，其语言似乎正是接受了这个暗喻性质的指责词义。纳粹的报纸鼓励听话的学生们，把他们“砸烂马努斯·赫尔施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教授用作性学研究的炫科学研究所”行为夸赞为爱国主义行动。赫尔施菲尔德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的研究所是“炫科学的”，不是真科学的。

然而过后没几天，就有事实表明，这个动词其实并没有贬义附身。1933 年 6 月 30 日，戈培尔在政治大学宣称，德国国社劳工党已经“扩展（aufziehen）成了一个几百万人的巨型组织，其中囊括了所有的活动形式，人民戏剧、大众体育、运动旅游、徒步跋涉、唱歌，国家从财力物力等各个方面予以支持”。这时的“aufziehen”是完全诚实的；还有，当政府以胜利凯旋的姿态对萨尔地区公决前的宣传情况进行总结时，用了“大力扩展开来（aufgezogene）的举措”这种说法。没有谁还会想到在这个词里找到什么广告性的东西。1935 年霍勒 &Co. 出版社从英语翻译出版了德语版《野问清治，日本书报王自传》。书里有：“现在我决定……，为培养大学生演讲者扩展一个示范性的组织。”

显而易见，这个动词本身的机械意义全然未被察觉，因为它一次又一次地运用在一个组织身上。这里公开展示了第三帝国语言的一个最强烈的矛盾对立关系：这个语言处处强调有机之物、自然生长之物，但同时它又被机械的表达所淹没，对“扩展开来的组织”，对这种由拼合造成的风格的破坏和尊严的丧失全无感觉。

“问题只在于，人们是否可以把‘aufziehen’归罪于纳粹”，F. 插言道。1943 年的夏天，我们俩在同一个制作德国茶的搅拌桶跟前上夜班，那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活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因为周围的灰尘非常吓人，我们不得不像外科医生那样把头脸蒙起来；休息时我们取下眼镜、口罩和帽子（F. 戴着法官帽，他以前是州法院的法官），坐在一只箱子上聊天，如果不讨论战争形势，我们就会谈论各个民族人的心理。他像所有居住在狭窄的史波热巷里的犹太人一样，于 1945 年 2 月 13 日到 14 日的夜里遭到灭顶之灾。

关于“aufziehen”，他认为，这个词在 1920 年前后就具有完全中性的意义，他听到和读到过。“与‘张贴 / 布告’这个词一起，情况相似”，他说。我反驳他道，我还不知道；“aufziehen”从那时起就是中性的，而根据记忆，把它与“张贴 / 布告”放到一起，这就更让我推断出它的贬义色彩。特别是，我在所有相关的回顾思考中原则上都持有这种观点，对我来说，关键的问题从来不在于确定一个表达或者某一个词的性质的第一次，因为这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认为找到了使用某个相关词的第一人，总是还会有一个他的前人存在。F. 只需要在毕希曼（Georg Büchmann）里查找一下“超人”（Übermensch）词条：这个词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我自己最近在老冯塔纳那里，在《史代西林》里发现了一个“人下人”(Untermensch)，而纳粹认为是他们发明了犹太的以及共产党性质的“人下人”和从属于之的“人下人的文化特性”，并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尽管让他们为之骄傲去吧，就像尼采也同样可以为他的“超人”而骄傲，尽管在他之前还有多位著名的先人使用过它。因为一个词或者某一种词的色彩或者词的性质，只有在一个语言里才能赢得生命，只有在走进一个群体的或者广泛的语言使用之后，并且在那里立足了一段时期以后，才是真正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超人”毫无疑问是尼采的创造，而“人下人”和没有讽刺意义的中性的“aufziehen”也肯定应该记在第三帝国的名下。

它们的日子将和纳粹主义的一同终结吗？

我为此而努力，但是，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我是在1946年的1月对这本笔记进行整理加工的。在完成它的整理工作后的第二天，我参加了一个德累斯顿文化联合会的会议。十来个人，都是那些赢得了选举因而格外高雅、应当起到榜样作用的人士。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筹办一个眼下到处都在流行的文化周，其中有一个艺术展览会。一位先生说，一些捐赠给“人民团结互助”、现在拿来参加展览的画，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立即有人应和他：“不像话！我们既然在德累斯顿这儿举办一次艺术展览，那我们就一定要把它aufziehen得宏大、无可挑剔。”

8

十年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驻德累斯顿领事馆的邀请，星期天上午，1932 年 10 月 23 日，观看电影——写明*film sonoro*[1]，尽管如此也还是无声的——“十年法西斯主义”。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人们在写法西斯主义［Faschismus］时已经用 sch 代替了 sc，也就是说这个词已经入乡随俗了。然而十四年之后，我以政府专员的身份考问一个人文专科中学的毕业生是否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这个词来自于 fax，火炬。”他并非智力平庸，他肯定做过人民少年队员和希特勒青年团员，他肯定收藏邮票，并且认识墨索里尼时代意大利邮票上的束棒，而且他当然会从多年的拉丁语阅读经验中知道这个，尽管如此，他却不知道法西斯主义这个

1 意大利语：有声电影。

词的含义。他的同学纠正他说："是从 facsis 来的。"但是，如果连一个接受纳粹教育的文科中学学生都不了解的话，不难想象，会有多少其他人对这个词和概念的基本含义不甚了了？……同样的疑问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朝我逼来：关于一个国民的知识和思想，关于他们的精神与心灵状况，有什么是可以确定地表明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和看见 Duce[1] 演讲。那部电影是一项宏大的艺术工程。墨索里尼从那不勒斯宫殿的阳台上俯身向人群讲话；群众的镜头和演讲者的大幅镜头、墨索里尼的演讲和演讲对象的回应声相互交替。人们看见，Duce 是如何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其每一句话的，如何不断地，间或缓和一下，制造出最高能量和最紧张状态的面部和身体表情，人们听见激情的宣教，仪式般的、教会庙堂里的声调，而从这种声调里甩出来的都只是些很短促的句子，就像礼拜仪式的断句，每个人无需动脑思考就会在感情上作出反应，即便他、应该说正因为他不懂句子的意义。巨大的嘴巴。不时的典型的意大利人的手指动作。人群里发出的吼叫声，激动的呼喊声，或者在演讲者点到某个对手时冒出来的尖利的口哨声。此外还不断有法西斯致意的动作，向前伸直的手臂。

所有这些，我们已经成千上万遍地见到和听到过，诸如纽伦堡党代会的镜头或者柏林乐趣庭园里的或者慕尼黑统帅大厅前的场景，等等等等，变化微乎其微，只有不断的重复，以至于这部墨索里尼电影在我们看来已经十分司空见惯，毫无特别之处。但是正如领袖这个称谓不过是 Duce 的德语化，棕黄衫[2] 只是意大利黑衫的一个变种，德国的致敬姿势也只是模仿法西斯致敬手势，这所有的电影录制，拍摄这一类场景作为宣传手段，这些场景本身，领袖在聚集的大众面前演讲，也同样是意大利榜样在德国的翻版。两边都是为了让作为领袖的人物与人民大众、与全体人民，而不是只与他们的代表们直接接触。

1　"Duce"，意大利语"领袖"的意思，是墨索里尼的别称，即"法西斯主义领袖"的简称。

2　纳粹党衫，纳粹冲锋队军服。

追踪这一思想，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撞上卢梭，特别是撞上他的*Contrat social*。当卢梭作为日内瓦公民在写作、对一个城市国家的各方面关联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在他的想象中，予政治以古希腊的形式，将它局限在城市的疆界中——政治是领导一个城邦、一个城市的艺术，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几乎无可避免。在卢梭看来，政治家是面对聚集在集市上的国民的演说者，对于卢梭来说，民众共同体参与的体育的和艺术的组织活动便是政治机构和宣传方式。苏维埃俄国的伟大创意是，通过运用新的技术发明，通过电影和电台，将前人的及卢梭的空间受到局限的方法向无限扩展，让国家领导人真的、亲自面向“所有人”，即便这个“所有人”数以百万计，即便他们个别的群体之间相隔数千公里。于是，在这样的方式和义务下，政治家的演说重新具有了曾经在雅典所有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更加提高了的重要性，因为一个雅典城市已经由现在的整个一大片国土取代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国家。

然而，演说不仅仅是比以往更加重要了，而是也必然地从本质上与以前不太一样了。在演说转向所有的人而不是只面对挑选出来的人民代表的时候，它就必须让自己能与所有的人沟通，于是就变得更加大众化。大众化即是具体化；一个演讲越是感性，越是较少地诉诸知性，它就越是大众化。一旦它从卸除知性之累跨越到所企图的知性的短路和麻醉，它就从大众化越界到了蛊惑民心或者变为邪恶诱众。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将那些对群众发表演讲的地方，那些装点得如同过节一样的市场和挂满旗帜和标语的大厅或露天舞台，看成演讲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看成它的身体；演讲是镶嵌进、导演进这样的框架里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艺术品，同时作用于耳朵和眼睛，而且是加倍地作用于耳朵，因为众人的喧嚷，他们的鼓掌，他们的拒斥，都同样强烈地影响着个别听者，至少跟演讲本身的影响同样强烈。而且演说者的声调本身也毫无疑问地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毫无疑问会更具有感性色彩。有声电影传达的是这个整体艺术品的全貌；电台则用解说替代了供眼睛观看的表演，解说类同于古希腊时期的旁白，但又忠实地再现

了撩人的、听觉上的双倍的作用，大众即兴的礼拜仪式的交替唱法。（“即兴的”属于第三帝国语言最喜爱的词汇，以后还会谈到这个词。）

在德语里，与名词“讲演”和动词“演讲”相应的形容词只有一个“能说会道的”，而这个形容词又不怎么好听，一个能说会道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有夸夸其谈的嫌疑。人们几乎可以说，德国民族性格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演讲者的疑虑。

罗马语族的人则相反，他们没有这类疑虑，他们尊敬演说者，明确地区分善于雄辩和夸夸其谈。在他们看来，雄辩家是诚实的人，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词语令人信服，力图说得清晰明了，做着正直的努力，并且同时面向两者，即他的听众的心与智两个方面。能言善辩是法国人赠予他们的经典名家的赞誉，一位是布道坛上博叙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一位是剧院里的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而这样伟大的雄辩家在德语语言里也曾经诞生过，像路德和席勒。“能说会道”这个声誉不佳之词在西部相应地有“花言巧语”这样一个特别的表达；玩弄辞令者——这是可以追溯到希腊人的诡辩术及其衰亡时期的——是爱说大话空话的人，是蒙蔽理性的人。

墨索里尼是其民族的雄辩家，还是属于诡辩家之列？回答是肯定的：他离诡辩家而不是雄辩家更为接近，并且在其邪恶的发展过程中，最终完完全全地深陷狡辩之潭。不过他有些话，在德国耳朵听来是夸夸其谈的，实际上倒并非如此，因为在意大利语里，那些东西几乎并未超出完全自然的讲话的语言色彩。*Popolo di Napoli*！那不勒斯人民！他在那次周年庆典上这样称呼他的听众。这对德国听众来说就显得有些哗众取宠地附庸古风。我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见到的一张广告，那是在斯坎诺，一个分发传单的人塞到我手上的。斯坎诺是阿布鲁佐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阿布鲁佐人很为其强壮有力和勇敢大胆而自豪。一家新开张的百货商店在广告上宣扬自己，它的称呼语为：*Forte e gentile Popolazione di Scanno*！强大而高贵的市民们！与之相比，墨索里尼的“那不勒斯人民！”显得何等简单。

墨索里尼讲话四个月以后，我第一次听到了希特勒的声音。（我从未见过他，从未直接听过他讲话，那是犹太人所不允许的；开始时他在有声电影里走到我的面前，后来，当我被禁止看电影，并且也不允许拥有收音机时，我都是从街上的扩音喇叭里和工厂里听到他的讲话或者是讲话片段的。）1933 年 1 月 30 日他当上了元首，3 月 5 日是选举的日子，以确认他的当选，并产生对他俯首帖耳的帝国国会。选举的准备工作，其中也包括——也是第三帝国语言的一部分！——帝国国会纵火，以最大的规格进行，对于这个人来说，不可能会有人对他的成功产生怀疑；他在科尼希贝尔格发表了讲话，俨然胜券在握，无可动摇。尽管看不见元首，并且相距遥远，我却有了一个与墨索里尼那不勒斯讲话状况的比较。因为德累斯顿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前面挤满了充满激情的民众，希特勒的讲话从打上了灯光的宾馆正墙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阳台上站着手持巨幅纳粹旗帜的冲锋队队员，一支举着火把的队伍正从俾斯麦广场走来。他的讲话本身只是断断续续地飘进了我的耳朵，其实更多的还是声响，而不是句子。然而我却已经获得了与我至此为止得到的完全相同的印象，这类场景不断上演过很多次了。它与其榜样墨索里尼有着一种怎样的不同！

那个 Duce，无论人们感觉他怎样使尽全身力气往句子里注入能量，力图掌控他脚下的民众，他依旧还是在其母语的声浪上划水；不管他的统治欲望多强烈，他也仍然依赖母语；即便他从雄辩滑落至诡辩，也还是尚未走调、尚无痉挛的演讲者。希特勒则相反，他喜欢表现得如神父般庄严或者摆出嘲讽的姿态——这是两种他喜欢在其间不停转换的声调——，希特勒说起话来，更应该说是叫喊起来，总是很痉挛的样子。在最为激动的时刻，人们也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尊严和内心的平静，一份自信，一种与自己和周围的人群协调的感觉。而这种东西，希特勒，这个自觉的、全然的、原则上的诡辩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过。即使是在胜利的凯旋之中，他也不确定，而是吼骂对手和敌对的观点。他的声音里从来没有平和，从来没有乐感，在他的句子的律动里，永远都只有一

种粗鲁的、对别人和对他自己的剧烈的鼓动和激荡。他经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只能是从煽动、怂恿者到被驱赶、追逐者，从痉挛的冲动激情到怒火和昏晕无力的恼怒，再到绝望。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我始终都没有弄懂，凭着他那毫无韵律和过度嘶吼的声音，凭着他那粗暴、常常非德语结构的句子，凭着他讲话的完全对抗性的辩辞，他怎么就能赢得大众、抓住大众、奴役大众呢，并且持续之久，令人心悸。据说人们仍然将很多东西归罪于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精神影响，仍然将很多东西归罪于肆无忌惮的暴政和令人战栗的恐惧，认为它们还在继续发生作用——（“只要他们还没绞死我，我就相信胜利”，这是柏林晚些时候的一个讽刺笑话）——，所以这是个重大的事实，就是那种精神影响能够形成、能作用几百万人、经受住所有的恐惧，持续到最后一刻。

1944 年的圣诞节，德国最后的西线攻势已经溃败，战争的前景完全明了，毫无悬念了，我在去工厂和回家的路上不时遇见迎面过来的工人悄声地、有时甚至是不那么轻声地说：“抬起头来，伙计！不会太久了……”，一次，我和一位患难兄弟谈论和猜测国内的气氛。这是一个慕尼黑的商人，气质上更像慕尼黑人而不是犹太人，一个深思熟虑的、遇事好持怀疑态度的、毫不浪漫的人。我告诉他我经常听到的安慰话。他说，他目前经历的跟我完全一样，不过他完全不以此为然。大众一如既往地信仰元首。“即便我们这儿会有百分之几的人反对他：但您只要让他到这儿来发表一个演讲，所有的人又跟着他跑了，所有的人！在最初的时期，当德国北部还没人知道他的时候，我就在慕尼黑反复地听过他演说。没有人能够抗拒他。我也没有。人们无法抗拒他。”我问史迪勒，这个不可抗拒性的根源在哪里。——“这我不知道，但是人们无法抗拒他”，他迅速、顽固地回答道。

1945 年 4 月，即便是最失明的眼睛也察觉得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在我们逃亡的巴伐利亚小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在诅咒元首，逃跑的士兵源源不断，再也停不下来，就在这时，这些无心恋战的人、失望的人和怨恨的人中间仍然有人怀抱希望，他们用呆滞的眼神和忠实的嘴唇信誓

旦旦地说，4月20号，元首生日的那一天，“转折”就会到来，德国的攻势就将捷报频传：元首就是这样说的，元首是不会骗人的，大家必须相信他，而不是去相信各种各样的理性因素。

这个奇迹是无法否认的，那么该如何解释它呢？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心理学方面的阐释，我完全赞同，只是想再补充一个语言学方面的理由。

在元首发表科尼希贝尔格讲话的那天晚上，一位同事对我说，他多次见过希特勒，听过他的讲话，他坚信这个人的结局将表现为宗教意义上的疯狂。我同样相信这一点，他确实是在极力地把自己当作德国新的拯救者，在他的内心，恺撒的妄想症与受虐狂的意识不断地打架，同时，这两种病情又在交替升级，而正是这类病菌传染侵袭了德国人民虚弱的肌体，这个肌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伤元气，心灵也遭受到重创。

不过，从语文学者的角度出发，我还相信，希特勒无耻的公然的辩术之所以会有这么巨大的效应，是因为它携带着一种病菌，一种首次出现的瘟疫毒菌，它钻进了一个至此未受其侵染的语言，因为它的核心完全是非德语的，就如同从法西斯分子那里模仿来的致敬形式，如同从法西斯那里模仿来的军服——用棕黄衫替代黑衫，不是一种很原初的发明——，如同群众集会上整个的装潢性饰品。

但是，无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先行于它十年的法西斯主义学习了多少东西，无论它的身体传染上了多少外来的病菌：最终它还是、或者是变成了一种专属德国的疾病，一种疯长出来的德国肉体的变异物，而由于受到了从德国反馈回去的毒化，那个本身当然已经罪恶累累、但却还没有完全兽性到如此地步的法西斯主义，也与纳粹主义同时走向了灭亡。

9

狂热的

当学生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对一位英语学者的行为感到生气，因为他在看莎士比亚戏剧时要点数戏里出现过多少次击鼓声、口哨声和其他表现打仗的音乐。我称之为枯燥的迂腐行当，因为对此无法理解……而我自己在希特勒时代的日记本里，在1940年就有这样的记载：“讨论课的主题：让学生确认，‘狂热的’和‘狂热主义’在公开的场合里使用了多少次，在那些不直接与政治有关的发表物里又有多少，比如在新出版的德语长篇小说里，或者在从外语翻译过来的书籍里。”三年后，我重读这一段，批注了一个“难以置信！”，并写道：“这个词多如牛毛，‘狂热的’如此频繁地出现，‘犹如拨弦乐演奏里的音调，犹如海边的沙子’。而比高频率更重要的，是这个词的价值的转变。我已经在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一书里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那里引用了卢梭的一处十分特别的、看来最不为人重视的文字。只愿这个文稿能够活过这个时代……”

它存活下来了。

Fanatique 和 *fanatisme* 在法国启蒙者那里无一例外地都是用于非常贬义的情况，其原因是双重的。最初——根子在 fanum[1]，在神迹里，在庙宇里——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个沉醉于宗教、处于迷狂的痉挛状态中的人。由于启蒙者反对一切导致蒙蔽和封锁人们思想的东西，由于他们作为特别激烈的教会的敌人，抨击任何一种宗教的痴迷妄念，狂热主义分子便是其理性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fanatique* 类型的人即是拉法亚拉克（Ravaillac），这人出于宗教狂热主义谋杀了好国王亨利四世。而当对立面有人指责启蒙者方面的狂热主义时，他们便会为自己辩护，认为他们自己的激情表现只不过是凭借理性手段进行的一场反对理性之敌的斗争。启蒙的思想财富无论浸入到哪里，那里的“狂热”概念就与一种排斥的情感、一种指责捆绑起来。

在成为独行侠之前，在开始痛恨他那些“哲学家”和“百科全书著作者”的启蒙同党之前，卢梭与其他所有的启蒙者一样，也完全是以贬斥的口气使用“狂热”这个词的。在萨瓦见习牧师的信仰自白里，卢梭谈到耶稣出现在犹太狂热分子中间：“在愤怒之至的狂热主义火焰中响起了崇高之至的真理的声音。”

但是紧接着，当见习牧师作为让·雅各的喉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百科全书派的不宽容时，其激烈程度比针对教会的指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个长篇注释里他写道：“培尔（Pierre Bayle）应该已经成功地证明了，狂热主义比心中没有上帝更为糟糕，影响更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他另一个并不稍有逊色的真知灼见却尚未被人们认识：狂热主义嗜血成性，残忍无度，尽管如此，它却是一种巨大的、强烈的激情，这个激情飞扬人心，令人蔑视死亡，赋予人强大的能量，只需要更好地驾驭这个激情，便可以继而表现出最高尚的道德；而在另一方面，怀疑

1 法语：神殿。

论者，整个殚思竭虑的启蒙者一派，走向依赖俗生，走向虚弱，心灵趋于卑下，激情转向低俗的一己利益，转向为人不屑的自私自利，以此悄然瓦解了每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真正的基础。”

这里已经发生了全然的价值重估，狂热主义转而为品德。不过，尽管卢梭声誉斐然，这一观点却裹藏在这个注释里，毫无影响。在浪漫派里，可以追溯到卢梭的不是对狂热主义的推崇，而是对各种形式的、为各种事业的激情的颂扬。在巴黎，在卢浮宫附近，竖立着一个纤巧美丽的小雕塑：一个从拐角冲出的少年鼓手。他敲击警报，他敲醒热情，体现着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和其后一个世纪的热情。他狂热主义兄弟的扭曲形象是在1932年才穿越布兰登堡大门的。在那之前，尽管有那个秘密的赞扬，狂热之态始终处于病态和罪行之间，被排斥的品性一直没有改变。

在德语里，这个词没有完全等价的替代词，即便把它从原始的运用中解放出来，不再限于崇拜活动。“热烈的”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表达，这个词更容易让人想到一个充满激情的宣教者，而不是一个直接施行暴力的人。“着魔”让人更多地联想到一个病态的、于是可以原谅的或者令人怜悯的状态，而不是从这种状态引发出的一种公共危害。痴迷者的色彩要明亮得多。无疑，对于力求清晰的莱辛来说，痴迷已经颇为可疑了。“不要把他（他在纳旦中写道）交付给你那些乌合之众的痴迷者。”不过，人们不妨思考一下，是否可以将“令人不安的狂热者”和“可爱的痴迷者”这两对毫无新鲜感的搭配里的形容词调换一下，也就是说是否可以说一个令人不安的痴迷者和一个可爱的狂热者。我们的语感拒绝这样做。一个痴迷者不会狭隘地钻牛角尖，他更容易让自己脱离实在的土地，忽略现实的条件，痴迷于飞向某个想象中的高空。波萨对于深为所动的菲利普国王来说就是一个“特别的痴迷者”。

所以“狂热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是不可翻译的，不可替代的，它总是作为一种评价性的表达负载着很强的否定性，表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令人反感的特质。即使人们有时会在悼念某位研究者或者艺术家的文字里读到那种空话，说他是某门学科或者某项艺术的狂热分子，但在这个

赞扬中仍然飘忽着一种指点，即某人身上带刺，孤僻封闭，令人尴尬地难以接近。第三帝国之前，从来没有谁会想到正面地使用“狂热的”这个词。甚至因为这个词身上附着了难以完全抹去的反面含义，以至于连第三帝国的语言自己在使用它时，都不免有时取其否定的意义。希特勒在其奋斗书里就摒弃地提到“偏执于客观性的狂热分子”。第三帝国鼎盛时期出版的一本书，埃利希·格里茨巴赫（Erich Gritzbach）的颂歌性质的专著《赫尔曼·戈林，书与人》，风格上不遗余力地堆砌纳粹语言的陈词滥调，在论及其憎恶的共产主义时声称，大家已经看见，这个异端邪说教唆人们成为狂热分子的能量有多大。然而，这话已经是一个近乎滑稽的出轨情况，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自我回击，回到以前时代的语言运用，就像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它甚至也会发生在这位第三帝国语言的大师身上；戈培尔到 1944 年 12 月（应该是依据所引述的希特勒言论）还讲到了“一些冥顽不化的德国人混乱不堪的狂热主义”。

我把这类东西称作极为滑稽的自我回击；因为第三帝国是在狂热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千方百计地进行狂热主义教育，所以“狂热的”是整个第三帝国时代获得最高级别首肯的形容词。它表达对勇敢的、献身的、坚忍的这些概念的提升，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充满荣耀地将所有这些品德融合到一起的综合表达；在第三帝国语言中，在这个词一般的运用中，即使是附带的最轻微的贬义也消失殆尽。在节庆日，在希特勒的生日或者接手权力的日子，没有一篇报纸文章、一句祝福、一个对任何一支部队或者任何一个组织的号召，不包含一个“狂热的誓言”或者“狂热的告白”，不证明对希特勒帝国永恒性的“狂热信仰”。尤其是在战争中，当失败不再可以掩盖之时！形势越是黑暗，“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对领袖的、对人民的或者是对人民之狂热的信念，就越是被说成为一种德国人的基本品质。1944 年 6 月 20 日刺杀希特勒事件发生后，在随后一天的新闻报道里，这个词的使用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在泛滥成灾的对领袖表忠心的誓言里，确确实实是每一篇里都出现了这个词。

与这种政治战场上高频率的使用情况携手一致的，是这个词在其他

领域里的频繁运用，比如在讲故事写小说的人那里，在日常的谈话中间。以前大致说或者写“激情的”那些地方，现在变成了“狂热的”。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必然会有某种疲软和某种有失尊严的情况。在前面提到的戈林传记里面，那位帝国元帅也被称誉为“狂热的动物之友”。（这里，“狂热的艺术家”含有的那种指责性质的附义完全消失，因为戈林总是被描写为最会讨人喜欢、最善于结交的人。）

问题只是在于，与这个词的疲软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是否也有一种去毒的情况。假如肯定这一点，那么理由便是，“狂热的”这个词汇现在已经被不假思索地填充进了一种新的含义，变成了一种可喜的融勇敢和激情献身于一体的表达。但是事情并非如此。“语言，它为你吟诗为你思……”毒汁，你无意识地喝进，它发生着作用——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够的。

在语言上引领第三帝国的头脑所寻求的是，必须将这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毒素的效用发挥到极致，而这个词的损耗折旧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种内心的虚弱化。于是戈培尔利令智昏，企图超越再也无法升级的极限，再来一次升格。在 1944 年 11 月 13 日的《帝国》报上，戈培尔写道，局势要想得到拯救，“只能通过狂野的狂热主义”了。仿佛狂野不是狂热分子必要的状态，仿佛会有一种驯顺的狂热主义似的。

这一表述标志了这个词的崩溃。

四个月之前，该词刚刚庆祝了其最高级别的凯旋，某种程度上享受了第三帝国所能颁给的最高荣誉，即军事方面的荣誉。军队的语言，特别是关于每日战争特别报道的语言，本来具有传统的客观、就事论事的风格，和公开的、几乎是自我欣赏的冷静，跟踪观察这种语言如何逐渐被戈培尔臃肿的宣传风格所淹没，是一项特殊的工作。1944 年 7 月 26 日，“狂热的”这个形容词第一次在军队报道中使用，赞美德国军队：我们的在诺曼底“狂热地战斗着的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思想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在这里，这种区别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显得更加清晰，清晰得近乎残酷。

第三帝国崩溃仅仅一年，一个独特的证据就可以充分表明，“狂热的”，这个纳粹主义的关键词，从来也没有由于过度使用而真正失去毒效。因为，当第三帝国语言的剥落残体在当前的语言中遍布开来时，“狂热的”却消失了。从中人们无疑可以推断出，正是在民众的意识或者下意识里，这个真实的情形整个十二年都保持活跃：它就是，一种云遮雾罩的、类似于疾病和罪行的精神状态贯穿了十二年，一直被视为最高的道德。

10

本源诗文

在那些可怕的年代里，虽然专业科学方面的东西与我相距甚远，但约瑟夫·贝迪耶（Joseph Bédier）那充满智慧的嘲讽表情仍然有好几次在我面前浮现。从事文学史职业的人需要为一个题材、一个寓言、一个传说去查找来源，有时候，这一职业专司变成了一种职业病、一种强迫症：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有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纵深度——纵深度愈大，研究者就愈是有学问，因为他连接上了悠远的源头——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在人们刚好遇见它的地方就地生根。当贝迪耶从 *Collége de France* 的讲台俯身向下，谈论一个滑稽的或者乖好的童话或者某一个文学细节，讨论它们的所谓东方抑或所谓“克尔特的”来源时，他声音中的讽刺我现在还能听见。贝迪耶总是会提请大家注意，在差别巨大的时间和区域里，某些境况和印象会引导出相同的表述，因为人的天性的同一性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在某些事物身上已经得到了证明。

挺久远的事了，我是在 1936 年的 12 月想到他的。那是在审判谋杀

纳粹驻外特工古斯特洛夫的凶手期间。有一出以谋杀马拉事件为素材的法国悲剧，彭萨（Francois Ponsard）的《夏洛特·科黛》，它诞生于近一百年前，长时间享有世界声誉，在德国常常用来做学校的阅读物，但后来（很不公平地）被轻视和遗忘了。在戏里，女谋杀者按响了他的门铃，坚定地要杀掉即将站到她面前的男人，因为她把这个人视作一个良心泯灭的恶狗，一个没有任何人情维系的非人。给她开门的是个女人，她吓了一跳：上帝，他有个女人，有人爱着他——*grand Dieu*，*sa femme*，*on l'aime*！但是接着她听见了他的声音，他把一个受人爱戴的人称为"上断头台"的祭品，于是她刺过去。在库尔法庭上，犹太被告者弗兰克福特的陈述听上去就像这个剧情的现代版，他极为细致地抓住了这个场景实质性和决定性的东西。弗兰克福特说，他决心要杀掉这个嗜血成性的家伙，而开门的是古斯特洛夫的太太，他动摇了——这是一个结了婚的丈夫，*grand Dieu*，*on l'aime*。这个时候他听见了古斯特洛夫打电话的声音："这些犹太猪！"，于是枪响了……我是不是该相信弗兰克福特读过《夏洛特·科黛》？而我宁愿在下一次关于彭萨的讲座里，强调这出法国喜剧所揭示人性的真实性，以库尔审判的情景作为实证。

贝迪耶的观察与其说体现在纯文学层面，毋宁说是在比较低层次的民情民俗方面，而将我领回到他这里的，正是属于这一层面的另一些事实。

1941 年秋，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有速战速决的可能，这时我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希特勒的愤怒发作。起初那是愤怒的发作，很快又变成狂飙性发作，据说元首咬过手绢，咬过枕头，还扑到地上咬过地毯。他还——这些故事都是听小人物说的：工人，挨家挨户售货的，轻率随意的邮差——，他还"吃了地毯的穗子"，经常吃穗子，因此得名"食地毯者"。这里是否有必要去追溯圣经之源，追溯食草的尼布甲尼撒？

人们不妨把"食地毯者"这个别号当作一个传说之萌芽。但是第三帝国也成功打造过真正的和全然怪异的传说。其中之一是我们在战争爆发前夕从一个头脑非常冷静的人那里听来的，当时希特勒正处于他权力的顶峰。

当时我们还拥有那座建在高处俯瞰城市的小房子，但是已经被与世隔绝，受到监控，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已经需要具有一定的勇气了。一位住在下面的生意人，日子好过的时候就给我们提供商品，这时也没有背弃我们，依旧每周上来，送给我们必要的物资，而且每次都要跟我们讲一些他认为可以安慰我们的事情，说一些他觉得可以提高我们勇气的话。他不是搞政治的，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坠入歧途的经济、不公正和强暴政治在他看来都是一目了然的，令他愤懑。而他看待一切的视角是常识和实际的考量；他文化不是很高，没有什么广泛的兴趣，对哲学没有概念，对宗教似乎也不关心。除了接下来叙述的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任何关于教会或者彼岸的东西。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小市民阶层的小商人，他与自己数十万同一阶层的同志们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没有让自己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这一次，他和平常一样跟我们聊天，讲述某个被揭露的、然后又被遮盖的党内丑闻，某个糊弄人的破产事件，或者某个通过行贿得来的职位，或者某个赤裸裸的要挟行为。当我们的地区长官无可挽回地名誉扫地、自杀身亡之后——这人先是被逼迫自杀，然后又享受了十分荣耀的身后礼遇，几乎是以一种 *en miniature*[1] 的国家仪式下葬的——那以后，我们不断地从 V. 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您们只管等着好了，您们已经看到了卡利科斯的死。您们也会看到穆池曼（Martin Mutschmann）和阿道夫的死的！这位头脑冷静的人，一位新教教徒，也就是说，他在孩童时代没有被圣人的和殉道烈士的事迹洗礼过，对我们讲述了下面的事情，带着一种不言而喻的笃信，一如他平时叙说卡利科斯的小恶和穆池曼的大恶时总表现出的那种神态。

有一个党卫军高级军官，哈勒或者是耶拿的——他讲述时总是对地点和人物做出准确的说明，“保证”一切都是从“绝对可靠的信息来源”获得的——，一位高阶衔的党卫军军官把他临产的太太送到了一家私人诊所。他观察她的房间；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幅基督像。“请您将那幅画

1 法语：小型。

像摘下来”，他对护士要求道，“我不想让我的儿子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胆怯的护士避开直接回答，说她会告诉护士长的，于是党卫军军官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然后走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了护士长的电话：“您喜得贵子，军官先生，您的太太一切都好，孩子也很壮实。只是您确实如愿以偿了：孩子来到世界上什么也看不见……”

第三帝国期间，骂犹太人无能于信、对他们的怀疑精神进行攻击的情况实在是家常便饭！但是，犹太人自己也制造并相信了关于他们的传说。1943 年底，第一次严重的莱比锡空袭之后，我在犹太人居所里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1938 年，纳粹是在夜里 4 点 15 分把犹太人从床上叫起来，拖往集中营的。而在最近的炸弹袭击中，城里所有的钟都准时在 4 点 15 分停住不走了。

在此七个月之前，一个传说让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走到了一起。这个传说是关于一棵巴比斯瑙杨树。这棵杨树孤零零地、高耸地、显赫地竖立在德累斯顿东南方向的一个高坡上，人们从城市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它，颇为奇特。第一次是在五月初，我妻子告诉我，她在电车上已经多次听人提起巴比斯瑙杨树；说不知道巴比斯瑙杨树的事儿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几天后，我在工厂里也听人说到它：巴比斯瑙杨树！我便问为什么要提巴比斯瑙杨树。我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它开花了。这是很稀罕的事；1918 年出现过，而 1918 年就缔结了和平协议。马上就有位女工纠正道：不仅仅是 191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1871 年。“十九世纪的其他战争中也是这个情况”，一位女工长补充说。而旅店服务生则推而广之：“每次那杨树一开花，和平就缔结了。”

接下来的那个周一，费德道：“昨天简直是一场全民漫游，全冲着巴比斯瑙杨树去了。那树真的是繁花盛开。也许和平真的要到来了——民间信仰从来不可以全然嗤之以鼻的。”费德，戴着犹太人黄星标志，戴着他用旧的法官帽改制的防灰口罩。

11

模糊界限

自然范畴之间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界限，这一点，很长时间以来，连初中生都已经了解。不那么普及的、并较少得到承认的是，在美学领域里同样没有确定的界限。

人们使用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这一对概念，是为了给现代艺术和文学——这即是二者的先后次序，因为是绘画打了头阵，文学随后跟进的——划分阶段；概念之剪在这里必须能够完全干净利落地剪开、分别开，因为这里关系到的是绝对的对立面。印象派沉湎于事物的印象中，他把吸收进入内心的东西再交付出去：他是被动的，他接受自己每一刻经历的影响，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固定的、统一的、持久的心灵之核，没有稳定不变的自我。表现主义者从自己本身出发，他不理会客体事物的力量，而是在它们身上烙刻他的印记、他的意志，于其之表、并于其之里表现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特质来塑造它们：他是积极动态的，他的行为由那个不可转变的持衡的自我掌控，受制于确

定的自我意识。

美，并且好。但是印象艺术家有意识地不反映现实的客观图像，而是仅仅表现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和是怎样的；他表现的不是枝繁叶茂的树，不是特定形态的个别树叶，不是原本的绿的或者黄的色彩，一个日子的、一个季节的、一个天气状况下原本的光线，而是他的眼睛所抓住的相互渗透的堆积的树叶，是与他一瞬间的心情相契合的色彩和光照，也就是他从自身出发强加给事物实际状况的个人感受。他行为的被动性在哪里呢？他在美学方面同样主动积极，他与他的对立面，即表现主义者，是同样的表现艺术家。

其相互对立的区别仅存在于伦理层面：表现主义确认自我，为自己和周围世界规定了明确的法则，有责任感。摇摆的、时时发生变化的印象主义者为自己的和他人的责任缺失采取反道德的态度。

然而，即便是在这里，界限的模糊化也无可避免。出于个体茫然无助的感受，印象主义者生起社会同情心，并为压抑的和迷乱的人代言，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印象主义方面的左拉和龚古尔兄弟之间，还是表现主义方面的托勒（Ernst Toller）和翁汝以及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之间，都没有区别。

不，在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和语言史的领域里，我不能信任纯粹的美学观察。必须从人性的基本态度出发；有时候，在目的完全对立的情况下，感性的表达方式可以是同样的。

这一点正好体现于表现主义流派：托勒，被纳粹杀害；尤思特（Hans Johst），在第三帝国做了科学院院长，俩人同属于表现主义。

突出意志的和风暴席卷式的语言形式，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从表现主义那里继承来的，或者说，这是它们共享的语言。那些年轻的表现主义作家用《行动》和《狂飙》给自己的杂志命名，想要在文坛争得一席之地。在柏林波茨坦桥边的“奥地利咖啡馆”里，他们是最左倾的一翼，是艺术家里最饥渴的波西米亚（他们有的也在名气更大、更高雅的“西

部咖啡馆”里落座，但是那里的人大致都是颇有脸面的，那里的“倾向”也更加多样），在慕尼黑他们则是“史黛芳妮咖啡馆”的常客。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2 年的选举之夜，我们在“奥地利”等待着随时传进来的报社电报，当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第一百个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欢呼起来；我们相信，通向自由与和平的大门现在大大地、永远地敞开了……

“行动”（Aktion）和“狂飙”（Sturm）这类词语大约在 1920 年从女人格调的咖啡馆转入了男人的酒馆。“行动”自始至终都属于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未德意志化的、同时不可或缺的外来词汇，它联系着对早期英雄时代的回忆，联系着椅凳斗士的画面；“狂飙”成了军事等级的部队名称：第一百支狂飙，SS 纳粹国防军的骑兵狂飙，而这里当然也有德意志化的和与传统衔接的倾向在起作用。

在“狂飙”这个词最为流行的时候，它也同时变得最为隐性，如今，或是在纳粹专权的那些年里，谁还会意识到，SA 是狂飙支队（Sturmabteilung 冲锋队）的意思？

SA 和 SS，这些卫戍部队，也就是禁卫军，已经成为自鸣得意的缩略语，它们不再是缩简的替代词，而是具有自身的词义，将原来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完全排挤开了。

我只是十分勉强地在这里写下 SS 这个带有下滑曲线的常规字符。在希特勒时代，铅字盒里和办公用的打字机键盘上曾经有特殊的棱角分明的 SS- 字样。它类同于日耳曼语族人使用的古老的文字符号“胜利”，是在对这种符号的回忆中创造出来的。此外，它还与表现主义有许多关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士兵的语言中有一个形容词叫“凌厉的”（zackig）。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旅问候语是“凌厉的”，一个命令，一个致辞可以做得“凌厉”，“凌厉的”表达的是，一次憋足了劲儿的、一次严格自律的能量付出。它表明一种形式，是表现主义绘画和表现主义文学语言实质性的东西。在看见纳粹的 SS 时，一个未受语文学之累的头脑里首先出现的，一定是关于“凌厉的”的想象。此外再加上另一

样东西。

纳粹的SS出现之前，变电站的小房子上早就有这个符号了，鲜红的颜色，下面写着那句警告：“注意，高压！”这里，这个“凌厉的”S显然是表现闪电的图像，体现了闪电的风格。而这个闪电，以其能量的积蓄和迅疾成为纳粹最为喜爱的一个象征！那么，SS这个字符也可以是闪电的一个直接的体现，一个画一般的表达。而这双重的线条则可意味着加强的力量，因为儿童编队的小黑旗上只有一个凌厉的闪电，所谓半个SS。

一个造型往往是多个因素的合力，而造型者对此浑然无知。在我看来，这儿似乎也是如此：SS同时是两者，图像和抽象的字符，是向绘画那一边的越界，是图像文字，是向象形文字的感性的回归。

然而，首先将这类模糊界限的表达方式运用在现代社会里的是谁呢？他们是那些最坚决的、与自信的表现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完全对立的人，是那些怀疑论者，那些自我和道德的分裂者，是那些颓废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这个在罗马出生的波兰人，热血沸腾的自主选择的法国人、诗人和文学实验派，用字母排列作画：“一支被点燃的雪茄，它的烟升起”（un cigare allume qui fume），这句子的词被印刷成烟在上升的曲线，由相对应的字母组成，连接在雪茄这个词形成的直线上。

对于我来说，在第三帝国语言之内，SS凌厉的特殊形式意味着广告牌上的图像语言和狭义的语言之间的连接物。另外还有一个同样类型的连接物：这就是同样画得凌厉的、直立的、头朝着地面的火把，是日耳曼人最古老的文字中表现花开与枯萎的符号。作为逝去的象征，这个火把只是在悼亡讣告上占据了基督教的十字架的位置，而当它头朝上矗立着的时候，它就不仅是在出生告示上替代着那颗星的位置，而且也在药剂师和面包师的印章上据有自己的地位。人们以为，这两个古老符号和SS-字符一样本土化了，因为它们同样经过感性化和德意志化这两个倾向得到了发展。但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我有几次，每次都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做了有关的数据记录，看看

这种象形文字的使用与星及十字架的使用之间的比例是怎样的。我有规律地（尽管我们不允许有报纸，不允许把报纸拿回房间，但不知从什么地方总还是有报纸钻进犹太人的住房里）翻阅一份立场中立的德累斯顿的报纸——即一份报纸力所能及的中立，也就是与一份明显的党报相比较而言的中立——，我也经常看《自由之战》，德累斯顿的党报，此外还有《德意志汇报》，一份必须保持高一点水平的报纸，因为它在国外是代表德国的，尤其是在《法兰克福报》失声之后。我需要考虑到，那种古日耳曼象形文字其实在党报比在其他报纸里出现的频率要大，也需要顾及到，《德意志汇报》经常为那些专门的基督教教区服务，刊登许多广告。尽管如此，与其他报纸相比，《自由之战》里的象形字符并不显得特别多。象形文字使用的最高记录大致是在第一波惨重失败后达到的，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因为那个时候纳粹党对公众舆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然而，即便如此，当时每天大约二十多个牺牲者的讣告中，使用这种象形字符的最多也不超过半数，经常还不到三分之一。我同时不断发现，正是那些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最为纳粹的告示，往往对星及十字架十分坚守。那些出生告示的情况也很接近：配有那个象形字符的不到一半，经常要少得多，而那些最纳粹的——因为那些家庭告示有一种全然的第三帝国语言的风格——，正是它们让人常常感到缺少了这种象形字符。

在那些SS的形象畅通无阻的地方，这些表现正负生命的字符却未能得到贯彻，未能得到意会，其原因不难解释。SS是一个全新机关的全新的标志，SS不需要排挤任何其他东西。而对于生与死来说则不同，对于这些人类最古老也最无以转变的机能，星与十字架作为它们的符号已经有即将两千年的历史。于是，它们已经太深地植入了这个民族的想象中，不可能完全连根拔除。

但是假如它们，这些生命的象形符号，真的贯彻下去了，在希特勒时代曾经一统天下了的话——我会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会为这个问题而困窘狼狈吗？绝对不会的！即便是那样，我也会不假思索地、同样像

刚才那么心安理得地这样写：不难看出，这个情况必然会出现。因为第三帝国语言的总体倾向是追求感性的，如果这种感性化可以通过借助日耳曼的传统，通过一个古老的日耳曼画符来实现的话，那么这个画符就会受到加倍的欢迎。而这个生命的画符作为凌厉的文字图像，与 SS- 形象同属一类，作为世界观念的象征，与太阳轮的轮毂、与纳粹的弯钩十字构架同属一家。于是，在所有这些理由的共同作用下，这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情：这些生命的画符必定要将十字架与星之标志全部排挤掉。

但是，如果我可以拿出同样的充足理由，像谈论确实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样去谈论并未发生的情况，说后者本来势必会发生——那么我究竟说明了什么，又揭示了其什么样的神秘外衣呢？模糊界限、不确定、摇晃和疑问，在这里也不例外。蒙田的立场：*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勒南（Ernest Renan）的立场：问号——所有标点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与纳粹主义的固执冥顽和自信不疑决然对立的立场。

在两个极端之间，有个人性的钟摆在晃动摇摆，有个中间地带在摸索探寻。在希特勒之前和希特勒时代，人们不厌其烦地宣称，所有的进步都要归功于那些执着不疑的人，所有的障碍都来自于那帮问号之党朋。可以断言这是不成立的，但可以悬定的是：鲜血总是只沾染于那些冥顽执念者之手。

12

标点应用

在标点应用方面，无论是在个别人身上还是在群体里边，有时都可以观察到某种彰显性格特点的爱好和倾向。学者喜欢用分号；他们在逻辑方面的需要寻求一种作区分的标点，它既要比逗号坚决，又不能像句号那么完全绝对地进行界分。质疑者勒南表示，对于问号，怎么使用都不会过于频繁。狂飙突进对惊叹号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德国早期自然主义喜欢用破折号：那些句子，那一系列的思绪，不是用细致的书桌逻辑完成的，而是撕开断裂的，进行暗示的，保持不完整状态的，有一种匆匆的、跳跃的、联想式的质地，这一质地与这些句子和思想产生的状况很相符，与一个内心独白、与一场激动的谈话、特别是不习惯思考的人们之间的谈话很相符。

人们会猜想，第三帝国的语言，因为它本质上是玩弄辞藻、不断地诉诸情感的，肯定会类似于狂飙突进，沉湎于惊叹号。然而这一点几乎并不明显；相反，在我的感觉中，第三帝国的语言对这个符号的使用倒

是相当节俭的。仿佛是它用那种毫无疑问的想当然的态度将一切都组编成了呼唤和惊叹，所以它根本不再有必要借助特殊的标点符号——因为，哪里还能找到平实的表述，以让惊叹语句凸显自己呢？

第三帝国的语言大肆使用、以致泛滥成灾的是引号，我想称之为讽刺引号。

简单的、初始的引号不过意味着一字一句地转述一个其他人所说的或者所写的东西。讽刺引号并不将自己局限于这样的中性的引用，而是对引文的真实性加以怀疑，兀自宣称所转述的话语是谎言。当这一点通过在演说者的声音里添加一种嘲讽的口吻表达出来时，讽刺性引号便与第三帝国语言的巧辩性格最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讽刺引号绝不是第三帝国语言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人在夸耀他们优越的文化时，当他们俯视其西方邻国的文明、视其为一种劣质的、流于表面的成就时，法国人每次提到“*culture allemande*”[1]时，都必然要使用那一对嘲讽意味的引号。很可能，引号在使用伊始，就于其中性应用的同时还具有一种嘲讽性的运用。

但是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这个标点符号的嘲讽运用超过了其中性应用的数倍。因为这个语言不能忍受的正是中性性质，因为它总是需要有一个敌对者，总是需要把那个敌对者撕扯下来。如果西班牙的革命者经过斗争赢得了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有军官，有总参谋部，那么就不可避免的是“红色的‘胜利’”，“红色的‘军官’”，一个“红色的‘总参谋部’”。同样的情况还有后来的俄罗斯“战略”，还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张伯伦、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只不过总是讽刺引号里的“国家政要”，爱因斯坦是一位“研究者”，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是一个“德国人”，海涅是一位“‘德国’诗人”。没有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没有一份讲话的铅印文稿不充斥着这些讽刺引号，即便在较为平静的详

---

1 法语：德国文化。

尽的研究中也少不了它们。它们属于印刷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属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声调，是这个语言与生俱来的元素。

1900 年，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要写一篇关于纪念碑的作文。其中有一个句子是这样的：“七〇年代战争[1]之后，几乎每一个德国的集市广场上都曾经有一个战无不胜的德意志女神，配以旗帜和利剑；我可以为此举出上百个例子。”我的老师不相信，在边上用红墨水批注道：“下次上课拿一打例子来！”而我只找到 9 个，于是从此吸取教训，再也不敢在数字上大夸其口。尽管如此，在对第三帝国语言的观察里，我却有太多的关于数字滥用方面的东西要说，但在讽刺引号这一点上，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写下：“这方面的例子数以千计。”一般来说，这些数以千计的例子千人一面，但有一句例外，它是这样的：“人们对德国猫和‘高贵’猫加以区别。”

1　指 1870—1871 的德法战争，当时也称作七〇年代战争。

13

名字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在高级中学里代代相传；如今，因为没几个学校还在教授希腊语，这笑话肯定已经绝迹了。这个笑话说：德语词“狐狸”是怎样从相同意义的希腊词 alopex（αλωπηξ）脱胎出来的？是按照下面的发展顺序：alopex，lopex，pex，pix，pax，pucks，Fuchs。高级中学毕业之后，三十来年我都没去想它了。但是 1934 年的 1 月 13 日，这个笑话又突然浮现出来，带着那种走出遗忘的新鲜气息，就仿佛我在几天前刚刚引述过它似的。那是在阅读第 72 期的学期简报时发生的。校长通知说，我们的同事，副教授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市议会议员伊斯拉尔，“经部里批准”，重新继承其家族的老姓氏。“其家族在 16 世纪叫奥斯特赫尔特，在劳斯茨地区又称作卫斯特赫尔特、伊斯特哈尔（也有叫伊斯特海尔和奥斯特海尔）、伊斯特拉尔、伊塞热尔等等，最后因为切割肢解而发展成为伊斯拉尔。”

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注意到第三帝国语言中的姓名这一章节。后来，

每当我从崭新锃亮的住户名牌“奥斯特赫尔特”旁边走过——那个牌子安在瑞士区的某一个花园的门上——，我总会责备自己又是老习惯，把这个特别的章节也首先 *sub specie Judaeorum*[1] 去看。而这绝不仅限于犹太人的事物中，也不是仅仅属于第三帝国语言的章节。

在每一次革命中，无论那个革命涉及的是政治还是社会，是艺术还是文学，总是有两种倾向在发生作用：一方面是追求全新事物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突出强调的是迄今通行事物的对立面，而此外也有衔接承续的需求，有对具有辨白意义传统的需求。人们不是绝对的新，人们又返回到那个需要被取代的时期大逆不道的地方，又返回到人类或者返回到民族或者返回到风俗或者返回到艺术的真正本质等等等等。两种倾向都在命名和更名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以一位开创新局面者的名和姓，为一个新生儿或者一个需要起名字的人命名，这种情况大概基本局限在美国和美国黑人那里。英国大革命信奉清教主义，醉心于旧约里的名字，并喜欢通过圣经的一句语录加以渲染（约书亚——颂扬主吧，我的心灵）。法国大革命在经典的古籍中、特别是古罗马的典籍中寻找他们的理想形象，每位国民公会议员都为自己及其孩子们添加一个西塞罗式和塔西佗式的名字。而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好党员同样大力强调的则是，他与日耳曼人、与北方人和北方诸神之间的血统及心灵的亲密联系。瓦格纳热和久已存在的民族主义做好了铺垫工作，豪斯特、思格琳德等名字在希特勒刚刚现身的时候就已经比比皆是了；在瓦格纳崇拜之外，在那之后，青年运动，候鸟的歌唱肯定也起了作用，后者的影响可能还更为强烈。

但是，那些原先的时髦或者惯例，与其他惯例同时存在的惯例，在第三帝国几乎成了义务和制服。如果纳粹青年团领袖自己就叫巴尔杜尔（Baldur von Schirach），谁还能甘为人后呢？直到 1944 年，我还在

---

1 拉丁语：从犹太的视角。

一份德累斯顿的报纸上，在出生告示中看见了六个特意强调的日耳曼名字：迪特（Dieter），戴特莱夫（Detlev），乌拂（Uwe），玛吉特（Margit），英格丽特（Ingrid），乌塔（Uta）。复名，用一个连字符连接起来的，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具有饱满的声音，含有双重的认同和雄辩的特性（于是就有隶属第三帝国语言的特性）。贝恩特－迪特玛（Bernd-Dietmar），贝恩特－瓦尔特（Bernd-Walter），迪特玛－盖尔哈特（Dietmar-Gerhard）……同样显示第三帝国语言特性的还有那种经常出现的告示形式：小卡琳(Klein-Karin)，小哈拉尔特(Klein-Harald)；人们往叙事谣曲名字的英雄意味里拌进一点甜蜜的感觉，就赢得一种上好的诱饵的口感。

我的制服化的说法是不是太夸张了？但面对这种情况也许就不能说夸张了：许多本土化了的外来名不是变得声名狼藉，就是干脆遭到了禁止。基督教的名字是十分不受欢迎的；这类名字很容易让它们的主人陷入被怀疑的境地，被人看作是反对派。有一次，那是在德累斯顿之难前不久，我拿到一张当包装纸用的《观察画报》，应该是1945年2月5号那天的报纸。我发现上面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海德伦”（Heidrun）的文章，感到惊异不已，因为这是一份最为公开的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的副刊）。

在这些年里，曾经好几次，我都联想到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戏剧里的一个奇怪场景。《梦・一场人生》，最后一幕。年轻的主人公无可救药地卷入了一场血腥的罪孽，报应不可避免。这时钟声响起，他喃喃道：“听！敲钟了！天亮前三时 / 短暂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他在一时的半睡半醒间感觉到，那只是一个梦、一个教导性质的梦在折磨他，只是其自我的一个未能实现的可能性在折磨他。“虚假的形体，夜间的画面；/ 病态之妄想，你更情愿要，/ 而我们看见它，因为正在发烧。”

曾经好几次，耳边响起了“天亮前三时”，但这声音从来没有像在后来这篇海德伦文章中这么清晰，那是一种对其罪孽的朦胧意识，出自

于希特勒信徒们的发表物；只是，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实在太晚了，他们病态的妄想并没有鬼魅影绰般地消失；他们确实曾经杀戮了……在海德伦文章里，作者直接用双重的方式嘲讽了他的党员同志（Pg.）。他写道，如果父母在他们退出教会之前（就像党卫队队员和全部的东正教纳粹分子必须做这一步一样），如果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某个非德意志阶段，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施以洗礼，命名为克丽斯塔（Christa），那么这以后，他们至少会试图借助正字法给这个可怜的造物进行一定程度的减负，把她半东方名字的开头换掉，改成德语的写法“Krista”。而为了进行完全的赎罪，他们便给第二个女儿起一个很日耳曼的和很世俗的名字“海德伦”，在米勒和舒尔茨看来，这大约是艾瑞卡（Erika）的日耳曼化。但是，文章说，海德伦其实是艾达（Edda）的“天羊”，其乳房里盛着一种蜜酒，欲火难耐地追赶着公羊。如此看来，对于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这实在不是个合适的北方名字……文章中的这个告诫还起过作用、帮助过哪个孩子吗？这篇文章发表得比较晚，离第三帝国的灭亡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几天前，在为电台作的一次查寻中，我刚刚遇到过一个西里西亚的海德伦……

尽管克丽斯塔和与其一类的名字属于污名浊字，但是它们尚允许在户籍部门登记，而取之于旧约的名字则是被禁止的：任何一个德国孩子都不可以叫雷阿（Lea）或者萨拉（Sara）。假如有个不谙世事的牧师要报登这样一个名字，户籍部门就会拒绝给予登记，而牧师的抗议只会遭到上一级部门气急败坏的驳回。

人们试图全面保护德意志民族的同志不受这类名字的干扰。1940年9月，我曾经在一些广告柱上看到一个教堂的告示：“一个民族的英雄；打斗的圣乐。”下面的印刷字很小，畏畏缩缩的，还加了括号：“犹大·马加比；新版印刷。”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读了一部文化历史的小说，是从英文翻译的：*The Chronicle of Aaron Kane*。吕藤 & 罗宁出版社，维也纳犹太人安彤·贝特斯海姆（Anton Bettelheim）撰写的伟大的博马舍传记也是在那里出版的！而在编年史的第一页，出版社却致歉道，其

中人物出自圣经的名字合乎其清教主义和时代的、国度的习俗，所以无法进行变更。另一本英语小说——我记不清是哪一位作家的——德语的书名叫《被爱的儿子们》内页里用极小的字体标出了原作的书名：《O Absalom！》。在物理系，大家不能说爱因斯坦的名字，甚至频率单位“赫兹”都不能用这个犹太人名字进行标示。

但是，由于人们不仅要保护德意志民族的同志免遭犹太名字玷污，更要避免他们跟犹太人本身有任何接触，于是后者便被精心地隔离出去。这种隔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名字加以标识。只要谁的名字显然是希伯来语的、是完全没有融入本土德语的，比如巴汝荷或者莱查，他就必须给自己的名字附加一个“伊斯拉尔”或者“萨拉”。这件事他必须通知他的户籍局和银行，在所有的签字里都不可以忘记，并且要提醒所有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在寄发邮件时也需要牢记。假如他没有和一个雅利安妇女结婚并和她生下孩子——光是有雅利安妻子无济于事——，他就得佩戴黄色的犹太人星。星里的“犹太人”这几个字母很像希伯来语文字，而这个词的作用就如一个佩戴在前胸的称谓。在我们走廊的门前，双重地贴着我们的名字，我的名上有颗犹太星，我太太的名下写有“雅利安”的字迹。我的生活用品票证上刚开始是个单个的J字母，后来变成了“犹太人”全词，斜着印在上面，到最后，每个极小的一节票据上都立着“犹太人”，这个完整的词在这一张证上六十次六十次地反复出现。官方语言在提到我的时候，始终称为“犹太人克莱普勒”；盖世太保要求我去汇报的时候，我必须非常“凌厉”地报告：“犹太人克莱普勒到”，一旦没有做好就会挨拳。这种鄙视还可以加码升级，借助缩写标点，以霸道的称呼取代直陈形式。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见到我的音乐家表兄的消息，他及时流亡到了洛杉矶：“‘犹太’克莱普勒(Jud’Klemperer)逃出了疯人院又被关了起来。”如果提到可恨的“克里姆林宫犹太人”托洛茨基和李维诺夫，他们的名字就变成托洛茨基－布朗施泰因和李维诺夫－芬克施泰因。如果提到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那个可恨的纽约市长，他永远都是叫：“犹太人拉瓜迪亚”，至少是“半个犹

太人拉瓜迪亚”。

假如有一对犹太夫妇，在经历了一切艰难困苦之后，仍然想送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不允许给他们的甩货——我今天还能听见那个唾骂者冲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优雅女士吼叫：“你的甩货逃脱了我们的控制，你这个犹太母猪，为此我们要叫你尝尝厉害！”接着他们也让她尝到了厉害，第二天她再没有从她的药物昏睡中苏醒过来——，犹太父母是不允许给他们的后代起一个会产生误导作用的德意志名字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提供他们一长串的犹太名字任其挑选。而这些名字看上去都怪怪的，很少具有旧约名字那样的尊严感。

卡尔·埃米尔·弗朗措斯（Karl Emil Franzos）在其来自《半亚洲》的研究中谈到，加利西亚犹太人怎样在 18 世纪有了自己的语言。那是约瑟夫二世采取的具有启蒙与人道意义的措施；但是很多犹太人出于正统派的反感心态对此加以抗拒，于是，持讥讽态度的下级官吏便将令人发笑的和尴尬的姓氏强加给了那些反抗者。这种嘲弄的行为违背了当年立法者的本意，却颇有作用，纳粹政府有意利用了这一点；它不仅要将犹太人孤立起来，而且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这一特定圈子的语言成了纳粹政府的手段，根据其词汇的形式，这种语言在德国人看来即是德语语言的一种变形，在他们听来很粗糙很刺耳。而犹太人延续了几百年的对德国的依恋性恰恰就表达在这特定圈子的语言里，其发音在很大程度上与某个福格威德的瓦尔特（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和艾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Wofram von Eschenbach）的发音正相契合，这一点当然只有日耳曼学者封·梅梯尔了解，他在纳粹时代里曾经在他的课堂里指出过这一点，我很想认识这位日耳曼学教授！所以犹太德语的昵称形式，像福格勒，汶德勒等等，便上了那个留给犹太人做名字的名单，它们在德国人的耳朵听来，或者尴尬，或者可笑。

在我们住过的最后一个犹太人居所里，我每天都会看到一个很有特性的门牌，父亲和儿子并排标示在上面：巴鲁赫·列文和豪斯特·列文。父亲不再需要加上“伊斯拉尔”——“巴鲁赫”本身已经很犹太了，这

个名字还是从波兰的和正统教派的犹太人居住地区来的。儿子得以拿掉“伊斯拉尔”则是因为他的混血儿身份，因为其父亲已经被德意志文化同化至深，甚至缔结了一个跨族婚姻。这个叫“豪斯特”的整整一代犹太人，其父母一直在强调和过分强调自己几乎已经德意志化了，乐此不疲。豪斯特一代受纳粹的折磨比他们的父母要少一些——我当然是指心灵上的折磨，因为在集中营和毒气炉面前没有代际之间的区别，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巴鲁赫们感受到的是被赶出了自己所热爱的国土，而豪斯特们——那时有众多的豪斯特和斯格弗里德，他们作为完全的犹太人都得附加“伊斯拉尔”之名——，这些年轻人对德国属性却无所谓，而且有数量可观的一部分人更是对之抱有敌意。他们和那些纳粹分子一样，是在同样变态的浪漫派氛围中长大，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此刻我又钻进了对犹太事物的观察。这是我的问题还是话题的问题？这个主题肯定也有许多非犹太方面的。也确实有。

在命名问题上，回归传统的意愿甚至蔓延到那些原本跟纳粹主义保持距离的同代人身上。一位宁愿退休也不愿意加入纳粹党的高级中学校长，很爱跟我讲述他的小孙子早早就表现出来的英雄行为，那孩子叫伊斯布兰特·维尔德利希。我问他男孩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他回答说：“我们来自荷兰氏族的男人十七世纪时就叫这个名字。”尽管有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保护这位校长抵制希特勒的诱惑，可他对“氏族”这个词无所顾忌的使用清楚地显示了他身上纳粹意识的侵染。“氏族”（Sippe），一个表示宽泛意义上的亲缘、家庭的中性词，后来像“奥古斯特”一样下降为贬义词，眼下又高升为崇尚的尊严，氏族研究变成了每一个同族同志的光荣义务。

相反，只要在与民族原则相抵牾的地方，传统便被肆无忌惮地扔至一边。这里，一个典型的德国品质，一个经常被讥讽为迂腐的特性，彻底性，发挥了作用。德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上居住着斯拉夫人，那里的地区名称也与这一历史情形相符。然而，容忍日耳曼地名以外的区域名称，这背离了第三帝国的原则和它的种族自豪感。于是人们对地图进行了细

致入微的清理。1942 年 11 月 15 日的《德累斯顿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德国东部的地名"，我做笔记道：在梅克伦堡，许多村庄名字中的附加部分"雯第族"[1]被划掉了，大量斯拉夫地名被德国化，在波美尼亚有 120 个、布兰登堡大约有 175 个，尤其是施普雷森林的小村庄，被日耳曼化的特别厉害。在西里西亚，进行了德意志化变更的地名总数达到 2700 个，在固宾恩行政区，最不被容忍的是"低等种族的"（niederrassig）立陶宛词尾，比如把贝尔宁劳肯进行了"北方化提升"（aufnordete），变成贝尔宁根，固宾恩区总共 1851 个乡镇里就有 1146 个被变更了名称。

然而，在将街道名称德国化的过程中，回归传统的意愿却又表现得很突出。最古老的和最不知名的议长和市长都被挖掘出来，并写到街牌上，其准确性颇富示范意义。在德累斯顿南坡这一带有一条新建的街道叫迪尔曼街，名字下面写着："尼可劳斯·迪尔曼硕士，市长，1437 年去世"，类似的东西在市郊的另一些街道上也能看见："14 世纪市政议会议长"或者"15 世纪城市编年史的撰写者"……因为约瑟夫是个太天主教的名字，还是因为要为一个浪漫派的、因而特别德意志的画家腾出位子？无论什么原因，德累斯顿的约瑟夫大街更名了，变成卡斯泊－大卫－弗利德里希－大街，尽管这一更改最后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尴尬的邮政误导：我们住在这条街上的一个犹太人居所的时候，不断收到一些信件，收信人地址是：弗利德里希大街，卡斯泊·大卫转交。

从邮戳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混合体，其中交织了对中世纪行业和阶层秩序的热爱和对时尚广告的热爱，在这些邮戳里，城市获得了一种特有的附加指称。"博览城市莱比锡"是古老的表达，并非纳粹的发明，而履纳粹之新的是这样的邮戳："克莱佛，高质量的童鞋产地"。在日记本里我记载道："法勒斯雷本之大众汽车城市"，除了行业的和工业的广告之外，这个邮戳还隐藏了一种明确的政治含义，那就是：它将一个特殊的工业区突出出来，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领袖的宠儿，其最得意的

1 德国东部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

创建；因为，诱纳了老百姓钱财的那个前景灿烂的大众汽车，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筹划中的战争汽车。承载着不加掩饰的政治性的和纯粹宣传目的的是那些负载荣誉的邮戳："慕尼黑，运动之城"和"纽伦堡，党代会之城"。

纽伦堡位于"传统大区"，这种说法大概是想要表明，人们应该在这个行政区里寻找国家社会主义的光荣开端。用"大区"（Gau）表示省份，是衔接德国属性的又一种方式，他们将纯波兰地块划入"瓦尔特大区"，通过德意志的命名将对异国土地的掠夺合法化。类似的情况还有用码（Mark）这个字符表示边界地区。东码：这就将奥地利拉入了大德国，西码：荷兰被挂上了。在波兰的洛兹问题上，占领者的意志炫耀得更加厚颜无耻：洛兹丧失了自己的名字，被以其一战时期的占领者命名，改叫黎茨曼市。

在我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邮戳：黎茨曼市－隔离区。此刻，几个已经进入了世界史上地狱地理的名字冒了上来：特莱西恩施塔特、布痕瓦尔特、奥斯维辛……它们旁边还浮现出一个名字，一个没什么人认识的名字——它只与我们德累斯顿的人有关，而与它最有关系的人全部都消失了，这就是犹太人营地海勒贝尔格。1942年秋天，人们将德累斯顿最后被集中到一起的犹太人安置到海勒贝尔格简陋不堪的棚户里，那里比关押俄国战俘的棚子还要简陋。几个星期以后这批人就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只有我们几个跨族婚姻的人留了下来。

现在我又跑到犹太人的题目上来了。是我的错吗？不，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错，全是它的错。

然而，在这个庞大得实在足以撰写一部博士论文的主题里面，我只能依靠偶或的笔记和一些暗示语句——也许有一个邮政总局，可以把材料汇集齐全——，因为此刻，我已不得已进入了（所谓的）地方爱国主义的话题，因此我想要再述及一件涂改证件的小事件，这件事帮助我实现了生命的拯救。同时我确信，我的情况决非孤例。第三帝国的语言就

是一种（监狱看守和被羁押者的）监狱语言，而不可避免地（作为正当防卫的手段）就有属于监狱语言的隐晦的词语，进行误导的多重含义，涂改，等等。

当时，有人把我们从德累斯顿的毁灭里拯救出来，送进克罗彻军用机场。我们扯下了犹太人黄星，我们离开了德累斯顿的属地，我们和雅利安人一起坐进了一辆汽车，简言之：我们开始犯下一大摞的死罪，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将置我们于死地，一旦落入盖世太保手中，等待我们的就是绞架。瓦尔特曼当时的处境比我们好。“在德累斯顿的地址簿里，”瓦尔特曼说，“有八个瓦尔特曼，而我是他们中间唯一的犹太人——哪有人会注意到我的名字？”但是涉及我的姓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波西米亚边界之外的一个很普遍的犹太人姓氏——克莱普勒（Klemperer）与白铁工手工艺（Klempnerhandwerk）毫不相干，它意为敲门者，是社区的服务人员，负责早晨敲那些虔诚信徒的门窗，叫他们起床做早祷告，这个名字在德累斯顿只有很少的为人所知的几例，而我则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惊悚之后，那个地方唯一的残渣余孽。我不能声称遗失了所有的证件，那样会显得可疑，而企图避开与各种政府部门打交道也非长远之计：我们需要生活必需品的票证，需要车票——我们当时已经习惯成自然，还相信这样的票证的必要性……我们几乎同时想到了一只开给我的小药瓶。那张处方，由于医生的草书，把我的名字完全改变了，通过两个轻易可做改动的地方。只需要一个小点，就可以把“m”变成“in”，再加上一条一毫米的横线，将第一个“r”变成了“t”。于是克莱普勒（Klemperer）成了克拉佩特（Kleinpeter）。第三帝国里这样的克拉佩特太多了，应该不会有哪个邮政所会将这么大量的克拉佩特都登记入册的。

14

煤耗子

1943年春天，劳动局把我作为毫无经验和技术的辅助工人送到了维利·史律特花茶及疗浴工厂，这是一家因为军队的订货而大规模膨胀起来的工厂。他们最开始让我做包装工，把成品茶装入硬纸包装盒里——一种极为单调、但在体力上很轻松的活儿；这个活儿很快就交给妇女单独干了，我便来到了真正的生产车间，来到搅拌滚桶和切割机器跟前；每当许多新的原材料堆过来，犹太人小组也得帮忙装卸和储放。史律特茶的情况——大概也是那时所有替代茶的情况——与任何一个统治权力的情况一样：只有名称是持久同一的，内容则在不断更换；人们充塞进去的，是刚刚被炒作起来的东西。

五月的一个下午，我在一个地势很高、通风良好的地窖里上班，这是一间贯穿整个大楼一翼的大厅。除了几个凹穴和狭窄的过道，这个重要的储藏大厅已经塞得满满的，只有紧挨着天花板下面的地方还有一点位置。大袋大袋满登登的山楂属白荆花，椴树花，欧石楠，薄荷，香薄

荷等一个摞一个地堆上去，新货物不断地运进来，从院子里通过窗户扔上斜轨滑下来，来不及拖到它们该去的地方，便很快造成堵塞。我帮着把那些滚在一起的袋子拽开来归类，同时惊叹于那些搬运工，他们背着鼓鼓囊囊的沉重的包袱，往那些还有空间的储放地艰难地攀爬。一个因为有事情刚刚下来的女办事员，站在我旁边笑道："煤耗子（Kohlenklau）太棒了，他真可以胜任任何马戏团的表演。"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谁，问一个同伴，得到了一个怜悯的、不屑的回答，说，这还用问啊，不聋不瞎的人都知道："当然是奥托了，那个家伙，所有人都这么叫他"。同伴撇了下腮帮子为我指点，我看见了他，看他怎样在一袋袋货物堆成的山梁上前行，弯着腰，几乎是跑动着向前，看他怎样像毛毛虫般蠕动着他的背、肩、头，将身上的大包袱拱出去塞进一个空当里，一个挨着墙堆起来的毗邻排列里的空当，再用长长地伸出去的双臂将其全部推挤进去。这个姿势让他具有大猩猩般的、半童话似的味道：手臂是猴子的手臂，宽阔的上半身架在短短的粗壮的大腿上，双腿形成了个O字，两只脚踩在无跟的鞋子里，水母般黏糊糊地贴在不安全的支撑物上。当他转过身来时，我看见他有一张青蛙般的脸，黑色的头发垂在他窄窄的额头上，掉在他的小眼睛前。确实，这样一个类似的形象、姿势和面目我已经多次在广告柱和墙壁上看到过，但此前从未认真注意过。

一般来说，纳粹的宣传画看起来总是一个样。人们见到的总是同样的类型：暴力的、顽固僵硬的斗士，旗帜或者长枪或者佩剑，身着冲锋队或者党卫队或者野战部队的制服，或者也会赤裸着；总是生理力量的展示，狂热化意志的表达，总是肌肉、坚硬和毫无疑问的全然的思想缺失，它们形成了这些宣传运动和战争、宣传献身于领袖意志的广告的典型特征。希特勒刚刚上台执政，就有一个高级教师在德累斯顿的语文学家们面前激情地呼喊："我们与领袖不可分割！"；从此以后，这句话就从第三帝国所有的、众多的广告和特种邮票里朝我喊叫；而如果广告表现的是妇女，那么人们看见的就是这些北方的英雄男人的北方的英雄女人。如果说我对广告牌的注意只是很潦草的，这真的是情有可原的，特别是

当我戴上黄星标志以后，我总是力图尽快地从街上走过，因为在那里我从来没有安全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谩骂，或者听到令人尴尬的同情的表示。而所有这些可怜的英雄气派的广告牌，不过是把单一腔调的第三帝国语言之最为单调的地方转化为版画一类的东西，并无从自身出发对这个语言有所丰富。这些画作成打成打地登场，其文字转换形式与版画作品之间从来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一种紧密契合和任何的相得益彰。“领袖发令，我们遵命！”，或者“跟随我们的旗帜走向胜利！”，这些作为条幅、作为口号套话本身也在施加影响，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哪一个口号或者言辞与哪一幅版画配合得如此默契，以至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呼应。我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个第三帝国广告画上的形象如此进入生活，像眼前的这个煤耗子一样，语言与画面融为一体，对全体工友的日常状态产生影响。

这以后我仔细地端详起这幅广告来：真的，它呈现出了新的东西，这是一段童话，一段鬼怪叙事谣曲，它借助于幻想。凡尔赛宫里有一口井，是从奥维德的《变形记》得到灵感而创作的：那些在井缘上呷饮的形体有一半都被魔力控制，他们的人体开始消失在动物的形式里。煤耗子正是这样一种形态；双脚几乎处于两栖的状态，衣角像是一截秃尾巴，那个弓着腰悄悄开溜的小偷姿势很接近四脚动物。那名字起得好，增加了这幅画面的童话效果：不拘谨，大众化，用“耗子”替代小偷很有日常感，而通过大胆的名词自造（参见为言说！）和头韵法（Kohlenklau）又显然地超越了日常而有诗意。画面与词语如此相融，合二为一，深深潜入记忆，这跟“党卫队”这个词和它的特殊符号 SS 不无相似之处。

人们后来又作过一些尝试，想通过类似的方法发生影响，但是再也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比如为了表示某一个浪费行为——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个了，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有“钱币坟墓“（das Groschengrab）；很好的头韵，但是这个词不像“煤耗子”那么有味道，这个画面也没有那么吸引人。然后有一个滴水的冻死鬼，令人毛骨悚然

地爬进窗户，然而这儿缺少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词。与“煤耗子”最为接近的应该是那个鬼影般潜入的偷听者，那个造成恐惧不安的警示性的形象。那个形象连续几个月在报纸的角落里，在橱窗里，在火柴盒上警告人们小心探子。但是在这个鬼魅般的男人出现的同时，跟他联系在一起的说明性词语“敌人在偷听”就已然暗淡无光了，因为德国人的耳朵对这种去冠词的美式德语很不习惯；这种词语人们已经在各种所谓故事性很强的画面下见过多次，比如在咖啡馆里，可恶的敌人竖着耳朵躲在报纸后面，偷听邻桌毫无提防的谈话。

从一些复制和仿效的东西里也可以看见“煤耗子”的直接影响：那以后有过一个“钟点耗子”，有过一个扫雷艇自称“鱼雷耗子”，《帝国》上登过针对苏维埃俄国政策的一幅画，题名叫“波兰耗子”……人们在一个有手把的小镜子的框架里，还再一次看见了原封不动的“煤耗子”；底下写着：“把这个镜子举在你的面前：这是你吗，或者不是你？”此外，常常有人在看见烧着暖气的房间门敞开时会叫：“煤耗子来了！”

不过，这一切，包括那个家仆奥托的诨名，都不如我在街上注意到的一个小小的情景更有说服力，更能说明在铺天盖地的众多广告牌中，只有这个广告特别有影响。那是 1944 年，那个时候，“煤耗子”已经不再新鲜，不属于当时常见的画面了。那天在街上，一位年轻的妇女拿她捣蛋的小男孩无可奈何，小淘气鬼不断地挣脱她的手，站在街上哭嚷，不肯往前走。这时，一位沉稳的老先生跟我一样看到这个场景，他走到孩子跟前，将手放到他肩上，安静地、严肃地说：“你现在乖乖地待在你妈妈身边，跟她回家，好不好？如果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到煤耗子那儿去！”小男孩惊恐地望了这位先生一会儿，随后吓得大哭起来，撒腿跑向他妈妈，抓住她的裙子叫道：“妈妈，回家！妈妈，回家！”

阿纳托勒·弗兰思（Anatole France）写过一个故事，很令人深思，我记得它叫《园丁普托伊斯》。在一个家庭里，在孩子们面前，普托伊斯被描述为一个危险的人，一个黑人，在他们的想象中，他的这种特性被强化，他被植入下一代的教学里，他越长越巨大，变成为家庭之神，

最后干脆变成了一个神。

假如第三帝国的生存期更长一些，从图与词里诞生的“煤耗子”，绝对有机会像普托伊斯那样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15

不可能

我第一次听说“Knif”（不可能）这个词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年。贝尔托尔特·M. 准备去美国，走之前赶来了结他在这里的业务（“我干吗在这里让人慢慢地掐死？我们几年后再见！”），我问他，是否相信这个政权会持久地存在下去，贝尔托尔特·M. 回答道：“Knif！”他故意表现出一种嘲讽味儿的平和，但还是忍不住转为激愤，而柏林人的武士道精神又要求对这种激愤加以掩盖，于是，他以强烈的口吻补充道：“Kakfif！”我不解地看着他，他的解释表现出一种俯视的怜悯，说我变成了一个外省人，对柏林一无所知了：“在我们那儿，全世界都这么说，每天说几十遍！‘Knif’就是‘不可能’（Kommt nicht in Frage），‘Kakfif’：‘绝对不可能！’（Kommt auf keinen Fall in Frage）”

对事物可疑一面的敏感和批评性笑话一直是柏林人的基本品性（所以我至今无法搞懂纳粹主义是怎么在柏林成气候的）；柏林人在三十年代中期就懂得了缩写法的滑稽趣味。如果能对这种滑稽性略作手脚进行

建构的话，那么这类调料就会帮助它产生双倍的效果；就这样，用以消解柏林地下室及炸弹之夜的睡前祝福诞生了：“Popo”，意思是“头顶无休伴你睡！”（Penne ohne Pause oben）

后来，1944年3月，出现了一次真格的公开的和正式的警告，警告人们不要过度地滥用“残截词语”，比如这里提到的缩略语。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汇报》（DAZ）在固定的“我们的观点”栏目里时不时讨论语言的话题。这一次它报导了一个官方的指令，要对危害语言的短词语的继续蔓延加以遏制。好像某一个别的指令就会让人们回头剪除自己不断养成的、并且仍然在继续养成的东西，即不间断地自生自长的东西，没有任何外力生长出来的东西，从那个事物的本质中生长出的，那个现在想要遏止这一生长的事物。像“Hersta der Wigru”这样的一组发音是否还是德语，有人问道；一本经济百科全书里有这组字母，意思是：“经济团队的生产指南”（Herstellungsanweisung der Wirtschaftsgruppe）。

从时间上看，在柏林民间笑话和《德意志汇报》这个严肃观点之间，有某种东西插入，这东西很像是坏良心变得麻木不觉和推卸罪责。《帝国》（1943年8月8日）上的一篇文章有个挺诗意的题目：“对短促的爱好和强迫”，作者将缩短形式的“语言乱象”归罪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德意志的幽默是与这类肆虐表现相抵牾的；但是也还有一些成功的短词语，这些（当然！）要归功于德国人民的创造，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流传开来的替代“Artillerie”（炮兵）的“Ari”。

这篇文章满纸的奇谈怪论：缩略语完全是艺术创造，就像世界语一样，不是民间自然生长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只是自发地进行嘲讽性的模仿，“Ari”这样的是例外。包括指责俄国是语言乱象的发源地，理性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指责显然来自于三个月前（5月7日）发表在《帝国》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到了去纳粹化的意大利南部俄语语言课的情况：“布尔什维克们葬送了俄语，潮水般的怪腔怪调的缩略词及人造词葬送了她……南意大利的学生们学的是一种俚语。”

就算国家社会主义通过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从布尔什维克学来了很多东西（以便之后把这事儿，一个米达斯谎言，如同他所触及的一切，扫进骗人的货物里），但是，制造缩略语汇这一条，他是不用到布尔什维克那里去偷的，因为二十世纪初以来，更不用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情况在德国，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在全世界都已盛行。

柏林早已有了KDW，西方之商场，HAPAG出现得就更早了。有一本漂亮的法国长篇小说，叫作《Mitsou》；Mitsou就是一个工业企业的缩写词，同时又是一个情人的名字，这一情爱意味的注入提供了一个肯定的标志，说明缩略语的形式已经融入了法国。

意大利拥有一些艺术性特别强的缩写造词。这里可以区别三个层次：最低级的就是简单地把几个字母拼到一起，BDM之类；第二层构造一个音组，让其可以作为词读出来；第三层模拟现有语言的一个词，而原来的那个词和缩略语所表达的东西有着某种联系。创造之词："Fiat"（会成！）标志了都灵意大利汽车制造厂（"*Fabbriche Italiane Automobili Torino*"）的一个自豪的汽车品牌，而法西斯意大利的电影每周简报名为"Luce"（光），这里包含了教学电影联盟，*Lega universale di cinematografia educative* 最前面的字母。戈培尔为"进驻企业！"行动找到的缩略语"Hib-Aktion"，只是一个在口头使用上很得力的表达形式；在印刷上要达到完美的话，这个表达形式还缺少书写的正确性。

在日本，一个按照欧美方式衣着举止的年轻小伙和年轻姑娘，被人称作"Mobo"和"Mogo"，即modern boy和modern girl。

同缩略语的空间跨度情况一样，它的时间跨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最早时那些基督徒教区的标志和象征，Ichthys，鱼，不就是这样的一个缩略语吗？它包含了"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救赎者"这些希腊语词汇的开头字母。

然而，既然缩略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如此之大，那怎么又可以说它是第三帝国语言的一个特别的表现和一个特别的邪恶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说明人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之前对缩略语所作的要求。

Ichthys 是一个宗教秘密联合体的标志，它身上附着了双重的浪漫派因素，即秘密的盟约和神秘主义的兴起。Hapag 具有商务上必要的、适合于电报地址的简短性。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可以因为浪漫主义超验的、精神层面的格式用语年代久远，远为令人起敬的久远，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对语言和诗文事物上类似的结论同样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实用的表达需求之前，宗教表达的需求先行找到了它的形式；而也许，只不过是庄严事物的表达，相对于日常事务的表达，更具有那种获得记载保存的荣幸而已。

此外，再仔细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浪漫主义的东西和现实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变得很不确定。如果有人与一个工业产品的专业缩写符号、一个电报地址打交道，总是会，不管是比较强烈或者不很强烈，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有那种热乎乎的感觉，觉得自己通过一种特别的知识，一种特别的关联，从一般的群众中突出出来，属于一个特别群体中的内部人士；而对这种感受的变化，那些制作相应的缩写词的专业人士显然是十分清楚的，并且非常着意于此。当然，毋庸置疑，现代社会对缩略语的普遍需求是从现实的业务需求，生意的、工业的需求中产生的。而工业的和科学的缩略语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却又是无法确切说明的。

现代缩略语浪潮的出发地毫无疑问是那些商业和工业强国，英国和美国，当然苏维埃俄国表现了对缩略语风潮特别的倾心，所以有对俄国的“语言肆虐”的攻击。因为列宁把国家的工业化列为一个主要任务，并在这方面以美利坚合众国作为追随的榜样……语文学家的札记本！多少课程论文和博士论文的题目就在这寥寥数行里，多少对语言史和文化史的新见解可以从这里出发去发掘……

不过，现代的缩略语并不仅仅在专业－经济的领域里得到了发展，而且也在政治－经济的和狭义的政治范畴里发展状大。不管是哪里，只要涉及工会、组织、党派，哪里就会出现缩略语，哪里就会明确地感觉

到特殊符号的那种感情价值。把这个范畴的缩略语同样归宗于美国，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我不知道社民党（SPD）的名称是否必须依赖于一个外国语言的榜样，但这一类缩略语在德国的惊人蔓延必然是模仿外国造成的。

然而马上就有某些德国本土的元素加入进来。帝制德国最强大的组织是军队。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队语言里就聚集了所有的缩略语形式和缩略语动机：工业器械和团队的简略名称，作为对外防御、对内相互认同的口令等等。

我问自己，简略语是否必须、为什么必须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的明显特征，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以前没有哪一种语言风格像希特勒德语这样大肆地使用这种形式。现代缩略语在所有技术化和组织化的地方都会出现。基于其整体化的要求，国家社会主义将一切都技术化和组织化了，于是它的缩略语也就规模巨大。出于同样的整体化要求，它也寻求控制人们内心生活，因为它想要充当宗教，并且到处插遍法西斯弯钩十字旗，于是它的每一个缩略语都与古老的基督教的“鱼”有亲缘关系：两轮摩托机枪（MG）射手或者是射手队，希特勒青年团（HJ）的或者德意志劳动阵线（DAF）的成员——人们始终是“结盟的共同体”。

16

在一个独有的工作日

毒素俯拾皆是。第三帝国语言的饮用水被毒化了，无人得以逃脱。

逖密西 & 莫毕乌斯是一家生产信封和纸袋的工厂，那里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纳粹化的东西。厂长虽然是党卫队队员，但他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维护他厂里的犹太人，和他们说话也很有礼貌，有时还让厂里的食堂发给他们食品。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给我以比这更有力或者更持久的慰藉：如果能有一小截马肉肠，或者我被人称呼一回“克莱普勒先生”甚至“教授先生”。我们戴黄星的人被打散分在雅利安工人中间，只有在吃饭时和防空警报下才实行隔离；工作时，只能用禁止与我们交谈的方法来替代隔离，但是没有人遵守这一条，工人们更没有什么纳粹意识，起码在 1943 年到 1944 年的冬天他们已经不再有了。大家只是畏惧工头和两三个女的，认为他们会打小报告，这几个坏名声的家伙出现时，人们便会相互触碰一下，或者使个眼色，以示警告，但是只要他们不在视线里，马上又会充满了工友间的亲和气氛。

所有人中最友好的是驼背的芙丽达，她教会我手艺，而且一旦我那个信封机给我找麻烦了，她总会来帮助我。她在这个工厂已经干了三十年，即便是工头也不能拿她怎么样，她照样在大车间里机器的嘈杂声中高声地表示善意："您别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没和他说话，我是在指导他怎么处理涂胶器！"有一次，芙丽达得知我太太生病了，在家躺着。第二天一早我就看见我的机器上立着一只大苹果。我朝芙丽达干活的地方望去，她向我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站到我身边，说："给你妻子，帮我好好地问候她。"之后，她很好奇，很惊讶地说："阿尔伯特说，您太太是个德国人。她真的是德国人吗？"……

苹果带来的快乐过去了。这个圣洁－朴实的心灵，完全非纳粹的和完全人性的，被浸入了纳粹之毒的基本元素；她认为"德意志的"与那个具有魔力的概念"雅利安的"是一回事；她觉得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一个德国妇女跟我这个异族人、动物世界的另一个种类里的造物结婚了，因为"异种的"、"德意志血统"、"下等种族的"、"北方的"、"种族耻辱"，这些东西她听得太多了，也跟着说得太多了：她肯定不懂得所有这些概念，但她感情上无法接受我的太太会是个德国人。

阿尔伯特，她的信息的发源地，思维方面胜她一筹。他有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且一点都不与政府一致，也不热衷军事。他有一个兄弟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自己则因为严重的胃疾没有通过征兵体检，至今每一次都被刷下。"至今"这个词每天都可以从他嘴里听见："至今我还是自由的——只要他们别在战争结束之前把我招去，这混蛋战争！"在这个苹果之日，传来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消息，说联军在意大利某地取得了一场胜利，这令他在和一个同事聊天时，比平日在自己的常规话题上多停留了一阵。我正在紧挨着阿尔伯特的地方装货，把我机器要用的一沓沓纸张放进一辆手推车里。"但愿他们别把我招去"，他说，"别在这场混蛋战争结束之前！"——"可是你说，战争怎么才能结束？没有人愿意示弱。"——"喏，这倒是很清楚：他们总有一天要认识到，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是不能让我们屈服的，我们组织得这么棒！"组织得

很棒——这里又来了，那囫囵吞下去的、那令人眼光迷离、飘飘欲仙的毒品。

一小时之后，主管师傅叫我，让我去帮他往成品包装盒上贴标签。他自己先计算、填写标签，我将它们贴上高高堆起来的一列列纸盒，我们站在纸箱墙的后面，与这个大车间里的其他人隔离开来。这种隔离状态使这个老人的话多了起来。他叹息说着自己都快要七十岁了，却还在工作；没有想到他的老年生活是这样的，但是人们现在就得像奴隶一样地干活，直到蹬腿！“而我的孙子们会是什么命运呢？如果小家伙们回不来怎么办？埃尔哈特几个月都没从木尔曼斯克捎话来了，小的躺在意大利的一家战地医院里。什么时候和平才能到来啊……就是美国人不要和平，其实我们这儿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会通过战争发大财，这几个犹太猪。这的确是‘犹太人的战争！……’又是他们惹出来的！”

汽笛的呼啸声打断了他；我们常常会直接得到正式的警报，预警在这段时间里有时也会被忽略掉，因为它来得太频繁了，大家已经不再为此而中断工作了。

下面的大地下室里，一组犹太人围着一根柱子坐着，挤在一起，明显地跟雅利安工人区分开来。但是雅利安人坐的那些长椅离得很近，前面几排的聊天声不断地传到我们这边。喇叭里每两三分钟播出一次情况报告。“机群向西南飞去……新的机组从北方靠近。德累斯顿有遭受袭击的危险。”

谈话停顿下来。然后，一位坐在最前排的胖女子，一位很勤奋很能干的女工，操作复杂的“开窗信封”的大机器的——，带着平静的确定的口气微笑道：“它们不会来，德累斯顿不会受到伤害。”——“为什么？”她的邻座问，“你也相信那个胡话，说他们要用德累斯顿作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吗？”——“不是的，我有更好的理由。”——“那到底是什么呢？”回答伴随着一种醉心迷恋的微笑，那笑容出现在这张粗线条的、缺少灵气的脸上显得有点怪异。“我们三个人都看见了，看得很清楚。上个星期天的中午，在安娜教堂附近。天空很晴朗，只有几片小小的云彩。

突然这些小云彩中间的一朵伸展开来，变成了一张脸，一副非常清晰、独一无二的轮廓（她确实说的是‘独一无二’！）。我们三个马上认出来了。我丈夫最先叫了起来：是老弗里茨，跟他的那些画像完全一样！”

“接下来呢，你想说什么？”——“还有呢？”——“这一切和我们在德累斯顿的安全有什么关系？”——“怎么可以问这么笨的问题？我们三人，我丈夫、我姐夫和我都看见的这个图像，难道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志，说明老弗里茨在德累斯顿上空守护着吗？他保护的城市还会有什么事呢？……你听到了吗？警报已经解除了，我们可以上去了。”

一天之内，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四种坦露接踵而至当然是个例外。这种精神状态本身并不局限于这一天，也不局限在这四个人身上。

这四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位都不是真正的纳粹。

那天晚上我防空值班；我座位几米之外的地方就是一条通往雅利安人防空哨所的路。我正读着一本书的时候，那位痴迷于弗里德利希的女士路过我那里，高声向我问候：“希特勒万岁！”第二天早晨她向我走来，用很诚恳的口气说：“请原谅我昨晚的‘希特勒万岁！’，我急急忙忙走过去的时候看错人了，我是该向另一个人这样致意的。”

没有一位是纳粹，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中毒了。

17

体系和组织

我们知道有哥白尼体系，有某些哲学体系和某些政治体系。而国家社会主义者讲“体系”时，他指的只是魏玛宪法的体系。在第三帝国语言对这个词专门的运用下——不，应该说由于它扩展成为1918年至1933年这整个一段时间的标志，这个词十分迅速地普及化了，其普及程度远远大于作为一个时期标志的“文艺复兴”。早在1935年夏天，一个前来修理庭园木门的木匠就对我说：“我浑身冒汗！在体系时代，有那种舒服的席勒领口，可以敞开脖颈。现在这类东西都看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勒得很紧的玩意儿，很死板的东西。”这个人当然不会想到，他在同一个句子里，既形象地哀悼了所丧失的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自由，也形象地用蔑视惩罚了这个时期。席勒领口意味着一种自由的象征，这一点不需要解释，而“体制”里面含有一个责难的隐喻，则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对于纳粹分子来说，魏玛的政府体系就等同于体系，因为他们曾经

直接与这个政府体系进行过战斗，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最糟糕的政府体系，他们与之不共戴天的程度比之与君主体制更为强烈。他们指责那个体系分崩离析为太多的党派，导致职能丧失。在希特勒的暴政下的帝国会议上演了第一次活剧之后——没有任何的讨论，政府的每一个要求都被一个训练有素的木偶群体一致接受——党报们欢呼雀跃，胜利地宣称，新的帝国议会半个小时的工作效率超过了体系议会制半年的效率。

然而，在拒绝体系的背后，语言思想层面的——我的意思是：根据这个字符的意义，尽管它在这里只代表“魏玛议会制”——远远不仅止于此。一个体系是某个“搭建到一起的东西”，一个结构，一个用手和工具根据理性的安排实施的建筑。我们今天讲铁路和运河系统，也是在这层具体的、建构性的意义上。但是这个词更常见地（因为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很爱讲“铁路网”），几乎完全地，是用于抽象的事物上。康德的体系是一个以逻辑联系起来的思想之网，用以把握整体世界；对于康德来说，也可以说对于职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哲学家来说，哲学思考就意味着：系统地思考。然而这一点，正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从其本质的最深处必须加以拒绝的，是他从自我维护的内心需求出发必然加以排斥的。

思考者，不需要别人说服他，而是要达到信服；系统思考的人，加倍地难以信服。所以第三帝国的语言对哲学这个词的好感几乎比对体系这个词还要少。他们反感体系，提它的时候总是带着蔑视的态度，但是却经常提它。而哲学他们则决口不提，完全用“世界观”（Weltanschauung）来替代这个词。

“观”（anschauen）从来不是思想之事，思想者做的事正好相反，他把他的感官从对象上脱离开来，他进行抽象；“观”也从来不仅仅是作为感官的眼睛的事情。眼睛只是看。“观看”这个词在德语里是专门用于一个较为稀有的、较为正式的、充满预感的模糊的——我不知道，就说是行动或者状态的：它表示一种看，在这种看中，观看者的内心、他的感情参与了进来；它表示了一种看，这种看不止看见了被观察对象

的外表，而且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同时抓住了其内核、其灵魂。“世界观”，这个在国家社会主义之前已经广泛使用的词汇，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作为“哲学”的替代词遗失了所有的礼拜天的性质，而获得了日复一日俗常的、手艺的感觉。“观”，对于史泰芬·盖奥尔格小组是神圣的，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也是一个受到膜拜的词——假如我把这本札记作为真正的词典来写，用我喜爱的百科全书的风格，那我自然就会在这里标明参见“巴尔努姆”词条——，而“体系”则上了被排斥的黑名单，和它一起的还有“智性”（Intelligenz）和“客观性”（Objektivität）。

但是如果“体系”被唾弃了，那么纳粹怎么称呼自己的政府体系呢？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个体系的，而且对这个绝对囊括了所有生活表述和生活情境的大网感到非常自豪；所以说“极权”（Totalität）是第三帝国语言的基本支柱之一。

他们没有体系，他们有一个组织，他们不用理性去系统化，他们暗自偷听有机组织体（Organisches），窃取其秘密。

我必须从这个形容词开始，在这个词族里，唯有形容词，不同于名词“器官”和“组织”，不同于动词“组织”，还保留了最初之日的美好和圣洁之光。（这个最初之日是什么时候？毫无疑问是在浪漫派的日出之际。不过，说“毫无疑问”，总是因为问题正好提出来了，所以这应该留作一个专门的考察题目。）

当克莱门斯在卡斯帕－大卫－弗里德利希大街抄家，拿《二十世纪的神话》夯我的头，并把跟这本书有关的笔记撕毁（幸亏撕得无法辨认）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日记本里对罗森贝尔格关于“有机组织的真理”隐晦的核心学说花过一番功夫。当时，还在进攻俄国之前，我就写道：“如果这辞藻混乱的学说不导致如此可怕的毁灭性后果，它会何等的可笑！”

罗森贝尔格教导说，职业哲学家们全都犯下了双重的错误。首先他们都去“追逐所谓的那一个永恒的真理”。其次他们是在“纯粹的逻辑道路上寻求，其方式是用理性的原则不断地、继续地推理”。但是，如果人们将身心投入他的，阿尔弗莱德·罗森贝尔格的，当然不是哲学的，

而是神秘之观的深层意义上的世界观方面的认识，那么“那全部的失血的纯粹格式化的理性垃圾堆一下子就被清除掉了”。这些引语包含了第三帝国的语言厌恶“体系”这个词和这个概念的最重要的原因。

紧接着，在《神话》最后几页的总结部分里，“有机组织的”终于登堂入室了；orgao（ὀργάω）意为膨胀，发芽，植物般的无意识地成长起来，“有机组织的”（organisch）于是有一天德语化了，与德语词“成长性的”（wuchshaft）交织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为了假想中的普遍人类而存在的真理，由这个“有机组织的真理”取代了，它从一个种族的血统里生长出来，并且只适用于这个种族。这个“有机组织的真理”不是由思辨能力推导、发展出来的，不是立足于一个理性的知识中，而是存在于“民族和种族心灵的神秘中心”，是北方血统的日耳曼人与生俱来的：“一个种族的最终可能的‘知识’已经包含在它最初的宗教神话里了”。这样的摘录，无论我堆积多少，事情都不会变得清晰起来；把事情讲清楚根本就不是罗森贝尔格的意图。追求清晰的是思想，巫术则在晦暗中施行。

在这些隐晦的论说中，有机组织的身上罩着一层富有魔力的光环，弥漫着一种令人麻醉的血统气味，而当人们从形容词过渡到名词和动词时，那光与味在语言的感觉上都一定程度地丢失了。因为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前，政治领域早就有了“党的喉舌”和很多的“组织”，在我最先听人说政治方面事情的时候，也就是在九十年代，人们在柏林一般会讲一个工人，他是“一个有组织的人”，或者说：他“在组织里”，以此表明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一个党的喉舌并不是由种种血统的神秘力量造就的，而是通过很多思考编辑的，一个组织的构成也不似一个果实，而是悉心地建设起来的，用纳粹分子们的话就是“扩展起来”的。我肯定也读到过这样的作家，而且还应该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日记本里我用括号注明了：“查，在哪里，什么时候！”，然而，直到今天，获得解救一年多了，查询这件事仍然还有很多困难——正是这些作家认为组织是杀死有机组织、阉割灵魂而使人机械化的途径。在

那帮国家社会主义者里面，我看到在德温格的卡普－政变小说（Kapp-Putsch-Roman）《在半途上》（1939），“可怜的”、因为造作而被鄙视的组织纽带被置于“真实的”、生长出来的自然联系的对立面。不过德温格也逐渐地滑到了纳粹主义的一边。

总而言之，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面，“组织”一直是一个诚实的和受尊敬的词，除了专业方面的个别和孤立的情况，它经历了一种1933年以前尚未曾有过的发展。

极权的意志导致了组织的泛滥，泛滥到下至希特勒少年，不，是下至猫群：我不再允许为动物保护协会下属的猫会缴纳会费，因为在“德意志猫咪协会”（Deutsches Katzenwesen）里——协会讯息报里确实是这么叫的，这张报纸如今也已经变成了党的喉舌——不再有位子给那些待在犹太人身边的、非纯种的动物了。后来，他们把我们养在家里的宠物，猫、狗，甚至金丝雀也都给掠走、杀死了，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出自个别人的恶劣品行，而是官方的、系统的行为，是纽伦堡审判没有提到的残暴之一。假如我握有实施处罚的权力，我会为这类残忍行为架设一座高塔般的绞架，即使我将因此而失去永恒的天堂。

说这些，我并没有完全偏离第三帝国的语言这个主题，虽然表面似乎如此。因为正是“德意志猫咪协会”成为一个契机，使那种语言上的创新广为传播，令其十分可笑。纳粹在其组织手段和严密的集中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偏执，在个别的组织之上又创建了综合性的“覆盖组织”；为庆祝第三帝国的第一个狂欢节，《慕尼黑最新消息》的狂欢节号外认为还可以更放肆一点，便推出了一个关于“德国猫咪协会最高组织”的笔记。这份报纸后来变得温顺了，两三年后完全销声匿迹。

一方面，这个讽刺只是个别现象，没有特别地蔓延开来，另一方面，一种对纳粹意义上组织行为全无嘲讽的、全然下意识的接受（Kritik）却发展起来，从民族心灵自身真正有机地生长出来了；用一个非浪漫色彩的表述就是：这种批评同时出现在太多的场合，表现出相同的自然而然的态度。而其原因仍然是这本书开头所提到的：语言为我们吟诗，为

我们思考。我对这个下意识的接受进行了观察，它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早在1936年我就遇见过一位年轻的汽修钳工，他娴熟地修好了我的汽化器突发故障，对我说："怎么样，我这活儿组织得棒吧？"他耳朵里整天充斥着"组织"的名词和动词，他脑子里填满了这种观念，认为所有的工作都得首先加以组织，也就是说，都得由一个安排者分工给一个纪律严明的团队，以至于他面对由自己独立完成的任务时，竟然想不到一个与之相应的简单的表达，比如"工作"或者"了结"或者"完成"或者最基本的"做"。

我最早是在斯大林格勒的日子里，此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了这种批评的第二个、决定性的发展阶段。比如当我问起是否还能买到好一点的肥皂时，对方回答我说："买是买不到的，得去组织它。"这个词已经变得晦浊，味道不正，感觉很不地道，很不规矩，它所沾染上的正是那些正式的纳粹组织散发的味道。但是，人们也"组织"私事，这样说话的人完全无意于一个不明不白的行动。不，"组织"是一个良善的、到处喜闻乐见的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为的自然而然的称谓……

至此，我写了好半天的过去时了：那时（es war）……。然而，是谁昨天还说来着："我得去给自己组织一点烟？"我怀疑那是我自己。

18

我相信他

每当我想到人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时，眼前总是最先出现宝拉·封·B，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灰眼睛，那张不再年轻鲜嫩但却精致的、良善的，又十分知性的脸。她是瓦尔策德语讲座的助教，非常多的中小学教师在图书资料、写作课程等方面获得她多年认真周到的帮助和指导。

奥斯卡·瓦尔策（Oskar Walzer），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他可能有时候略微从美学的东西偏离到了美学家的东西上，可能有几次出于对事物发展最新状态的偏爱而陷入附庸风雅的危险，可能在大规模的公共讲座里对大批太太听众或者人们所谓的五时茶-听众有一点过多地顾及，但是，尽管如此，他在他的著作里始终是一名扎实的学者和思想丰富的人，为文学作出了许多贡献。由于他的总体思想和他的社会姿态完全属于传统中产阶级左翼，他便很容易被他的敌人指责为“犹太副刊主义”（jüdischer Feuilletonismus），而当瓦尔策拿出了希特勒所要求的雅利安证明的时候，他毫无疑问地把那些人给惊呆了；那时他已经到了波恩，

即将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这张纽伦堡的赦免条，对于他的太太以至于他的朋友圈子，则是不可企及的。

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封・B显得非常开心，他的朋友也是她的。我获得她的好感显然是因为我对瓦尔策的认识，我永远不会因为他的一些外在的小毛病而否认他的内在分量。后来，瓦尔策德累斯顿的继任者用某种哲学的重流质取代了沙龙风格——文学史的崇高讲坛上一般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小小的矫情，这似乎是这个行当不可避免的职业病。宝拉・封・B对新老板的风格也很适应，几乎跟以前一样开心；无论如何，她的知识面和理解力足以帮助她，在这个潮流里也同样游刃自如。

她出身于一个老的贵族军官家庭，她父亲去世前是一位退休将军，她的哥哥戴着少校军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返回，然后进入了一家犹太人的大公司，获得了一个备受信赖的很风光的职位。假如有人在1933年以前问我宝拉・封・B的政治观点，我的回答很可能是：德国的，毫无疑问；欧洲的和自由中立的，也同样不容置疑；还怀有一些对辉煌的皇帝时代的渴念；但是，我更可能会回答说，政治对于她来说根本不存在，她全部身心都沉浸在精神生活里，同时，她在大学里的很现实的工作也不允许她耽于那些风花雪月的文艺东西、甚至无聊的夸夸奇谈。

然后1933年到来。宝拉・封・B有一天要来我的系科取一本书。这位平日里严肃的女子满面春风地朝我走来，步态里有一种年轻人的轻盈。“您情绪很好啊！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吗？”——“特别的？我还需要特别的吗？……我年轻了十岁，不，是年轻了十九岁：1914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么开心过！”——“您竟然在我面前说这种话？这话您也说得出口，您难道没有看见、读到、听见这一切吗？您看见人们怎样被侮辱，那些一直跟您关系密切的人，您看见那些书籍怎么被践踏，那些您一直都推崇备至的作品，您看见所有的精神上的东西怎样被抛弃，那些您至今……”她打断我，有一点吃惊地、非常亲切地说：“亲爱的教授先生，没想到您会受到这么大的刺激。您应该去度假，休息几个星期，决不要看报纸。您眼下感到很委屈，那些琐碎的令人不快的和美中不足

的事情转移了您的视线，令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但是这么伟大的改造工程出现一些小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很快您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我过一阵就去拜访您们二位，您不反对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像一条蹦跶的油煎鱼一样跳出了房门，同时丢下一句：“向您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很快”后来变成了“数月”，在这段时间里，新政权整体的邪恶和它对于“犹太知识精英”的特别的残暴越来越公开化。无忧无虑的宝拉·封·B应该会感到震惊。我们在学校见不着面——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故意回避我。

直到有一天，她终于到我们这里来了。她说，她要向朋友们坦承自己的信念，她把这视为自己的德意志义务，并希望我们一如既往地把她当作朋友。“‘德意志义务’，这话您从前不会说的”，我插话道，“德意志的或者非德意志的，这跟十分私人的东西和普遍的人性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您想跟我们进行政治交往？”——“德意志的或者非德意志的，这与一切都有关系，这本身就是实质性的问题，您看，这是我、我们所有的人向领袖学来的，或者说是重新学习来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给遗忘了。领袖把我们重新带回家来了！”——“您对我们说这些干什么？”——“您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您必须理解，我完全属于领袖，但是您不应该以为，我因此而放弃了对您的友好感情……”——“这两种感情怎么能够统一呢？对您如此尊敬的导师和从前的领导瓦尔策，您的领袖又会说什么呢？您让学生写关于莱辛和其他所有大家的课程论文，您从他们那里读到的人道主义与这一切如何统一？还有……不过，继续这样问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我的每一句话，她只是摇头，眼睛里含着眼泪。“是的，看来的确是毫无意义，因为您问我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理性，而其背后的情感，却纯粹是对于非本质事物的积怨。”——“如果我的问题不是来自于理性，那它们又应该来自哪里？那个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我已经跟您说了，就是我们回家了，回到家里了！这一点，您得去感受，您得听

从这种感情，时刻感受领袖的伟大，而不是您自身眼下不利的处境……您问我们的经典作家吗？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与他相互对立，人们只须要正确地阅读他们，比如赫尔德——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会令他们信服的！”——“您这种信心又是从何而来的？”——“从所有信心的源发地：来自于信仰。如果您认为这话等于什么也没说，那么——那只能说明我们的领袖反对……（她及时地把犹太人几个字咽了下去，继续道）……反对僵化的知识分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相信他，我必须对您说，我相信他。”——“既然如此，尊敬的封·B小姐，那么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将关于信仰的谈话和友谊推至一个未知的时间……”

她走了，在我还留在学校的短暂时间里，我们真的小心地相互回避。此后，我只再见过她一次，也只在一次谈话中听到有人谈及她。

再见到她是在第三帝国的一个历史性时刻。1938年的3月13号，我毫无预感地打开国家银行营业大厅的门，接着就往后退，起码是退到了可以让半开着的门将我部分地遮住。因为大厅里，所有的人，无论是柜台前的还是柜台后的，全部伸长着胳膊僵硬地直立在那里，倾听着收音机里激昂的声音。这个声音正在宣布奥地利与希特勒德国结盟的法律。我保持在我的半遮掩状态，以便不必跟着举手致礼。在人群的最前面，我看见了封·B小姐。她全身陷入了沉醉痴迷的状态，她的眼睛放光，她僵硬的姿势和致礼不同于别人的“立正”，而是一种痉挛，一种迷狂。

又过了几年，一则关于几个大学人事的消息辗转传到了犹太人居所。提到封·B小姐时，那人大笑，说她是领袖最不可动摇的追随者，但同时却比别的有些党徒无害，因为像告密和其他卑鄙的事情她是不干的。她只是激情洋溢。她刚刚向所有的人展示了她成功拍摄的一张照片。她在假期旅行中从远处观赏了上萨尔茨山；她未能亲眼见到领袖本人——但还是见到了他的狗，而且给它拍了一张非常棒的照片。

当我太太听到这些时，发表看法道：“当初，1933年，我就对你说过，这个B.是一个神经质的老处女，在领袖身上找到了她的救世主。希特勒就依靠这一类老处女，或者说在他大权在握之前，一直以这类的

老处女为依靠。”——“我那时就这样回答你，今天依然如此回答：关于老处女的这个看法肯定是不错的，但是仅仅这一点是做不到这些的，仅仅这一点在今天同样不够，或者说今天肯定不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在斯大林战役之后），所有的权力手段，所有肆无忌惮的暴政都不够。必须有信仰，发源于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必须覆盖更多的人，其他的人，而不仅仅是老处女。而且封·B小姐也不是最典型的老处女。我们认识她多年了（那些年对她来说已经是危险的年岁），而她一直是一位十分理智的女性，她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她有一份非常适任的工作，她在一个清醒的、干练的环境中长大，她在很长的时间里与视野宽阔的人们相处，身心愉快——所有这些，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令她对这种宗教性质的心理战术具有抵抗能力……我认为，她的‘我相信他’在这里至关重要……”

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当人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全面的、无可挽回的败局的时候，当终场直接伫立在面前的时候，我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两次碰上了对这一信仰的坚持，两次都没有任何老处女现象在里面起作用。

先是在普法芬霍分附近的森林里，1945年4月初。我们成功地逃进了巴伐利亚一带，并持有身份证明，应该可以凭借它们在某个地方找到居所，只是起先不太顺利，所有的村镇都让我们去找下一个。我们驮着行李徒步赶路，十分疲劳。一名战士赶上了我们，二话没说就拿过我们最重的行李背上，加入了我们一行人。他二十出头的样子，有一张友好而开朗的脸，看上去结实健康，只是制服的左臂空荡荡地垂挂下来。他说他看出来了，我们的行李太重，背不动了，他干吗不来帮助一下“人民同志”（Volksgenossen）呢，我们应该是同路，都是往普法芬霍分方向去的。接着，他很可爱地谈起了自己。他曾经在大西洋防线受伤被俘，在一个美军战俘营里生活过，后来作为截肢者交换回来。他是波美尼亚地区的农民，一旦他的家乡从敌人手中获得解放，他就想回到家乡去。——“从敌人手中解放？您还这样认为吗？俄国人已经到了柏林的大门口，英国人和美国人……”——“我知道，我知道，也有相当多的

人认为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您自己不这样认为？您不是目睹了很多吗？您在国外肯定也听说了很多……”——“唉，那都是谎话，外国说的东西。”——“但是敌人已经深入德国了，我们的救援物资也耗尽了。”——“您不能这么说。您再等十四天吧。”——“这十四天还能改变什么呢？”——“那时就是领袖的生日了。许多人都在说，那时候反攻就要开始了，我们之所以让敌人这么深入地进来，只是为了到时候能够更加稳妥地消灭他们。”——“您相信这话？”——“我只是个二等兵；对军事懂得不多，没法对此进行判断。但是领袖最近刚刚宣布，我们必胜。他从来没有骗过我们。我相信希特勒。不，上帝是不会遗弃他的，我相信希特勒。”

跟他前面说的所有的话一样，最后这个句子也同样十分简单，顶多显得略微沉思一点，说完，这个至此那么爱说话的人，将目光投到地上，沉默下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幸好几分钟之后，当普法芬霍分的最初几座房子出现的时候，他离开了我们。

还有一次，在那之后不久。我们在一个叫下博尔巴赫的小村子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住所，那个村子不久就被美国人占领了。那里离前线很近，打散了的军团或者落单地、或者一队队地往回撤。部队在蒸发。人人皆知，一切都完了，人人都想要逃脱做俘虏的命运。绝大多数人转而反战，一心只要和平，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有些人诅咒希特勒，有些人诅咒政府，认为领袖本人的意愿是好的，崩盘的责任在于其他人。

我们和很多人交谈，因为我们的户主是天底下最为乐善好施的人，总是能为每一个流亡者找到一块面包或者一勺浓汤。晚上，四个来自不同下属部队的战士围坐在桌旁，一会儿他们将去仓房过夜。其中俩人是来自北德的年轻大学生，另外两个年纪较大，一个是木匠，上巴伐利亚人，一个来自施多尔克夫，是位鞍具匠。那个巴伐利亚人谈到希特勒非常激愤，两位学生也附和他。这时，鞍具匠一拳击在桌上。“你们应该感到羞愧。瞧你们那样儿，好像战争已经打败了似的。只不过是美国佬冲破了这儿的防线！”——“那么俄国人呢？……英仔呢……法国人呢？”

他们朝他四处出击，告诉他，现在是 12 点差 1 分，就连孩子都该明白这一点。——“这根本不是什么明白不明白的事，必须要信仰。领袖不会退缩，领袖是不可战胜的，当其他人都认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每次都能找到一条出路。不，活见鬼，不，这根本不是明白不明白的事，必须相信。我相信领袖。”

于是，来自两个民众阶层的信仰表白，知识阶层的和狭义的民众阶层的，我都听到了，而且是两个时间段都有，最初的阶段和最后的终结时段。这些表白每一次都不仅仅是嘴巴说说而已，而是发自坚信的内心，我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并且，这三个表白的人显然都拥有人们常说的平均智力，这一点对我来说当时就很明确，目前看也毋庸置疑。

第三帝国的语言在其巅峰状态时，必然是一个信仰的语言，这一点不言自明，因为它追求的就是狂热。而这里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就是它作为信仰的语言紧紧地依傍基督教文化，确切地说是依傍天主教，尽管国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基督教，而且恰恰是反对天主教会，时而公开地，时而秘密地，时而从理论上，时而在实践中打压之。在理论上，他们从其希伯来语和——第三帝国语言的专用语——“叙利亚的”（syrisch）根子上消灭基督教；实践上，他们一再坚持党卫队队员要退出教会，并力图在从事义务教育的中小学教师中贯彻这一条，他们审判修道院学校的同性恋教师，并对之加以渲染，同时把人们称之为政治神父的神职人员关进监狱或者劳改营。

但是，党的第一批牺牲者，那十六个在统帅大厅前倒下的人，获得的却是和基督教的殉道者一样的待遇，同样的宗教崇拜，同样的语言方式。那面红旗，高举在他们游行队伍前面的，叫作血旗（Blutfahne），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新编号在抚摸血旗的仪式中生效。这一类场合的讲话和文章中必不可少的还有“血祭者”（Blutzeugen）。这些表达制造着虔诚的血雾，光是这血雾，已经足以将没有直接参加过、或者没有通过

电影参加过这类仪式的人团团笼罩。

诚然，篡取奥地利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1938的大德意志圣诞节”，的确被所有的报道全然非基督化了：这完全是个庆祝“德意志心灵的节日”，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复活”，所以也就是光的新生，于是有了对日轮和弯钩十字的朝拜，而犹太人耶稣则整个地与之毫不相干。至于此后不久在希姆莱生日之际被捐赠的血章(Blutorden)，就显而易见的是“北方血统勋章”（Orden des nordischen Blutes）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里作为词语发生影响的，却是朝着基督教的超验方向：圣诞节的神秘性、殉道精神、复活、信仰骑士团的开启仪式将自己（不顾其世俗的含义）作为天主教的或者所谓的帕斯法尔[1]意象与领袖及其政党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而“血祭者们”“永恒的哨所”（ewige Wache）也引导人们往这同一个方向想象。

这里，“永恒的”（ewig）这个词起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它属于第三帝国语言词典中一类特殊的词语，其纳粹主义只存在于它们肆无忌惮的频繁使用中：第三帝国的语言里，使用太多的词语有“历史性的”，有“唯一的”，有“永恒的”。人们可以把“永恒的”理解为纳粹主义的数字最高级的长梯上最高的横档，而借助这个最高的横档就够上了天。“永恒的”是神性事物的专属形容词；我如果把某一样东西称之为永恒，我便将其提升进了宗教的范畴。“我们找到了那条通向永恒的道路”，莱耶（Ley）在1938年初，在一所希特勒学校启用的庆典仪式上如是说。在学徒考试中，会不时出现一个刁难人的问题，考生很容易上当。这个题目是：“第三帝国之后是什么？”毫无概念者或者一个踉跄栽入圈套的人会回答：“第四帝国”，然后，他就会（即便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作为不合格的党的信徒被毫不留情地刷掉。那题的正确答案必须是：“之后无来者，第三帝国是德意志永恒的帝国。”

1　瓦格纳最后一部音乐剧剧名。剧名与主人公同名。

希特勒本人使用毫无疑义的新约词语以标榜自己是德国人的救世主，这种情况我只记录了一次——（但是，再说一次：只有很少的东西进入过我的耳朵、出现在我的眼前，即便是现在，我能够做的补充阅读也极为有限）。在 1935 年 11 月 9 日的日期下面我记载道："他把在元帅大厅前牺牲的人称为'我的信徒'——那是十六个人，他当然要比他的前人多四个——，葬礼上声称：'你们在第三帝国复活了。'"

即便这是一个例外，也许这种直接自喻上帝、在修辞风格上的把自己比作新约里的耶稣的情况真的只有过一次，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领袖一次又一次所强调的自己与上帝之间特别亲密的关系，他的特殊的被挑选者的身份，他的特殊的上帝之子身份，他的宗教使命。在其凯歌高奏的上升期间，他曾经在维尔茨堡说（1937 年 6 月）："天意（Vorsehung）引导着我们，我们遵循上帝的意志行动。没有这个天意的福佑，任何人都不可能创造众民族的、世界的历史。"在 1940 年的英雄纪念日，他"谦卑地祈望天意的恩赐"。连续多年，这个将他挑选出来的天意几乎出现在他的每一个讲话、每一次呼吁里。1944 年 7 月 20 日的谋杀行动之后则是命运，是命运在维护他，因为这个民族需要他，需要他这个"信仰和信心的"旗手。1944 年的除夕，当胜利的希望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宣称，那位有形的上帝一定会像在胜利的日子里一样再次到来，那位"至高无上者"是不会让正义的事业无果而终的。

另一个情况比建立这类与上帝的个别联系更为重要。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书《从皇帝宫廷到帝国元首府》里，于 1932 年 2 月 10 日谈到了领袖在体育馆的一次讲话："最后他沉浸于一种美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演讲激情中，直至用'阿门！'这个词结束，这个结尾显得如此自然，令所有的人深感震撼、深为所动……体育馆里的群众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心醉神迷之中……"这个"阿门"明确地显示出，希特勒演讲的基本方向是一种宗教性的、夸张做作的。而"显得如此自然"的评价出自这位最专业的听众，可以证明这是有意识地运用了高明的演讲艺术。如果读一下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介绍的影响大众的策略，人们就更不会怀

疑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诱导，它沿用了虔诚的、教会惯常的典型性语言风格。无论怎么说：一个虔信的狂热分子，一个痴妄的人，往往会追随其妄念发展出极大的狡黠，经验告诉我们，巨大、持久的影响力都只源自这一类自欺欺人的骗子。不过，希特勒应该上绞架还是应该进疯人院，纽伦堡法官已经无需裁决，他自己免除了他们这个任务，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他的罪责问题，而是其影响如何发生的问题。这种影响发展成一种宗教的巅峰状态，一方面缘于单个的基督教专用的表达用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拉长了的演说布道式的、激情澎湃的宣讲方式。

而最首要的原因则是，他使用了许多训练有素的助手，善于组织这些人发挥作用，令其合力为编织他的神话服务。

在刚才引述的那段话的几页之后，戈培尔高兴地、自豪地记录了“觉醒的民族之日”：“我们将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集中全部精力，尝试所有的宣传手段……”一切“都将毫无阻碍地实现”。随后，领袖在科尼希贝尔格发表了讲话，每个人都深深地被吸引，这时候，“在讲话的终结旋律里融入了有力的荷兰式的致谢祷告，颂至最后一节时，科尼希贝尔格大教堂的钟声响起。这一颂歌通过广播穿越苍穹遍及整个德国。”

然而，领袖是不能每天演讲的，他也不可以这样做，上帝在一般情况下必须高高地坐在云端上，更多地是通过他的神父之口而不是亲自发表讲话。这一点对于希特勒来说还意味着更多的好处，因为相对于他的自吹自擂，他的侍从和友朋可以更加坚定、更加无拘无束地追捧他为救世主，对他的膜拜可以更加多声部、更加无休无止。从1933年到1945年，一直到柏林大灾难，将领袖奉为上帝，将其人其为比作救世主和圣经，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总是“毫无阻碍地实现”，从来不能对他有最微小的反对意见。

有一次，在希特勒现象的第一年，我的同事史巴默（Adolf Spamer），一位非常了解奇迹和传说的形成及其流传情况的民俗学家，看到我对德国民众的精神状况感到惊骇的时候，对我说：“如果有可能——（他当时还把这作为一个非现实的虚拟句），如果有可能把整个

报界、全部的发表物和学说都限定在一种声音上，如果再去到处说教，称 1914 到 1918 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那么三年以后整个世界都会相信，那场战争确实没有发生过。”当我们再次见面、进行第一回促膝长谈的时候，我提起了他的这段话，他纠正我道：“是的，我还记得；只是有一点你记错了；我当时说的是一年以后！今天我更是这样认为。”

把希特勒奉为上帝的例子太多了，我只举很少的几例。1934 年 7 月，戈林在柏林市政厅前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所有的人，从普通的冲锋队员到州长都是属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由阿道夫·希特勒而来。”1938 年，在号召支持奥地利加盟和赞同大德国的投票动员中，他们声称，希特勒是“天意之器”（das Werkzeug der Vorsehung），继而假以旧约的风格断言：“写‘不’之手，定将枯萎”。巴尔杜尔·封·施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确定了领袖的出生地布莱瑙市为“德国青年的朝拜地”。巴尔杜尔·封·施拉赫还编辑出版了《追随者之歌》，“奥地利希特勒青年团无名人士在遭受迫害的 1933—1937 期间的诗词”；其中写道：“……有多少人，他们从未与你谋面，你却仍然是他们的救星。”

于是，这个天意自然成了全天下的努力方向，追随它的不仅仅有那些因其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而容易受影响和放纵情感的人，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尚可以理解；追随它的也有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校长，一位享有盛誉的数学教授，也就是说，他照理应该能够审慎地思考，能够把握话语的尺度，但是，就连马格尼夫岑茨·柯瓦勒夫茨基先生也在这些日子为一份报纸撰文：“他是天意派来的使者。”

在即将袭击俄国之际，戈培尔为神话希特勒重新定出了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调门。他在对 1941 年 4 月 20 日发表的祝福讲话中说：“我们不需要知道领袖想要做什么——我们相信他。”（在此总是需要向后辈人强调，宣传部长的这样一句话确确实实没有在任何公共场合遭遇到哪怕是最轻微的质疑。）1944 年除夕，戈培尔对人类发出的抱怨甚至比领袖自己还要多，他愤然道，为了他的民族不该承担的苦难，领袖熬白了头，人类却对此视而不见，错判了他。而他的爱是属于全人类的；假

如人类了解这一点，“那么，就在此时此刻，他们便会向他们的伪神们告别，转而膜拜希特勒。”

无论在哪儿，只要谈到希特勒的著作，他的国家，他的战争，就会有宗教性的说明语加入，致使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和环绕着这个人的闪光的宗教雾障更为加剧。维尔•费斯泊（Will Vesper），帝国文献协会萨克森州会长——全面控制的组织！史巴默的非现实条件句失去了它的非现实性，维尔•费斯泊在十月的一个读书周里宣布：“《我的奋斗》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和新德国的圣书（das heilige Buch）。”这个句子，我不相信它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最多不过是一种描述性的表达而已。因为《我的奋斗》一直都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在哪儿都一样。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为我个人所用的极为非语文学的证据：正是这一表达，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下记录——我觉得它简直是太自然不过、太平常不过的了。很显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狭义上的希特勒帝国，而且还要维护希特勒宗教的影响范围，这场战争成了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圣战”，一场“神圣的人民战争”，而这样一场宗教战争中当然也会有人死去，在“对他们的领袖坚定不移的信仰中”牺牲。

领袖是一个新的基督，一个德国人的特别的拯救者——一个包罗了从艾达一直到希特勒奋斗的选集，而路德、歌德等等只是充当中间台阶的德国诗文与哲学的宏大选集，也称作《日耳曼圣经》，他的书是德国人真正的福音书，他的保卫战是一场圣战：很明显，书和战争的神圣性缘自于其创造者的神圣性，虽然它们也反过来增强了他神圣的光环。

那么，在首创性这一点上，涉及到这个希特勒宣告的、创建和保卫的帝国本身的问题时又是怎样呢？

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是接受者。

“帝国”（Reich）这个词身上带有某种庆典的东西，一种宗教的尊严，这种尊严是所有跟它只是部分汇合的同义词都没有的。这个respublica，共和国，是所有公民的普遍性事务，是赋予所有人责任的公共秩序，这个秩序是他们自己以其共同的身份建立和维护的，一个纯粹

的此岸的、理性的建构。文艺复兴之词“国家”正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它标志了一个聚合到一起的地区的固定状态和稳定秩序，它具有一个完全现世的、纯然的政治意义。“帝国”则相反，只要它没有因为复合形式而受到限制［王室帝国（Königreich），皇室帝国（Kaiserreich），教父帝国（Gotenreich）……］，它便囊括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范围，伸进了精神的、超验的领域：基督教的彼岸是天之帝国，在基督教最普遍的和最质朴的祷告中，其第二吁请就是：你的帝国到来吧。为报复嗜血成性的希姆莱，人们私下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讲的是希姆莱的牺牲者，说他让他们进入了希姆莱帝国[1]；一直到 1806 年，德国的国家形象明确地标示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而“神圣”在这里并非装饰性的或者只是激情洋溢的形容词，而是表明，这个国家并不只关心此岸的秩序，更将彼岸的区域也一道管辖起来了。

当希特勒将奥地利收入囊中，跨出了通向他幻想中的大德国的第一步，并且，mutatis mutandissimis[2]，模仿中世纪皇帝的意大利之行，以豪华的阵势，带着大批的随从开往罗马去与墨索里尼谈判时，德国报刊的头版头条上出现了醒目的“神圣的德意志民族日耳曼帝国”的字样。中世纪帝国的统治者们通过教会的加冕而获得上帝的恩准，具有了合法性，视自己为一个罗马基督教信仰和文化体系的掌管者。希特勒利用古老帝国的神圣光影为他的新建构服务，以稳固神圣的日耳曼帝国。最初还遵守着希特勒最初的说教，即他只是要创建一个德意志的或者日耳曼的帝国，所有其他的民族将继续保持自己的自由，不受干涉。

当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背信弃义，一次又一次地巧取豪夺，当最初的闪电战早已变成慢性流血直至耗干的时候，1942 年圣诞节的《法兰克福报》（在 srp 的代号下）刊出了一篇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帝国在经受考验”，为帝国思想黯然失色的光环涂油抹彩。这篇文章从内容到

---

1 希姆莱帝国原文为“Himmlersches Reich”，与“天之帝国”（Himmelreich）很接近。

2 拉丁文：请注意两种说法看似相同，但有区别。

风格均以知识读者为目标，以神圣罗马帝国的精神-世俗秩序为出发点。文章写道，这里谈论了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欧洲秩序，在这个秩序里，许多文化上互不相同的民族隶属于德国皇帝。当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这个帝国就分崩离析了。而在这些民族国家中间，普鲁士最为纯洁地发展了国家思想，视其为“道德的要求，精神的守望”，于是普鲁士成了小德国的秩序的监管者。当人们聚在保罗教堂，举行关于一个新的大德国的谈判时，便显然意识到，大德国不能仅仅是一个“种族民族国家”，而是应该承担其超越民族的欧洲意义的任务。保罗教堂的先生们没有做成功的事情，领袖做成了：他创建了大德意志帝国。也许，曾经有片刻（在他自我期许满足于苏台德地区的时间里），他以为封闭的民族国家是可能的。但是大德国思想的内在必然性催促他往前走。大德国只能作为“一个新的帝国的核心和承载者存在，它在历史面前为欧洲大陆上一个新的整体秩序和一个新的、脱离了无政府状态的时代承担起责任……战争中，它必须为这一使命经受考验”。这篇研究的结论部分有一个小标题：“遗产和使命”。于是，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从古老的帝国思想出发，这个罪恶至深的战争就变得神圣了，帝国这个概念本身也被新的神圣性填满。

在人们不是光说“帝国”这两个字，而是不停地说“第三帝国”的时候，这种神圣性就升级了，进入了神秘性，而且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每个人无意识地滑入的神秘性。同样在这里，只要有机会，第三帝国的语言都会处处为希特勒神话服务。默勒·凡·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第一版的前言后面署明日期为1922年12月。他在那里写道：“第三帝国的思想是一种世界观的思想，是超越现实的。仅这一概念、第三帝国这个名字……，就引发出很奇异的想象，云彩满天，情感丰富，漂离移去，完完全全的彼岸，这并非偶然。”汉斯·施瓦茨，1930年第三版的出版人，记述道：“国家社会主义响应了对于第三帝国的召唤，山地联队以此命名了它的杂志”，同时，在其文章开头的几行里施瓦茨就强调：“对于所有寻找探求中的人，第三帝国都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

一般来说，难以置信的力量在缺少精神教养和历史知识的人身上作用最为强烈。这儿的情况正好相反。对文学史和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越是了解的人，“第三帝国”这个表达就越是让他感受到“彼岸”的气息。中世纪的教会及宗教纯净派，以后一些时期热衷于改造人类的革新者，追求方向迥异的人们都在做同一个梦，梦想着在尘世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或者在堕落的当代基督教之后出现一个完美的第三帝国的时代，他们希望弥赛亚降临，以兴建起这个帝国。对莱辛和易卜生的怀念逐渐复苏。

但是，即便对这个概念所含有的丰富历史毫不知晓的大众——人们可以、而且当然会对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启蒙，世界观方面的培训一直都在做，戈培尔和罗森贝尔格的两个部门有着精心设计的分工——，即便普罗大众也能感觉到，“第三帝国”这个标志显然是充满宗教意味的“帝国”概念的宗教性升级。曾经有过两次德意志帝国，两次都不完美，两次都沉没了；而现在作为第三帝国，它正是要实现完善，永远地无可动摇。不愿意为其服务的手，甚至于举起来反对它的手，必然溃烂……

第三帝国的语言里这些各式各样的触及彼岸的表达和用语，集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网，撒向了听者的想象，将其拉进信仰的界面。这个网是有意识地罗织起来的吗，是建立在，借用一下十八世纪的表述，神父欺蒙之上的吗？肯定有这样的成分。此外，不应忘记的是，这个说教的一些发起者渴求信仰，具有宗教情结，这种情况也毫无疑问地在起作用。第一批织网的人有罪抑或无罪的问题，并不总是能够得出判断。但是，那个网曾经存在并且发生影响，这一点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纳粹主义所以曾经被几百万人视作福音，就是因为它使用了福音的语言。

曾经？——对于“我相信他”，我只跟踪到希特勒帝国的最后的日子。眼下，我日复一日地与恢复了名誉的人、或者是那些想要恢复名誉的人打交道。这些人，无论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所有人都宣称，自己属于“法西斯主义牺牲品”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悖于自己的信仰，受某种暴力胁迫而加入这个党的，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憎恶这个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领袖，从来没有相

信过第三帝国。然而，我最近在街上碰见了L.，我从前的一个学生，我上一回见到他还是在最后一次去州立图书馆的时候。他当时同情地握了握我的手；我很尴尬，因为他已经戴上了纳粹的弯钩十字标志。现在，他友好地向我走来："我为您获救并且重新履职而感到高兴！"——"您好吗？"——"当然不好，我现在是建筑工人，不够养活老婆和孩子，而且这样长期下去体力上也受不了。"——"您没恢复名誉吗？我是知道您的，您肯定没有做什么罪过的事。您在党内做过高官吗？您在政治上很积极吗？"——"根本不积极，我只是一个小不点的党员同志（Pg.）。"——"那怎么反而是您不能恢复名誉呢？"——"因为我没有去申请，也没法去申请。"——"这我就不懂了。"——停顿。然后，他眼睛朝下很吃力地说："我不能否认，我是相信了他。"——"但是您现在不可能还在相信他；您看，这一切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政权的一切耸人听闻的罪行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长的停顿。然后，很轻很轻地："这一切我都承认。是那帮人误解了他，背叛了他。但是他，他（IHN），我依然相信。"

19

家庭告示：

第三帝国语言的复习小资料

1942 年 7 月 27 日的《德累斯顿快报》登出一则出生告示：佛尔克（Volker）s.139 1942.7.21。在德国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托尔斯滕（Thorsten）的小弟弟诞生了。感到自豪的快乐（stolze Freude）的艾尔·霍曼……汉斯－盖奥克·霍曼（Hans-Georg Hohmann），党卫队德累斯顿后备队少尉，魏斐将军街。

出生，孕育，死亡：所有人生中最一般的、动物性最重要的事物，也是每一个人人生中的自然阶段。犹如旋毛虫总是聚集在一个被侵染物的关节之处，第三帝国语言的性格特征和套语也在家庭告示里大量堆积；我在许多地方某些视角下只能观察到的个例，在家庭告示里却经常可以一天之内遇见一堆，尤其是在与俄国开战之后，当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可能是闪电战的时候，这些东西便更加充斥报端。这个日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时期的报刊上登出了一些文章，其中认为，对光荣战场上的牺牲者过于心软或者失控的哀悼，是一种丧失尊严的、甚至是

不爱国和敌视国家的行为。这类言论对阵亡者讣告的英雄化和斯多葛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段笔记开头的出生告示为传承下来的一套陈词老调增添了富有教益的独特的新东西。孩子们起了尼伯龙根或者北方的名字，党卫队的父亲也好歹通过一道连线为他天生简单的名字赋予了一个圆满的德意志音质，用那个生命画符替代星星或者“出生”这个词，这一切不过是已经流行的纳粹标示的堆积运用，在我的笔记本里也只是个重复的记录。他们居住的那条街道，为纪念希特勒部队在战前不幸丧生的一名飞行将军而更名，则纯粹是件幸运之事，而非其本人的功劳。“德国最伟大的时代”也几乎算是一个比较谦虚的最高级了，为了神话希特勒时代，最高级早已深得人心，获得了广泛运用。

新鲜的和富有教益的东西在于“自豪的快乐”。幸福的父母为何而自豪？生育能力对于党卫队夫妇是不言自明的——否则他们根本不允许缔结婚姻。第二个儿子也还不能作为自豪的理由：正是对于党卫队，人们抱有更高的期待，很愿意将他们作为种马或者种狗进行饲养，让他们有更高的人身肉体的产出（Menschenfleischlieferungen）。（人们也像对待动物那样给他们烙上了一个群队番号。）于是就只剩下对于“最伟大的时代”的自豪了。但是，人们只能对于那些自己积极发挥了作用的事情感到自豪，而在这位党卫队父亲的名字后面缺少他在军队的地位，甚至没有常见的“目前正在战场”的字样。按照第三帝国的约定俗成，最多只有告示其某个家庭成员为了领袖而牺牲的妇女有权利自豪。“自豪的快乐”在这个出生告示里毫无意义。

然而，教益正是存在于这种毫无意义之中。因为这很显然是对于阵亡者讣告中“自豪的哀悼”的一个机械性仿造。机械的类比仿造证明了其模式的经常性、它的名誉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对于这对党卫队夫妇来说，在家庭告示下面签署自豪的表达，是一件不假思索的、想当然的事情，这样，他们的“自豪的快乐”便问世了。

如果说，自豪的哀悼是在前面所提到的时间之后才被频繁地当作一

种硬性的规矩，有时甚至为了强化这种自豪，保证是遵循英勇战斗的阵亡者的愿望而放弃了黑色丧服，那么，“阳光的”（sonnig）作为程式化的修饰词则是从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普遍了，即便老年人也不例外。仿佛在希特勒的帝国里，每一个日耳曼人每时每刻都很阳光，就像荷马的赫拉总是一副牛眼，罗兰之歌里的卡尔大帝总是白胡子一样。直到希特勒的太阳已经深深地被遮蔽，修饰语“阳光的”已经用滥了，给人以“悲喜剧的”感觉了，这个词才变得稀少了。但是，直到最后它也没有完全消失，回避它的时候，人们喜欢代之以“热爱生活的”（lebensfroh）。一位后备上校在最后一刻还为他“快乐的（strahlend）年轻士兵”发布了讣告。

“阳光的”表示了所谓的一种共同的日耳曼特性，自豪的哀悼完全与爱国主义者的行为相符合。而一种观念中专属纳粹的东西也可以在讣告里面得到表达；这里有很细微的层次区分，它们不仅能给最高的热情赋予一个特别的表达，而且还能（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暗示批评性的局外立场。

大多数阵亡者在最长的时间里将其生命交付给了领袖和祖国，“为了领袖和祖国”。［这个与老普鲁士的“为了国王和祖国”类似的口号，有着相同的重音起始音节，听着十分入耳，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便传遍各地；而另一件在希特勒政府刚刚登台就筹备的事情，即把4月20日标志为“领袖生日”（Führers Geburtstag）的尝试，却没有成功。很可能因为这个与“国王生日”（Königs Geburtstag）类比出来的表达在党的领导层听来太过于君主意味了，于是就继续保持“Geburtstag des Führers”不变，这样，人们无论如何不会因为“Des Führers Geburtstag”的语序而发一点思古之幽情。］更高的纳粹主义热度表现在这样的用语里：“他为他的领袖而牺牲”，“他为他热爱的领袖而死”，这里并没有提及祖国，因为祖国就体现和包含在阿道夫·希特勒自身，就像主的身体寓于经过仪式洗礼的圣饼一样。纳粹激情在其顶峰的表达中，将希特勒赤裸裸地放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上：“他怀着对他的领袖的

坚定信仰牺牲了”。

另一方面，当有人并不赞同国家社会主义时，当有人想要发泄发泄他的反感、甚至是他的憎恶、同时又不愿意给人抓住把柄去充当反对派，因为他还不具备这么多的勇气，这时他会这样表述：“我们唯一的孩子为了祖国牺牲了”，把领袖搁置一边。这大致与信件末尾的结束语“致以德意志的问候”相符，在最初的几年里，有一定勇气的人曾经大胆地以此替代“祝福希特勒”。随着牺牲者数目的上升和胜利希望的减少，我感觉领袖崇拜的词句也相应地萎缩了，但是我并不想确保这一点，尽管作过一些报纸抽查。

因为可能还有别的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人员和材料日益减少，迫使越来越多的报纸合并，各家报纸自身收缩版面，于是家庭告示只留下了最必要的极简部分（经常缩减词语，弄到难以辨认的残障地步）。最后，像昂贵的电报，在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母上克扣。1939 年，那时为祖国献身还是一个新鲜的、不那么日常的事情，纸张和铅字还很富余，阵亡讣告往往占据一个很大的正方形，很粗的黑框，如果英雄在其之前的生活中是一个工厂或者商店的业主，那么他的从属人员肯定还要以他们的名义向他献上一个特别的悼词。除了遗孀的讣告，这样的一个第二悼念对于一个公司的职员来说是绕不过去的义务，于是这个感情虚假的词“从属人员”（Gefolgschaft）也进入了我的材料笔记。假如这位永生者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高官或者是多家公司的董事，那么他的英雄之死就会三次、四次地、或者更多地叠加登出，占满半张报纸版面。那里当然有足够的地盘倾泻、铺陈四处侵淫开来的套话空话。但是到了最后，一个家庭告示极少能占到狭窄的两行字以上。单个的告示也不再有黑框。和在一个群葬墓地里一样，死人们被打发到一起，紧挨着躺在唯一的一个黑色四边形里面。

在战争的最后时期，出生与结婚告示同样挤在类似的一个狭促空间里，即便其糟糕的程度还没有完全到达这个地步，因为毕竟只有很少的这类告示，但与之面对的是残酷的一长列死者名单。在结婚告示中间，

这种情况并不特别地少，有一种异样的婚姻缔结引人注目，因为这个告示同样可以放在死者名单上：女方通知与阵亡的未婚夫补办结婚仪式。

正是这一类告示，比如来自《民间观察者》的这一例：“我宣布追加缔结与我阵亡的上等兵、舰队报务员罗伯特·海格勒，工程师，二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的婚姻……”被列入“希特勒德国闻所未闻的”特别事件里。搜集在1944年即于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控告文书，有一本将《希特勒的言论和希特勒的行动》进行相互对照的书，其堆积起来的、不添加任何评语的类似材料非常可怕。虽然这里以及某些同样在此提到的“远程结婚仪式”里包含着很多悲剧，它们却并不意味着纳粹主义的一种特殊的性格特征，不意味着掠夺性战争的普遍罪责之外的一种特别的罪孽，不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傲慢，像寄身于宗教套语里的那种：“牺牲于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念中”；因为在它们的身后，可能正是人们在这个时代几乎无处寻觅的东西：一种纯粹的人性的东西，也许是对一个孩子未来的担心，也许是对一个所热爱的姓氏的忠诚。而且作为基础的各种法律的可能性，更未由第三帝国所给予。

现在回到真正的纳粹的领域，借助一种框架观察，并且是取“框架”这个词的基本意义。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死去的人，如前所述，也经由报纸被置入群葬之墓。确切地说，这里每一次都是两个墓地，非图像的：是两个框形结构。第一个，比较高雅的，是为光荣战场上的尸体设置的，一个弯钩十字图案装饰着框架的左上角，旁边大致写着“为德国阵亡”；第二个框形结构圈进了那些只是作为平民死亡者的姓名，没有献身祖国的一切英雄事迹。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类的框形里，同样有、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平民挤进，比如只有平民职业而无军衔的男人们，即便是对于希特勒的部队也还是过于年迈或者年幼的老人和男孩儿，此外还有各种年龄段的妇女和姑娘。这些是轰炸战的死者。

如果他们是在外地某处丧生的，那么那个地名是允许标明的：“我们热爱的母亲在不莱梅袭击中……”而如果他们是在本地遇难的，则不可以告白，以免邻居因为躲过了损失而感到庆幸。在这种情况下，第三

帝国的语言有一个格式化的套语："悲惨的命运令他们丧失了生命……"

所以，我的材料笔记记下了这种欺骗性的委婉语，它是第三帝国语言的一部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那些牺牲者的命运，比起那些在一场围猎中被射死的兔子，并不更为悲惨。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还是用一道粗壮的横线将他们与前线阵亡者区别出来了。于是就有了三个尸体阶级。针对这种贬低炸弹亡灵的行为，柏林的民间段子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问曰："啥叫胆小？"答曰："离开柏林上前线去。"

20

留下了什么？

“然后把他们九月化（septembrisieren）……”那句诗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1909 年，当我还在使用全部的十个指头写作，发了许多非学术的文字时，我曾经为一家发行量很大的出版社编过两本小册子，是关于十九世纪德国政治诗歌的简介及诗选。上面这句肯定是在海尔威（Georg Herwegh）的一首诗里：某个家伙，不是普鲁士国王就是被形容为畜生的反动力量，将要用某种方式扼制自由或者革命或者某些革命党人，“然后把他们九月化”。这个词我不认识，当时也没有什么语言方面的兴趣——著名的托布勒（Adolph Tobler）把我的兴趣彻底驱赶走了，我也还不知道佛斯勒（Karl Vossler），所以我满足于查看小达尼尔·桑德斯（Daniel Sanders），他收集了 1900 年左右所有属于普通教育的外来词和专有名词，齐全得令人惊异。比如里面就有：实施大规模的政治屠杀，比如 1792 年 9 月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情况。

这句诗、这个词给我印象深刻。1914 年的秋天或者是冬天，它们

又在我的记忆中复苏，而此刻我感受到了自己对语言研究的喜好。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写道，俄国人有意要将普略塞（Przemysl）[1]“间提希化”（lüttichieren）。我对自己说，这里出现的语言现象与“九月化”是一样的：一件历史事实发生了如此强烈的和持久的影响，以至于它的名字获得了一般性的意义，被推及到类似的事件上去。在一本1881年的老的Sachs-Villatte词典里，我不仅找到了九月变形的法语词septembriseur，septembrisade，septembriser，而且还看见它们被作为德语外来词（Septembrisierer！）标示出来。此外也指引出一个新样式的模仿构词：decembriser和decembriseur。这一模仿追溯到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其动词的德语化是：“dezembrisieren”。后来，我还碰见过德语的“九月化”，在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出的一本词典里。这种经久性和这种超越了自己国家界线的传播，显然要归之于九月屠戮的影响，它极大地刺激了想象力；此后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没能将它的深恐巨骇挤出记忆和留传。

那时，1914年的秋天，我就问自己，“间提希化”是否会具有类似长久的生命力。而这个词根本没有流传，是的，我相信，它根本没有进入帝国德语的语言系统。这肯定是因为，在间提希进攻战之后紧跟着一系列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更为血腥的战争行动。军事专家会在这里提出异议，认为攻占间提希的战斗完全是一个特定的武器行动，也就是说是对一个现代堡垒的直接进攻，正是这样一种技术的特殊性应该通过新的动词表现出来；然而，决定一个新词是否被普遍接受，不取决于专家的意愿和精确性，而是取决于普遍的氛围和一般性的想象力。

“九月化”可能今天还活在老一代德国人的记忆中，因为*septembriser*属于法语里的固定词汇。“间提希化”则在间提希之后无以名状的战争苦难中完全死去，如果说它还算活过一回的话。

1　波兰城市。

如出一辙地死去的还有一个很接近的词，是上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虽然，用纳粹的话来说，这个词是为永恒制造的，而且是在大德国的报刊和电台宣传的合力喧闹中出世的：动词“装备中心化”（coventrieren）。Coventry本来是英语的“装备中心”——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其中全部是军事人员，因为我们原则上只攻击“军事目标”，每一个报告里都是这么说的，我们实行的也仅仅是“复仇行动”，根本就没有首先行动过，不像英国人，是他们先开始发起空中挑衅，并且作为“空中海盗”主要以教堂和医院为袭击目标。德国炸弹于是把装备中心“履为平地”，并且威胁要将所有的英国城市“装备中心化”，因为所有的城市都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1940年10月传来消息说，伦敦遭受了“一刻不停的复仇袭击”，忍受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轰炸行动”，经历了一个“巴塞罗缪之夜”；如果它还不最终投降，就会被装备中心化。

动词“装备中心化”沉没了，那个宣传机器对之绝口不提了，它日复一日地在人类和天上公平的上帝面前诅咒敌人的“海盗和歹徒行径”，同时不允许忆及自己在耀武扬威的日子里的强盗行动，于是，动词“装备中心化”葬身于德国城市的废墟之下。

我如今却会真切地想起“装备中心化”这个词，每天都有两次或者四次，这要看我只是在上午、还是下午还得有一次从我们宁静的郊外园子往下走，去城里的一个工作地点。每当我靠近废墟一带，这个词就会出现。在课堂上、会议中、与学生谈话的时候，这个词不会来找我。但是，一旦我踏上回家的路，这个词便又从残垣断壁的深处跳了出来。“装备中心化”，有轨电车轰鸣着这个语调，“装备中心化”，脚下的步履踩踏着这个节奏。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新的废墟绘画和废墟诗文，不过，它将与十八世纪的不同。那时，人们带着泪水润湿的悲情，充满享受地沉湎到对世事无恒的思考与感慨之中；那些败落的中世纪城堡和修道院，或者甚至是古典时期的寺庙和宫殿，在多少世纪以前就被摧毁了，于是喟叹其命运的痛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性的、一种十分哲学的、也就是一种很轻柔

的、实际上很舒服的感觉。但是眼下……在这庞大的废墟场下，也许还躺着你思念的亲人，在这空荡荡的四面墙壁里，你几十年挣得的一切都已经烧成灰烬。无可替代的东西：你的书籍，你的钢琴……不，我们的废墟，它们不会刺激出柔和的感伤。而当“装备中心化”这个词随着眼前的苦涩而至，它便在身后拖曳着一道压抑无望的思绪。这个思绪叫作：罪责与偿还。

但这只是我作为语文学者的强迫症。民众（das Volk）对于“装备中心”和“装备中心化”已经不再有任何概念。关于来自空中的毁灭，还有两个听上去不那么陌异的表达，深深地嵌入了他们脑中。我这里的确可以用民众这个词，因为德累斯顿灾难之后，我们在逃亡途中去过许多省份，在公路上我们遇见了来自德国各地和各个社会阶层的逃亡者和士兵。无论是哪里，在佛格特山林撒着锡箔的林间小路上，在巴伐利亚毁坏了的铁道边，在严重受损的慕尼黑大学里，在上百个不同的防空洞，上百个不同的村镇里，从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嘴里，从工人和科学工作者那儿，任何地方，只要什么东西警告有空袭，在等待解除警报的无聊时刻，也或者在面临危险的关头，我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一句话：“海尔曼说了，假如有一架敌机胆敢飞到我们这里来，他改叫玛耶（Meier heißen）！”这个长句子经常被缩短为嘲弄性的呼唤：“海尔曼·玛耶！”

那些记起戈林曾经做过的保证的人，总还是保持了一点强颜欢笑的本事。另一些内心充满了愤懑不平的人则搬出了希特勒的威胁言论：他要把英国的城市全都抹除掉（ausradieren）。

“抹除掉”和“改叫玛耶”：领袖和他的帝国元帅从来没有比这更紧凑、同时也更完备地刻画过自己了，一个体现了他作为巨人妄想症罪犯的本性，另一个展示了他作为民间滑稽戏子所扮演的角色。人们不该作什么预言；但是我相信，“抹除”和“玛耶”会保留下去。

21

德意志之根

我能够带进犹太人居所的书籍数量很少，而且全部都是专业书，其中有一本威廉·舍若（Wilhelm Scherers）的《德国文学史》。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还是慕尼黑第一个学期的“日耳曼学学生”，自此我便经常不断地研读这本书，从中寻找问题的答案。现在，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不，实际上是持续出现：每当我打开舍若，总是要为他的自由精神，他的客观性，他的宏观性感到惊叹，这种惊叹的程度与之前无法比拟，要强烈得多，而我以前一直以为，这其中的某些品德对于科学家来说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断有一些句子，一些论断带给我与往年完全不同的认识；德国发生的可怕的变化，令所有之前关于德国本质的表述呈现于一种大为改变了的光线之中。

这种骇人的对立，在德国现实与德国过去所有的、的确是所有的时期之间呈现的对立是怎么出现的？我在自己的写作中一直在强调那些 *traits éternels*，一个民族性格的永久特征，法国人所说的，我曾经不断

找到它们的印证，我一直相信找到了印证的。这一切难道都是错误的吗？或者希特勒的信徒们有理由将赫尔德，比如说，这个人道主义者，纳入自己的圈子，为他们服务？歌德时代的德国人和阿道夫·希特勒时代的民众之间存在着任何一种精神上的关联吗？

在我下功夫钻研文化学的那些年里，奥义根·雷尔希曾经扔给我一个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讽刺词，说我发明了“经久法国人”（Dauerfranzosen）（就像人们说经久香肠一样）。当我后来看见，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如何可耻地利用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性的文化学来经营他们的计划，把德国人抬高到上帝的和法定的统治人种，而把其他民族贬为低等动物的时候，我常常绝望地感到羞耻，为自己在这个运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甚至是一个引导的角色。

但是，在所有的自我考察之余，我总还是能够证明自己良心的纯洁。比如我对魏希斯勒（Eduard Wechßler）的《灵感与精神》，一本柏林教授的幼稚沙文主义的艰深巨著，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一大批高级中学教员扭曲的观念与其密切相关。然而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我的良心是否纯洁的问题，这没有人会感兴趣，而是关系到经久的性格特征是否存在的问题。

塔西图（Tacitus）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和经常被引用的人物：他在他的《日耳曼尼亚》里刻画了一个如此美好的德意志先人的形象，从阿尔米尼乌斯和他的随从，经过路德和弗里德利希大帝，一条直线直通希特勒以及他的冲锋队、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这样一种历史观刺激我到佘若那里查找，看看他关于《日耳曼尼亚》是怎么说的。于是我遇见了一段话，它令我惊讶不已，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我救赎。

佘若谈到，在德国，精神生活方面的忽上忽下带有坚定的彻底性，并且往上和往下都能走得很远：“无度（Maßlosigkeit）似乎是我们精神发展的诅咒。我们飞得很高，这样也就跌得越深。我们如同那个在掷骰子的游戏中丢掉了他所有财富的日耳曼人，他在最后的赌注中又押上了自己的自由，结果也将自由丢失，心甘情愿地让人作为奴隶出卖。日耳曼人的坚韧性（Hartnäkigkeit）——讲述这个故事的塔西图补充道——

即便在糟糕的事情中也是如此强大；他们自己称之为忠诚。”

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德意志性格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原来是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和持久的基本特征上的。在希特勒式的兽性与德国经典文学的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浮士德式的放纵无度（faustische Ausschweifungen）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五年之后，当灾难降临时，当这个兽性的膨胀程度和德意志坠落的深度呈现出来的时候，一件极小的事情和普利威尔《斯大林格勒》中的一个与之相关的简短的评论，又把我带回到塔西图的那段文字。

普利威尔记叙过俄国的一块德语路牌：“东河畔的卡拉池，距离莱比锡 3200 公里。”他评论道：“一个很特别的胜利标志，如果说在真实的距离上增加了一千来公里，那也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恣意无度的一种更加真实的表达罢了。”

这位作家，我愿意打赌，当他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肯定既没有想到塔西图的《日耳曼尼亚》，也没有想到威廉·佘若深刻厚重的文学史。他只是在深入地思考眼前的德国畸形变异的状态、在探寻其最深层的原因时，自发地看到了这种同样的放纵无度、蔑视所有界限的性格特征。

“去界限”（Entgrenzung）是浪漫主义者决定性的基本态度和根本性作为，也是在这里，其浪漫派的本质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宗教的向往中，在艺术的创造中，在哲学的思考中，在工作生活中，在道德观念或者罪犯形态中。在浪漫主义的概念和词汇存在之前的几个世纪，各种德意志的行事就已经带有浪漫主义的印迹了。罗曼语语文学家对这一点感觉最明显，因为在中世纪，法国一直是德国的文学教书匠和题材传达者，在德国，人们每每接过了法国主题，每每都要穿越它的样板为自己设置的界限，一会儿在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在那个方向超越各种界限。

普利威尔的那个评说被认为是十分幼稚和无知的，而我却看见了它与佘若式思考的关联，将第三帝国的军队和阿尔米尼乌斯的日耳曼人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判断，纳粹的罪犯形态（对于它来说，具有第三帝国语言特点的“低等人”确实很合适），和德国从前的精神文

化之间是否有确凿的关系问题不断地折磨我，令我绝望。我真的能使自己平静下来吗？如果说所有这些可怕的东西只是模仿过来的，只是携带进来的，是一种凶狠的意大利疾病，如同几个世纪前被携带进来的法国疾病曾经以其原初的传染性肆虐过一样。

在我们这儿，一切不仅仅非常糟糕，而且从内核上区别于意大利，比之毒性更大。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视自己为古罗马国家的合法继承者，注定要重建古罗马帝国——但是，这些要去重新占领的地区的居民，罗慕路斯的后代，位于动物界一个更为低下的生物阶层，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决定他们永世僵守在劣等性里不得解脱，这些论调，以及所谓它必然带来的一切残酷的后果，意大利法西斯并不去传授，起码它在尚未受到其教子、第三帝国施予它的反影响的时候没有。

但是此刻我又一次质疑自己，这种质疑多年来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难道我没有因为自己深受其害而过高地估计了反犹主义在纳粹体系中的作用吗？

不，我没有高估这个作用，如今事情已经大白于天下，反犹主义是整个纳粹主义的中心和所有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反犹主义是那个落魄的奥地利小市民希特勒的隐秘敌意之基本情感，政治上，反犹主义是其促狭的基本思想，因为他是在申纳勒（Georg von Schönerer）和吕格（Karl Lueger）时代开始对政治进行思考的。反犹主义自始至终都是党的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是种族主义教条最有效和最广为人知的具体化体现，是的，对于德国大众来说，它就是种族学说本身。因为，什么叫“黑人化”的危险，德国大众知道吗？对于所谓东方和东南方民族的劣等性，他们个人有多少了解？然而每个人都认识一个犹太人。反犹主义和种族教条对于德国大众来说是同义词。通过科学的、更应该说是伪科学的种族学说，人们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狂妄，为其所有的恣意僭越和过分要求，为它每一次侵占，每一个暴虐行径，每一种残忍和每一场屠杀寻根求据，辩解维护。

自从我获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及其毒气室的情况以后，自从我阅读

了罗森贝尔格的《神话》和张伯伦的《基础》之后，我就不再怀疑反犹主义和种族学说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心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了。（当然，这样的问题只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而定，要看在那些天真地把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教条理解为同一个东西的地方，种族教条是否真的成为反犹主义的出发点，还是仅仅作为它的借口和它的装饰。）如果证明了在这里作祟的是一个德国特有的、从德国精神里沉淀的毒素，那么任何传统的表达、习俗、政治措施都无济于事：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就不是一个裹挟进来的瘟疫，而是德国本质自身的一种变异，那种 *traitis éternels* 性格特征的病态形式。

反犹主义，作为一种从社会、宗教和经济方面的缘由生出的反感情绪，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中都有出现，一时在这里，一时在那里，一时弱，一时强；把反犹主义专门算在德国人的账上，独独归结于他们，是完全不公正的。

有三重因素造成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变为某种全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其一：瘟疫之火燃烧起来，熊熊之势前所未有，而且是在一个它作为真正的瘟疫似乎早已过去、并且将永远过去的时代。我这么说的原因是：1933 年以前当然还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反犹冲突，正如欧洲的港口城市不时会有霍乱和鼠疫疫情一样；但是，正如人们确定或者相信可以确定文明世界里不再会爆发中世纪那样的瘟疫、导致一个个城市荒芜化一样，像中世纪那样剥夺犹太人权利和迫害犹太人身心的事情，似乎也完全不再可能。除了这种惊人的反时代性，第三帝国排犹的第二个唯一性在于，这种倒行逆施绝对没有披上一件历史的外衣，相反，它以最现代的姿态登场，不是作为民众起义、作为暴乱和一时失控的屠杀（尽管起初它还以自发性做挡箭牌），不是的，它具有最高度的组织和技术的完备化；因为，今天的人回头反思屠杀犹太人时，想到的就是奥斯维辛的毒气室。第三个最本质的新特点在于其仇犹的基础，即将仇犹情绪建立在种族思想上。在所有过去的时代里，对犹太人的敌意全都只存在于没有基督教信仰及基督教社会之外的人们中间；区域信仰和习俗的实

行起到了平衡和（起码是对于下一代人）模糊对立性的作用。种族思想却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区别注入血液，同时以此让每一个平衡成为不可能，将分离永久化，使之作为上帝的意愿合法化。

这三个新的特点之间联系紧密，三者全部指向塔西图的基本性格，指向日耳曼的“即便在糟糕的事物上也表现出的坚韧性”。作为血统观念的反犹主义十分坚韧，无以消除；从其自我标榜的自然科学性来看，它不是反时代主义，而是适应了现代性的思考，所以对于它来说，运用最现代的科学手段去实现其目标，这几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是，这里见到的极端残酷的行为，就与坚韧无度者的基本特性相吻合了。

在维利·塞德尔（Willy Seidel）1920年撰写的《那个新达尼尔》里，除了那个理想主义（idealistisch）的德国人，人们还可以读到少尉簇克史崴特的形象，德国令人头痛的阶层的代表，这种人在国外令我们面目可憎、在国内令“西木利斯穆斯”（Simplizissimus）无可奈何。这个人并非不能干，总体来说几乎不能称之为恶棍，也肯定不能说他是暴虐狂。而有人给了他一个任务，要他去淹死几只幼猫。当他干完活从水中拖出袋子的时候，一个小动物还在呻吟。这时，他举起一块石头将它砸了个“稀巴烂”，并且对着它吼道：“你这个死畜生——你应该看看，什么叫彻底性！”

人们会以为，这个显然在努力寻求公正而描绘了一部分变态国人形象代表的作家，将忠实于他的价值观，直到小说结束，就像人们在罗曼·罗兰那里可以见到两个法国和两个德国一样。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这个具有彻底性的猫屠夫最后获得了原谅和怜悯，进入喜悦澄明之中，而在这部进行民族比较的小说里，美国人得到的评价却越来越糟糕。这种对一方面柔和、对另一方面严厉的理由在于，德国人无论怎么说还是有纯种性的，而美国人则体现了一个混血种族——比如说到大城市辛辛那提的居民时就会出现这样的表述：“这些因为近亲繁殖而半堕落的、或者带有印第安人、或者带有犹太人血统而彩色化了的市民”。另一次，作者则十分赞赏地引述道，一个日本人在旅途中讲到美国时说：*that Irish-*

Dutch-Nigger-Jewmess。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希特勒还未露头，而在一位显然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位思想者和多次成功地力求中立的作家这里，人们就已经不得不问自己，与把反犹主义基本情感作为借口和掩饰相比，种族主义论调是否意味着什么特别的其他的东西；不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种战争观点认为：在凡尔登和索姆河之后，当战斗来来回回地原地拉锯、不见分晓的时候，“那个留着尖胡子、有一双光亮的犹太人眼睛的中立者围着战斗的双方，边蹦跳边数数；这就是世界新闻主义者。”

相对于其他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在于它建立在种族思想上，一种被狭隘化和极端化的、在反犹主义中激活的种族主义。纳粹主义正是从这种思想中抽取了它的全部毒素。确实是全部的，包括对待他外交政治上的对手，那些他不可以贬为犹太人的对手。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它来说就是犹太的布尔什维主义，法国人黑人化了、犹太化了，英国人更是应该追溯到那个圣经里的犹太人一族，那个人们以为其踪迹早已消失了的族群，等等等等。

这种“无度”、“过于执守”、“及至无界之地（Ins-Grenzenlose-Langen）”的德意志基本性格，把最肥沃的思想产地拱手相送。但是这个性格本身是一个德国产品吗？在回溯它的理论表述时，就看见一条直线，从罗森贝尔格、到自愿选择归属德意志民族的英国人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一直回到法国人戈宾诺（Arthur de Gobineau），他们形成其主要阶段。后者的《论人种之不同》，从 1853 到 1855 年出版的四卷本，是第一个进行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说教的，他称之为没有混杂的日耳曼属性之最高的和实际上唯一的人种阶层，正受到从各处侵入的、糟糕至极的、几乎不能称为人的犹太血统的威胁。这里，第三帝国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无论是为其哲学上的论证还是为其政治上的需要；这个学说后来所有的纳粹前的扩展及运用，总是会追溯到这一个叫戈宾诺的人身上，他是，或者似乎是——我还不想确定这一点——始作俑者，应该为这一血统教条承担责任。

就在希特勒帝国的丧钟即将敲响的前夕，还有人在做一种科学尝试，为法国人寻找德意志先人。在新德国帝国历史研究所发表的著述中，有一本规模庞大的、十分透彻的研究：《德国浪漫派中的种族思想及其18世纪的基础》。海尔曼·布罗莫（Hermann Blome），这个诚实的、傻乎乎的作者，正好证明了他以为可以证实的东西的反面。他想要让十八世纪，他想要让康德，他想要让德国浪漫派做自然科学的先行者，结果却把他们弄成了那个法国人的同犯。不过他是从一个相反的前提出发的，即每一个研究了人的自然史、研究了种族的结构及其特征的人，都是戈宾诺的先行者。但是戈宾诺特有的东西并不在于他将人类进行了种族区分，而是在于他把人类这个大概念搁置一边，以利于那些自足自立的种族，他在白人内部，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把一个日耳曼的统治种族与一个犹太害虫种族对立起来。在这方面，戈宾诺会有什么先行者吗？

毫无疑问，布罗莫说，布封作为“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和康德作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哲学家”已经提及并且运用了种族这个概念，而且也有一些人在后来的时间里，还在戈宾诺之前，在种族研究的领域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同时也不缺少将白人置于有色人种之上的表述。

然而，布罗莫的书在一开始就下了一个不无遗憾的论断，这个论断接着不断地出现，变化微乎其微：在整个十八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种族学科都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当然：是在纳粹主义意义上的“决定性的”！）进步，因为它受到了主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制约。赫尔德，这位对各民族的不同声音有着如此细腻的感受、同时对他的德意志文化具有如此强烈的意识的人（纳粹的文学史差一点就把他刻画成一个真正的党员同志了），如果不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视野让他在一切丰富多彩之上总是不断地看到和强调人类的一体性”的话，他本来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那封“关于人类的自然历史的基本法则”的悲伤的第116封信“论人道主义的推进”！“首先人们应该像人类自身的守护神那样中立；地球上不该有宠爱的种族，首选的民族。”再有：“自然研究者在他所观察的那些造物中间不设立等级秩序；所有的造物对他来说都同

样可爱、具有同等的价值。自然研究者也是这样对待人类的”……然而，如果“在种族问题上，受时代局限的理想主义人类观最后阻止了他求证并得出种族主义的结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确认亚历山大·封·洪堡把“自然科学的追求放在首位”，这样做最终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位纳粹作者的意图，要把第三帝国的种族学说追溯到德国思想家身上，从根本上失败了。这又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在戈宾诺登场之前，从血统的角度进行宣传的反犹主义在德国并不存在。阿尔霍尔特·鲍尔在《建设》里（1946，第2期）发表了关于“反犹主义对德国思想的侵入”的论文，其中指出，过于强调德意志浪漫派倾向的大学生团体激烈学生军团并没有将犹太人“原则性地排除出他们的阵营”。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只是想要拥有基督教信仰的成员，但是他也视接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为“基督徒和完全同等的国民”。而体操之父亚恩虽然“被恶名为典型的德国人，却甚至没有将洗礼作为这个大学生组织成员的条件”。在建立全德大学生团体的时候，这个组织自己也拒绝了洗礼作为入会条件。“人道主义的精神遗产，一位莱辛的宽容和一位康德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发生了如此强大的久远的影响，鲍尔说，并于此表现得与这位纳粹主义的博士生或是教授候选生十分接近。

尽管如此——而且正因为如此，这一章才进入了我的《第三帝国的语言》，虽然我到现在才读到布罗莫，鲍尔的研究论文我当然也是现在刚知道——，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坚持我在凶恶的年代里形成的观点：那个被幻想成为日耳曼人的特权和人之霸主地位的种族学说，最终成为施予人类最恐怖的罪行的狩猎券，它的根子在德国浪漫派。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它的法国发明者是德国浪漫派的一个志同道合者，一个后继者，一个——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学生。

我在从前的研究工作中，曾经多次与戈宾诺打过交道，他的形象就在我眼前。用自然科学家们的话说，他是作为自然科学家误入了歧途，我对此确信无疑。但是这对我来说十分简单，因为有一点我十分确定：

戈宾诺从来不是一个出于内心原动力的自然科学家，他从来没有为了自然科学本身而做自然科学。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总是为了某个固有的、自私的想法服务的，是为了证实这个想法的成立和它的无可置疑性。

在法国文学中，阿图尔·戈宾诺伯爵扮演了一个比在自然科学里更为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个角色在德国方面比在其同胞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承认，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在所有他经历过的法国历史时期——他出生于 1816 年，死于 1882 年——他都感觉自己，像他所相信的那样，作为贵族继承来的统治权利，作为个体的发展和影响的可能性被坑蒙拐骗了，罪魁祸首便是金钱的统治，市民精神的统治，向上拥挤、要求平等权利的大众的统治，是所有他所谓的和所憎恨的民主的统治，是他眼中的人类堕落行为的统治。他坚信自己是法国封建贵族和弗兰克的古老贵族的直系的和纯粹的血脉。

在法国有一个很古老的政治理论方面的争论，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封建贵族宣布：我们是弗兰克征服者的后裔，为此我们具有对臣服的高卢－罗曼族人民的统治权，但是我们不隶属于我们的弗兰克国王，因为根据弗兰克的法律，国王只是 primus inter pares（同类之中的最优），绝对不是凌驾于具有平等权利的贵族之上的统治者。与之相对的是，御用法学人士视绝对权力的国王为罗马恺撒们的继承者，而接受他统治的人民则是当年罗马人的高卢－罗曼族后裔。革命以后，在摆脱了恺撒式的压迫者之后，法国借助这个理论，返回到罗马共和国的国家形式上来——弗兰克式的封建统治者们便再无市场。

戈宾诺，原本的才能在于诗歌，在法国的浪漫派里开始创作，这个派别的标志包括倾向于中世纪，反对冷静的市民性的周围世界。对于戈宾诺来说，作为贵族独行侠，作为弗兰克人，作为日耳曼人，这些都是相同的感觉。他很早就从事德国和东方研究。在语言和文学上，德国浪漫派连接上了日耳曼属性的一个印度远古时期，联结上了欧洲多民族家庭的一个雅利安共性。（跟随我漫游到了犹太人居所的佘若将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1808年的《印度的语言和智慧》和弗朗茨·博普1816年的《梵

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言的连词体系比较》收入了他的编年附录中。）雅利安人的构架根植于语文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但在自然科学领域，戈宾诺也找到了有决定性意义的启发，不过他更多的是受到了德国浪漫派决定性的诱导。因为，浪漫派一方面在全方位地追求无界，跨越和抹除各种界线，一方面也建构性地、象征性地从抽象思辨跨越到自然科学的属性里。于是它就吸引了这位选择了日耳曼归属的法国诗人，他更加充满激情地推崇日耳曼文化，比只是经由他的选择而表现出的推崇更为强烈，浪漫派启发了他，令他某种程度上合法地把自然科学的事实进行抽象化，或者对它们进行哲学的解释，以便从中获取他想要得到证实的东西。这个东西正是对日耳曼文化的过度推崇。在戈宾诺那里，这种推崇来自于内政方面的压力，在浪漫派那里则产生于拿破仑时代的磨折。

有这样的说法，即人道主义的理想保护了浪漫主义者（纳粹方面则是说：阻碍了他们），令他们没有因为日耳曼民族作为上帝选民的优越感而走得更远。但是，民族主义意识灼燃起国家社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烧毁了这块盾牌。整个人类相互依存的情感完全消失殆尽；在自己的人民中间，所有具有真实的人类价值的东西一应俱全，而德国之对手——“置他们于死地！上帝的法庭 / 无所谓有没有道理！”

在这些自由战争的诗人看来，德国人该死的敌人是法国佬；人们可以列出这个敌人太多的劣迹，可以将其拉丁属性作为一个低等品质的玩意儿置于纯粹的日耳曼属性之下，但是，把法国人打入另一个人种却是不可能的。于是在那一刻，当德国浪漫派从他们极为宽广的视野转向其极度的狭隘时，这种狭隘化只是表现为对所有异国东西的拒绝，表现为仅仅对一切德意志事物的渲染吹捧，只是还没有以种族傲慢的姿态登场。有文章指出，亚恩和阿恩特都表示应该将德国犹太人与德国人一样看待，而不拒绝他们加入爱国的、推行德意志化的大学生团体Burschenschaft。

是的——但是，三十年以后，在《论人种之不同》出版之前——同

为阿恩特，这个此前持有人道主义观点的人，却在1848年问世的《讲话与短评》里抱怨起来，而纳粹分子布罗姆充满胜利自豪感地引用了这段话："犹太人和犹太同志，接受过和未曾接受洗礼的，似乎正与所有最最极端的左翼人士坐在一条板凳上，不知疲倦地拆卸和消解那些至今牢牢地维系着我们德国人的人性的和神圣的东西，销蚀和毁灭每一点祖国之爱和上帝之畏……倾听一下、环顾一下四周吧，这种毒性的犹太人道主义（Judenhumanität）将把我们裹挟到哪里去，假如我们不以任何独特的德国的东西与之抗衡的话……"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解放自己于外敌，而是为内政的和社会的问题作斗争，于是立刻，纯粹的德意志文化之敌就已经成了"犹太人，无论是接受过还是未接受过洗礼的"。

不顾及洗礼与否的反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可以看作是种族反犹主义，这个问题仍然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然而，没有疑问的是，维护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德意志属性的理想与一个"毒性的犹太人道主义"形成了对峙。（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完全一样——表现得最为频繁的是在罗森贝尔格那里，相应地也在希特勒和戈培尔那里——"人道主义"这个词从来没有在不带嘲讽性引号的情况下使用过，一般都附有诋毁性的形容词。）

在纳粹时代里，为了平静自己语文学者的良心，我试图打造了这根从戈宾诺到德国浪漫派的链条，如今又作了一点强化。当时和现在我内心里都十分确定地知道纳粹主义和德国浪漫派之间最紧密的联系；我相信，即便从来不曾有过那个法兰西的志愿日耳曼人戈宾诺，纳粹也会不由自主地从浪漫派里生长出来。此外，戈宾诺对日耳曼的推崇，其实更多的是指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人的，而不是德国人。纳粹主义包含和体现的一切东西，在浪漫派里已经开始萌芽：摘除理性的桂冠，将人动物化，追捧权力思想、追捧哺乳动物、追捧金发野兽……

但是，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怕的、针对这种精神取向的控告吗？这种德语艺术和文学（该词最宽广的意义上）赖以取得如此巨大的人性价值的精神方向。

这个可怕的控告成立，理由充足，无论浪漫派创造了多少价值。“我们飞得很高，而跌得也就越深。”最德意志的精神运动（Geistesbewegung）根本的性格特征就叫作全无界线。

22

阳光的世界观

（来自偶然的阅读）

书籍在犹太人居所里是一种贵重的财产——我们绝大部分的书籍都被没收了，购置图书和利用公共图书馆被禁止。如果雅利安妻子以她的名义利用了一个租借图书馆，而盖世太保在我们这儿发现了这样的一本书，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挨打——我有几次都是以这种最好的方式逃脱了。人们仍然所有的、或者说允许所有的，是犹太书籍。这个概念定义不明确，自从所有珍贵的私人图书馆早已——第三帝国的语言，因为党的委托人是不会偷盗的——“安全安置”（sichergestellt）了以后，盖世太保便不再派懂行的人来检查了。

不过，在我们这儿，大家也不是特别依恋那几本留存下来的书籍；因为其中有些书是“遗传”下来的，用我们的特别语言说就是：它们无主地留了下来，因为它们的主人突然去了泰莱辛市或者奥斯维辛的方向，消失了。为此，这些书会让新的占有者十分强烈地进入一种情绪，不知他自己每天、更应该说是每夜会遭遇什么。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毫不犹

豫地把每一本书借给每一个人——尘世财物的稍纵即逝实在是不需要向我们这样的人再作宣讲了。

我自己是拿到什么就读什么；第三帝国的语言是我最重要的兴趣，然而奇怪的是，那些表面上或者实际上离题万里的书籍，经常会在某个地方对我的题目有所帮助，而且真正奇怪的是，在处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人们会从那些自以为了然于胸的著作里读出很多新的东西。

我就是这样在 1944 年夏天撞上施尼茨勒的《通向自在之路》的，重新读它的时候并没有期望会有什么斩获；因为在很久以前，大约是 1911 年，我就写过一本关于这位作家的很长的研究专著，而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在读书、争论、绞尽脑汁，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这本书所有的东西我都还十分熟悉。但是后来还是有新的收获留下来，那是一个很小的段落，表面上就是一个附带的议论。

大约就是我们这个世纪之初，一个主要人物很看不惯当时，那个正满世界流行的“关于世界观的扯谈”。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人定义道，“从逻辑上说就是真实地去看也即观察世界的意志和能力，不受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误导，不急于立即从一种经验引导出一个新的法律，或者将这个经验增添进一个现存的法律……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世界观无异于观念实用性能的一种高级形式——所谓在无限之中的观念实用性能（Gesinnungstüchtigkeit）”。海因里希继续思考：“请您相信我，盖奥尔格，在有些时刻，我真嫉妒那些具有这个所谓世界观的人……而我们这些人取决于哪一个心灵层面被照亮，我们马上便是一切，有罪与无罪，胆小鬼与英雄，白痴与智者。”这时，人们意识到，上一章那简练聪明的议论是与这部犹太人小说真正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意志，要把“观”（anschauen）这个概念完全不带神秘色彩地理解为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的看，这个反感和妒忌，反对那些人把世界观视为坚定的教条、视为在每一种境遇下，在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良心陷入矛盾、摇晃不定的时候都可以抓牢的牵狗链：按照施尼茨勒的观点，这是犹太精神中富有特征性的东西，并且毫无疑问地是整

个世纪之交维也纳、巴黎和欧洲普遍的知识阶层里的气质特征。“世界观之扯谈”的兴起（在这个词语的“非逻辑”意义上）正好可以从开始形成的反对派现象里得到解释，其矛头指向颓废派、印象主义、怀疑派和一个持续的因而负有责任的自我之消解。

在阅读这些时，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个有关颓废的问题，即这里谈的是一个犹太人的还是一个普遍性的颓废问题。我更多地是反问自己，为什么当初，当我第一次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当其中的现实还是当前的、我所经历的现实的时候，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新词的兴起和流行趋势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呢？答案很快就有了。那时，“世界观”尚局限于某些新浪漫派人士的反对派团体里，是一个团体词汇，还没有进入普遍使用的语言。

我继续问自己，这个世纪之交时的团组词汇怎么会变成第三帝国语言的标志性词汇的，因为，在这种语言里，最小的党员同志（Pg）和每一个没文化的小市民和小商贩，利用每一个时机，谈论他的世界观和他建立在其世界观基础上的行为态度；我继续问自己，纳粹的“在所谓无限之中的观念实用性能”体现在哪里。它必须要是那种最能为大众所理解的东西，适合所有人的东西，在组织意义上有用的东西，因为在德国劳动阵线(DAF)的条例中，我在工厂时曾经有一次迎面撞见过这个条例，在一个“所有创造者的组织”的这种章程里，没有明确提及“保险金”，却言及对“一个世界观共同体的贡献”。

第三帝国的语言发现了这个词，并不是因为它在其中看见了外来词“哲学”的一种德语化情况——它并不总是很在意德语化问题——但是，它在这里找到了一种表达，那种对于它来说最为重要的、针对哲学活动的对立面的表达。因为哲学是一种智力的、逻辑思维的行为，纳粹充满敌意地站在它的这个最危险的死敌的对立面。但是，纳粹所需要的清晰思维的对立面并不是那个“真实的看”，如施尼茨勒对“观”这个动词所定义的；“真实的看”同样妨碍纳粹在修辞上不断地进行迷惑和麻木人的尝试。第三帝国的语言在“世界观”这个词里看见的是“观”（das

Schauen），是神秘主义者的“观”（die Schau），也就是内心之眼的“看”（Sehen），是宗教迷狂状态下的直觉和启示。拯救者的愿景，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的出发点：这是“世界观”这个词最核心的意义，或者说是最深层的向往，如同它在新浪漫派的语汇里所出现的和被第三帝国的语言所承继的那样。我总是不断地回到那同一个诗句和同一个结论上去：“从同一块耕地里 / 有杂草和鲜花长起”……以及：纳粹的德国之根叫作浪漫派……

不过：在德意志（deutsch）浪漫派变成狭隘的陶意志（teutsche）[1]浪漫派之前，它曾经与异乡远方有过一种非常真诚的关系；纳粹一方面将陶意志浪漫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升级，另一方面它倒也像最初的德意志浪漫派一样，对所有陌异事物能提供的有用东西具有极高的接受能力。

在读了施尼茨勒几周之后，我终于拿到了戈培尔的《从皇帝宫廷到帝国元首府》。（书籍的匮乏到了1944年同样也成为雅利安人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图书供应很糟糕，借书人又太多，于是那些租借书籍的图书馆只是根据请求和特别的推荐才接受新的顾客——我妻子在三家图书馆“注了册”，并且始终把我要的图书条子放在她的手提包里。）在这些“日记之页”里，戈培尔洋洋得意地夸耀自己成功的宣传攻势，并同时展开新的宣传。1933年2月27日他写道：“为觉醒的民族之日准备了宏大的宣传攻势，所有细节都确定了。这个行动将像一场极棒的表演（Schau）在全德国展开。”在这里，“Schau”这个词与内心和神秘毫无共同之处，它在这里向英语的show看齐了，意味着一个表演的推出，一个视觉的盛典，完全处于马戏团表演、美国人的巴尔努姆表演的影响之下。

这个从属的动词“观”（schauen）与施尼茨勒的“真正地看”，

---

1 “日耳曼”的贬义说法，典型德意志的。

或者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有很多的关系，全在于人们怎么看。这是一种被驾驭、被引导的看，一种对感性的眼睛的满足和使用，在灼人的光线中最后导致炫目迷惘。

浪漫派和善作广告的经营，诺瓦利斯和巴尔努姆（Barnum），德国和美国：在第三帝国的语言观（Schau）和世界观中，两者都存在，并且像天主教礼拜仪式里的神秘性与感性的绚丽一样不可分解地相互融合在一起。

而当我问自己，那个德国劳动阵线的世界观共同体对之俯首称臣的救世主是个什么外表时，这时，在他最为突出的线条中又是德国和美国的东西相互融合到了一起。

和施尼茨勒关于世界观的段落令我着迷一样，一年前我也从黎莉·布劳恩（Lily Braun）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里摘录了几句话，并将它们与我的题目联系起来。（在这份遗物上黏附着一个想象中的毒气室气味，特别可怕。"在奥斯维辛死于心悸缺损"，我在他的死亡证明上读到这个非自愿地留下遗产者的死亡证明……）

在日记里我记载道："……阿利克斯在明斯特和一个天主教神职人员有一次宗教辩论：'基督教的思想？……天主教教会与此毫无关系！这正是我热爱之、欣赏之的地方……我们是无神论者，是太阳的崇拜者……卡尔大帝立刻明白了这一点，他的传教者跟他一样。他们的血管里本就不断流淌着萨克森的血。因此他们有许多自己的圣人的庙宇，替代了沃坦神、多纳尔雷神、巴尔德尔神和弗雷娜神；因此他们不是将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而是将上帝的母亲、这个创造性的生命的象征，抬到上天的王位上。因为那个一无所有的人可能会将他的头颅摆上来，所以他的仆人们用金子和宝石装点着他们的衣衫、他们的祭坛、他们的教堂，并拉来艺术为其服务。从基督的立场出发，他们的再洗礼信徒毁掉神像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民族的志同道合者生命力强大的天性却判处他们无理。'"

这个非欧洲的基督，这种宣称天主教会内部日耳曼的主宰，强调对

生命的肯定，强调太阳崇拜，再加上萨克森血统和本族同志们生命力强大的天性：所有这些都完全可以是罗森贝尔格《神话》里的语言。然而尽管如此，这个布劳恩却完全是非纳粹的，既不反智，也不反犹，这就给了纳粹分子一个更为广大的基础，在涉及到他们作为日耳曼象征的弯钩十字标志的时候，在涉及题目的太阳轮崇拜的时候，在他们持续地强调阳光的日耳曼属性的时候。

“阳光的”（sonnig）当时在阵亡者讣告中迅速蔓延开来。我曾经十分坚定地相信，这个修饰语根植于古老的日耳曼崇拜之心，完全出自于对金发救世主的想象。

这一直持续到我在工厂读到了一本战场邮政的小册子。早餐休息时，我看见一个和气的女工盯着那本小册子看得很起劲，便请求她借给了我。那是《战士—战友》系列中的一本，由希特勒的弗朗茨·艾尔出版社大量发行，在“黄瓜树”的总标题下推出了一系列小故事。

我本期望能在艾尔出版社的一个出版物里，找到最浓缩的形式下的纳粹毒素，没想到所有这些故事都令我失望。这家出版社也通过其他的书本往军队里喷洒了足够的、过量的毒素。但是威廉·普莱尔（Wilhelm Pleyer），无论是从作家的还是从人的品格来看，他都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党员同志（Pgs）。后来，当我知道他是苏台德德国小说家时，我的第一印象，无论是好是坏，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黄瓜树的果实都是一些很流俗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很平常的所谓的小幽默故事。在我觉得它们完全没有意义、已经准备将它搁置一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故事，是关于父母的幸福的，关于母亲的幸福。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很活跃，金发，金子般的头发，阳光般的头发；金发，太阳，阳光的品性填满了字里行间。这个小姑娘与阳光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她叫薇薇朴慈（Wiwiputzi）。她怎么会取个这么少见的名字？作家也问自己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三个 i 在他听起来特别有光感（licht）？是不是这个词的开头令他想到 vif，有生命力的？不管这个词的创意在其他什么方面给他以诗意的和肯定生命的感觉，反正他给自

己的回答是："想出来的（ersonnen）？不，这完全是自然地产生的——阳光照射出来的（ersonnt）[1]。"

还书的时候，我问那位女工，她最喜欢哪个故事。她答道，所有的故事都很好，不过其中最好的还是薇薇朴慈的故事。

"我真想知道，这人怎么会想到拿'阳光的'玩词汇游戏？"这个问题几乎不由自主地从我嘴里冒了出来，而且我马上就后悔了，因为这位妇女全无文学概念，她能怎么回答呢？我只会使她狼狈。但奇怪的是，回答立刻就来了，而且非常理所当然："他当然是想到了*sonny boy*！"

这可真是vox populi[2]。我当然不可能搞问卷调查，但是当时我就本能地毫不怀疑，而且今天依然毫不怀疑，*sonny boy*这个电影——同时有谁知道，*sonny*是小儿子的意思，跟"阳光的"根本没任何关系？这个美国电影为"阳光的"这个疫疾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起码可以与日耳曼崇拜媲美。

---

1 "ersonnt"为"sinnen"（想）的第二分词，原本与"sonne"（太阳）无关，而"ersonnt"的词根，就是"太阳"。

2 拉丁语：人民的声音。

23

如果两人做同一件事……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刻和那个词，它们令我的语文学兴趣发生了转移，从文学上——我该说是“扩展”到还是“狭隘”到了专门的语言上呢？一个文本的文学关系突然变得不重要了，丢失了，而你把眼睛盯在了某一个别的词、个别的形式上。因为在这个个别词的下面，一个时期的思想、普遍的思想状态在你面前打开，个体的思想契合进一般的思想，受到后者的影响，或许是被其引导。当然，个别的词、个别的用语在其出现的各种关联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直至对立的相反的意义，于是，我其实又回到了文学上来，回到了面前文本的全局上。相互的映照、个别词汇和文章的全貌相互检验是必要的……

那是发生在卡尔·佛斯勒因为人材料（Menschenmaterial）这个表达而深感气愤的时候。材料，他说，顶多是一个动物身体的皮、骨、肠等；说什么人材料，就意味着依附于物质，轻视精神，这个真正的人之为人的东西。

我当时并不完全同意我老师的观点。那是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我还从未近距离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性，我根本不相信，在真正的欧洲内部还可能会发生战争，因此，我认为服兵役不过是一个心理和体能方面的有益无害的培训；在我看来，如果哪个军官或者军医谈论好的或者是差的人材料，那就跟一个地方医生在午饭前还要很快地解决一个“病案”或者一根“盲肠”没什么区别。这一切既不特别关系到雇佣兵玛耶的心灵情况，也不特别涉及病人米勒和舒尔茨，人们只不过因为职业的原因，在这一刻仅仅考虑人的自然属性的物理方面。战争之后，我倾向于把“人材料”视为“大炮饲料”（Kanonenfutter）的同类，一个令人难堪的家族，视其为同样的，一个是有意识的、一个是无意识的具象讥讽。即便在今天，对于这个被判有罪的表达的粗暴性质，我仍然不能真正确信。为什么不可以有人怀着最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确地标示一个人或者一组人对于某些职业或者运动方式的确凿的材料值呢？依此类推，如果在监狱的行政语言里，犯人顶着的是代号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名字，我也不想认为那就是一种特别丧尽天良的情况：囚犯们并没有因此而被非人化，而只是作为一个管理的对象，只是在表格上被看作数字而已。

当一个贝尔森集中营的女看守在战争法庭上声称，她在某一天和某一日要跟十六“只”（Stück）犯人打交道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昭示了一种一目了然和无可置疑的粗暴呢？在前面两个例子中，讲的是职业性的对个人（Person）的忽略，是抽象化，而“只”则是在进行物化（Versächlichung）。同样的物化行为还有行政语言中的“腐尸利用”（Kadaververwertung）一词，更有甚者是其向人的尸体扩展时所表达的东西：人们把集中营的死者做成肥料，对此的称谓完全与对动物腐尸的加工一样。

从部队指挥部战报公式化的陈词滥调中，特别是在1944年，这种物化表现得意图性更强，而且是受一种怨恨驱使，怨恨的背后是已经开始的、崩溃状的绝望。这些战报总是指出，结帮团伙（Banden）不可饶恕；尤其是针对不断高涨的法国反抗运动，有一段时间报上反复不断地

说：这样或那样，很多人被“干掉了”（niedergemacht）。在动词“干掉”（niedermachen）上，人们能察觉到他们对于对手的怒火，但对方在这里总还是算被痛恨的敌人，还算是个人。而后来人们每天读到的却是：这样或那样，很多人被“结清了”（liquidiert）。结清是商用词汇里的词，是个外来词，其冷漠程度比德语里任何相应的词都更甚一筹，也更加物化；一个医生为他投入的劳动结清一笔数目，一个生意人结清他的商店。在前一个例子里是将医生的劳务换算成钱的价值，第二个例子讲的是最终的了结，涉及的是一家商店的事务。而人如果被结清了，那么他们同样是被了结了，或者像事情的价值一样被终结了。在集中营的语言里叫作，一个群组“被领入最终解决（Endlösung）”，以此表达他们被枪毙或者被毒气杀死。

那么这种对人的物化可以看作是第三帝国语言的一个特别的性格特征吗？我相信不可以。因为它只是被用在某些人身上，国家社会主义剥夺了这些人真正的人之属性，它把他们视作低等种族，或者对立种族，或者是下等人，把他们从真正的、只适用于日耳曼人或者北方血统的人性之爱中排除出去了。而在其承认的人种圈子里，它则是非常重视和强调个人的。我可以为此举出两个很说明问题的有力证据。

在军事领域里，人们不再说一个军官的人，一个连队的人（Leute），而全都讲“男人们”（Männer），每一个少尉都这样报告：我命令我的男人们……《帝国》里有一次刊登了一个心怀感动的、充满激情的悼词，是一位大学老教授为三位阵亡的军官、他曾经最宠爱的学生写的。其中有这些军官从战场发出的信件的影印件。老教授一次又一次地为这种德意志男人之间的忠诚、为这些军官和他们的“男士们”（Mannen）的英雄精神而激情洋溢，他沉浸在他古德语韵味的诗意表达里；而他的学生在信里用的全都是：“我们的男人们”（unsere Männer）。这里，这个当代语言的词汇形式使用得理所当然——这些年轻人完全不再有那种情感，即要用这个新词语说出一些新的、一些诗意的东西来。

一般来说，对待古德语的语言形式，第三帝国的语言采取的是一种

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与传统的连接、与浪漫主义的对德国中世纪倾向的连接，与尚未经罗马文化改变的原初的日耳曼本质的紧密联系，在它来说都是自然而喜爱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要毫无负担地贴近时代、很先进很现代。希特勒在其开创时期还与德意志民族文化党人进行过斗争，因为后者很想给其自己的语言以一种显著的古德语的格调，希特勒曾经视其为不好对付的竞争者和对手。所以，在宣传过一段时期后，德意志的月份名称并没有流行起来，也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过。而同时，一些古老的字符和各种各样的日耳曼名字却又赢得了声誉，进入了日常生活……

在力图突出亲身性（Persönlichkeit）这一方面，比“男人们”表现得更为坚决的，是一个行政语言风格的新说法，这个词变异为下意识的滑稽笑料。当时，犹太人既没有购衣卡也没有计划供应票证，他们不允许采购任何新东西，只能从一些特别的衣物和日用品库里取得使用过的物资。刚开始从这类衣物库里拿到一件东西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后来就需要向上申请，经过辖区指派的“法律咨询官”和盖世太保的犹太人部，直到警察总局。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个印在卡片上的通知：“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条使用过的工作裤，领取于……等等。警察总长。”它所基于的原则是：不是冰冷机械的行政部门，而是这位为领袖负责的个人要对每一件事作出决定。于是所有行政事务都转为“我形式”（Ichform），由一位亲力亲为的上帝安排。我，以个人面目出现的财政总长，不再是税收点X，要求弗里德利希·舒尔茨，缴纳三马克五十芬尼的过期罚款；我，警察总长，开出一份三马克的罚单；最后甚至是：我，警察总长，亲自对犹太人克莱普勒许诺了一条旧裤子。一切都是majorem gloriam[1]，领袖原则和亲身性的崇高荣誉。

不，对于其尊之为人的日耳曼人，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愿进行去个人化（entpersönlichen）和物化（versächlichen）的。问题只是，一个领

---

1 拉丁语，完整为：“Ad majorem Dei gloriam”，为了上帝更高的荣誉。

袖也需要被领导者，他能够信赖的无条件服从他的被领导者。人们注意到，这十二年期间，“毫无保留地”（blindlings）这个词在尽忠誓言中、在追捧和应和的电报及决议中出现的频率极高。“毫无保留地”属于第三帝国语言的支柱性词语，表达了纳粹精神面对领袖和各个次领袖的理想状态，它的使用并不比“狂热的”少很多。而为了毫无保留地执行一项命令我是不可以对它加以思考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停下、顾忌，甚至导致批评并最终拒绝执行命令。所有军事教育的实质都在于，使一系列动作和活动自动化，让单个的战士，单个群组，不受外界的影响，不理内心的权衡，不顾任何本能的感觉，完全像一台机器那样去听从上级的命令，按钮一揿就随之运行起来。国家社会主义根本不想触犯个人本身（Persönlichkeit），正相反，它要抬高之，但是这并不排除（对于它来说并不排除！）它同时将其机械化：每个人都应该是上级和领袖手中的自动化器械，同时也是按钮的操纵者，对于隶属于他的自动器械来说。这种结构掩盖着通行的奴役化（Versklaven）和去个人化（Entpersönlichen），并滋生出大量来自技术领域的第三帝国语言的用语，众多的机械化词汇。

当然，自 19 世纪初以来，所有文明语言（Kultursprachen）经历和继续经历着技术性专业表达的增长，这是技术的全面渗透及其对于日常生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个因素必须排除。这里观察的更多的是技术方面的语汇跨越到非技术的范围，并在那里发生作用，使事物机械化。这在 1933 年以前的德语里甚为少见。

魏玛共和国实质上只有两个表达超出了它们的技术专业范围，被输送进一般语言里：“下锚泊位”/“确立”（verankern）和“借助曲柄发动”/“推动”（ankurbeln）是当时的口号性用语和时髦词。它们由于过于泛滥而很快成为被嘲弄的对象，被用来讥讽和刻画不受欢迎的同代人；比如二十年代末，史泰芬•茨威格就在他的《小编年史》中这样写道：“尊贵的大人和系主任使劲地推动着（ankurbeln）他们的联系。”

“下锚泊位”是否可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纳入技术的画面，这

个问题还很难说。它来自于航海业，被一种淡淡的诗意缭绕着，在魏玛共和国之前很久就单独出现了；它变成这一时期的时髦词，完全是那个阶段的过度使用导致的。一个引起广泛热议的看法对这个词的滥用现象肯定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强调说，企业员工代表管理委员会必须“在宪法中确立下来（verankern）”。从此，所有的可能的、不可能的东西都在各种形式的地面上下锚泊位了。然而，对这一画面的倾向性，肯定是一种内心的、下意识的动机，它埋在对安定的深层的渴求之中：人们厌烦了革命的动荡激流；国家之船——古老的图像（*fluctuat nec mergitur*）——应该稳稳地停泊在安全的港湾了。

只有“借助曲柄发动”这个动词，是从较为狭义的或者较为现代意义的技术范畴里提取出来的；它来自于当年不时出现在大街上的一个场景：那时自动马达还缺少引擎，到处都能见到司机拼命地用手动曲柄发动他们的机器。

这两个画面，不论它们是半技术的还是全技术的，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只涉及事物、状况、活动，而从来不关乎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推动”全部的各类的商务分支，但从来不“推动”从事商业的人本身，人们“确立”最不同的机构，也“确立”政府部门，但是从来不“确立”一位财政总长或者一位部长个人。而当技术的喻体直接指向了人，或者就像世纪初以来蔓延的一个表达所说的：对准了（eingestellt sein）个人的时候，那么真正决定性的一步，在语言上将生命机械化的步子就迈出去了。

我附带问自己，“eingestellt sein”和“Einstellung”（观点/看法）——每个家庭妇女如今对甜味素和糖都有其独特的看法（Einstellung），每个男孩儿对拳击运动和田径都持不一样的观点（eingestellt sein）——是不是同样属于语言技术化的范围。是，也不是。起初，这些表达涉及的是将一个望远镜调准到一定的距离，或者将一个发动机调到一定的转数。最初的领域延伸是通过转义进行的，只是一种半比喻的性质：科学和哲学——特别是哲学——使用了这个表达；精确的思想，思想的器械被清

晰地调准到一个客体上，这里，技术的基本格调完全清楚地保留着，应该还保留着这层意思。这些词的一般性使用很可能来自于哲学。当时，对重要的生活问题具有一种“看法”，显得很有文化和教养。想要确认人们在二十年代初对这些词汇中技术的、起码是纯理性的意义还有多少清楚的了解，几乎是不可能了，无法一概而论。在一个讽刺性的有声电影中，媚惑的女主角唱道，她的生活“从头到脚都是对着（eingestellt）爱情的”，这话表明了一种对那个基本含义的了解；而同时，有一个自视为诗人、后来也被纳粹作为诗人吹捧的爱国分子十分幼稚地唱道，他的全部感情都是“朝向（eingestellt）德国的”。这个电影根据亨利希·曼的悲喜剧作品改编，是一部描写教书匠的长篇小说；那位被纳粹捧为早期的追随者和自由军团斗士的诗句艺术家，有一个不太日耳曼的名字，叫波古斯拉夫或者博莱斯拉夫——当一个语文学家的书籍被夺走了，他的部分笔记被毁掉了，他便一筹莫展了。

毫无疑义地将个人机械化，是第三帝国语言的专利。它在这方面最具性格特征的、也是最早的创造叫作“同一化”（gleichschalten）。这个词让人们看见按钮、听见按钮的声音，它将人，不是机构，不是非个人的政府部门，置入均匀的自动化的状态和运动中：不同学校的老师，不同组合的法律和税收部门的职员，战斗部队和冲锋队队员等等等等，几乎在不变的形式下同一化了。

这个词对于纳粹主义基本的思想意识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所以它是获得佛尔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红衣主教荣宠的不多的几个表达之一，早在 1933 年底，他就在圣灵降临节的祈祷中对这些词语进行了嘲讽。在古代亚洲民族中，他说，宗教和国家是被同一化的。与这位教会高层人物同一时期的，还有小小的幽默讽刺剧艺术家，他们敢于给这个动词抹上一层滑稽的色彩。我记得有一次，郊游协会组织了一个所谓随心所欲之行，当大家在森林里进行咖啡小憩时，一位滑稽剧演员调侃说现在这个活动与自然同一化了，引来了热烈的掌声。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没有第二个词像“同一化”这样赤裸裸地表

现了将人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倾向，没有哪一个技术词汇的越界情况比它更加严重。人们在整整十二年里都使用了它，虽然开头用得比后来频繁，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的同一化、所有的自动化很快都完成了，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其他从电子技术接受过来的词语没有产生这么明显的严重后果。如果什么地方谈到那些电流（Kraftströmen），那些在领袖的素质里汇集、或者从领袖的素质中发出的能量——人们可以在关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表述中读到相似的、略有区别的说法——，这些作比喻的词语既强烈地指向电子技术，也同样地表达磁性的力量，同时便与浪漫主义的感觉十分接近了。这在伊娜·塞德尔（Ina Seidel）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她在自己最纯的创作活动和最恶的犯罪行为中使用了同一个电子比喻——不过伊娜·塞德尔是另一个可悲的篇章了。

然而，像戈培尔那样激昂地谎称，他驱车前往被炸毁了的西部城市，本来是为了鼓励遭受轰炸的人们，提高他们的勇气的，然而那里的人们表现出的不可动摇的英雄气概，却为他“重新充足了电”（neu aufgeladen）……这样的谎言难道可以称之为浪漫吗？不，这是习惯性地将人贬低为一个技术器械，其中唯有、而且必定是这种惯性的作用。

我之所以说得这么肯定，是因为这位宣传部长、包括戈培尔圈子里的人，他们所使用的其他技术方面的比喻中，与机械直接的联系占统治地位，没有任何对电流的联想。工作劳动的人一再被比作马达。比如在《帝国》中对汉堡总督的描述是，他在工作中就像“一个总是高速运转的马达”。这类比较不管怎么说总还是在画面和被比较的客体之间划了一道界线，更严重地造成人之机械化基本观念的是戈培尔的这一类句子：“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我们将在一系列地区重新高速运转起来（zu vollen Touren auflaufen）。”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和机器比较了，我们就是机器。我们：这是戈培尔，这是纳粹政府，这是全体希特勒德国，应该在严重的困境中、在巨大的力量损失中提高勇气；而这个雄辩的布道者不是将自己和他忠实的子民比较为机器，不是的，而是将自己直接

认同为机器。不可能还有比在此暴露出来的更弱智的思维方式了。

而当机械化的语言运用如此直接地伸向个人的时候，它继续不断地向距离略近的其范围之外的事物伸手，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没有什么不能启动（anlaufen lassen）、不能超越（überholen），就像超越一个运转了较长时间之后的机器、或者一艘进行了远程航行之后的船只一样，没有什么人们不能令它从随便哪里钻进去、或者从随便哪里钻出来（hinein-oder herausschleusen）的东西，人们当然——这个语言是正在形成的第四帝国的！——可以扩展一切和所有。如果说一个被炸毁的城市的勇敢的生存意志应该受到颂扬，那么，作为这方面语文学的证据，《帝国》提供了他们莱茵居民或者是威斯特法伦居民的地区性表达："又滚动了（Es spurt schon wieder.）。"（我得到的解释是，"滚动"是汽车制造业的专用词：车轮遵循正确的轨迹行进。）为什么一切又滚动了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全方位的良好的组织中"满负荷地"开展工作。包括"满负荷地"（voll ausgelastet），一个戈培尔最后几年里最喜爱的用语，也必定是从技术的语言跨出去，运用到个人身上的；只不过这一跨界的感觉不像高速运转的马达那么暴力，因为人们最终完全可以像对待某一个承载构件那样对待人的肩膀，让它满负荷运行。

语言使之昭然若揭。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界越矩，技术性词语的扩张延伸，如此态势下的恣意妄为：魏玛时代只知道"推动"（Ankurbeln）经济，第三帝国的语言不仅添加了"全速运转"（Auf-volle-Touren-Kommen），还有"磨合得很好的方向盘"（die gut eingespielte Lenkung）——所有这些（这些我绝对没有进行词典学方面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证据，证明第三帝国事实上蔑视它标榜尊重和维护的个人，证明它压制独立思考和自由的人。这个证据不会失效，无论它唱得多少高调，宣称他们恰恰是要发展个人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特别是犹太和亚洲布尔什维克主义搞的"群体化"（Vermassung）誓不两立的。

但是，语言真的使之昭然若揭了吗？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词，一个我现在总是听见的词，因为俄国人正在致力于重新建设我们完全毁坏了的

学校：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它引自于列宁的表述。这也是一副技术的画面，是的，其实是最最技术的了。一位工程师是跟机器打交道的，如果他被视为非常适合于维护心灵的人，那我就必须从中推断出，心灵有如机器……

我真的必须这样吗？纳粹始终在说教，说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唯物主义方面超过了社会主义学说，因为它力求模仿美国人的工业方式，并接受了他们技术化了的思想和感情？这一切哪些是真的？

一切，全非。

确实，布尔什维克在技术上是以美国为师的，它正在激情洋溢地使它的国家工业化，这必然在它的语言中留下极为明显的痕迹。但是它为什么要让它的国家工业化？是为了给它的人民带来一个具有人的尊严的生存，向他们提供一个精神提升的可能性，一种建立在身体条件获得改善的、沉重的工作压力得到减少的基础上的可能性。丰富的新的技术用语正好证明了与希特勒德国所证明的相反的东西：它指示了为精神解放而战斗的武器，而在德语里，从技术词语的越界现象我却不由自主地推演出对精神的奴役。

如果两人做同一件事……通俗至极的智慧。但是，我还是要在这本语文学者的笔记簿里，强调这个没有专业意义的表达：如果两人使用同一个表达形式，他们完全不必从同一个意图出发。正是在今天、在这里，我要特别着重地、重复地强调这一点。因为了解各民族真实的精神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必要了，我们与他们隔离开了这么久，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被蒙骗了这么久。在俄国的问题上更是如此，比其他任何民族都厉害……没有什么比语言更能引导我们接近一个民族的心灵……尽管如此："同一化"和"灵魂的工程师"——两者都是技术用语，但德语的这个比喻指向奴役，而俄语的却指向自由。

24

欧洲咖啡馆

1935年8月12日 “它虽然至为边远——要望到亚洲那边去了——但是它还在欧洲”，戴波两年前告诉我，他获得聘书将去伊斯坦堡大学任教。今天，我眼前又浮现出他当时满意的微笑，那是他被解聘、确切地说是被赶走而愤懑积怨了几周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就在今天，我想起了那个微笑和开朗的声调，它们使“欧洲”这个词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今天从Bl.夫妇那里传来了他们离开之后的第一个消息。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到达利马了，他们的信是从百慕大三角发出的。这封信让我感觉沮丧：我嫉妒这些人的自由，嫉妒他们视野的扩展，我嫉妒他有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他们不是表示快乐，而是报告他们受晕船的折磨和对欧洲的渴念。我精心作了几句诗，准备寄给他们：

感谢上帝吧，每一天，
他托着你们渡过大海

逃脱了巨大苦难——
小磨折无足轻重；
于一艘自由之船
从栏杆吐向大海，
这不算最大苦痛。
抬起你们的疲累双眼
朝着南方的十字谢拜：
远离犹太人万千苦难
航船载你们恩重如山。
你们充满对欧洲的怀念？
它就在你们面前的热带；
因为欧洲是一个概念！

1935年8月13日 瓦尔特从耶路撒冷写信来说："今后写信请直接寄到：欧洲咖啡馆。我不知道，我目前的私人地址还能用多长时间，相反，在欧洲咖啡馆肯定能找到我。我觉得这里，我指的是眼下整个耶路撒冷，总体来说都要比特拉维夫好许多，特别是咖啡馆；在特拉维夫犹太人只是自己在一起，而且只想做犹太人。这里更加欧洲化一些。"

我不知道，今天这封来自巴勒斯坦的信件，会不会因为昨日邮件给我留下的印象，被我赋予了比它本身更重要的意义；但是我感觉，我这个并非学者的侄子对欧洲的理解，比我学富五车的同事们更加接近本质，后者的渴念黏附在地理的位置上。

1935年8月14日 总是这样，为任何一个想法，我最多只感到一天的骄傲；然后我又瘪了下去，因为接下来——语文学者的命运使然——我便记起了这个想法的来历。"欧洲"这个概念是从保尔·瓦西里（Paul Valéry）那里借来的。我可以聊以自慰地添加上：参见克莱普勒的《现代法国散文》。距今已经十多年了，当时，我在一个特别的章节里对法国人关于欧洲的思考进行了综述和评论，他们如何绝望地指控这个大陆

在战争中自我撕裂，如何在梳理和传播某一种文化、某一种精神和意志形态的过程中认识到其本质。在1922年的苏黎世讲话中，保尔·瓦西里非常清晰地提出了欧洲大陆的抽象化。对于他来说，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的三位一体性伸展到的所有地方，都是欧洲，他自己说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和基督教罗马，而基督教罗马中是含有耶路撒冷的；美国对他来说也只是“欧洲的一个巨人般的造物”。但是，在将欧洲树为世界领袖的同一时刻，他便立即补充道：我没有正确地表达自己，不是欧洲实施着统治，而是欧洲精神。

对于一个不复存在的欧洲，人们怎么能心怀渴望？德国肯定不再是欧洲了。与之接壤的那些国家又还能安全多久呢？在利马我会感觉比在伊斯坦堡更加安全。至于耶路撒冷，我则觉得它离特拉维夫太近了，而且与米斯巴赫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为现今的读者所作的注解：巴伐利亚的米斯巴赫在魏玛时代出过一份日报，其腔调和内容与其说是为《冲锋者》作了铺垫，毋宁说是《冲锋者》的先声。）

*

在作了这些笔记之后，几乎有八年之久，“欧洲”这个词没有再出现在我的日记本里，尽管我关注着所有闯进我视线的第三帝国语言的独特现象。当然我并不是想说，任何地方都读不到有关欧洲或者欧洲境况的文章了。这样说当然就更不合适，因为纳粹主义从它的祖师爷张伯伦那里接过来一种经过篡改的欧洲思想，这种欧洲思想在罗森贝尔格的神话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并受到党的所有理论家的附和追捧。

这种思想，可以说，帮助种族主义政客实现了他们对于德国人的理想化：他们被“提升北方化了”（aufgenordet）。按照纳粹的说教，所有的欧洲人属性都来自北方人或者北方日耳曼人，所有的损害，所有的威胁都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只要欧洲文化的希腊和基督教来源不遭

到任何形式的否定，古希腊人、包括基督就都是金发－蓝眼－北方－日耳曼的血统。基督教属性中不适合纳粹的伦理和国家学说的东西，很快就被当作犹太的、或者是叙利亚的、或者罗马的性质剔除掉了。

然而，即便在这种扭曲中，“欧洲”这个概念和词语仍然只为一个很小的知识阶层而存在，此外还几乎与被摒弃的概念“智性”和“人道”一样令人生疑。因为这个危险始终存在：人们曾经怀有的欧洲设想还可能会苏醒，这类回忆必然会把人们引向和平的、超越民族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路径上去。而另一方面，由于罗马时代的日耳曼国被作为整个欧洲思想的发源地，作为欧洲人唯一的血脉，那么，“欧洲”这个概念就可以干脆抛弃掉了。通过这种方式，德国便从所有的文化纠缠及义务中超越出来，拥有各种无上的权利，独一无二地、上帝般地凌驾于所有的民族之上。理所当然地，人们无时无刻不被要求了解，德国必须抗御犹太的－亚洲的布尔什维克。1938 年 5 月 2 日，当希特勒极端戏剧性地前往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时，报纸上多次声称，领袖与 Duce 正在着手共建“新欧洲”，但马上就有“德意志民族神圣日耳曼帝国”的大标题打出来，以抗衡国际化的“欧洲”。在第三帝国的和平时期，人们还不会把“欧洲”这个词列为具有第三帝国语言性格特征的词，因为那时绝对没有如此特别频繁地使用它，没有如此强调某种特别意义，没有如此突出感情色彩。

直到开始进军俄国，尤其是到撤退的浪潮开始的时候，这个词才获得了一个新的、越来越绝望的意义。如果说人们此前只是偶尔的、也就是说只是在节庆味儿的文化论述中，保卫了“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那么眼下，这一陈词滥调或者是某个类似的套话则是随处可见，在每一天，在每一份报纸里，常常在不同的位置上重复出现。戈培尔发明了荒原席卷而来的画面，从地理科学的专业语言里拿来这个名词，用以警告欧洲将被荒原化，从那一刻起，“欧洲”和“荒原”，一般都紧密地相互关联，进入了专门的第三帝国语言的语汇。

于是，“欧洲”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很独特的返构过程。在瓦西里的观察中，“欧洲”是与其原初的空间、根本就是与空间相脱离的，在

他看来，“欧洲”便是意味着每一个精神上烙有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三位一体印记的地域（或者用更加拉丁语的表达：一回雅典，两回罗马）。现在，在希特勒时代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里，“欧洲”这个词所发生的绝对不是这一类的抽象化。不错，人们会谈到关于西方国家的理念，对它进行保护使之不受亚洲属性的侵害。但是纳粹上升时期非常强调的所谓欧洲属性是北方－日耳曼的这一点，人们也同样避免重提和宣传，就像人们另一方面也很少浪费笔墨去讨论瓦西里较为接近于真实情况的欧洲概念一样。我只是称他较为接近真实；因为他纯粹的拉丁语基调和唯独的西方取向令其过于狭隘，使他无法完全达到真实：自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发生影响以来［沃居里（Vogüés）的《俄国长篇小说》1886 年就已经出版了］，自从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它与美国技术联系起来以后，欧洲精神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莫斯科……

不，“欧洲”，第三帝国的语言现在每天都在说的“欧洲”，这个语言新的基本词“欧洲”，完全是空间的和物质的，它标识了一个狭隘的地区，观察这个地区的角度比以往通常的视角更为具体。被视为俄国非法占有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当然是被作为希特勒的新大陆划走了，而“欧洲”现在不仅仅跟俄国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在敌意的排斥中跟大不列颠国分离开来。

在战争之初还不是这样。那时叫作：“英国不再是个岛国了。”这个说法早在希特勒之前很久就有了，我曾经在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川克雷德》里和政治旅行作家洛尔巴赫（Paul Rohrbach）那里读到过，后者为巴格达铁路和中欧做过宣传；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提法仍将一直与希特勒捆在一起。当年，在对波兰和法国闪电战胜利的晕眩中，整个希特勒德国都相信即将登陆英国。

希望落空了，被封锁并受到进攻威胁的不再是英国，现在被封锁的、遭受进逼威胁的是轴心国了，于是“封锁严密的”（blockadefeste）“独立的欧洲”（autarke Europa），即那个所谓被英国背叛的，被美国

人和俄国人包围并伺机侵占以进行奴役化和精神荒芜化的“尊贵的大陆”（ehrwürdige Kontinent）成为流行词。从辞书和概念意义上讲对第三帝国的语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欧洲堡垒”（Festung Europa）。

1943 年初，一本受到官方首肯的书出版（“这本作品被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图书目录”），它就是马克斯·克劳斯（Max Clauß）的《事实欧洲》。这个题目本身就表明，这里无关漫无边际的玄思推测，而更关乎具体事物，关乎圈围起来的欧洲，关乎“今天大步行进的欧洲”。在这本书里，站在真正敌人的位置上的是英国，英国比俄国更甚。其理论出发点是寇登侯夫－卡勒基 1923 年出版的《泛欧洲》一书，这里，英国被视为欧洲的领袖，苏维埃俄国为欧洲民主的威胁。也就是说，在以苏联为敌的立场上，寇登侯夫不是纳粹作家的反对派，而是其盟友。但是这里的关键不是两位理论家纯粹的政治立场。关于这一联盟的标志，克劳斯引述了寇登侯夫的解释：“所有国家的泛欧洲人士联合在这个标志下，这个太阳十字架：红色的十字架在金色的太阳上，人道主义的、理性的象征”。而跟我的问题相关的，不是寇登侯夫对俄国的排斥，不是他不明白正是俄国举起了欧洲属性的火炬，也不是他对于英国主导地位的肯定。对我来说，重要的仅仅是，寇登侯夫把欧洲的观念而不是欧洲的地盘放到了中心的位置——而在纳粹那本书的封面上，人们看到的正好相反，那里是地盘，是这个大陆的地图，这个欧洲的观念就叫作人道主义和理性。《事实欧洲》这本书嘲笑“泛欧洲之惑光”，完全只关注“现实”，准确地说是 1943 年初希特勒德国官方承认的持久的现实：“现实，对巨大的、以解放出来的东部为基础的大陆空间进行组织，现实，让巨大的力量释放出来，以保证被严密封锁的欧洲无论如何不受侵犯。”在这一空间的中心是作为“秩序强国”（Ordnungsmacht）的德国。这个词也属于后期的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是对施行统治和剥削的权力所作的婉转遮掩的表达，“轴心国伙伴”、盟友意大利的地位越是削弱，这个词的落实就越有力；它不含有脱离空间关系的观念上的目标。

“欧洲”这个词在最后几年里常常出现在报纸和讲话中——而且随

着德国的情况越糟糕，这种情况就越多、越显得信誓旦旦——而其唯一的内容是：德国，这个“秩序的强国”，保卫着“欧洲堡垒”。

萨尔茨堡举办了一个展览：“德国艺术家和党卫队”。关于这个展览的报道有一个大标题，叫作“从运动的推动部队到欧洲的战斗部队”。在这之前不久，1944年的年初，戈培尔写道：“欧洲各民族必须跪谢我们”，因为我们为保卫他们而战，他们也许根本不值得我们这么做！（我只是把这句话的开头部分逐字记录下来了。）

然而有一次，在所有那些一心只想着希特勒德国淫威下的欧洲地盘的唯物主义者们中间，却有一个诗人和唯心主义者发言了。1943年的夏天，《帝国》发表了一篇古诗格律的欧罗巴颂歌。诗人名叫维尔弗里德·巴德（Wilfried Bade），他新出版的诗集叫《死与生》。除此之外，我对这个作家及其作品一无所知，它们应该都已经销声沉寂了；当时触动我的仅仅、而且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是，这样一首颂歌纯粹的形态和韵律。其中，公牛形态的德国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上帝，它引诱了美丽的欧罗巴，诗歌称颂被掠夺和被升华的欧罗巴道：“……你三位一体 / 母亲，爱人和女儿，/ 也是难以感知的 / 巨大秘密……”但是这位年轻的唯心主义者和古典爱好者并没有继续沉湎于这个巨大的秘密，他知道有一副灵丹妙药，可以对付一切精神难题：“然而剑光熠熠之中 / 一切简易，再无一物 / 依旧是谜。”

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思想距离何等遥远！“欧罗巴，我无法忍受，你在疯狂中毁于一旦，欧罗巴，我向你的厮杀者呼喊，告诉他们你是谁！”犹勒斯·罗曼斯在诗中写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人却在剑光熠熠中获得升华和眩晕！

很多东西，生活可以将它们联系、结合起来，小说家则不可以，因为在小说里，这些联系会显得过于小说化，很不真实。

我将自己在希特勒时代所作的欧洲笔记进行了综述，并在思考，我们现在是否正回到一种更加纯粹的欧洲思想之中，或者我们是否会干脆

丢掉这个欧洲概念，因为现在，最纯粹的欧洲思想正从莫斯科这个当时还未入瓦西里小说法眼的地方出发，确确实实地面向“所有的人”，因为在莫斯科的视角下，只有世界而不再有欧洲这个特殊省份。正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瓦尔特侄儿从耶路撒冷寄来的第一封信，六年之后的第一封。信不再是从欧洲咖啡馆发出的。我不知道那个咖啡馆是否还在，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个地址的缺失与它当时的存在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信的内容很令人怅然若失，当年的那种欧洲人属性何处寻觅？“你有可能已经在报纸上读到了相关的东西（信里说），但是你无法想象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们在这里干了什么。我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这样看来，欧洲咖啡馆在耶路撒冷的确丢失了它的留守。不过这属于我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之犹太篇了。

25

黄星

我今天又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问了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上百遍了：在这十二个地狱般的年头里，什么是犹太人最艰难的一天？

我从来没有从自己这里、也从来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过另一种回答，它是：1941 年 9 月 19 日。从那时开始我们必须佩戴犹太星，六角的大卫之星，黄色的布块，这个如今依然意味着瘟疫和隔离的颜色，中世纪犹太人的标志性颜色，嫉妒之色，进入血液中的胆汁色，必须躲避的邪恶色；黄色的布块上印着黑色的字迹："犹太人"，框在两个套在一起的三角形线条里，由粗体印刷字母组成，每个字母的孤立状态和过于宽粗的横面线条给人以希伯来语文字的错觉。

这个描述太冗长了吗？不，正相反！只能说我乏术，无法作更加精确、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的描述。多少次，当有一个新的黄星要缝上一件新的（更多的情况是从犹太人衣库里争取来的旧的）衣物时，缝上一件

上衣或者一件工作服时，我拿着放大镜细细地察看那块布，看黄色织物的一条条纹路，看黑色印迹的不均匀之处——假如要往每一个小织格上系一个我所经历的黄星之苦，所有这些织格加起来都不够用。

一个看上去本分、好脾气的人迎面朝我走来，手上牵着一个小男孩，十分小心谨慎地在我前面一步远的地方站住，说："你看这个人，豪斯特——这就是万恶之源！"……一位白胡须的、整洁清爽的先生穿过街道，深躬致意，握住我的手说："您不认识我，我只是想告诉您，我谴责这类方式。"……我要乘坐有轨电车。我只被允许站在车子的前端，只能是在去工厂的时候，只能在工厂距离我的住处六公里以上的情况下，而且只能在前端部分与车子的内部严密分隔开来的情况下；我要上车，时间已经不早了，而如果我不能准时上班，主管师傅就可能向盖世太保报告。有人从后面把我拽下来："干吗不步行去，这对你来说要健康得多！"一名党卫队军官，歪笑着，完全不是那种暴力的，只不过找个乐子而已，就像人们拿一条狗耍逗一下……我妻子说："天气这么好，我今天正好不需要采购什么东西，不要排什么队——我陪你走一段！"——"绝对不可以！难道要我在街上看着你因为我的缘故受侮辱吗？再说了：谁知道，会不会让哪个本来不认识你的人注意到你，到你把我的文稿送走的时候，正好又让他撞见！"……一位家具搬运工，因为两次搬家而对我产生了好感——所有的好人，身上都有一种德共的味道——突然在弗莱堡街上出现在我面前，用他两只粗壮的大手抓住我的手，低语，但必须压过快车道的噪声："教授先生，您千万不要放弃！他们很快就会丧失民心了，那些该死的东西！"这是对我的安慰，这也是给我心灵的温暖；但是，如果让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我的安慰者就得坐牢，我就要去奥斯维辛，在那里丧命……在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一辆汽车开过去时突然刹住，一颗陌生的头伸出来："你怎么还活着？你这个该死的猪，应该把你轧死，碾过你的肚皮！……"

不，全部的小织格都不够记录犹太人黄星的苦涩。

盖奥尔格广场上，原来有一座古茨科夫塑像立在绿荫中，现在只剩

下底座在烂泥乱土中；我跟这尊塑像有一种特殊的友情。如今还有谁知道《精神骑士》？为了作博士论文，我兴味盎然地读了《精神骑士》的九卷全集，而在很久以前，母亲就告诉过我，她还是小姑娘时就已经如饥似渴地读了这部当年被视为最现代的、实际是被禁止的小说。不过，我路过古茨考夫塑像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精神骑士》，而是《乌利尔·阿考斯塔》，那是我十六岁时在科罗尔看到的。这出戏当时已经从常规剧目单中消失了，每一个剧评人都有义务批判这个糟糕的剧目、专门挑剔它的弱点。但是我却被它震撼了，其中有一句话伴随了我一生。在几次排犹风潮的冲突中，我相信自己对它有了一种特别生动的体会，但是它真正地进入我自己的生活则是在那个9月19日。这句话叫作："我很想沉入一般之中，顺着生活的大潮前行！"毋庸置疑，我从1933年起就被剥离出了一般，整个德国也自此被从中剥离出来；然而，尽管如此：一旦我走出住所，走出人们都认识我的那条街，依旧还是一种进入一般大潮流的沉潜，虽然是充满恐惧的沉潜，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一个恶意的人认出并骚扰我，但终归还是一种沉潜；而现在我却被随时随地、为所有人标志出来，并且经由这个标志被孤立和唾弃；因为这项措施的理由就是，犹太人必须被隔离开来，他们的残忍已经在俄国得到了证明。

这时候，隔离区化才成为一种完备的事物；之前"隔离区"（Getto）这个词只出现在可以在邮戳上读到的地方，如"隔离区黎茨曼市"，是被占领的外国才有的。在德国那时有几个犹太人居所，人们把犹太人都挤到那里去了，有时也在外面标注"犹太人居所"。但是这些房子都位于雅利安人住宅区中间，而且住的也不全是犹太人；所以人们才会不时看见另外一些住房贴出这样的告示："此房无犹"（Dies Haus ist judenrein）。这几个又粗又黑的大字保留在某些墙壁上，直到这些墙壁本身毁于轰炸大战，而像"纯粹雅利安商店"（rein arisches Geschäft）这一类牌子则很快就消失了，包括充满敌意的橱窗涂鸦"犹太人商店！"（Judengeschäft！），动词"雅利安化"（arisieren）和商店门上亢奋的词句："完全雅利安化的商家！"（Völlig arisiertes Unternehmen！），

因为犹太人商店都没有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进行雅利安化了。

现在，由于使用了犹太星，犹太人居所是分散在各处的还是组成了一个自己的小区，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每一个佩星的犹太人都随身背着他的隔离区，就像一个蜗牛背着它的房子一样。同样，在他的居所里生活的是犹太人还是雅利安人也都无所谓了，因为在门上他的名字上方必须贴上黄星。假如他的妻子是雅利安人，那么她必须将她的名字放在偏离黄星的位置上，并把“雅利安”字样置于其后。

很快，一些地方走廊的门上又出现了其他的字条，美杜莎式的字条：“这里曾经住着犹太人瓦伊尔。”这样，送信的女邮差就知道不必再费力去找他的新地址了；寄信人收到被退回的信，上面有委婉的说明：“收信人已经移居。”所以，残酷的特殊意义上的“移居”（abgewandert）完全属于第三帝国语言词典的条目，下属于“犹太人”栏目。

这一栏目富含官方表达和用语，这些表述是所有涉及者所熟稔的，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交谈之中。这当然要从“非雅利安的”（nichtarisch）和“雅利安化”开始，接下来是“关于纯洁德意志血液的纽伦堡法案”，然后有“全犹太人”（Volljuden）和“半犹太人”（Halbjuden），“一级混血儿”（Mischlinge ersten Grades）和其他级别的混血儿，“犹太血缘者”（Judenstämmlinge）。当然，还有“特权者”（Privilegierte）。

这是唯一令我不确定的纳粹的创造，我不知道这帮整个妖魔化运动的发起者对这个发明是否有清楚的意识。“特权者”仅仅在工厂里的犹太工人群组中呈现出来；他们的特权正在于他们不佩戴黄星，也不需要住在犹太人居所。被赋予了特权的人必须生活在跨族婚姻中，从这个跨族婚姻生育了孩子并对这些孩子进行了“德意志教养”（deutsch erzogen），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没有作为犹太人群体的家属进行登记。这一条款的解释经常摇摆不定，往往取决于荒诞的精细的拿捏，它也许的确只是为了保护可以进行纳粹用途的部分人群；然而对于犹太人群自身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条规定的影响更大了，它起到了分化涣散、败坏道德的作用。它引发了多少嫉妒和仇恨！我听到人们说得最频繁的、

最心怀嫉恨的话就是这一句："他是一个特权者。"这意味着："他缴纳的税比我们少，他不需要在犹太人所居住，他不戴黄星，他可以半沉潜地生活……"而在"我是特权者"这三个词里，又有着多少傲慢，多少可怜的幸灾乐祸——说其"可怜"，是因为说到底他们其实也与我们处在同一个地狱里，即便是一个较好的地狱圈子，最后毒气炉也吞噬了"特权者"——有多少着意拉开的距离。如果我当时听说犹太人自己相互谴责，听说后果严重的报复行为，我总是首先想到佩星者和"特权者"之间普遍存在的裂痕。当然，犹太人居所里狭促的共同生活——几个家庭共用一个厨房、一个浴室、一个走道——和工厂犹太人群组的紧窄群体性也造成了无数的其他摩擦；但是在"特权者"和"非特权者"身上燃烧起的却是最具毒性的敌意，因为这里关系到最受憎恨的东西，关系到犹太星。

我在自己的日记里重复地发现这样的句子，其间变化甚微："这群人最恶劣的性格特征均暴露于此，成为反犹分子真的很容易！"但是从第二个犹太人居所起——我一共见识了三家——这一类感叹语后面总不免见到这样的补充："幸好我现在读了德温格的《在铁丝网后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伯利亚营地挤作一团的情况，与犹太属性完全无关，那完全是纯种的雅利安人群，是德国队伍，是德国军官团，而这个营地里的情况实际上与在我们的犹太人居所里的情况完全一样。这不是种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是拥挤和奴役带来的……"

"拥有特权的"（privilegiert）是我词典里"犹太人"栏目下第二恶劣的词。最恶劣的仍然是"黄星"。有时候，人们用一种黑色幽默看待它：我戴着 *Pour le Semite* [1] 就是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有时候，人们会声称为之感到自豪，不仅仅在别人面前，也对自己这么说；一直到最后，人们才将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它将是我们的无罪证明！然而，在整个最为漫长的时间里，它却始终发射着刺目的黄色光芒，灼照着折磨人

---

1 法语：闪米特人。

至深的思想。

而“被遮掩的星”反射的光是最毒的。根据盖世太保的规定，黄星必须无遮挡地戴在心脏一边，戴在短上衣、长外衣、工作服上，在任何可能遇见雅利安人的场合都要佩戴。假如在湿闷的三月天里，你将大衣解开，前襟往心脏那边翻过去了，如果你左臂下夹了个文件夹，如果你作为女士捧了个皮手筒暖手，你的黄星就会被遮住，也许不是有意的，也不过几秒钟时间，也许是有意的，以便能有一次穿过街道时没有耻辱标记。但这些对于盖世太保的官员来说永远都是故意遮掩，接踵而来的便是集中营。如果一个盖世太保的官员想要证明自己忠于职守，而你正好撞上了他，那么即便你夹着文件夹的手臂、或者持着皮手筒的手臂一直垂挂到膝盖，即便你的大衣再规矩不过地扣着，结果仍然是：这个犹太男人雷瑟或者这个犹太女人温特斯泰因“遮掩了黄星”，最迟三个月以后，社区就会看到一个符合程序的死亡证明，来自腊汶斯布吕克或者奥斯维辛。证明上精细地、甚至是名目繁多地、个别地出具了死亡原因：“心肌劳损”，“试图逃跑时被击毙”。而真实的死亡原因是被遮掩的黄星。

26

犹太人的战争

电车前端站在我旁边的人严厉地看着我，小声地、但却是以命令的口气对着我的耳朵说：“你在主火车站下车，跟我走。”这种事我第一次遇见，但早已从别的戴星者的讲述中了解到了。事情最后有惊无险，他们认为我平常无碍，也就是想恶作剧一回。尽管如此，这个突发事件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因为我是无法预知结果的，也因为即便有惊无险、即便不过是个玩笑，被盖世太保捉弄也绝非享受。“我要给他找找跳蚤（flöhen）”，我的捕狗者（Hundefänger）对门卫说，“让他面朝着墙站在这儿，直到我叫他。”于是我在楼道里站了大约一刻钟，面朝着墙，路过的人向我抛来一个个辱骂和建议，比如：“吊死算了，犹太狗，还等什么呢？”……“还欠揍吧？”……终于，命令传来：“上来，快……跑步！”我打开门，在靠近书桌的前方站下。友好的招呼语：“你大概还没来过这上面吧？真的没有？你很幸运——你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两步迈到桌子跟前来，双手贴着裤缝，挺直了报告：‘这里是犹

太人保尔•以色列•混蛋畜生，类似这样的。’往回走，出去，大步走，大步走，当心挨揍，如果你的报告不利索！……嗯，不算很利索，不过头一次还算说得过去。开始吧，找跳蚤。识别卡（Kennkarte）拿过来，证件，口袋都掏干净，你们这些人身上总是有些偷来的、掖着藏着的东西……什么？你还是教授？老天，你要教我们这样的人？单凭这种厚颜无耻你就该去特莱西恩施塔特……不！你还远远没到65岁，你应该去波兰。还不到65——却已经面露青色，这么虚弱，这么上气不接下气！上帝，你肯定大吃大喝地太享受了，看上去像个75岁的人！”搜查者情绪很好。“你运气不错，没让我们在你身上找到违禁的物品。但是如果下次你的口袋里变了样，饶不了你；一小截香烟就要你倒霉，即便你有三个雅利安女人也没用……滚吧，快！”

我已经握住了门把，他又把我叫回去：“现在是不是要在家里为犹太人的战争祈祷啦？——别这么瞪着我，也不需要你回答，我知道你会做这个事。这是你们的战争——怎么，你摇头？我们在跟谁打仗？问你呢，张口说话，你不是教授吗。”——“跟英国，法国和俄国，跟……”——“住嘴吧，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是在跟犹太人打仗，这是犹太人的战争。你要是再摇头，我就给你一巴掌，让你马上滚到牙医那儿去。这是犹太人战争，领袖说的，领袖永远正确……滚蛋！”

犹太人的战争！这不是领袖发明的，他也肯定根本不知道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他只是偶然有一回从报纸上或者从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犹太人佛希特万格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犹太人的战争》。第三帝国的语言所有特征突出的词汇和用语应该都是这样：英国不再是岛国（England keine Insel mehr），大众化（Vermassung），荒原化（Versteppung），唯一性（Einmaligkeit），低等人属性（Untermenschentum）等等——一切都是承接下来的，但是一切又都是新的，而且永远属于第三帝国的语言，因为它们都是从个人的、或者专业科学的、或者群组语言运用的偏僻角落，进入了一般性的语言，并被纳粹主义的基本倾向完全毒化了。

犹太人的战争！我对此摇头，并且列举了德国的一个个战争对手。

然而从纳粹主义的视角看，这个称谓是准确的，在更为全面的意义上是准确的，而不是在它的运用上；因为犹太人战争从1933年1月30日的“接手政权”开始，仅仅在1939年9月1日经历了一次“战争升级”（Kriegserweiterung），这个词在第三帝国语言的后期曾经时髦过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我都一直抗拒着这种设想，即我们——正是因为我得说“我们”，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和虚荣的自我欺骗——，即我们竟然如此位于纳粹主义的中心。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这种情形的出现世人有目共睹。

要明白就里，只需翻开“维也纳的学习和磨折岁月”一章；在其奋斗之书的那些篇页里，希特勒叙述了他“向反犹主义者的转变”。无论这里有多少遮掩、修饰加工、设计构造，有一点显然是真的：这个完全没有文化和心灵坚守的人，最初结识政治时，依循的是奥地利反犹主义者吕格和徐讷勒的立场观点，并且是从小街小巷的视角去观察认识他们的。他直接用原始低级的方式表现犹太人——他一生都是说：犹太民族——用加利西亚人挨家挨户贩卖商品的画面；用原始低级的方式谩骂穿着脏兮兮的卡夫坦长衫者的外部形象；用原始低级的方式把所有伤风败俗的东西都加在那个被升格为喻体的形象、即“犹太民族”的身上，借此发泄他在维也纳时期一事无成的恼怒。在每一个被揭开的“文化生活的瘤体”里，他都不可避免地要见到“一个犹太小人……如同腐烂的躯体上的蛆虫”。而犹太人在不同领域里的全部活动对于他来说则意味着瘟疫，“比从前的黑死病更加恶劣”……

“犹太小人”（Jüdlein）和“黑死病”（schwarzer Tod），轻蔑的、嘲弄的表达和恐惧的、惊慌失措的表达：这是两种在希特勒那里不断遇到的风格形式，在他的每一次演说和讲话中都会出现，不管他怎样频繁地谈及犹太人。这种对待犹太属性的孩子般的、幼稚的最初的态度，希特勒从来没有超越过。而这正是他的强大中的一个实质性的部分，因为这种态度将他与最为懵懂的一干群众联系到一起，这个人群在机器时代并非由工业无产者组成，而是部分地来自农业人口，更多地是大量小市

民属性的人簇拥到了一起。对于他们来说，穿着另样的，说话另样的，不是另外的人，而是来自另外的圈栏里的另外的动物，跟它们不可以有和睦，只能憎恨之、噬咬之并赶走之。种族作为科学和伪科学的概念，直到 18 世纪中叶才出现。而作为情感方面的东西，作为一种本能的对异族人的反感，一种从血统出发的对外人的敌意，种族意识属于人类的最低层次，当个别的群落学习不再把邻居群落视为异类的动物群队时，也是这种最低的层次被克服之时。

然而，如果在这种方式下，反犹主义对于希特勒来说意味着一种基本情感，一种缘于这个男人的精神低下性的情感，那么这位领袖就同样具有那种算计的狡猾，而且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程度极高的，这种狡猾似乎与其不计后果的状态不符，却又如此频繁地和它连在一起。他知道，他只能期待那些处于跟他一样低级状态下的人的忠诚；保持这个忠诚的最简单和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对憎恨犹太人的本能加以维护、使之合法化和进行所谓的美化。他在这里撞上了这个民族文化思维的最薄弱之处。犹太人从他们的隔离状态、从他们的特殊圈栏里走出，被接纳为一个一般性的民族，究竟有多长时间了？这一解放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在德国到六十年代才完全实现，而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有一个挤在一起的犹太人群，他们根本不愿意放弃自己特殊的存在方式，不断为那些认为犹太是非欧洲民族、是亚洲种族的人提供了具体的观察及证明材料。是这些犹太人自己，在希特勒进行他最初的政治考量的时刻，把他送上了最适合他的道路上：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升级的时代，在德国人们还很少觉察到它，但是在希特勒的学习和磨折年代的维也纳，人们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它。它在这里形成了——我再次摘引《我的奋斗》——“一个很大的运动，规模不小”。如果把反犹主义建立在种族思想上，那么就不仅给了它一个科学的或者是伪科学的基础，而且也给了它一个原初的民俗的基础，就令它根深蒂固、不可铲除：因为一个人可以更换他的衣服，他的风俗，他的教育和他的信仰，但不可以更换他的血液。

但是，维护这样一种不可消除的、返植于木钝的本能的仇犹情绪，

可以赢得什么呢？

所赢巨大。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并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反犹主义是一般的种族学说的一种特殊运用，而是坚信，他们只是接过了一般的种族教条并加以罗织，以便反犹主义具有持久的、科学的基础。犹太人是希特勒国家最重要的人：他是最民间化的土耳其人头[1]和替罪羊，最民间化的对手，最好理解的统一指称，最稳固的、包含进最五花八门的因素的括号。假如领袖消灭所有犹太人的目的达到了，他肯定得发明出新的犹太人，因为没有犹太魔鬼——“不识犹太人者，不识魔鬼”，这话就写在冲锋者报栏目介绍上——，没有阴暗的犹太人，就决不会有北方日耳曼人的光辉形象。此外，对于领袖来说，发明新的犹太人不会困难，纳粹作者不是已经多次提到，英国人就是圣经中失踪的犹太人族裔的后人吗？

希特勒有如魔鬼附身的狡猾表现在他对党的宣传干部下达的卑劣的、厚颜无耻的公然指令中。无处不在的最高法则叫作：不要让你的听众产生批评意识，一切简单化处理！如果你论及数个对手，有些人会想到，你，作为单个人，也许不占理——所以，把许多人置于同一个指称下，用括弧把他们摞到一块儿，给他们以共性！所有这些都可以由那个犹太人（der Jude）形象地、大众化地完成。这里需要对这个个人化和喻体化的单数加以注意。这不是第三帝国的发明。在民歌中，在历史的叙事谣曲里，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间化的士兵语言中，人们都喜欢用单数的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代替多数。但是通过它在犹太人身上的运用，第三帝国的语言把喻体性单数冠词的使用大大地扩展了，远远地超越了从前的步兵范围。

犹太人——这个词在纳粹的语言使用中比“狂热的”占据的空间还要大，但是，比“犹太人”更经常出现的是形容词“犹太人的”（jüdisch），

---

1 指“刺向土耳其人头”的游乐。18世纪中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玛丽娅·特蕾莎女王为纪念重新占领布拉格而发起的宫廷游戏，后来变成一项民间游乐活动，直至19世纪。

因为那个括号首先要通过这个形容词才能发挥作用，才能把所有的对手联结成一个敌人：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的荒蛮性，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犹太人的－法兰西的、犹太人的－英格兰的、犹太人的－美利坚的毁灭德国的意愿。自1933年起，每一个敌人，不管他来自何方，总是通向同一个敌人，通向希特勒所谓隐蔽的蛆虫，通向犹太人，那个人们在情绪升级的时刻也称为“犹大”（Juda）、在激情高涨的时刻唤为“大犹大”（Alljuda）的犹太人。无论什么举动，从第一时刻起，都是抵抗措施，在一个被强加的战争、“犹太人的”战争里的抵抗措施——“被强加的”（aufgezwungen），自从1939年9月1日以后，该词始终是这场战争的附属词，而9月1日其实也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它只是犹太人的谋杀欲发作的一个继续，针对希特勒德国的谋杀欲，而我们，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纳粹，只是在做我们之前也做了的事情，我们在保卫自己：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还击敌人的炮火”，我们的第一份战争声明这样说道。

这个犹太人的内心深处的谋杀欲求不是来自某些谋虑和利益，甚至不是来自权力欲，而是出自与生俱来的本能，出自犹太种族对于北方－日耳曼民族的“深不见底的仇恨”（abgrundtiefer Hass）。这个“犹太人的深不见底的仇恨”是一个贯穿了这十二年的流行套话。为了对付与生俱来的仇恨，没有什么比消灭仇恨者更加保险的办法了，于是，人们顺理成章地从巩固种族反犹主义走到了根除犹太人的必要性。“剔除”（Ausradieren）英国城市希特勒只说过一次，那是一个个别的表述，像他身上所有的语言最高级事物一样，出自于他的巨人妄想症带来的肆无忌惮。而“根除”（ausrotten）却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动词，归属第三帝国语言的一般性语库，在它的“犹太人”栏目下落户，表示一个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

种族反犹主义是纳粹主义周密思考的、从个别细节入手而进行体系化的中心任务，虽然它最初不过是希特勒内心的一种情感，契合于他的原始主义（Privitivismus）的情感。戈培尔在他的《为柏林而战》一书

里写道："人们可以说犹太人是肉体化了的被排挤的低等复合物。但这并不会更深地触动他，不会比人们指称其真正的本质更深。去叫他小人、混账、骗子、罪犯、谋杀者和杀人犯，他将无动于衷；去犀利地、静静地注视他一阵，然后对他说：您大概是一位犹太人！于是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一刻他是怎样的慌张、狼狈并怀有负罪感……"一个谎言（在这方面谎言与笑话具有共同点）含有的真实成分越大，它的欺骗性也就越大。戈培尔的说法不错，除了谎称的"负罪感"这一点。那个被如此称谓的人并非意识到有罪，而是他先前拥有的安全转变为全然无助，因为确认他的犹太属性就是抽去了他的立足之地，并转瞬间令他丧失了任何解释和抗争的可能性。

在第三帝国语言里跟犹太人有关的那一部分，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将他们完全地、遥不可及地与德意志属性隔离开来为目的。他们一会儿被归总为犹太民族（das Volk der Juden），作为犹太种族（die jüdische Rasse），一会儿又被标志为世界犹太人（die Weltjuden）或者国际犹太属性（das internationale Judentum）；不论是哪种情况，关键都在于他们的非德意志属性上。他们不再允许从事医生和律师职业；但由于他们自己也需要几个医生和律师，而且要从他们的自己人中间产生，因为德国人和他们之间的任何接触都必须停止，于是，那些允许为犹太人服务的医务人员和法律人士就有了特殊的名称，他们叫作"病人处理者"（Krankenbehandler）和"法律咨询者"（Rechtskonsulenten）。两者都体现了这样的意图，不仅仅要进行隔离，而且要令其可鄙。"咨询者"这儿的情况更加清楚一些，因为从前就有"边角咨询者"（Winkelkonsulenten）一说，以区别于学术的和国家认可的法律人士；"病人处理者"听上去低人一等，只是因为这就意味着禁止使用正规的和常规的职业称谓。

讲清一个表述为什么听上去有很鄙夷的味道，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为什么纳粹的命名"犹太人礼拜仪式"（Judengottesdienst）是鄙夷的，难道它表明的不是中性的"犹太人的礼拜仪式"（jüdischer

Gottesdienst）吗？我猜想，这是因为这个表达令人联想到异域味道的游记，某个非洲原住民的膜拜仪式。在这儿我应该是触及到了真实的原因："犹太人礼拜"是为犹太人的上帝作的，犹太人的上帝是氏族之上帝和氏族之神，不是，还不是那一个和普世（allgemeine）的上帝，那个"犹太人的礼拜仪式"尊奉的上帝。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情爱关系叫作种族耻辱（Rassenschande），纽伦堡犹太教堂被法兰克人的头目施特拉燮称为纽伦堡的耻辱，并在一个"庆典的时刻"被他派人捣毁了，他也统称犹太教堂为强盗洞穴——这里不需要研究，为什么它听上去不仅是拉开距离的，而且也是轻慢鄙视的了。对犹太属性不加掩饰的谩骂十分普遍；希特勒和戈培尔在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一次不带上"狡猾"、"刁钻"、"欺诈"、"胆怯"等形容词的，也从来不会缺少民间的、有生理联系的咒骂语言，如"平板脚的"、"歪鼻子的"、"恐水症的"等等。上点档次的则有"寄生虫的"和"游牧民的"。要说一个雅利安人最恶劣的坏话，就叫他"犹太人的奴隶"，如果一个雅利安妇女不愿意跟她的犹太男人离婚，她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妓女"，假如有人要靠近可怕的知识阶层，便会被指为"歪鼻子唯理性主义"（krummnasiger Intellektualismus）。

可以发现这些咒骂语言的使用在十二年的时间里有某种转化、某种进步、某种分层别类吗？有，也没有。第三帝国的语言甚为贫乏，它在1945年1月和1933年1月操弄的是完全同样的粗秽物。但是，在所有这些相同的组成部分以外，仍然有一种明显的变化，而且只要拿一个讲话、一篇报纸文章的全文来看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变化极端明显。

我回想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犹太小人和黑死病，那种鄙夷的口气和那种恐惧的口气。领袖的习惯用语中一个特别经常重复的或者变相表达的是他的威胁：犹太人将丧失其笑声。这个威胁后来变成了另一个同样经常重复的说法，即犹太人真的不再笑了。这话不错，而且通过一个犹太人的戏谑强化了：犹太人是唯一让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许诺的人。然而，领袖自己，整个第三帝国的语言也逐渐丧失了笑声，确切地

说是这个笑扭曲成了痉挛的笑，成了一个面具，面具后面是无法掩饰的死亡的恐惧和最终的绝望。这个可笑的小化词“犹太小人”在战争的后期再也见不到了，而对黑死病的恐惧却仍然能够感觉到，在所有的鄙视的表达和做作的傲慢的表达身后，贯穿于所有的夸口大话里。

这种状况最强烈的表达可以算是戈培尔的那篇“世界不幸的起源”了，文章发表于 1945 年 1 月 21 日的《帝国》。其中称，已经到达布莱斯劳的俄国人和位于西部边界的联军，都不外是“一个寄生虫类种族在全世界结盟的雇佣兵”。其中称，犹太人把数百万人逐入死亡，出于对我们的文化的厌恶，“他们感觉这个文化远远高于他们的游牧性世界图像之上”，出于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机构的厌恶，“因为它们不再给予他们寄生虫式的行为以活动的自由”……“你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撞见犹太人！”但是他们的笑声已经多次“彻底地”丧失了！照这样，“犹太人的权力”现在也要“坍塌”！不管怎样：这里说的是“犹太人的权力”和“犹太人”——而不再说“犹太小人”了。

人们也许会问，如此不停顿地强调犹太人的卑劣和低等，强调犹太人的单一的敌对性，是否会令人麻木，而最后激发出反对的声音。这个问题会立即扩展为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即整个戈培尔宣传机器的价值和影响力是否经久的问题，最后就朝着关于纳粹在大众心理学领域里的基本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去了。希特勒的奋斗书竭尽全力地、细致周密地宣讲着愚化群众、维护群众的这种愚昧以及对他们进行恐吓、不许他们思考的必要性。一个主要方法就在于不断地灌输始终同样的简单平凡的说教，那些不允许从任何方面进行反驳的东西。包括知识分子（总是零星散见的），其心灵有多少部分也是从属于他周围的众人的！

我想起了在战争的最后三个月结识的一名小个子药剂师，她有个立陶宛－东普鲁士人的名字。她通过了难度很大的国家考试，受过良好的普通教育，是一个强烈的反战派，完全不信从纳粹，她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完蛋，并且十分期待这一天。在她上夜班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长谈，她感觉到我们的观点，慢慢地也敢说出她自己的。那是在我们躲避盖世

太保的逃跑途中，我们用的是假名字，法尔肯施泰因的朋友给了我们一个栖身之地和一段安宁的时间，我们就睡在他的药店的后间里，躺在希特勒的画像下面……

“我从来都不喜欢他对待其他民族的傲慢态度”，小施杜基斯说，“我的祖母是立陶宛人——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她和我就不如随便某一个纯粹的德国妇女，就比她们廉价？”——“是的，他们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血统的纯粹性、建立在日耳曼人的优越性之上的，反犹主义……”——“关于犹太人”，她打断我的话说，“他应该是有道理的，那应该是另外一回事。”——“您认识他们本人……”——“不认识，我总是避开他们，我害怕他们。可以听到、读到很多关于他们的东西。”

我在想怎么回答她，试图找到一个既谨慎、又能富有启发的回答。那姑娘在希特勒之役爆发时最多才 13 岁——她会知道什么，可以从哪里讲起呢？……

这时响起了一级警报，常常发生的事。地下室最好不要去，那里放着盛有爆炸性流质的罐子。所以我们蜷缩在楼梯间坚固的顶梁柱下面。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危险，飞机的目标一般是普劳恩，那个地方重要得多。但是今天却出现了凶险的、漫长得简直残酷的一分钟。在非常短暂的间隙里，庞大的机群从我们头顶飞过，如此密集和贴近地面，令我们四周颤抖着、晃动着、轰鸣着。炸弹每一刻都可能铺天盖地地砸下来。我眼前出现了德累斯顿之夜的情形，一直不停地想着那个句子：死神的翅膀辇辇作响，这不是空洞的修辞，死神的翅膀真的在轰响。那年轻的女孩子紧紧地贴在柱子上，完全缩在一起，大声地、沉重地喘着气，那是几乎无法压抑的呻吟。

终于，它们过去了，我们可以直起身子，走出黑暗的、冰冷的楼道，走进药店的亮堂和温暖里，好像返回到了生命之中。“我们现在可以睡了”，我说，“根据经验，到明天早晨不会有警报了。”突然间，而且十分有力的，好像她正在终结一场漫长的辩论，这位平时十分平和的小姐回答道：“这就是犹太人的战争。”

27

犹太人眼镜

我妻子习惯从城里带回部队的战报，我自己是从来不在布告或者喇叭跟前站下来的，在工厂我们犹太人只能看前一天的报道，因为如果询问雅利安人最新的电报内容，就是进行政治谈话，就能直接把你送到集中营去。

“斯大林格勒终于拿下来了吗？”——“是的！经过英勇的搏斗，一套带浴室的三房公寓被占领了，而且尽管遭到了七次不断的反攻仍然坚持着。”——“你干吗要嘲弄？”——“因为他们绝对拿不下来，因为他们会因此耗尽最后一滴血。”——“你完全是透过犹太人眼镜看事情。”——“现在连你都使用起这种犹太人的特殊语言了！”

我感到惭愧。作为语言研究者，我始终力图观察每一个情境下、每一个圈子里语言使用的特殊情况，而自己说话要完全不带色彩地保持中性，但我现在还是被环境染上色彩了。（人们用这种方式糟蹋听觉，糟蹋这个接收录记的能力。）但我是可以得到原谅的。一群人被挤压进同

样的处境里，特别是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挤压、是敌人的挤压时，没有从中产生出语言的特殊现象是完全不可能的；个人无法脱离它的影响。我们来自极其不同的省份、阶层、职业，没有人还那么柔韧年轻，一些人已经做了祖父。就像三十年前我脑子里转着的是关于一个拉布吕耶尔宾馆的想法——我当时在那不勒斯大学有个教职，我们是一个海滨宾馆的常住客人，因为那个宾馆，旅游者不断地蜂拥而来——，而如今我则有更多的理由去想犹太人“性格”的一种后果。那是两名医生，一名州法院的顾问，三名律师，一位画家，一位高级中学老师，十多个商人，十多个工厂主，一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以及——在犹太人中间极少见的！——一个什么也没有学过的工人，几乎是一个文盲；其中有人主张融入其他民族，也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奉者，有祖先在德国生活了几百年的、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褪去德国皮的人，而另一些人则刚从波兰移民过来，是俚语土话，不是什么德语，构成他们远远没有放下的母语。我们现在是德累斯顿的黄星佩戴者，是一群工厂工人和马路清扫工，是犹太人所的居住者，盖世太保的拘役者；如同在监狱和军队里，马上就有一个共性的东西遮掩住了以往的各种共性和个性，并自然而然地制造出新的语言习惯。

那一天遮遮掩掩地传来了第一个关于墨索里尼倒台的消息，晚上，瓦尔特曼敲史迪勒的门。（我们与史迪勒夫妇和柯恩夫妇共用一个厨房、门廊和浴室——几乎没有秘密可言。）瓦尔特曼此前是一个富有的皮货商人，现在是犹太人居所的门卫，在从犹太人居所及监狱往外运送尸体时也要帮忙。“请问可以进来吗？”他叫道。“你从什么时候起客气起来了？”屋里传出回答。瓦尔特曼立即回应道：“快要到头了，我得重新习惯和客户交往的语气了，现在就从您这儿开始。”他说得非常严肃，肯定没有说笑的意思；内心的希望驱使他回到从前他那个语言社会阶层去。“你又把那个犹太人眼镜架到鼻子上了”，史迪勒站在门口说（他是一个比较压抑的、常常感到失望的人），“你会看到的，罗姆他过来了、斯大林格勒他过来了——墨索里尼也不会让他倒台。”

“你”和“您”的称谓在我们这里奇怪地混乱。一部分人，尤其是看来参加过一次大战的，都使用“你”，就像他们当年在部队里那样；其他人则坚持用“您”，仿佛他们想要据此维持他们过去的状态。我自己在这些年里，极其清楚地感觉到“你”的双重效用；如果一个雅利安工人自然而然地跟我称“你”——他完全不用特别说什么安慰的话——，我就感觉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是一个认可，我们之间作为人是同等的；如果这个称呼来自盖世太保，他们原则上都是跟我们“你”称的，这个“你”总是打在我脸上的一记耳光。工人的“你”令我高兴，又不仅仅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对黄星隔离的一种抗议；而且如果是在工厂里使用这种称呼，我也总是视之为一种标志，因为不管盖世太保如何规定要求，在工厂，完全将犹太工人隔离开来实际难以彻底实现，于是那里的“你”表明对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疑虑消失了，或者起码是缩小了。

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说话方式决不仅仅具有美学的意义。我坚信，有文化的人和无产者之间不幸的疑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许多不同的语言习惯。在这些年里，我多次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做呢？工人喜欢在每一个句子里使用那种粗俗低级的表达。如果我做同样的事，他就会发现我不是出自于内心，认为我是一个拍马屁的人，想要讨好他；但是如果我随性自然地、或者是如幼儿园和学校里塑造出的那样说话，那他又会认为我高傲，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但是我们说话的这种群组性改变决不仅在于我们部分地附和了比较粗俗的工人语言。我们还接受了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习惯联系在一起的表达。比如当有人没来上班时，人们不会问，他是否生病了，而是问，他“有没有病假条”，因为生病的权利只能从医生的记录里获得。在被问及收入情况的时候，人们此前习惯的回答是：我每月挣多少多少，或者我一年的收入是这个和这个。现在每个人都说：我每周拿三十马克回家；讲到某个收入较好的人时就说：他有一个较鼓的工资袋。如果我们说到某个人，他做很重工作，那么这个“重”总是并且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这个人拖着很沉的包装箱或者推着很重的手推车……

除了这些取自于工人平常语言中的表达，另外还有一些词语也常用，它们部分出自黑色幽默，部分出于我们的处境下必要的捉迷藏游戏。不是每一次都可以确定地加以说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地区性的，在多大程度上，为了作语文学的定义，具有一般性日耳曼学的意义。人们不是“被抓捕了”（gefangen），而是“出游了”（verreist），特别是在一开始，当拘役和营地还不一定就意味着死亡的时候；人们不是在“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也还不在简写的和一般通用的集中营(KZ)，而是在“音乐会营地”（Konzertlager）。动词“报告”（melden）得到了一个可怕的专门意思。他必须报告，意思是：盖世太保传唤他，而这样的一个报告肯定是与虐待联系着，并且越来越经常地与有去无回连在一起。除了遮掩黄星的指责，还有一个常用的传唤借口是指控你传播恶毒讯息。从这里衍生出了一个简单的动词，“恶心人”（greueln）。假如有人收听了外国电台的新闻（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那么在我们这儿这些新闻便都是来自于“科茨臣布罗达”（Kötzschenbroda）。“科茨臣布罗达”在我们的语言里就是伦敦，莫斯科，拜罗明斯特和自由电台。假如哪一条消息受到怀疑，那它就是出自于“口台”（Mundfunk）或者“IMA”，后者意为“犹太童话通讯社”（Jüdische Märchenagentur）。如果讲起那个盖世太保胖官员，他管理着德累斯顿区内的犹太事务——不，是“利益”（Belange），这也是变肮脏了的词汇之一——那他整个儿就是叫“犹太人的教皇”（Judenpapst）。

渐渐地，在与工人德语同化、从情境中产生新的表达之外，还出现了第三个语言特征。犹太人的数目越来越少了，年轻人或是单个的或是成群地消失到波兰和立陶宛去了，年老的去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只需要很少的房子就足以把剩余的留在德累斯顿的犹太人集中到一起了。这也在犹太人的语言中得到了表达。单个的犹太人的地址已经没有必要书写完整，只要标明不同的城市部位的几座房屋、它们的街道号码就行了：他住在92号街，在56号。然后溶化在一起的犹太人残余再一次急剧萎缩，甚于，远甚于急剧萎缩：绝大多数人必须离开犹太人居所，人们把他们

挤进海勒贝尔格犹太人营地的简易房里，几周以后再从那里去真正的消灭营地。现在留下的，只是生活在跨族婚姻里的、也就是特别多地德意志化的犹太人，他们大部分根本不再隶属于犹太人教区，此外还有不同政见者或者——一个后来不再被批准的、消失了的名称——“非雅利安人基督徒”（nichtarische Christen）。很容易理解，在他们中间，对于犹太习俗和宗教仪式的了解已经所剩无几，甚至不复存在了，更不用说关于希伯来语言的知识了。于是，带着经讽刺笑话平缓了的某种伤感他们转向对年轻时代的回忆，尝试让被遗忘的东西相互唤醒。而这正是他们的语言不大容易确定的、但明显存在的第三个性格特征。这与虔诚或者是复国主义毫无关系，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逃离，是一种休养。

早餐休息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一个人讲述了他怎样在 1889 年进入拉缇博市的李普曼森粮食加工厂当学徒，讲他的老板说着一种如何少有的德语。那些奇怪的表达——一些听众笑起来，他们回忆起往事；另一些人则要求解释这解释那。“我在克罗托沁读书的时候，”瓦勒施泰因说。但他没能往下说，格伦堡姆，协会的主席，打断了他：“克罗托沁——你们知道克罗托沁混子的故事吗？”格伦堡姆最会讲犹太人的笑话和逸闻趣事，他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是个无价之宝，他使日子变短，帮助人们忘掉最糟糕的忧郁症。这个故事讲一个移民因为太不熟悉德语文字，在 K 没做成犹太教堂的差役，后来在柏林却高升至商业顾问。这个故事成了格伦堡姆的绝唱，因为第二天早上他没来，几小时之后人们得知，他们把他“带走”了。

从语文学的角度看，“带走”（holen）与“报告”十分相近，但是它使用的时间更长、范围也更广。反身动词“报告”（sich melden）的第三帝国的语言－词义只在盖世太保和犹太人之间有其秘密之用；“带走”却是用在犹太人和基督徒身上的，那些雅利安人甚至是特别大量地在 1939 年夏天被军事部门带走。因为“带走”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有专门的意思：不引人注目地弄走，不管是送到监狱里还是送到兵营里，而由于我们在 1939 年 9 月 1 日要成为无辜被袭击的对象，那么之前整

个的军事准备都是一个秘密的、夜间的带走行动。而在第三帝国语言的内部，“带走”和反身的“报告”之间的亲缘关系则在于，两个后果严重和残酷的行为过程，隐藏在毫无色彩的、日常的说法之下，同时，另一方面，这些事件如此令人麻木地日常化了，以至于人们不是强调它们的阴暗沉重，而是将其视为日常的和普遍的情形。

格伦堡姆被带走了，三个月后奥斯维辛寄来了他的骨灰盒，它被下葬在犹太人墓地。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大规模毒气屠杀普遍化时，礼貌地寄回骨灰盒的事情当然停止了，但在很长时间里，参加葬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礼拜天的义务，也几乎有点儿成了我们礼拜天的消遣。经常有两三个骨灰盒寄到；人们在对死者表示敬意的时候，有机会与其他犹太人居所的和其他工厂的命运伙伴聚到一起。早已经没有神职人员了，但是有约定好的墓地管理者，一个黄星犹太人，朗读一篇堆积了通常的祷告套话的悼词，做得当然好像这个人完全是正常自然死亡的样子；接着是一个希伯来语的死亡祈祷，在场的人也尽力参加进来。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如果问一个懂希伯来语的人祈祷的内容，他会回答：“大意应该是这样的……”——“您能不能逐字逐句地翻译？”我打断他。——“不行，只有这个声调还留在我记忆里，时间太久了，我还是多少年以前学的，我已经和这一切完全没有联系了……”

轮到格伦堡姆时，来了很多人。在我们跟着把骨灰盒从大厅送往墓地的时候，走在我旁边的人小声对我说：“那个商业顾问在克罗托沁没得到的职位叫什么来着——沙么斯，对吧？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怜的格伦堡姆的这个故事！”然后他一边走路，一边顺着步子的节拍默念着：“克罗托沁的、沙么斯，克罗托沁的、沙么斯。”

纳粹的种族学说塑造了“促进北方化”（Aufnorden）这个概念。它是否成功地促进了北方化不归我来判断。但它肯定促成了一种“犹太化”（Aufjudung）——而且是在那些抗拒这一点的人那里。人们完全没有能力摘掉犹太人眼镜，每一件事，每一个报告，每一本书，人们都通过这副眼镜去看。

只是这副眼镜并不一直是同样的。刚开始，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它的玻璃片还用玫瑰色的希望装饰被观察的事物。“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糟糕！”每当军队报告里的胜利讯息和俘虏数目让我感到形势严峻无望时，我听到过多少这样的安慰话语！但是后来，当纳粹真的陷入困境的时候，当他们再也无法遮掩他们的失败的时候，当联军逼近和越过德国边界的时候，当一个又一个城市被敌人的炸弹毁灭的时候——只有德累斯顿似乎是禁区，正是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更换了他们的眼镜。墨索里尼的倒台成了他们用老镜片观察事物的最后一个事件。而当战争却仍然在继续时，他们的信心坍塌了，完全回复到对立面。他们不再相信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他们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相信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感更甚于领袖已经变得动摇了的信徒们。

那是在德累斯顿的灾难之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坐在犹太人居所的地下室里，这里也有一间特别的雅利安人室。我们坐在那里等待防空警报过去，与其说感到恐惧，不如说有一种无聊和冷嗖嗖的感觉。和以往的经验一样，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袭击肯定又是冲着在劫难逃的柏林去的。我们压抑了很久了，此时已不再那么沮丧；下午我妻子在可靠的雅利安朋友那里收听了伦敦的广播，此外，更重要的是她得知了托马斯·曼最近的讲话，一篇胜利在握的、一篇美好人性的讲话。一般来说，布道词给予不了我们什么东西，它们令人心情不佳——但是这一篇讲话的确是令人鼓舞的。

我想用我的好心情感染一下我受难的同伴。我走近这一组，又靠近那一组人：“您们听了今天的新闻吗？知道曼最近的讲话吗？”我到处遭到冷遇。一些人害怕卷进被禁止的谈话：“您留着自己受用吧，我不想进集中营。”另一些人则已经由怨愤到放弃了：“即便俄国人到了柏林跟前”，施泰因尼茨说，“战争还会持续数年，其他的一切都是神经质的乐观主义！”

这么多年里，我们这儿的人被分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像是分成两个种族那样。对于他是怎样一个人的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

到这样的回答：他是乐观主义者，或者他是悲观主义者，这在犹太人嘴里与后文当然是同样的意思：希特勒很快就会倒台，和：希特勒站稳了。现在只有悲观主义者了。施泰因尼茨太太还要胜过她先生一筹："如果他们拿下了柏林——那也无济于事。那时战争会在上巴伐利亚继续进行。最少还有三年。对我们来说，再有三年还是六年没什么区别。我们反正撑不过去了。您终于该打碎您过时的犹太人眼镜了！"

三个月后希特勒成了一具死尸，战争结束了。但是，当然，施泰因尼茨夫妇没有看到这一天，还有另外一些当年与我们一起坐在犹太人地下室的人也没有看到。他们被埋在了这个城市的废墟下。

28

胜利者的语言

每一天都有一巴掌重新打在我脸上，比盖世太保的称谓“你”和咒骂的语言还要糟糕，我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抗议或进行教训，从来没有对此麻木不觉，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我所有的拉布吕耶尔－类型中躲开这种辱没。

你实际是经过思维训练的，是一个本分的全身心投入的日耳曼学者，可怜的艾尔莎·格劳博，一位你的教授真正的助教和助手，是他讲座学生的咨询指导者；结婚生子后，你仍然继续做语文学者、语言净化者和教师——几乎太尽职了，恶毒之人在你的背后称你为“枢密顾问先生！”

你曾给予了我多少帮助啊，用你美好的、以如此滑稽的方式保护下来的经典图书馆！犹太人——在人们还对他们开放图书的情况下——只允许拥有犹太书籍，可是枢密顾问女士依恋她的德国经典作家，那些由最漂亮的版本积累起来的的图书。十多年来，她脱离了大学学府，做了一位非常有教养的生意人的太太；盖世太保把一个折磨人的职位加给了

这位生意人，犹太人社区的区长，使他成了一个承担责任的、无助的、在刽子手和他们的牺牲品之间两头受罪的中间人。此刻，艾尔莎的孩子已经开始在她的指导下阅读这些珍贵的图书了。在不断搜查的盖世太保面前，她是怎样把这些宝物拯救下来的？十分简单而且很有道德！以认认真真的诚实态度。如果这本书的编者叫理查德·M. 麦耶，艾尔莎·格劳博就挑出 M. 这个面纱，用摩西的名字顶替这个缩写；或者她指出日耳曼学者尼欧佛的犹太属性，或者指教那些搜查者，告诉他们，著名的龚道尔夫（Friedrich Gundolf）的真姓名为犹太姓龚德芬格。日耳曼学者中有那么多的非雅利安人，所以在这些编者的保护下，歌德·席勒的著作和许多其他作品都变身为“犹太人的书籍”了。

艾尔莎图书馆的条理和规模都得以保存下来，因为区长宽敞的别墅被宣布作了犹太人居所，于是这个家庭虽然限制在较少的几间住房里，但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四壁之内。我可以大量地借阅使用这些犹太经典作家，还可以尽情地和艾尔莎进行令人欣慰的、严肃的专业领域的交谈。

我们当然也谈论我们绝望的处境。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艾尔莎是一个更好的犹太人呢，还是一个更好的德国爱国者。两种思维和感觉方式在局势的压力下都强化了。即便是在冷静的日常谈话中，也很容易出现激情的表达。艾尔莎经常谈到，她非常注意让她的孩子在真正的犹太信仰中成长，注意让他们同时也吸纳着对德国——她从来都是说“对永恒的德国”——的信仰，即便面对着当前的一切侮辱。“他们必须学习像我一样思维，他们必须像读《圣经》一样读歌德，他们必须是狂热的德国人！”

那就是它，打到脸上的一巴掌。“他们必须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艾尔莎太太？”——“狂热的德国人，就像我，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只有狂热的德意志属性能够把我们的祖国清洗洁净，洗掉现在的非德意志性。”——“您难道一点不知道，您在那里说什么吗？您不知道，狂热和德语，我是指您说的德语，合在一起就像拳头和眼睛，导致，导

致……”我带着一腔怒火，用所有我在这本书“狂热的”章节里记录的东西，当然是缺东少西的、未经整理的、然而却是更加震撼的东西，阻截她。最后我对她说：“难道您不知道，您说着我们死敌的语言，并以此认输，以此交付出自己，以此背叛的正是您的德意志属性吗？如果您不知道这一点，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您，为了永恒的、无瑕的德意志属性而努力的人——那还有谁能去感觉并避免之呢？我们在我们困窘的、隔绝的状态下构造着一种特殊的语言，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行政机构针对我们的、来自纳粹词典中的表达，可以感觉到这种特定语言在这里或那里膨胀延伸，感觉到有一种与这个j、与希伯来语特征戏耍调情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很自然。但您这是匍匐在胜利者的语言之下，这么个胜利者！”……

艾尔莎被我的爆发整个弄蒙了，完全失去了她的枢密顾问的尊贵，她承认错误，许诺改正。当她下一次，在讲到伊菲革涅亚时，又强调她的“狂热的爱”时，便马上以抚慰和解的口气纠正道：“对了，我不可以这样说；我只是从翻新（Umbruch）以来习惯这么说了。”

“从翻新以来？”——“这您也唾弃吗？那您肯定没有道理。一个如此美好的诗意的词，它带着新翻垦的耕地散发的味道，它肯定不是希特勒那帮人找到的，它肯定出自于盖奥尔格一带某个地方。”——“肯定的，但是纳粹接过了它，因为它与血和土，与对耕地和根基性的推崇配合得如此之好，他们用染上了病毒的手污染了它，以致今后五十年都不会再有正派的人……”

她打断了我，转而反击，说我是一个语言洁癖者，一个好为人师者，一个固执己见者，一个——“您不要太生气——一个走火入魔者”。

可怜的艾尔莎·格劳博——关于她和她的家庭，人们再也无法得知任何讯息；“他们被人从特莱西恩施塔特带走了”，这是有关她的最后的消息。我现在之所以要以她未加遮掩的名字纪念她，是因为她虽然有唯美偏向和枢密顾问的姿态，却仍然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我有些东西要归功于她勇敢的精神品质，于是这个悼词变为控告。

但是这个针对这一位、这个语文学者的控告，在某种程度上解脱了所有其他那些因为缺少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也犯下同样罪责的人。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被这个罪孽俘获，每一个个别的人都留在我记忆中的罪责账本上，都带着一个另样的、独特的词汇。

有一位年轻的K.，一个完全不文学的商人，但是完全沉湎于他的德意志属性里，在摇篮里就受洗，当然的新教徒，与犹太教毫无关系，对复国主义的追求没有丝毫的理解力，更不用说表示善意的支持了——但是“犹太民族”（das Volk der Juden）这个表达他却接受并不断使用着，跟希特勒主义使用的完全一样，仿佛如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就像有一个德意志和法兰西等民族一样，仿佛“世界犹太人”（Weltjudenschaft）——这一很成问题的纳粹合成词他也跟着学舌——在有意识地、有意愿地结成这个民族群体。

有一位在俄国出生的、脸部线条像蒙古人的S.，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是K.的一个对立面，他是德国的、所有德国人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他属于犹太复国主义最极端的派别——每当他在争取这个犹太民族主义的权利时，就会宣称他的“民族利益”（völkische Belangen）。

牙医，不，牙齿处理者F.，则是一个面对其束手就擒的病人时极爱说话的人——因为，在嘴巴被撬开的情况下，人们能怎么回话呢？和S.一样，他也是无一例外的所有德国人和所有德意志事物的死敌，但是与复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与犹太属性更是无缘，而是彻头彻尾地为一种对英国的痴情所支配，因为他曾经在英国有过一段幸福的私人生活。每一个器械，每一件衣物，每一本书，每一个观点都必须出自英国，否则就没有好东西，而如果它们来自德国，包括来自德国以往的时代，则是绝对要摒弃的。因为德国人“品性上低劣”（charakterlich minderwertig）。而他不知道，他用“品性上”这个他最喜欢的词帮助了纳粹的一个新词义继续传播（跟现在新时代的追随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样）。对于纳粹教育学来说，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思想，取决

于他们的学生拥有未经歪曲的纳粹主义，所以，思想在所有的、每一个方面都放在决定性的第一位，比任何一种能力培养和实际运用能力、所有的知识都更受重视。从学校的语言里，从考评证书和毕业证书的要求里，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新形容词流行的原因；评语“品性上良好”，这就意味着：无可指摘的纳粹思想，仅此一条就打开了通往任何职场生涯的大门。

我们的牙齿处理者最为强烈的和用最多的话语表达出的反感，是针对我们的病人处理者的。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段伟大的生涯，他作为指挥部医生经历了那场战争。他使用的完完全全是 1914 年时的军官语言，并毫无感觉地用戈培尔传播开来的每一个词语丰富了它。他曾经越过了多少“狭关隘口”（Engpässe），“战胜了多少危机”（Krisen gemeistert）！

我们犹太医生的一位同事使用第三帝国的语言则完全出于另外的动机，并且采用全然不同的方式。P. 博士在 1933 年以前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和大夫，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宗教和种族的问题上，他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迷误或者是一种病态，很快就会过去的，不至于带来灾难。现在他被完全扔出了他的职业，被迫从事工厂劳动，做一个小组的头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属于他这个小组。他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表达他的怨愤。他学来了纳粹所有的敌视犹太人的表达，特别是希特勒的，然后就总是游荡在这些表达方式之间，以至于他自己似乎都已经无法判断是在嘲讽领袖还是在嘲讽自己了，也说不清这种自我贬损的说话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自然天性。

于是，他养成了个习惯，在称呼任何他的犹太人小组成员时，从来不会忘记在对方的名字前面加上犹太人这个标志。“犹太人卢汶施泰因，你今天要去操作小裁剪机。”“犹太人玛恩，这是你的医疗证，给那个牙犹（Zähnejuden）的”（他这是指我们的牙医）。对于这个腔调，这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抱着取笑的态度，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他们中间有些人允许乘坐有轨电车，另一些人则得走路上班，因此也就分出了乘车

犹太人和步行犹太人。工厂里的洗浴条件很不怎么样，一些人使用它，另一些人宁愿回家清理自己，于是又有了沐浴犹太人和脏鬼犹太人的区别。这对于后来调到这个小组的人来说可能显得不大入耳，但是他们也不会把这事看得很重，不至于为此发生争吵。

在吃饭休息的时候，只要大家谈到任何一个关于我们处境的问题，我们组长就会引用流行的希特勒语录，带着那种十分自然的态度，令人不得不以为那是他自己的话。比如玛恩叙说道，昨晚检查时，在 42 号发生了一点事，有惊无险。警察和盖世太保之间发生公开的对立，年纪较大的警察大多数都是老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必须在夏天九点钟、在冬天八点到家；监管这件事是警察的任务。）P. 博士立即宣布说：“马克思主义力图把世界有计划地引导到犹太属性的手里。”另一次讲到股票公司，博士用坚信的口气说：“犹太人用股票这个迂回的方式挤进国家生产的循环中，把这个生产变成肮脏交易的对象。”当我后来有机会透彻地研究奋斗书时，许多长句子都让我感到特别面熟；它们与我们组长的那些言论完全一致——为了我的语言笔记，我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他把领袖的长句子都背熟了。

组长的这些怪癖，我说“怪癖”是为了避免称之为“走火入魔”，我们就这么听着，有时候觉得好玩儿，有时候感觉沮丧。我自己感到它们有一种象征意义，表现了犹太人完全的屈从性。然后，布考夫策来到了我们这里，这下子和平结束了。布考夫策是一个内心煎熬、暴脾气的老家伙，他懊恼他过去的德意志属性、自由主义和欧洲主义，只要听到犹太人方面有人表露对犹太属性反感的话，即便只是犹疑的态度，他都会情绪激动，表现激烈。我们组长的这些言论每次都令他的太阳穴和整个秃脑袋青筋直暴，不断地大叫：“我不允许对我进行诋毁，我不容忍对我们的宗教进行诋毁！”他的怒火又刺激博士继续引述下去，我有时候真怕布考夫策罹患中风。但是他只是不断地叫喊、呼喘着希特勒最爱说的、用以显摆的外来词：“我不允许对我进行诋毁（diffamieren）！”直到 2 月 13 日，这两个隶属第三帝国语言的敌对现象才告结束：他们

被埋葬在石波仁巷犹太人居所的废墟之下……

这种隶属性如果只在日常的说话里出现，那不管怎么说毕竟还能理解；这个时候人们比较不注意自己，受制约于总在眼前出现的、总在耳边听见的东西。但是犹太人的印刷语言是怎样的呢？这个经过三番五次的检查并承担全责的语言？作者在写下他们的词语时是要放到天平上称量的，然后在修改的时候还要对之再三斟酌。

刚开始，当时还有几个犹太人的杂志出版，我有一次读到一篇墓前讲话，题目叫："纪念我们的领导莱文施泰因"。这里的领导指的是一个社区的区长。文字糟糕得令人难堪，我对自己说——毕竟对于一个演说者，而且是墓前讲话的演说者，人们很可能允许和缓的气氛，即便他急于抓住当下的东西。

后来，在四十年代，早已经没有犹太杂志和公开的犹太人的布道。但却可以在犹太人居所里找到专门的犹太现代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开始出现了德国人和德国犹太人生活互相分离的情况，犹太复国主义在帝国立足。当时出现了许多彰显的犹太出版社书店和书社，它们仅出版犹太历史和哲学著作，也包括犹太作家关于犹太的、德国－犹太主题的畅销书。所有这些经常以订购和系列连续预订的方式进行销售——我相信，未来会有关注这一段文化史和社会学情况的文学史家，研究这种出版和销售方式的——，这些非雅利安人的出版物在我们这里还有十分可观的遗存物。特别是我的朋友施戴尼茨，他拥有大量的这类东西；这类系列凡是他知道的，他都订购了，他把这看作是一种教养和信仰的义务。我在他那儿找到了布博（Martin Buber）的作品，隔离区小说，普林茨（Joachim Prinz）的《犹太史》，杜普诺（Simnon Dubnow）的《犹太史》等等。

我在这儿见到的第一本书是犹太图书联合会出的一部：阿图尔·艾略塞（Arthur Eloesser）的《从隔离区到欧洲：19 世纪精神生活中的犹太文化》，柏林，1936。虽然从来没有结识过阿图尔·艾略塞，我却是实实在在地随着他长大的。当我的文学兴趣在九十年代开始萌动的时候，

他是《沃斯报》的戏剧评论家，而这样一个职位在我当时看来是最高的和最值得羡慕的。如果要我今天对艾略塞的成就做一个总体评价，我会说，它与当年的《沃思阿姨》的风格非常合拍(还不是乌尔施泰因的风格)；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而是稳重的，不是革命的，而是老实的自由主义的作为。此外，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些评论家们全无民族主义的狭隘，总是具有那种欧洲眼光——根据我的记忆，艾略塞写了一部很棒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戏剧的——所以他们一直都最自然不过地被视为德国人；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来源于某个非德意志的什么。而现在，多么大的变化！从第一行字一直到最后一行，充满了失败者的、被排除出局者的悲凉无望。这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因为卷首语，引自于作家的一位美国亲戚，题为：*We are not wanted anywhere*，德语就是：犹太人处处不受欢迎！（在最初的希特勒年代，人们会在饭馆的门板上看到一层叠一层的牌子："犹太人不受欢迎"和"犹太人禁止入内"，后来这种禁忌不言自明，也就不需要牌子了。）这本书的最后写到了贝尔托尔特•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的葬礼，一位于 1882 年年初辞世的虔诚的犹太人和热忱的德国爱国者。他将生生地从坟墓里起身复活，F.泰奥铎•费舍(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在纪念他的讲话中这样说，而艾略塞却总结性地补充道："但是，诗人与其朋友的时代，以自由主义为世界观的时代，据此而怀抱希望的德国犹太人的时代，已经在同一块乡土下面被埋葬了。"

这位自由主义的、完全融入德国社会的文学人，以这种并非不抵抗的放弃，承受他的出局，这种态度也并非被逼无奈的、半推半就的向复国主义的转向，这是艾略塞的书最强烈地令我惊奇和震动的地方。这种绝望和对一种新的支撑的寻求太令人理解了。但是那巴掌打在脸上，不停地重复的巴掌！在这本典雅的书里，胜利者的语言被以一种顺从的姿态接收过来，它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第三帝国的语言所有富有特征的形式。那种单数形式的简单的堆积：怀抱希望的德国犹太人（der hoffende deutsche Jude），对人的简单分割：德意志的人（der deutsche Mensch）

一次次出现……人们在柏林从尼考莱的（Friedrich Nicolai）启蒙转向批判哲学，这就意味着“一个剧烈的变革”（einen starken Umbruch）……犹太人相信自己在文化方面和德国人“同一化了”（gleichgeschaltet）……米歇尔·比尔（Michael Beer）的《帕里亚》是一个“伪装的”（getarntes）剧作，海涅的“阿尔曼索”是一个“伪装的”犹太人……沃尔夫冈·门策尔（Wolfgang Menzel）追求一种德国精神生活的全面的“独立性”（Autarkie）……博尔纳（Ludwig Börne）经受住了“战斗的”（kämpferische）男人的岁月，没有什么旋律、没有什么神秘的“血统的召唤”（Anruf des Blutes）会令他迷乱，像海涅和迪斯莱利听到它时那样……对社会关系的罪责的确信“造就了”（ausgerichtet）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道路……当然也有“行动的法则”（das Gesetz des Handelns），这个应是出自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被纳粹滥用至极的表达。还有“炫/扩展”（aufziehen）和“人民式的”（volkhaft）和“半犹太人”（Halbjude）和“混血儿”（Mischling）和“前部队”（Vortrupp）*e tutti quanti*[1]……

紧挨着艾略塞的书的，是一本“短篇故事中的长篇小说”，鲁道夫·弗兰克（Rudolf Frank）的《祖先和孙子》，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系列，是同一年出版的。“这里，第三帝国的语言滑入了内部”，我的日记本里这样记着；即便现在我要把这些记载整理出版，我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达。诚然纳粹词汇也因为“宗族”、“随从”、“炫/扩展”等等而容易辨认，而且，由于这位作家着意地模仿歌德的叙事风格，这些词汇显得更加怪异。但是，他还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陷入了第三帝国的语言，比起形式上的沉沦更甚。他讲述1935年的德国流亡者（而且也是以一种文学上基本不合格的方式），他们在缅甸落脚，用他们对祖祖辈辈家乡生活的回忆喂养和平复他们的乡愁……直接提到德国现状的只有一个很短的句子；作家用它回答，为什么他的人物从所热爱的莱茵河地区跑到异域风情的地方去：“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

1 法语：及其余一切，所有的，没有例外。

其他的一切，只要是涉及德国的，都是历史小说的铺陈，这些故事每一次都讲述既不遗余力地忠于传统，又热情洋溢的德意志化，也就是德意志属性化的犹太人。于是，人们应该会认为，这些出走者内心怀着一种曾经经历的对德国的热爱，他们在谈话和思考中必然会表露出对他们的驱赶者应有的仇恨。但是没有，正好相反！他们视此为悲剧的命运，因为他们在心里同时怀有对经典德语和经典希伯来语的热爱。他们被驱赶出德国乐园，几乎并不能怪罪于纳粹，因为在本质的问题上，他们和纳粹的感觉和判断完全一致。

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混血联姻？“不，不！上帝分开的东西，人是不可以联结到一起的！”——我们唱着“杜塞尔多夫诗人的故乡之歌”，那充满渴望的“我不知道，这应该意味着什么？”他救助自己！“我们是游牧人，依旧是游牧人。违背意愿的游牧人。”我们也无法从我们自身建造出房屋：我们走到哪里，即去适应别人的风格（纳粹方面称此为寄生虫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将要建一座寺塔式的犹太教堂，我们的游牧营地将叫作“茅屋之乡”。——“把你的手献给手艺！”在最初的纳粹年代，第三帝国语言的一个标语条幅上这样写道，而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不断地指斥犹太人为商贩和知识畜生。弗兰克的书推崇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个四代相传的手工艺家庭，这个家庭于是成为道德楷模，并明确地教导人们回到“自然和手工艺”，谴责即便到了缅甸也想着拍电影的电影导演（“你看吧，我给他们炫出一个怎样的作品！”），把他作为一个反叛者和堕落者。——在那些历史小说里，有一个被指为在井里放毒的犹太人，为了把自己洗刷干净，他从周围所有的水系里，从十四个溪流里饮水，“河流与源泉的水进入到他的身体里。水流过他的经脉，身体，进入他的质地和感受。”当他确证无罪并得到了一座莱茵地区的房子生活时，他发誓，绝不离开它，“并且深深地朝着他曾经喝过其汁液的土地鞠躬。”还有人能够对这个血缘土地说（Blubodoktrin）进行更加诗意的肯定吗？——最后他叙述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十分年轻的女儿，两位女士准备送给她们新的家乡一个孩子，于是，在一种作家没有

感觉到的、令人难堪的滑稽的庆典氛围里："两位母亲……姊妹般地迈步前去……她们将一个新生代带往她们富饶的乡土"—— 这些，人们难道没有又一次感觉到，与第三帝国的训导教条和妇女评价如出一辙吗？

我强制自己把这本书看完。文学史家没有权利因为反感一个作品而将其扔掉。这里唯一合我口味的人物是罪孽的弗莱德·布赫斯堡姆，他在缅甸和在家乡同样忠实于他的电影职业；他不退让，要维护自己的存在方式、他的欧洲属性、他的在场性；他拍摄喜剧，但是他不在自己面前、也不自己扮演喜剧。不，即便人们到处，包括在犹太人居所里，也接受了胜利者的语言——但那却只是一种不思想的被奴役状态，而不是对其学说的肯定，不是对其谎言的信仰。

这个想法在一个礼拜天的上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四个人站在厨房里，史迪勒和我帮助我们的妻子洗碗。史迪勒太太是个温顺的巴伐利亚女子，从她粗犷的线条可以看出她的巴伐利亚籍贯。她安慰不耐烦的丈夫说："等到你又可以忙你那些制衣厂，出门旅行跑业务的时候——这一天会来的！—— 我们也可以再找个女佣。"史迪勒沉默地、动作粗鲁地擦了一阵盘子，然后激动地强调说："我再也不去跑……他们说得完全对，那很没有效率，那是投机经营……我要做园丁或者类似的事情……我要和自然贴近！"

胜利者的语言……人们说着它并非不受惩罚，人们吸纳进它，按照它去生活。

29

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和塞利克松的关系是建立在物品交换上的：他有糖尿病，给我们土豆，换取一点点肉和蔬菜。我始终没有真正搞懂是什么原因，并且一直有点感动，不知他为什么很快就对我们两人产生了真实的好感，尽管他憎恨所有的德国属性，认为黄星佩戴者中间的每一个德意志爱国者——那样的人所剩无几了——都是傻子或者马屁精。他在奥德萨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十四岁时来到德国；他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尽管，或者如其所言，是因为他读了一个德国中学和大学。他不断地试图说服我，要我认识到我的观点没有意义。每一次，每次抓人，每次有人自杀，每一次有来自集中营死亡的消息，只要我们到一起，而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在一起，因为我们讨论得越来越激烈，每一次他都要说："而您还想要做德国人，甚至爱德国？下一步，您还要向希特勒和戈培尔写一份爱情宣言呢！"

"他们不是德国，而爱，这也不是事情的核心。另外，我今天还

找到了跟这事有关的好东西。您有没有听说过尤里乌斯·巴朴（Julius Bab）这个名字？”

“听说过。柏林的一个文学犹太人，剧作家和剧评人，对不对？”

“史泰尼茨的书橱里有他的书，上帝知道怎么会跑到他的书橱里的，一个私印版本。五十首诗歌，只是作为草稿为他的朋友们公开的，因为他自认为不是真正的创造性的诗人，总是在自己的诗句后面感觉到接受来的韵律。非常正直的谦逊，而且确实很到位；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一会儿有盖奥尔格的，一会儿是里尔克的，表达方式更像是由他组织结构的，而不是源出于他的。但是有一节诗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令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这非自然的依赖性。我把它记在日记本上了，我朗读给您听，我马上就能背诵它了，因为我老是想着它；两首致德国的诗，一首写于1914年，另一首1919年，两首诗以同一个归属性的坦承开始：

你热爱德国吗？——没有意义的问题！
我可以爱我的头发，我的血液，我自身？
爱难道不也是冒险和赢取？！
我更是无可选择地许给自己至深
这个国土，是我、我自己。

假如“冒险和赢取”那一行不那么盖奥尔格式，我可能会很嫉妒的。事情正是如此，不仅是对于诗人和我，而且对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是这样。”

“最诚实的自我暗示，自我欺骗，纯粹的谎言，太常见了，当然其中有数不胜数的中间层次。”

“那么是谁写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美的德语诗歌？”

“您不会是说黎索尔（Ernst Lissauer）做作的仇恨之歌吧？”

“无稽之谈！但是：‘下面的多瑙河边蹲着两只乌鸦’……（但愿

我没有引错），那不是一首真正的德意志民歌吗，犹太人楚克曼（Hugo Zuckermann）写的？”

“跟罗雷莱一样，是真正的，也就是说富有艺术性的仿造，也同样是做作的感受，海涅回归犹太文化您是知道的，但是您看来对楚克曼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他的复国主义诗歌却一无所知。事情确实如此，就像您大学里黑板上写的那样，其他地方也能看见：犹太人写的德语都是谎言！”

“简直令人绝望，怎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脱离不了胜利者的语言，甚至包括您，您这个把一切德国人视为敌人的人！”

“他使用我们的语言比我们使用他的多得多！他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只不过，他把一切都变形为谎言和罪恶。”

“什么？他们学的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还记得1933年最初的景象吗？纳粹在这里举行了反对犹太人的大游行？‘去耶路撒冷的单行道！’，‘白鹿赶走犹太人’，那些条幅和那些一起打出的图像、标语牌上都写的什么吗？队伍里也有一个犹太人，他举着一个钉在很长的杠子上的牌子，牌子上写着：‘我们滚出去！’

“我听说过这件事，以为是一个苦涩的笑话。”

“不，真的有这回事，而这句‘我们滚出去’比希特勒的一套东西要古老，不是我们说胜利者的语言，而是希特勒从海尔策那里学来的。”

“您相信希特勒读过海尔策的什么东西吗？”

“我根本不相信他真正读过任何东西。他只是抓取了最一般教育里的片断，只是找出了对其疯狂体系有用的东西，进行不断的鹦鹉学舌和无度夸张，但是这正是他心中疯狂的天才或者是魔鬼或者是罪犯属性——您说是什么吧，随便您怎么解释——，他把所有抓取来的东西难以抵挡地表现出来，达到对无知的人们发生裹挟的作用，而且不仅如此，还将那些本来已经拥有或者曾经拥有一定思考能力的人，变回了低级的群队动物。他在《奋斗》里最先谈到他对犹太人的敌意时，谈他维也纳的经验和认识时，也马上说到犹太复国主义，这在维也纳是很显然的现

象。再说一遍，他用最肮脏的、最可笑的后楼梯方式[1]扭曲了一切；黑发的犹太青年带着撒旦的狞笑，伺机俘获雅利安金发女郎，以在她身上羞辱日耳曼种族，同时试图将自己低等的种族、犹太民族引向所追求的世界统治地位——真的，我在引述，即便只是根据记忆，但在所有关键点上肯定是逐字逐句的！”

“我知道这个，我甚至可以把这段话更准确地给您念出来，因为我们的组长是希特勒语录的牛人，而这段话是他最喜爱的段落之一。接下来是，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黑人带到了莱茵河畔，试图通过强制性的野蛮化手段毁灭白人统治种族。但是这与犹太复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将犹太人看作一个民族，看作政治的统一体，并且总结为‘世界犹太属性’，这些，他显然是从海尔策那里学来的。”

“您这样说难道不等于是对海尔策发出了一个可怕的指责吗？”

“被一个嗜血成性的恶狗偷盗了，德国的犹太人没有及时地听他的话，海尔策能有什么责任？现在太晚了，现在你们朝我们来了。”

“我没有。”

“您！下一步您就会像拉特瑙那样表示，您有一颗金色的日耳曼之心，德国犹太人是德意志部族的一种，在北德人和施瓦本之间。”

“金色的日耳曼之心十分无聊，我肯定没有兴趣，但是德意志部族的一种，完全从精神上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确实是可能的，我的意思是：对那些母语是德语、整个都是受的德语教育的人是可能的。‘语言甚于血液’。我在其他方面与罗森茨维格没有多少相通之处，枢密顾问艾尔莎给我看了他的信件——不过罗森茨维格属于布博那一章了，我们还是谈海尔策。”

---

1 “后楼梯”表示佣人们去其工作间所走的不为人所见的通道，常被用于指“小道消息”以及恋人的秘密通道。

“跟您谈没什么意义，您不了解海尔策。您必须去了解他，这属于您现在必要的知识积累，我想看到您从他那里收获些东西。”

这场谈话让我想了好多天。我从来没读过海尔策一行字，这真的是没有知识的表现吗，而为什么我会从来没有想要阅读他呢？我当然早就听到人们谈论他，在生命的旅程中，我也好几次遇见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早是在世纪之初，我在慕尼黑时，一个目的十分明确的犹太组织想要拉我进去。我只耸了耸肩，就像面对某个与世界隔膜的事物。然后是一战爆发的几年前，在施尼茨勒的《通向自在之路》里，紧随其后在我到布拉格作报告期间。在布拉格，我和几个犹太复国主义学生一起在咖啡馆里坐了几个小时，比起此前阅读施尼茨勒的时刻，我这会儿更加坚定了，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件奥地利的事务。在那个人们习惯于把国家依据相互纷争或者顶多相互容忍的民族进行整理的地方，大概也可以有一个犹太民族；那里的加利西亚地区还有一些聚集的小市民阶层的犹太居民，他们自愿在隔离区的隔绝状态中坚守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与相邻的波兰及俄国的犹太人群完全相似，压力和迫害使他们对一个更好的家园怀有渴望，在那里，犹太复国主义可以理解，只有一点令人奇怪：为什么复国主义直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才出现，而且只是通过海尔策才得以形成的。而它确实很早以前就在那里存在，甚至部分地萌生了其政治形式，海尔策自己补充进一个已经存在的运动中的新的东西，只是对关键的政治视角的决定性阐发，并将在西方和真正的欧洲条件下安家的、开放的犹太人纳入，引导到民族思想和迁移回归的意图中去。

然而这与我、这与德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当然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在珀森省有追随者，我们这儿，柏林，也有复国主义者小组，甚至还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杂志——但是在柏林有形形色色的边缘、异域的特别的事物，肯定也有个中国俱乐部。这与我的生活圈子、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对我的德国属性、我的欧洲属性、我的人之属性、我的二十世纪明确而有信心。血统？种族仇恨？如今肯定没有了，这里肯定没有了——这是在欧洲的中心！战争肯定也不会再出现了，在欧洲的中心不

会了……最多在巴尔干的边边角角上，在亚洲，在非洲。直到 1914 年的 6 月里，一切关于某种返回中世纪的可能性的论述，我都认为是幻觉，而一切与和平和文明不能融合的东西，在我眼中都是中世纪的状况。

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了，我对欧洲文明不可动摇的坚固性肯定被动摇了。当然我也感觉到反犹主义的、纳粹的潮水一天天在上涨——坐在教授和学生中间，有时候我相信，他们比小市民还要糟糕（他们的罪责无疑是更大的）。而这时候，出于抵御、出于危机自卫，我们这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加强了，这一点我当然也有察觉。但是我不关心它，我完全不读犹太人的特别出版物，而后来在犹太人居所里，我又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它们。那种自我封闭是执拗吗，还是迟钝？我相信二者都不是。是一种对德国的攀附，一种对其羞辱状态置若罔闻的爱吗？肯定不是，那不是什么激情，而只是某种自然而然的东西。真的，巴朴的诗句说出了所有我想说的东西。（他自己今天是否仍然同意这些诗句？他还活着吗？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后来再也没有相见了。）不过此刻我在 1942 年的日记里陷得太深了，同时离开一个语文学家的笔记太远了。

不，其实不远；这并没有偏离主题；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把德国的这些事情看错了或者看得不全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也必须对我目前的观察表示怀疑，我起码是不适合讨论犹太主题的。有一次，在对马克瓦尔德作例行的每周探望时，我谈到了这个问题。马克瓦尔德是一位几乎完全瘫痪、但精神上充满活力的近七十岁的老人。每隔几小时，当疼痛太折磨人的时候，他勇敢的妻子就会给他打一针吗啡。这样已经好几年了，有可能还会这么持续几年。他想要重见他流亡的儿子们，认识他的孙子们。“但是如果他们把我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我就完了，因为我在那里得不到吗啡。”他被运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没有他的病人座椅，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在那里了结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工厂里那个什么也没学过的工人加文盲一样，是黄星佩戴者中的一个特例：他的父亲已经作为地主在德国中部安家落户，他

自己读了农业经济专业，接手并经营着父亲的土地，直到世界大战中他被委任为萨克森农业厅的一个高官。他有时跟我讲——这也属于“犹大”栏目——“谋杀猪”（Schweinemord）的事，根据不断重复的指责这是犹太人干的，以便逼德国人饿死；讲纳粹那些顶着另样名目的完全类似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叫“犹太人的谋杀”（jüdischer Mord），现在叫作“德国人的远谋”（deutsche Vorausschau）和“联合大众的计划经济”（volksverbundene Planwirtschaft）。不过，和这位瘫痪者的谈话绝不仅仅围绕着雅利安事物：马克瓦尔德夫妇对政治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博览群书，由于近年的这些事件，他们像我一样，很自然地急迫地关注起德国犹太人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没有逃脱胜利者的语言的影响。他们给我读一本精心地详细、全面记载的手写本，证明他们家族几个世纪以来在德国的历史，其中使用了大量的纳粹词汇，整体上是对于“氏族学科”（Sippenkunde）的一个贡献，其对于最新国家政权的某些“权威的”（autoritären）法则不无同情。

我与马克瓦尔德谈论了犹太复国主义，我想要知道，他有没有认为这个运动对德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管理机构的官员比较善于对事物从数据方面进行评价。是的，他说，他当然也听闻过这个“奥地利的运动”，并且发现，自从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反犹主义的挤压下，这个运动在我们这里呈上升趋势；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全帝国范围的运动，在我们这儿，一直以来它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少数群体，一个利益集团，大多数德国犹太人已经不可能脱离德国属性了。谈不上什么失败的同化、或者可以抹除这种同化、掉回头去的问题；德国犹太人大概可以被清除——但是不可以被去德国化，即便他们自身作这种努力也没有用。这时我讲了塞利克松告诉我的有关海尔策的情况，海尔策对于纳粹主义的影响……

“海尔策？这个人是谁？活着的人？”

“您也从来没读过这个人的东西吗？”

“连他的名字我都是头一次听说。”

马克瓦尔德太太也对他一无所知，她确认。

我把这记录下来，以解脱自己。除了我，在德国肯定还有更多的人，更多更多的人，一直到最后都对犹太复国主义非常地陌生。不能说，这么一个极端的同化党的信徒，一个“非雅利安的基督徒”，一个大土地主，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人。正相反！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见证人，特别是他身居高位，赋予了他全局目光。Les extremes se touchent（对立双方交集）：这句话同样意味着极端对立的党派总是相互了解得最多。当我 1916 年躺在帕德伯恩的战地医院里的时候，那里的主教学院为我提供了最好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文学……

不过，希特勒的学生时代是在奥地利度过的，就像他把“宣告”（Verlautbarung）从那边拖进了德意志帝国的官府语言一样，他也必然将那边海尔策的语言和思维形式——从这一个到另一个的过渡几乎无法确定，特别是在原始低级者那里几乎不可能——吸收进自身，如果那些东西真的在他身上存在的话。这次谈话和思考之后不久，塞利克松给我拿来两本海尔策的书，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文集及其日记的第一卷，都是柏林的犹太出版社在 1920 和 1922 年出版的。我在读它们的时候感到一种近乎绝望的震惊。我写的第一个日记记录是：“主啊，请在我的朋友面前保护我！在这两卷书里，人们只要愿意，就可以为希特勒、戈培尔和罗森贝尔格用以反对犹太人所抬出的许多理由找到证明材料，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去对此进行阐释和歪曲。”

后来我用一些关键词和引语把希特勒和海尔策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列出来，置于眼前。上帝保佑，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

最主要的：海尔策从来不企图压迫、更不谋图灭绝陌异的民族，他从来不捍卫所有的纳粹恐怖赖以支撑的上帝选民思想和一个种族或民族对于整个低等人类的统治要求。他只为一群被压迫者要求同等权利，为一群被虐待和迫害的人要求一个有节制的相应的安定空间。“低等人的”（untermenschlich）这个词，他只是在述及加利西亚犹太人低等人的处境时才会使用。其次：他并不狭隘和固执，他不像希特勒那样缺少精神

和心灵的教养，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只是想做一个狂热分子，却仅仅做成了半个，因为他始终不能将自己内心的理智、斟酌和人性窒息，总是只能在一些短暂的片刻感觉自己是命定的上帝的使者，并不断地问自己，难道自己不就仅仅是个富有幻想天赋的副刊作者，而非第二个摩西吗？他坚定不移的意图只有这一点，并且也只有这一点在他的计划中毫无疑义地得到了贯彻：必须为那些不开放的、作为民族保留下来的、真正被欺压的东犹太民众建立一个家园。一旦他碰到了这个问题西边的情况，他便被矛盾纠缠，徒劳地试图平衡。“民族”（Volk）这个概念的定义陷入摇摆；管理者（Gestor），政府行为的领导，是独裁者还是议会，无法清晰地确定；种族区别不合他的意，但是混合他又要禁止；他带着“伤感的”快乐依恋德国的教育和德语语言，他要把这个语言与所有西方的东西一样救到巴勒斯坦去，然而犹太之人民却正是通过同一模式的东方隔离区的居民大众组成的，等等等等。在所有这些摇摆之中，海尔策都不是一个天才的、但却是一个热心的和有趣的人。

然而，一旦他跃升为上帝的使者，感觉自己有义务完成身负的使命时，犹太人的救世主与德国人的救世主在思想上、德行上和语言上的相似性就达到了一种时而荒谬、时而可怕的程度。他“展开了国家社会思想的旗帜”（entrollt die nationalsoziale Fahne），旗帜上有七颗星星，它们代表了七小时的工作日，他捣毁反抗他的，砸烂阻挡他的，他是命运赋予重任的领袖，并去实现在他的人民大众中无意识地潜藏着的东西，这是一个需要被他建构成为民族的大众，而这位领袖“必须有一个严酷的目光”。他也必须懂得大众心理和需求。他将在不损害自身的自由思想者特性、无妨于促进所有科学的情况下，为大众的儿童般的信仰创造朝圣之地，他也将尽力利用自己的光环。“我看着、倾听着（他在一个成功的群众集会后记载道），我的传说正在诞生。民众易感、冲动；大众看不清。我相信，他们现在就已经不具有对我清楚的想象了。围绕着我开始轻轻升起了一团雾气，可能会形成云雾，我在其中叫喊。”宣传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对孩子气的大众可以用严厉的教义和朝圣之

地治理，对西化的和知识人的圈子则通过附庸风雅的方式进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维也纳的妇女协会里朗读博瑞斯·封·明西豪森(Börries von Münchhausen)的犹大叙事谣曲和展示莫滠·黎莉恩(Mosche Liliens)的插图。(这里我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明西豪森就在许多犹太人协会里朗诵自己的犹大－诗歌，在希特勒帝国他又作为伟大的德国诗人受到推崇，以布罗博曼的姓氏与纳粹人士相交甚欢。说明这一点我已经触及下面还要谈到的东西；不过这是后话。)外表的华丽和令人印象强烈的象征是一桩很好的、不可或缺的事情，要重视制服、旗帜和庆典。令人不舒服的批评人士作为国家的敌人来处理。对重要举措的反抗必须以“毫不留情的严厉”进行镇压，不必顾忌异见人士的怀疑和骂声。假如那些所谓抗议发起者出于重大的思想原因反对政治上的、包含西方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海尔策就会宣布：明年在耶路撒冷！“在民族没落的最近几十年”——他的意思是：同化的这些年——有一些犹太文字学者对这个古老的祈愿进行了“水分很大的解释”，说这个短语里的耶路撒冷本来应该叫伦敦、柏林或者芝加哥。“如果以这种方式阐释犹太人的传承，那么除了这些先生领取的年薪之外，犹太文化属性当然就剩不下多少东西了。”利诱与威胁必须很好地调配并用：不应有任何人被迫随同出走移居；不管怎样，那些犹疑者，迟到者，在那边会因此而不利，巴勒斯坦人民“将在那些曾经为这项事业抗争和受难的人们中间寻找他真正的朋友，当他们为此收获的不是荣誉，而是谩骂的时候。”

如果这是一般性的、两个领袖共有的语汇和腔调，那么海尔策就是多次将可怕的武器送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他想要强迫罗特仕尔特家族把他们的财产用于犹太人民的事业，而他们现在只为了自己扩大财富让所有强国的军队为其工作。这个抱成团的犹太民族——总是说：我们是一个唯一的整体，我们是一个民族！——，它将怎样确立自己，获得承认？在进行战争的欧洲强权缔结和平的时候，它将作为金钱的强权加入进来。它将来会更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便在建立犹太国家之后，肯定还有足够的犹太人在欧洲的国外居住，他们便可以依靠自己的国家，

从外面来服务于这个国家。对于纳粹主义来说，这里提供了多少阐释的空间！

而且俩人在人格上的亲缘性和语言上的和声也不断地显现。人们不妨数一数，希特勒政权有多少接见、多少讲话、多少可怜的东西被称为历史性的。而海尔策在一次散步途中向《新自由报界》的主编阐发了他的思想，这便成了"历史性的一小时"，只要他取得了最微小的外交成果，事情马上就进入了世界历史。也有一个短暂的时刻，他向他的日记本坦言，他的私人存在终止于此，他的历史性存在开始于此……

两人一个又一个的一致性——思想上和风格上的，心理上的，推理上的，政治上的，他们之间有过多少相互促进！海尔策赖以支撑一个民族整体的全部基础，其中完全与犹太人吻合的只有一点：敌对者和迫害者的共同性；在这个视角之下，所有国家的犹太人当然就在希特勒面前融合成了"世界犹太属性"，而他自己，他的迫害狂想和他失控的病态的狡诈，将此前只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东西加以具体化了，他为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国家输送了比海尔策本人更多的信徒。又是海尔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希特勒还能从谁那儿学到更加实质性和更加实用性的东西呢？

我在这里用一个轻巧的反问处理掉的问题，细致回答起来会需要比一个博士论文更多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纳粹的说教屡屡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启发和充实，而不会总那么简单的是，无可置疑地确定，哪些是领袖、哪些是这个或那个第三帝国的共同创立者从犹太复国主义那里拿来的。

困难在于，这两个人，希特勒和海尔策，非常大量地从同一个遗产里攫取东西。我已经指出了纳粹的德意志根源，那是狭隘化了的、钻入牛角尖的、变异了的浪漫派。假如我补充说：是造作了的浪漫派，那么这两个领袖精神上和风格上的共性就得到了最精确表述。海尔策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到的榜样是威廉二世。他清晰地认出了威廉式的英雄姿态的心理来源——那翘起的小胡子下面的残疾手臂对他来说不是秘密——，

这使皇帝跟他更加心心相印。犹太人的这个新摩西也梦想着拥有一支身披银盔甲的精锐部队。希特勒方面却认为威廉是民族的一个蛀虫，但是那种英雄的做派和对一种俗气化了的浪漫派的偏爱，则是他与海尔策共同拥有的，而且远不止于此，在这个方面他大大地超越了海尔策。

我当然也和枢密顾问艾尔莎谈论过海尔策这个题目，她当然也知道他。但是她对他不怀有什么热烈的情感，没有什么特别的热爱，也没有强烈的反感。在她看来，他太“庸俗”了，太缺少“精神性”。为了可怜的“东犹太人”，他的用意是好的，他毫无疑问地为他们的利益作出了贡献。“但是他没有权利对我们德国犹太人指手画脚；此外，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里已经完全过时了。我对那里的政治紧张态势不太感兴趣；两个党派都不赞同平和的小资产阶级海尔策，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不赞成，共产党人和苏联的朋友也不同意。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纯精神的领袖是关键的，而这在今天无疑是布博。我崇敬马丁·布博，如果我不是这么狂热地——抱歉！——这么全然地跟德国系在了一起，我肯定要全身心地追随他了。您关于海尔策俗气化了的浪漫派的评论，正说到了点子上，布博相反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完全纯粹的，完全深刻的，我几乎要说，完全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而他最后却选择了一个特殊的犹太国家——一半肯定是希特勒的罪恶，另一半——亲爱的上帝，他是维也纳人，而真正成为德国人还是只能在我们这儿，在帝国。布博最好的东西，完全纯粹的德意志的特性，您在布博的朋友弗朗茨·罗森茨维格那里可以看见。我把罗森茨维格的信件一起给您”——她后来甚至把那本珍贵的书送给了我，她拥有两本，我总是要为失去那本书心痛，它让我见识了多少关于其时代的精神历史——，“这儿有一些布博的东西”……

我在这里插入一句话，以平静我作为语文学者的良心：我的俚俚安式谈话只是一点点俚俚安式：它们出自于我的日记本，而日记我的确是一天一天地、在对事情的新鲜印象中、带着耳朵里所听见的声音写下的。

布博对于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二三十年代他就已经是有一定知名

度的宗教哲学家；而与不怎么有名的、很早就逝世了的罗森茨维格我则是首次相遇。

布博是一个如此强烈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以至于他把犹太属性的本质转向了它的反面。所有的发展都表明，最鲜明的理性主义，最极致地将上帝的理念去形态化，构成了这个本质的核心，而Kabbala和后来的神秘主义的膨胀，只是这个主要气质的持续主导和决定性地位所引发的反动现象。而对布博来说却正好相反，他认为犹太的神秘主义是本质的和富有创造力的东西，犹太的理性只是僵化和变异。他是一个全面广博的宗教研究者；对他来说，东方人本来就是宗教人，在所有的东方人中，犹太人达到了最高层次的宗教性。由于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与另一种天性的、积极的西方人最紧密地接触和生活，那么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东方和西方最好的精神事物融合起来，传递过去，传达过来。在这个地方，这位浪漫主义者，也是浪漫主义的语文学家加入进来（不像海尔策是个政治家）：在宗教这一点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找到了他们的至高，他们不是游牧的人群，他们原本是一个务农的民族，所有的图像，所有的《圣经》图像都表明，他们的“上帝是耕地的租佃者，上帝的节日都是耕地节日，上帝的法律是一个耕地法律”。并且，“无论那预言上升到何种普遍精神的高度……他们的普遍精神总是要依附于这特别的迦南土地之身的……”在欧洲，犹太心灵（“穿行过西方所有的天堂与地狱”），特别是那“顺应了环境的”犹太人的心灵，遭受了损害；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母亲的土地，他们便会重新富有创造力”。这是德国浪漫派的思路和感情，这也是浪漫主义的语言世界，特别是新浪漫主义的诗歌和哲学，带着他们与日常的隔离和神父般的庄严神圣，以及对充满神秘感的黑暗的倾心，这就是布博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东西。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的情况差不多，不过他没有在神秘主义那里走得如此之远，并且没有放弃与德国的空间上的联系。

我不想偏离我的本分即“第三帝国的语言”。犹太属性的本质，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当性不是我的主题。（一个虔信的犹太人很可能会得出

这样的结论，这第二个，在我们当代背井离乡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族群，跟第一个一样，是上帝的意愿；而第一个和第二个当然都不是来自于一个农耕土地的上帝，因为这个上帝原本赋予他的子民的任务正在于不作一个民族，不受制于任何空间和物体的围困，无根系地服务于赤条条的思想。关于这些以及关于隔离区作为围绕着精神的独特性的“篱笆”的意义，关于变身为勒颈系带的篱笆，关于那些十分重要的身负使命者的离弃——“伟大的斯宾诺莎”，布博这么说显然与他自身的学说相矛盾——，关于离弃和关于被抛甩出新的民族围栏——唉，天呐，我们对这些作了多少哲学思考！而这个“我们”所包含的人们，活在世上的还剩几人？少得可怕！）

我守在我的本分上。相同的一个富有布博特征的风格，相同的一些在他那里特别庄严闪亮的词语，比如“经久”（Bewährung），“唯一的”（das Einmalige）和“唯一性”（Einmaligkeit）。所有这些我频繁地在纳粹那边遇见，在罗森贝尔格，在某些地位低一点的人物那里，在书籍和报纸文章里。他们时不时地很愿意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他们时不时地很愿意完全面向知识人士；这样会给予大众强烈的印象。

罗森贝尔格与布博在风格上的接近，在某些价值判断上的接近——将农耕作业和神秘主义置于游牧性质和理性主义之上，这也道出了罗森贝尔格的心里话：这种亲缘性比之于希特勒和海尔策之间的相似性，难道不更加令人错愕吗？而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在两种情况下是同一个：浪漫主义，不仅仅是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而且也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统治着这个时代，两方面都从它的源泉里汲取，无罪的和下毒的，牺牲者和刽子手。

30

词语最高级的诅咒

大约四十年前，我在一份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东西。德文的《纽约国家报》在阿道尔夫·维尔布兰特（Adolf Wilbrandt）70岁生日之际发表了一篇他的传记作者、即我的文章。当我拿到这份样报时，从这一刻起，美国报纸永久的整体形象就站在了我的眼前。这很可能、甚至一定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一般化的推演都是一种欺骗，然而，这一认识没有改变我心中如此经常地、非常清晰地展开对美国报纸本质的联想。在我的维尔布兰特文章的正中间，从上到下，蜿蜒穿过一条线，将一行行文字分成两半，插入一种助泄药广告，以这样的句子开头："人有三十尺肠道。"

那是1907年8月。而让我最强烈地想到了这肠道的是1937年夏天。当时刚刚召开了纽伦堡党代表大会，有关报道说，整个德国报界创造的日出版量图柱计有二十公里长，可以抵达地球大气层的中间层——而国外却有人胡说什么德国报纸销量下降了；同一时间，正值墨索里尼访问

柏林，他们吹嘘花了40000米的旗帜布料，以装饰节庆的街道。

“数量（Quantum）与折磨（Qual）的混淆，美国主义最粗糙的方式，”我当时写道；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越来越粗壮的大标题，越来越经常地在予以突出的名词前面丢掉冠词——“《民间观察者》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大楼”（‘Völkischer Beobachter’ baut größtes Verlagshaus der Welt）——，在这里，军事、体育和生意方面的偏好紧凑浓缩地聚集到了一起，同时也表现出，第三帝国报界人士是美国人聪明的学生。

然而，美国人的数字浮夸嗜好和纳粹的真的一样吗？对此，我当时就有疑问。“三十尺肠道”里难道没有一点幽默吗？在美国广告中的夸张数字里，难道不是总能感觉到某种诚恳的幼稚吗？植入的广告中，难道不是每一次都有个声音在自言自语：我和你，亲爱的读者，我们俩在这种夸张中都同样感到快乐，我们俩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根本不说谎，你自己能够取出必要的东西，从我的夸耀中并不生出迷惑，通过最高级的形式，它只是让你得到的印象更牢固和更舒服而已！

过了一些时间，我读到一位美国记者的回忆录，是维普·米勒（Wibb Miller）的《我没有看到和平》，德语译本1938年在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这里面对数字的喜爱显然是完全诚实的；创造纪录属于职业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提供以数据证实的新闻，也就是有数据证明的最精确的报道。这比某一个深刻的思辨带来更多的荣誉。米勒特别骄傲地提到，他以最精确的细节（1935年10月3日，4：44，4：55，5：00）比所有的通讯员都要早四十四分钟宣布了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开始，而在下面这个句子里，对巴尔干上空的一次飞行所进行的十分简练的自然描述登峰造极：“（沉重云层的）大量白色物质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嗖地从我们身边掠过。”

令人诟病的美国式数字崇拜最糟糕的表现，是对自身价值幼稚的吹嘘炫耀和坚信不疑。我提一下那个国际性的大象话题。美国人说起来是：“我是如何射中我的第一千头大象的”。而德国人，正是在这个笑话中，牵着他的迦太基战争大象，尚属于那个思想家的、诗人的和游离于世界

的学者的民族，还处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某个时期。如果换作第三帝国的德国人，面临同样的任务，他们会用世界上最好的武器，击倒世界上那些最大的大象，其数量将庞大得不可想象。

第三帝国语言对数字的运用有可能是从美国人的习惯里学来的，但是却与之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是双重的区别，不仅仅通过最高级的拔高，而且也因为其心怀恶意，因为它处处肆无忌惮地以欺骗和麻痹为目的。在部队的战事报告中，战利品和俘虏数字任意地充斥叠加，枪炮、飞机、坦克车以成千上万计，俘虏的人数则动辄几十万，到了月末，人们会收到汇聚起来的一长串更加奇异的数字；而一旦说到敌人的死亡情况，这些确定的数字就完全不见了，代之以失去想象力的表达："不可想象的"和"无以计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为部队报道中理性的精确而感到骄傲。有一句话出自战争最初的日子，其自我欣赏的平实很是著名："达到了预定的前线"。人们当然难以保持这样的清醒状态，但是它却作为理想的风格一直浮游在那儿，这个理想从来也没有彻底地失去影响。而第三帝国的报导却立即使用了最高级，而且局势越是恶劣，就越是升级，直至无限无度，把军事语言的基本质地，即有约束力的精确性，恰恰变成其反面，变成幻想一类的、童话一般的东西了。再加上他们对自身的损失讳莫如深，就像电影里的战场画面，只见敌人的尸体堆积成山，于是，战利品数目的童话风格就更加强烈了。

军队的和战争的语言进入平民的、非军事的范围内流通，这在一战期间和一战之后都已经可以观察到很多；二战的特点在于，党的语言，真正的第三帝国的语言毁灭性地钻进了军队的语言。明确地消除数字界限而走向完全的毁灭，引入"不可想象的"和"无以计数的"这样的字眼，是分阶段完成的：刚开始只有通讯报道员和评论员不惮使用这类最为极端的词，后来领袖在他的致辞和召唤的高潮中也用起来，只是完全到了最后，国防部队的官方报道才使用它们。

谎言恬不知耻的短腿性质，在这些数字里暴露出来，令人瞠目结舌；坚信大众没有思想，可以绝对地愚昧化是纳粹的教条之一。1941 年 9 月

的军队报道说，20 万人被包围在基辅；几天后，从这个包围圈中带出了 60 万俘虏——看来这是把所有的平民都计算为士兵了。从前，德国人很喜欢笑话东亚人的浮夸数字；而在战争的最后年月里，日本和德国的战报无聊地争相夸张的场景，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人们不知道谁是师傅谁是学生，是戈培尔跟日本人学来的还是相反。

过度的数字不仅出现在真正的战争报告里面：1943 年年初，所有的报纸上写着，寄给战士们的读物，所谓战场邮图版本，已经寄出了 4600 万册。有的时候，较小的数目也给人强烈的印象。1941 年 11 月，里宾特洛浦宣布道，我们还可以进行 30 年的战争；希特勒 1942 年 4 月 26 日在国会说，拿破仑在俄国零下 25 度时进行过战斗，而他，希特勒元帅在零下 45 度、甚至有一次是在零下 52 度时进行了战斗。那时他还很喜欢被人吹捧为战略家，很喜欢被人家与拿破仑相比。在他这种对伟大榜样的超越之中，我似乎于不由自主的滑稽感中看到一种与美国的破纪录方式特别紧密的联系。

Tout se tient，法国人说，一切都环环相扣。直接来源于美国的，是“百分之百”这个表达，它可以追溯到一本在德语圈子中流传很广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小说的标题上。在整个十二年中，每个人口里都这么说，我还曾经常常听到它的扩展形式：“您要当心这个家伙，他是个百分之一百五！”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个最无可争议的美国主义，必须与纳粹主义的基本诉求和关键词“全面的”、“全方位的”（total）紧密地搭配到一起。

“全面的”、“全方位的”也是一个数字最高值，与浪漫主义泛滥无度时的“无以计数的”和“不可想象的”一样，在其现实的可掌控性里意味深长。德国方面的“全面”宣战给德国带来了极为可怕的后果，令人记忆犹新。然而，即便在战争之外，人们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也会处处遇见“全面的”、“全方位的”：比如一篇刊登在《帝国》里的文章，渲染一所严格的纳粹女子学校里“全方位的教育情况”；在一个橱窗里，我还看见过一种下棋游戏被称为“全方位的游戏”。

Tout se tient。一方面，数字的最高级与集权原则相关联，另一方面，它同样跨进了宗教区域，树立信仰，以日耳曼宗教替代犹太的和非英雄主义的基督文化，同样是纳粹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永恒的”（ewig），这个宗教意义上的无限的持续，使用得也很多：永恒的守护（die ewige Wache），永远将纳粹机构抬出（das ewige Vorhalten der nazistischen Institutionen）。“千年帝国”，一个比第三帝国打上了更坚决的教会－宗教印记的名称，频繁地出现。显然，一千这个响亮的数字在宗教之外也是很受欢迎的：当人们期待的闪电战决定落空时，为了提高 1941 年的勇气而召开的宣传集会立即被宣布为上千集会。

数字的最高级也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达到的：“独一无二的”（einmalig）与“一千”（tausend）同样是最高级别的。作为“超常的”（außerordentlich）的同义词，剥去了原本的数字意义，这个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末还是新浪漫主义哲学和文学的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时髦表达；那些十分讲究他们风格的高贵和新颖的人，像史泰芬·茨威格，像拉特瑙，会使用这种表达。第三帝国的语言，基于领袖本人的特别爱好，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而且常常过于不谨慎，令人很奇怪地想起它的数字价值。如果在进军波兰之后，为了酬劳独一无二的的英雄壮举，授衔了一打陆军元帅，那么人们要问，是否每一位都是只在一场战役中证明了他的能力？然后人们告诉自己，十二个独一无二的壮举和十二个独一无二的元帅合成为一打。

（随之而来的便是至此最高军衔陆军元帅的贬值，一个至高无上的、帝国元帅的妙然登场。）

然而所有这些数字的最高级不过组成了最高级使用中的一个富裕的特殊群体。最高级可以称为第三帝国的语言里使用得最多的语言形式，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最高级是演说者和鼓动者施加影响的最方便的方法，它根本就是广告之形式。所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排除了所有的竞争者的情况下，独占其为己有：1942 年 10 月，我们当时的隔壁邻居艾格告诉我，有通知指示他们，商业广告禁止使用最高级。“比如您写道：

‘您会得到最为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服务’，那么您就要把这话改成‘受过训练的’，最多写‘训练有素的’。”艾格是从前德累斯顿多家最负盛名的服装商店的所有者，其时是工厂的工人，之后不久就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杀了”。

除了数字和类似数字词汇的最高级，还有三类最高级的使用，所有这三类都同样地泛滥成灾：可变化的形容词最高级形式，内含着或者可以附加上最高级意义的个别的表达，以及浸透了最高级意义的整个句子结构。

通过堆砌，可变化的最高级形容词可以赢得一种特别的魅力。我刚才把大象的笑话纳粹化的时候，耳朵里就听见了布劳希契总司令的话，他在一次给部队下达命令时添油加醋道：世界上最好的工人制造的世界上最好的武器提供给了世界上最好的战士，武装了他们。

除了可变化的最高级之外，这里还有那个第三帝国的语言日复一日地挂在嘴边的，充满了最高级意味的词——世界。当宫廷诗人们在特别的庆典中，颂扬十七世纪发饰风格的太阳王的荣耀时，他们会说，*l'univers*，宇宙，朝他望，跟随他啊。希特勒的每一个演讲，每一次讲话，在整个十二年里，因为他直到最后才缄口——，总会出现那一句口号，成为规定性的陈词滥调：“世界听从领袖。”每赢取一场大的战役，就有“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说。（这又是对大众的健忘性恬不知耻的确信：多少次，同一个对手，已经宣布死去的对手，又一次被歼灭！）

“世界”（Welt）到处都在充当最高级前缀：盟国日本从一个大国升级为世界大国（Weltmacht）。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是世界公敌（Weltfeind），领袖和Duce的会见是世界历史性的时刻（welthistorische Stunden）。

在“区域”（Raum）这个词里面，也有类似于“世界”这个词含有的最高级意义。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已经不再说“柯尼希格莱茨或者色当战役”，而是说“……区域的战役”，这完全是与战事的延伸扩展相关的；“区域”这个词的频繁出现肯定要归功于对帝国主

义有利的地缘政治学。但是，在区域想象中本来就有某种无界限的东西起着误导作用。一个帝国执行官在他 1942 年的总结报告中宣称，在过去的近千年中，乌克兰区域从来没有像在大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下得到过如此公正、大气魄的和现代化的管理。“乌克兰区域”比单单的“乌克兰”与“千年”和西班牙语的副词三声部的最高级更为相配。

“大气魄的”（großzügig）和“大德意志的”（großdeutsch）都已经过于老旧，用得太滥了，无法再特别地给这个句子的膨胀性进一步加码了。不过，第三帝国的语言自身也滋生出了“大”这样一种附加前缀，并令它疯长蔓延——“大型集会”（Großkundgebung），“大举反攻”（Großoffensive），“伟大战斗日”（Großkampftag）等等——以至于还在纳粹时代，一位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好人伯瑞斯·封·明西豪森就已经对此提出了抗议。

与“世界”和“区域”同样承载最高级意义并同样经常被使用的还有“历史性的”（historisch）。“历史性的”是那些持续地留在民族或者人类记忆中的东西，因为它对民族的整体和整个人类产生着直接和持续的影响。于是“历史性的”这个修饰词便属于纳粹主义的和平领导和将领进行的所有的、也是最理所当然的行动，而希特勒的讲话和命令则有超高级的修饰词“世界历史性的”（welthistorisch）伺候着。

为了使最高级的精神浸淫整个句子，任何形式的吹嘘手段都可以使用。在工厂里，我听到广播里播出柏林体育宫的一次活动。1943 年夏，斯佩尔和戈培尔讲话。活动的开始是这样的：“大型集会由帝国暨德国电台转播，联合转播的有保护国电台，荷兰、法国、希腊、塞尔维亚电台……盟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电台……”这个播报还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对听众的想象力肯定产生了超高级的影响，甚于报纸上的一个标题“全世界都在聆听”，因为那是整个翻阅了一遍的纳粹世界地图。

接着，斯佩尔以夸张无度的数字渲染自己的装备状况，戈培尔则把德意志统计的精确性与敌人的“犹太数字杂技”拿来作比较，以进一步

突出德意志的作为。——列举和败坏、打击：领袖的所有讲话大概没有不包含列数自己的成就和嘲骂对手这两项的，且絮叨冗长。希特勒风格上的粗糙，被戈培尔用狡猾的修辞手段打磨精细了。他在1944年5月7日使这种最高级的构造达到了令人心惊的顶峰。在英美军队登陆大西洋海岸的前夕，《帝国》里说："德国人民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敌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毋宁说是这种进犯不会到来……如果敌人真的试图轻举妄动，孤注一掷，那么我们就祝他晚安！"

这难道仅仅对于回顾者是可怖的、登峰造极的吗？难道细心的读者当时没有感觉到，在这个绝对的胜利在握的面具背后，绝望已经开始？难道最高级的诅咒在这里还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吗？

在所有的语言中，这个诅咒都不可避免地附着在最高级表述的身上。因为不管在哪里，持续的夸张都会强制性地导致夸张继续不断地升级，同时，麻木、怀疑和最终的不信任就必然会出现。这肯定到处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语言对最高级的接纳能力要比其他语言强：在罗曼语地区，在巴尔干地区，在远东，大概也包括北美洲，在所有这些国家，人们对最高级的接受都比我们这儿更多一些，经常在他们只是温度有所提高，感觉很舒适的时候，我们却认为已经是在发烧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或者这是一个附带的原因，造成最高级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如此非同一般的激烈表现；瘟疫总是在它们第一次蔓延的地方最凶猛地发威。

人们也许会说，这种语言的疾病德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那是十七世纪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影响之下发生的；然而当时的赘疣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囊肿，完全没有有意诱惑民众的毒素。

对于德国来说，第三帝国语言里恶意的最高级表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所以它从第一时间起就发生着强烈的危害作用，到后来则日益走向毫无意义，走向毫无作用，直至催生与其意图相反的信念，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强迫性的，正是缘于其天性。多少次我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道，戈培尔这句和那句话实在是过于愚蠢的谎言，这个人完全没有做广告的才能；多少次我记下了对于戈培尔的大嘴和厚皮的嘲笑，多少次我

气愤地斥骂其厚颜无耻，竟标榜自己的谎言是“人民的声音”，从这声音中可以汲取希望。

但是，没有 *vox populi*，只有 *voces populi*[1]，而在这些互不相同的声音中哪个是真实的，我指那个决定事件走向的声音，总是只有在事后才能断定。而且即便这一点，所有那些因为戈培尔的谎言过于荒唐而笑话他或者斥骂他的人，是否真的完全不为其所动，都是无法简单断言的。在那不勒斯教书时，我多少次听人用这种表述议论这份或者那份报纸：*è pagato*，这是有人付了钱的，报纸为它的主子编写谎言，而第二天，同一张报纸的某一个明显的欺骗新闻却让这些Pagato–叫喊者确信不疑。因为那个消息印刷得十分醒目，因为其他人都相信了。1914 年时，我每一次都以一种平静的、确定无疑的心态得出结论：这正是与那不勒斯人的幼稚和性情相符的，孟德斯鸠就说过，在那不勒斯，人们比在别的地方都更民众[2]，*plus peuple qu'ailleurs*。自 1933 年以来，我明白了，并且是不可改变地明白了我很久以前就预感到、却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即培养这样一个 *plus peuple qu'ailleurs*，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也明白了，每一个知识人的内心都藏有一个民众心灵层次，我所有的关于上当受骗的知识、我所有的对类似时刻的批评性审视，都于我毫无助益：随便一个什么时间，印刷出来的谎言将征服我，只要它从各个方面朝我逼近，只要在我周围仅有很少的人、越来越少的人、到最后不再有人对其提出质疑。

不，最高级的诅咒并非如逻辑以为的那么简单。诚然，吹嘘和谎言搞过了头，被人认出是吹嘘和谎言了，戈培尔的宣传最后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成为毫无作用的蠢话了。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肯定的是：那被识破为吹嘘和谎言的宣传仍然在发生作用，只要操作者不知廉耻，将其宣传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最高级的诅咒并不总是自我毁灭的，却往往足以

1　“vox populi”拉丁语成语：人民的声音，单数；“voces populi”，人民的声音，复数。

2　这里的民众（Volk）为人们、民众的最高级。

毁灭阻挡它的智识；而戈培尔也许倒是比我相信的更富有天才，毫无作用的蠢话既非全然那么愚蠢，亦非全然那么无效。

*日记，1944年12月18日。*中午冒出来了一个特别报道，多年以来的第一个！整个是进攻年代和“歼灭性战役”的风格：“从西线出其不意地开始大反攻……短暂的、但是猛烈的炮火覆盖之后……攻下了第一个美军阵地……”这完全是绝望的掩饰，除此之外毫无内容。卡洛斯－结语：“这个是我最后的欺骗。”——“这是你最后的。”

12月23日……几周以来，戈培尔总算是说德国加强抵抗了，说联军的报纸称之为“德意志奇迹”。这也确实奇特，而战争还可能持续几年……

31

从运动中走出……

1941年12月19日，领袖和目前的最高指挥官向东线前沿阵地发出呼吁，其中最重要的句子叫作："在对历史上最危险的敌人的战斗中，东线部队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的胜利，现在，在突然到来的严冬影响下，你们需要从运动的惯性中（aus dem Zug der Bewegung）走出，进入一个阵地战的前沿……我的战士们！你们会……理解，我的心完全是属于你们的，而我的理智和决断力却只懂得消灭敌人，也就是说要胜利结束这场战争……上帝不会拒绝他最勇敢的战士，一定会让他们取得胜利！"

这个呼吁不仅意味着二战史上的、而且也意味着第三帝国语言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作为语言上的转折点，它以一个双排标志柱插进了那个普遍的、在这里升级为巴尔努姆风格的吹嘘夸口的肿胀肌体。

这里集聚着胜利凯歌的几个最高级形式——不过有一个现在时转变成了将来时。战争开始以来，人们随处可见一个充斥了无数旗帜的广告，

上面书写着这样的豪言壮语："跟随我们的旗帜就是胜利！"至此为止，联军一再被告知，他们已经无可挽回地战败了，不容置疑；特别是俄国人，他们听到郑重的宣告，在其失败后还想伺机反攻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绝对的胜利被推得遥遥无期，需要向上帝祈求了。从这时起，表达渴望的、等待的词，最终胜利这个表达活跃起来，紧接着，一战时期法国人赖以支撑的套语出现了：on les aura。人们将它翻译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并把它写到一个广告牌和一个票证的下面，口号的上面，帝国之鹰正力图牢牢掌控敌对之蛇。

而转折不仅仅表现在时态的转换上。所有的大话都掩盖不了，前进转变成了后退，人们正寻找着赖以支撑的立足点。向着"阵地战前沿"的"运动"僵持住了：这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所意味的东西比在其他任何语言里都要多得多。在如此大量的文字和文章里，在如此大量的用语和相关场合里，人们一直宣扬说，阵地战是一种医疗事故，一个缺陷，也就是一个罪过，第三帝国的军队永远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永远都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运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它的特性、它的生命，"运动"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Aufbruch）之后——"兴起"是第三帝国语言中神圣的、从浪漫派借过来的词！——就永远不可以停歇下来。人们不要疑虑，不要斟酌着保持个体自由，不愿像刚刚过去的那个时期那样意志薄弱；不愿让事物来影响自己，而是要自己去影响事物；人们要行动并永远把握住"行动的法则"（das Gesetz des Handelns）（又一个受宠的套语，出自克劳瑟维茨，在战争中被过度引用，甚至到了尴尬可笑的地步）。高雅的风格、并作为学养的标志就是：要富有"活力"。

马利奈蒂的未来主义对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并通过他们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一个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尤思特，则成为纳粹作家科学院的主席，尽管他最初的文学友人大多数都转向了共产主义。趋向，朝着一个目标的紧张的运动，是义务的规定，是基本性的和普遍性的东西。纳粹的运动本质是如此突出，以至于它干脆把自

己视为“运动”，把它的诞生地慕尼黑指称为“运动的首都”；虽然它在一般情况下，要为所有对于它来说重要的东西寻找响亮的、拔高的语言，却让“运动”这个词完全保留着它的平实性。

它全部的语汇都受制于运动和行动的意志。“风暴”（Sturm）可以说是其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词：从组织建立“冲锋队”（SA），即那些“风暴支队”（Sturmabteilungen）开始，到“民族风暴”（Volkssturm）结束，后者在词义上是与“民族”更接近的1813年“国家风暴”（Landsturm）的变形词。党卫队有其“骑士风暴”（Reitersturm），军队有其“风暴游击队”（Sturmtrupps）和“风暴重炮”（Sturmgeschütz），仇视犹太人的报纸取名为《冲锋者》。“迅即的行动”（Schlagartige Aktionen）是冲锋队的第一批英雄举动，戈培尔的报纸叫作“进攻”（Angriff）。这场战争必须是一场闪电战，每一种体育运动形式都滋养了通行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从其特殊的语言中为其提供养料。

行动的意志创造了新的行动词语。人们想要甩掉犹太人，就有去犹太化；人们想要把商业运作完全放到雅利安人的手里，就有雅利安化；人们想要倒回纯洁祖先的血液，就有北方化。一些非及物动词受惠于工业技术带来的新范畴，被启动为及物动词：人们飞一架重型飞机，人们飞（运输）皮靴和干粮，人们使用新的深冻方法冷冻蔬菜，而从前却要说使冰冻状，很麻烦。

在其中发生作用的，大概也有这样的意图，即比通常更紧凑地、更急促地表达自己，就像将报告写作者（Berichterstatter）变成报告者（Berichter），同样的意图，将载重卡车（Lastwagen）变成载重者（Laster），将轰炸飞机（Bombenflugzeug）变成炸弹者（Bomber），其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用缩略语替代那个名词。这样一来，从载重卡车，载重者，到LKW，就符合了一个从原级到最高级的普通升格。归结起来，这整个使用最高级的倾向，扩展开来极而言之，第三帝国语言整个的修辞手段，都可以归结到“运动”的原则上。

而现在，这一切都要从“运动”的惯性中出来，转变到停滞的状态

（和后退的运动）上去！查理·卓别林可以从最急匆匆的逃跑中毫无过渡地凝固为一个浇注的或者雕刻的前厅造型，纹丝不动，由此达到他所追求的滑稽效果。第三帝国的语言却不可以成为笑柄，它不能承认，它的上升变成了下降。对东线部队的呼吁是尽力掩饰的开始，力图掩饰形成了第三帝国语言最后阶段的特征。当然，掩饰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个现代的童话表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叫作遮掩）；但是，直到这一时刻之前，它掩饰的是罪行——“从今天早晨起，我们对敌人的炮火给予还击”，第一个战争公告上如此声称——，而从现在起，它所掩饰的却是茫然失措了。

首先必须七手八脚地将“阵地战前沿”这个反原则的词语遮掩掉，必须避免对一战期间无穷无尽的阵地战的痛苦回忆。不能让这种回忆冒头，就像不能让当年的甘蓝菜上桌一样。于是，因为不断地使用“运动型的防御战争”，第三帝国的语言更加膨胀了。于是有曰：如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被逼进了防御状态，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修饰词保持我们最深刻的本质形式。我们也不是从一个防守战壕的狭促空间出发进行抵抗，我们在一个巨型堡垒里和堡垒前战斗，有远为广大的区域自由。我们的堡垒叫作欧洲，很长一段时间还常说“非洲前沿”。“前沿”（Vorfeld）在第三帝国语言的视角下是一个双重幸运的单词：一方面它宣明了自己还留有的运动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我们也许要在不放弃决定性的东西的情况下，放弃非洲的领地。后来，从欧洲堡垒变成了德国堡垒，最后则成为柏林堡垒——确实！即便到了之后的战争里，德国军队也不曾缺少过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是一个持续的后退运动，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明确地说出来，一层又一层的纱幔覆盖着它，失败的、撤退的话，始终讳言，更不要说溃逃的话了。不用“失败”这个词，而代之以“打击”——因为这样听起来显得并不确凿；不说“溃逃”，而只是说“避开敌人”；敌人从来无法实现“反转”（Umbrüche），永远只是“进犯”（Einbrüche），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深入进犯”（tiefe Einbrüche），这些进犯都被“截击”（aufgefangen），被“阻挡”（abgeriegelt），

因为我们正好具有一个“弹性的前线”（elastische Front）。然后不时地进行一次“缩减前线”（Frontverkürzung）或者“抹除前线”（Frontbegradigung）——这是自愿的，以便消解敌人手上的一张好牌。

这一类战略措施只要是在国外实行，民众就完全不必了解其严峻性。就在1943年春季（在5月2日的《帝国》上），戈培尔还能塞进一个妩媚的小玩意儿：“在我们进行战争的边缘地区，在这儿或者那儿，我们会有些弱不禁风。”“弱不禁风”（anfällig）是说那些容易感冒或者发作胃疾的人，肯定不是指病患严重、生命垂危的人。而即便是这个“弱不禁风”，也被戈培尔加以虚饰伪装，变成了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我们方面的过度敏感和敌人方面的自吹自擂，所谓：德国人是被持续的一连串的胜利宠坏了，所以对每一个打击都会产生过度的心理反应，而习惯于挨打的敌人，对其最微小的“无足轻重的成功”都要进行夸大其辞的高调炫耀。

所有这些掩饰性的语言如此丰富，与第三帝国的语言通常的、与生俱来的、原则性的贫困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于是显得更加令人惊异。甚至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很平常的象征图像，当然它们不是自己原创的。类似于在阿斯佩昂阻挡了军队统帅拿破仑的*general Danube*（莱茵河将军），希特勒统帅仿造出了“冬季将军”，这成了一个被多次引述的人物，并且生出了好些个儿子——我现在只记起了“饥饿将军”，但是我肯定还遇见过一些其他的象征性的将军。曾经有很长时间，把无法否认的困难叫作“逼窘过道”（Engpässe）；这个表达的挑选也很成功，几乎可以与“前沿”媲美，因为这中间同样即刻包含了运动的意思（挤身穿行过去的运动）。有一次，一位语言上很有感觉的记者把这个寓意已经弱化了的词放进了它从前的语境里，巧妙地把它凸显出来。他报道一个坦克车队大胆地进入了雷区之间的一个狭促地带。

这种对困境的轻描淡写使用了十分漫长的时间，因为与德国的闪电战习惯完全相反，敌人只是展开了“蜗牛式的进攻”，只是以“蜗牛速度”缓慢地挪步。直到最后一年，当灾难完全无法掩盖的时候，人们才

给困境起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名字，当然依旧是蒙着面纱的：这时的失败叫作：危机（Krisen），但是这个词从来都没有自己独立出现过，人们不是将德国的目光转移到“世界危机”（Weltkrise）或者“西方人的危机”（Krise der abendländischen Menschheit）上，就是使用迅速模式化的用语，如“被战胜了的危机”（gemeisterte Krise）。人们通过“战斗而赢得解脱”（freikämpfte）战胜了危机。“战斗而赢得解脱”是一个掩饰的表达，针对当时几个师团从包围圈中挣脱出来的情况，这些包围圈令多个军团遭到毁灭。人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战胜危机，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让敌人扔回德国边界的，而是主动地脱离敌人，并有意地让敌人“进来”的（hereinließ），为了更加有把握地消灭这些过于深入的进犯者。“我们把他们放了进来——4月20日将是另一种情况！”这话我在1945年的4月还听说过。

最终到来的，凝固为公式，变成了具有魔力的词语的，是“新式武器”（neue Waffe），这个魔幻般的、能够不断升格的符号V。假如V1做不到，假如V2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能坚持怀抱希望，对V3和V4的希望？

希特勒最后的绝望的叫嚣是：“维也纳正重新成为德意志的，柏林继续保持德意志，欧洲永远不会是俄罗斯的。”此刻，当他彻底完蛋时，他干脆抹去了那个表示最后胜利的将来时态，它排挤走最初的现在时已经持续了很久。维也纳正重新成为德意志的——将已经被推至遥遥无期的东西作为正在到来的当前状态，必然令其信徒印象深刻。随便某一个V肯定还是能办到的！

魔幻字母V的奇异的复仇：V最初是被奴役的荷兰地下自由战士之间的联络暗号，V意为Vrijheid，自由。纳粹对这个符号施以强权，将它重新释义为“Victoria”，并把它无耻地强加给比荷兰更饱受暴政淫威的捷克斯洛伐克，让这个早已成为谎言的胜利符号出现在他们的邮戳上，他们的汽车车门上，他们的列车车厢里，无处不在。后来，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V变成了复仇的缩略语，变成了要结束整个德国所遭受的苦难并为之复仇的“新式武器”的符号。然而，联军不停地推进，德

国失去了继续向英国投射V-炮弹的可能性，失去了保护自己的城市免遭敌人轰炸的可能性。当我们的德累斯顿被炸毁时，德国方面没有再发射一枚防御弹，没有再升起一架飞机——复仇到来了，但它针对的是德国。

32

拳击

有一次拉特瑙在其信件里提到，他自己曾经赞同以和解实现和平，卢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则相反，他要“战斗直至胜利”，这是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用语是从竞技场地拿来的，人们在那里赌输赢或者赌名次。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拉特瑙对之皱起眉头加上引号，表示某种程度的不以为然，他显然认为这个用语不上档次，不能用到战争的情境下，即便它出自于从前贵族的运动方式；马术运动自古以来就是贵族和最为封建的军官团体的事情，身为马主人的骑手中间不乏具有最显赫的贵族姓氏的少校和骑兵上尉。但是这一点，在感觉细腻的拉特瑙看来，并不能抹去运动游戏和血腥严酷的战争之间的巨大差别。

在第三帝国，人们却极力掩盖这一区别。对外界需要维持一个无辜的和平游戏面孔的东西，一个为了保持人民健康的和平游戏，事实上就必然是一场战争准备，也必然在民族意识里被当作这一类的严峻事务。这时有了一个高等体育运动学院，本来一名体育科学工作者与其他任何

学者起码是平起平坐的——而在领袖的眼中他肯定比后者优越。这种时兴的价值观记录在三十年代中期香烟和小雪茄牌子的命名中，并通过这些命名得到加强：人们抽着“体育大学生”和“国防体育”的牌子，还有的叫“体育旗帜”和“体育水妖”。

令体育运动深入人心、无上光荣的另一个因素是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三帝国极为重视这个国际庆典，帝国需要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展示自己作为文化强国的领袖地位，正如所言，这符合其整体的做派，它将体力上的成就完全与精神上的放在同等地位，不，是放在精神成就之上，它给这场奥林匹克运动会罩上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光环，这种非同寻常甚至让种族差异在这个光芒的闪烁中一时间消失：“金发荷”，那个犹太女子荷莱娜•玛耶（Helene Meyer），可以为德国击剑运动的胜利挥舞她的佩剑；一位美国黑人的跳高赢得了欢呼，仿佛那是雅利安人或者北方人在腾跃。于是《柏林画报》也可以登一句空洞的话：“世界上最有天赋的网球运动员”，而紧接着又可以一脸严肃地将一项奥林匹克的成绩与拿破仑一世的行动进行比较。

体育运动声誉的第三个提高和传播，是通过汽车工业被赋予的意义，通过“领袖公路”和国内外所有那些英雄主义化的赛车，这中间，服务于国防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所有理由都在共同发生作用，此外，创造就业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而，在国防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领袖公路远未出现之前，希特勒内心已经有一个十分简单的和暴力的需求。在其奋斗书里，他在评议“人民国家教育的基本原则”、详细地谈论体育运动时，在拳击上逗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观点在下面的句子里表达得最为极端：“如果当初我们整个的上层精神界不仅仅接受了高雅的行为规范的教育，而是代之以学习拳击的话，就绝无可能会出现一个由卖淫业的经营者、开小差的逃兵和类似的社会渣滓发起的德国革命。”此前希特勒刚刚为拳击运动进行了辩护，反驳了这项运动特别粗野的指责——很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按照他自己关于拳击的说法，它就成了一桩无赖

之辈的（不是无产者的、也不是民间性的）事情，一场粗野谩骂的伴随现象或者终结。

如果人们想要理解体育运动在“我们的博士”的语言里所起的作用，这一切都必须要考虑进去。戈培尔在很多年里一直被称为“我们的博士”，很多年里，他自己署名每一篇文章都使用博士头衔，在党内，其学术地位的意义毫不亚于教会创建时代里的神学博士们。我们的博士是大众语言和思想的塑造者，即便他也从领袖那里拿来口号，即便罗森贝尔格作为党的哲学家领导一个特殊的部门，包括执掌“犹太文化研究所”。

1934 年召开了一个“忠诚党代会”，叫这个名字是为了抹除和遮掩瑞穆反叛事件。在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戈培尔提出了他的指导性口号：“我们必须说人民懂得的语言。想要向人民说话，就必须像马丁•路德讲的那样，投人民之所好。”帝国首都——在所有公开的报告中，一直到最后，柏林都被叫得这么响亮，甚至当帝国的一块块地盘早已落入敌人手中、柏林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遍体鳞伤、濒临死亡时依然如此——，在帝国首都，它的占领者，纳粹党的大区区委书记戈培尔最频繁地向柏林人发表讲话的地方，就是体育宫，而他眼中最有民俗风格的，他最信手拈来的画面，也来自于体育运动。他从来不会以为，拿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与体育运动的成绩进行比较，会是对前者的一种贬低；战士和运动员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具有角斗士的特质，而角斗士特质对于戈培尔来说就是英雄主义。

每一种运动都可以被他用来作为表达手段，人们经常感觉到，他对这些运动词汇异常熟悉，脱口而出，以至于他对它们的画面全然不觉。1944 年 9 月的一个句子叫作：“当冲刺的时刻到来，我们不会气喘吁吁”——我完全不能想象，戈培尔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眼前真的会有赛跑运动员或者自行车车手最后时刻拼力的样子。而在做下面这个断言的时候，情况又不同了：“哪怕只比别人提前半步冲过终点线的人”，也是胜利者。这里画面完整、比喻运用得当。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例子只是摄取了速度竞技运动的一个结束场景，另一回则是展开了整个

场地，不惮使用足球运动所有的专业术语。1943 年 7 月 13 日，戈培尔在《帝国》里写道："就像一场伟大的足球战役的胜利者，他们在离开足球场时和他们进入场地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一个民族在结束一场战争时和开始一场战争时也不一样……军事纷争在这个（最初的）战争阶段完全不能公开提及。我们完全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作战……"而现在人们竟然要求轴心国盟友投降！这就完全等于"输球一方的领队竟然荒唐地向赢球一方的领队提出，这场比赛在 9 ：2 领先的情况下中断……如果这个球队接受了这个要求，人们就会有理由嘲笑它，并且朝它啐吐沫。这个球队已经赢得了胜利，它只需要保卫它的胜利。"

有时候我们的博士会把不同门类运动的表述搅和在一起。1943 年 9 月，他指教说，强者不能只是在施予的过程中、也应该在获取中证明自己，不可以向任何人屈膝示弱（keinem ein Weichwerden in den Knien verraten）。否则，他继续道（一边从拳击运动跳到单车运动）就会"面临被甩掉的危险"（abgehängt werden）。

然而，绝大多数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此外也最为粗糙的画面全是取之于拳击运动。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思考，即这种与运动语言、特别是拳击语言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都于事无补：人们面对这里昭示的人性情感的整体缺失茫然失措。在吞噬了如此多生命的斯大林格勒灾难之后，戈培尔找不到更好的表达以形容宁折不弯的勇敢精神，只有这一句："我们擦去眼里流出的鲜血，廓清视线，当下一个回合开始时，我们又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几天之后他又说："一个至今只用左手击拳并正准备为右手配备拳套，以便在下一个回合里无所顾忌地使用它的民族，没有理由作出退让。"当第二年的春季和夏季，德国的城市四处遭受毁灭，其居民葬身瓦砾之下时，最后胜利的希望只能用荒谬的掩饰维持，为此，戈培尔找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拳击手在夺得了世界冠军之后，通常不会比之前虚弱，即便被他的对手打坏了鼻骨。"还有："……当一个人受到三个粗莽的无赖袭击，他们不按照规则出拳，只图得胜，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即便是最优雅的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脱下

裙袍，挽起袖子的。”这是对无教养之众的、也即希特勒式的拳击膜拜最准确的模仿，它的背后隐藏着对违反规则的、对新式武器的公然辩解。

我要说，戈培尔式宣传鼓动的所有极端化都是有道理的，其作用的长久和广泛已经为其自证。但是我不能相信这些拳击运动的画面完全发挥了它们的效用。毋庸置疑，它们令我们的博士的形象无人不晓，它们令战争众所周知——但这是在另一层面上，而并不是在所追求的意义上：它们抹去了战争所有的英雄主义色彩，它们给战争添加了粗野和最终对雇佣兵职业不以为然的印象……1944 年 12 月，《帝国》发表了当时颇受尊敬的文学家施瓦茨·凡·拜尔克（Schwarz van Berk）的文章，对局势加以抚慰。这个观察刻意写得没有激情。文章的题目叫：“德国会在这场战争中因技术点数出局吗？我打赌不会。”这话与戈培尔关于斯大林格勒之难的那些句子不一样，说它同样粗蛮是完全错误的。不，这只表明那种感觉已经死去，察觉不出拳击运动和战争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衡量的区别，这场战争已经丧失了全部的悲剧性的伟大……

Vox populi[1]——总是这个共同经历者的问题，在这众多的声音中，哪一个将是那个决定性的！

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在逃跑途中，我们在艾夏荷附近一个上巴伐利亚村子的入口处遇见了一些人，他们正在挖掘深坑。除了铲土的还有一些旁观者，一部分是身穿制服的这场战争的残疾人，独臂的、单腿的，一部分是高龄的白发平民。他们在泛泛地聊天；显然是在说人民冲锋队的队员们，他们要从这些坑洞里用防坦克导弹发射器对准压过来的车辆射击。在这些日子里，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崩溃，我一次次耳闻对于胜利信念的表白，相信奇迹还会发生；而这里全部坦露的则是这样的信念，甚至是愉快的信念：一切抵抗运动都是无用的，这场无谓的战争今天或者明天就会结束。“跳到那里面去——跳进自己的坟墓？……我

1 拉丁语：人民的声音。

可不干！”——“如果他们绞死你呢？”——“好吧，我爬下去，不过我会带上一条毛巾。”——“这事我们大家都要做。把毛巾当作白旗举起来。”——“更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印象更深刻的是（那不是美国人吗，不是体育爱好者吗）——把那玩意儿扔给他们，就像人们往拳击台上扔毛巾……”

33

追随者

每当我听到“追随者”（Gefolgschaft）这个词，眼前就会出现我们那个在缇密西 & 莫比斯公司的“追随者大厅”，而且是出现两个画面。大厅门口的上方始终书写着大号的“追随者大厅”字样。那下面就有两种情况。要么门框上有颗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个写有“犹太人！”标示的牌子，相邻的厕所也挂着同样的警示牌。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很长的大厅里有一个巨大的铁蹄形桌子和与其相配的椅子，衣物挂钩占了半面长墙，一张讲台和一架钢琴靠在一面窄墙边，此外，除了那个所有的厂房和办公室里都挂着的同样的电动钟，就什么也没有了。另一种情况是大厅门上和厕所边挂的两个牌子都消失了：这时，厅内的讲台蒙上了弯钩十字旗，主席台上，多面弯钩十字旗帜拥簇着希特勒的大幅画像，在木质墙裙之上一人高的地方，绕大厅一圈，拉起了一条挂满了弯钩十字小旗子的装饰彩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从荒芜转为节庆气氛的变化一般发生在上午时分——，那么我们半小时的午休会过得比平常

开心一些；因为接着我们会被允许比平时提前一刻钟回家，理由是大厅必须在下班之后立即毫无犹太人痕迹（judenrein），立即交还给它的膜拜使命。

这一切一方面跟盖世太保的规定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我们老板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他的仁义给他带去了许多麻烦和危险——给我们从雅利安人食堂送来了一些马肉香肠——最后也还是让老板收获了好处。盖世太保严令要把犹太人与雅利安工人完全隔离开来。在干活的时候，这一点做不到或者说难以完全做到，于是在置放衣帽和吃饭的地方就需要更加严格地遵守。M. 先生本来完全可以把我们塞进随便哪一间阴暗狭窄的地下室里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给了我们这个亮堂堂的庆典大厅。

在这个大厅里，我关注了身边人持续的争执，一会儿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基本问题或者是德意志属性的，一会儿是，而且更频繁、更激烈，关于不戴黄星者的特权问题，一会儿又是关于最无谓的琐碎东西，这些令我思考了许多关于第三帝国语言的问题及其各个方面。然而，在所有的日子里不断抓住我的，我在这个空间里任何其他的思考都不会完全抹除掉的，没有一场争吵声能够盖过的东西，是“追随者”这个词。纳粹主义全部的感情欺骗，把隶属理性的事物刻意地拐骗进情感范畴、在情感云遮雾罩的保护下刻意进行扭曲的万劫不复的罪恶：在我的记忆中，所有这一切都挤在这个大厅里，就像在庆典的日子，在我们消失之后，公司的雅利安追随者们全部聚集在那里一样。

追随者！聚集在那儿的事实上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工人和职员，他们为履行一定的义务领取一定的报酬。他们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的一切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如果说在老板和他们中的个别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亲密关系，这有可能，但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引来麻烦——无论如何，适用于所有人的是公事公办的冷漠的法律。而现在，在追随者的大厅里，他们被人从这个规则的清晰里剥离出来，让仅仅一个词给装饰、升华了：追随者。这个词为他们装载上古德意志的传统，使他们成为忠臣顺仆，成为追随其贵族和骑士主子的、携带武器的、负有效忠

义务的人群。

这种乔装打扮是一种无害的游戏吗？

断然不是。它将一种和平的关系扭转为战争的关系；它直接通向所有的条幅上渲染的那个精神："领袖，发布号令，我们追随！"

古德语通过其古老和不再日常运用之状态显示出诗意，而仅仅一个进入古德语的微小的转向，有时候只是抹掉了一个音节——其话语的对象便会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绪状态，他的思想被引导上了另一个轨道，或者说他的思想被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强加的虔信的情态。一个权利维护者（Rechtswahrer）的同盟是与律师联合体完全不能相比的更为仪式化的东西，长官（Amtswalter）听起来比公务员或者干部要隆重得多；而看到办公室的门上甚至写着"行政掌管"（Amtswaltung）而不是管理时，我会有某种宗教的神圣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办事部门，我不是得到履行职责的义务服务，而是受到"照管"（betreut），而照管我的人，我无论如何是要感谢的，绝不可以提出过高的要求，或者甚至表示出不信任，对之造成伤害。

我说这些是不是离题万里，跟指控第三帝国的语言毫无关系了？"照管"的确是个一直在使用中的表达，公民法律书也承认代理人（Treuhänder）。没错。然而第三帝国使用"照管"却过于频繁，过于勉强，完全失度——在一战中，大学生们在军队里有配备的学习资料，可以修读课程，受到继续教育，而在二战中，他们则被"远程照管"（fernbetreut）——而且将它纳入了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的中心和目标是正义之感（Rechtsempfinden）；从来不谈正义之思，也从来不单独谈正义之感，而是只谈"健康的正义之感"（das gesunde Rechtsempfinden）。所谓健康的，就是符合党的意志和利益的。在铜绿事件发生之后，这种正义之感鼓动了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同时，"赎罪"（Buße）这个词又含有了一种轻轻的古德语之音。

焚毁了一座座犹太教堂的纵火案都是精心策划的。为了给那些纵火案寻找理由，需要更强烈的、更深入的语言，而不是光利用感觉。于是

出现了“沸腾的民族心灵”（kochende Volksseele）这样的夸夸其谈。这个表达当然不是为作持久使用而创造的，倒是那些当时刚好时兴起来的词汇，如“不假思索”（spontan）和“本能”（Instinkt），成为第三帝国语言的长久财产，特别是“本能”，一直到最后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当他的本能被呼唤时，会做出不假思索的反应。1944 年 7 月 20 日之后，戈培尔写道，对于领袖的谋杀只有这样一种解释，即“恶魔般的智能的力量疯长，压过了本能的力量”。

这就揭示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之所以钟爱所有的听从感情和本能的东西的最终缘由：这个本能发达的混乱的羊群盲目地追随它们的领头羊，即便它跳入大海——（或者被甩进了大海，像拉伯雷所描述的；而谁又能说，希特勒在 1939 年 9 月 1 日还是自觉自愿地跳进战争的血海里？他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之前的错误和罪行逼进了这场丧心病狂里？）

强调跟随感情一直是第三帝国语言之所爱；而与传承对接不过是其偶尔乐意之为。对有些东西不能不持有疑虑。从一开始，领袖就把民间的东西视为竞争对手，与它们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即便后来再无必要畏惧它们，他也只能部分地使用它们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德意志性质的东西（Teutschtümelei），同时也要以工厂的工人为依靠，不能让科技和美国主义过于边缘，更不要说令其遭受辱没了。当然，始终受到推崇直到最后的，依旧是根植土地的、富于传统的和敌视革新的农民，而那个表白的缩略语形式 BLUBO（Blut und Boden）（血统与土地）也正是指向农民的，更是从其生活形式中得出的。

从 1944 年的夏季开始，一个在德国早已负载着历史含义的低地德语词获得了新的、悲惨的生命：“迁徙队伍”（der Treck）。在此之前，我们这儿的人只知道有在非洲寻找家园的荷兰和德国族裔，有他们组成的迁徙队伍。而现在，所有的马路上都绵延着迁徙的队伍，他们是从东部返回德国土地的移民和逃难者。当然，在这个“返回”（heim）里，也含有一种做作，甚至是一种十分陈旧的做作，它从这些不幸的日子一直回溯到光荣的肇始时期。那时候叫作：“阿道夫·希特勒引领萨尔返

回！”情绪还十分饱满的戈培尔带着柏林的傲慢，旅行到德国当年的殖民地，教那里的黑人孩子齐声高喊：“我们要返回帝国！”而如今却是被连根拔起的移民带着总算抢救出来的财物，返回到问题重重的境遇里。

七月中旬我在德累斯顿的一份报纸上（是这样，除了真正的党报《自由之战》以外，只还有唯一的一份德累斯顿的报纸了，所以我没记下它的报名），读到某一个通讯员的文章：“350000 人的流亡队伍”。这个描述，肯定是完全一样地或者改动很小地登在许多报纸上，很具有代表性、很有意思，而且是在双重意义上的：它再一次矫情地描绘了农民之属性（Bauerntum），给它涂抹上一层英雄主义的色彩，犹如和平年代在木马山上举行丰收庆典的时候，对乡土农民进行大肆渲染，同时，它无所顾忌地汇集了第三帝国语言所有的关键性调料，让某些在时代的困厄下不再使用的修饰词语再一次得见天日。这 350000 个被人从南俄国引渡到瓦尔特大区的德国移民，是“最纯正德意志血统的、真正的德意志属性的德国人”，他们富有“永不衰竭的生物建树能力”——在德意志的统辖下，从 1941 到 1943 年，他们的婴儿出生率从 1.7% 上升到 4%，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农民的和乡亲的乐观性情”，他们“对新的家乡和民族共同体充满了高涨的激情”，等等。结语说，他们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完全应该作为“全值的德国人”（vollwertige Deutsche）获得承认，更不要说他们中的年轻人早已是武装党卫队的队员了。从这个结尾当然可以推导出，他们的德语语言知识和他们的德国文化教养不算最好；总而言之：在这个“独一无二的”（einmalig）“流亡队伍”一词里，农民特性又一次通过最初有些片面的对传统事物的热情而被浪漫化。

在那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就是直接负责第三帝国语言的大师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善于出于通盘的考虑拆解传统和感情之间原本的联系的。民众只能通过感情的作用加以掌控，这一点对于他和领袖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一个中产市民的知性心灵对人民大众能有多

少理解？”戈培尔在他的（肯定为公众狡猾地处理过的）日记《从皇帝宫廷到帝国元首府》中写道。仅仅通过对所有的事物、形态、人员与人民之间关系的不容忽略的、随时随地的、乃至令人生厌的特别强调——“人民的同志”（Volksgenosse），“人民的总理”（Volkskanzler），“人民的害虫”（Volksschädling），“贴近人民”（volksnah），“与人民隔膜”（volksfremd），“心系人民”（volksbewußt），等等，无穷无尽。仅仅通过这一点，就已经有了一个持续的对情感的强调，这种强调听上去有某种虚伪与无耻。

那么，戈培尔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人民，他将自己算作其中一员的、他所了解的人民？可以确定他找不到。根据其柏林日记在相同页数的记载，他认为戏院只是“被一群边塞沙土上的亚洲人”占据着，这话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里只是形象地表露了普遍的反智主义和反犹主义；比较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他在《为柏林而战》里多次并且总是歧视性地使用的一个词。这本书还是在他尚未掌权、但是已经胜利在握的情况下写下的，描述了 1926/27 年那个时期，戈培尔从鲁尔区出来，开始为他的党夺取首都。那个在这里不断出现的表示反感的词叫作：“柏油”（Asphalt）。

柏油是人造的铺层，它把大城市的居民与自然的地面分离开来。在德国，最先（1890 年前后）象征性地使用它的是自然主义的诗歌。一朵“柏油花”当时意指一个柏林的妓女。但这几乎与斥责无关，因为在这首诗里，妓女或多或少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而到了戈培尔那里则是一个整体的柏油植被繁花盛开，每一朵花都具有毒性，而且还要彰显其毒性。柏林是一个巨大的柏油怪物，它的许多犹太报纸，那些犹太“恶记”的劣作，是柏油之肌体，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旗帜必须强行地“插入柏油中去”，“犹太人用陈词滥调和虚伪的许诺为通向（马克思观念的和丧失祖国的）厄运之道路铺设了柏油”。这个“巨大的柏油怪物”的吓人速度“把人弄得没心没肺”；于是这里生活着“一摊无形无态、无名无姓的世界无产者”，于是那个柏林无产者就是“一块无家可归”……

戈培尔当时感觉柏林全然缺失的是“那种夫权维系的体统”。他自己是从鲁尔区来的；他在那里也和工业劳动者打过交道，但是他们是另一种样式的，特别的样式的：那里还有“原初的根植于土地的特质”，那里的居民基本成分是“固守乡土的威斯法兰人”。所以那时候，三十年代初，戈培尔依然持守着传统的“血地崇拜”（Blubokult），用土地与柏油相抗衡。再后来，他在抬举农民的表达中变得比较小心了，但是一直到十二年之后，他才收回了对柏油人（Asphaltmenschen）的咒骂，而即便是在收回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弃欺骗，因为他没有说，是他自己灌输了对大城市人的蔑视。1944 年 4 月 16 日，目睹空袭造成的可怕的后果，他在《帝国》里写道：“我们大城市的居民所表现的这种不可摧毁的生活节奏和无以折损的生活意志，令我们深怀敬畏。柏油并没有使他们失去根基，虽然此前有经常是善意的、理论阐述充分的书籍一次次向我们论证这一点……我们民族的活力在这里与在德意志的农民特性中一样，坚定地驻扎下来。”

当然，人们并没有耽搁对工人阶级进行感情上的升华和笼络工作；人们同样也以矫情的腔调去争取了工人。铜绿事件之后犹太人被禁止开车，对此，当时的警察总长希姆莱不仅仅以犹太人“不可信任”为理由，而且声称犹太人开车“有辱德国人的交通共同体”，更不要说他们还会狂妄地使用“由德国工人的双手建造的帝国高速公路”。但总体来说，感情加传统主义这样的混合最主要的、首先的是通向农民和乡村的风俗的——“风俗”（Brauchtum）也属于在诗意的古德语基础上的矫情词汇。1945 年 3 月，我每天面对一幅画，一幅《法尔肯施泰因报》报栏橱窗里的画，徒劳地绞尽脑汁。那上面是一座木结构乡村建筑，毫无疑问很漂亮；房子的下面是罗森贝尔格的话：一座古老的德国农屋包含了“比所有的摩天大厦之城和钢板屋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的精神自由和创造力”。我徒劳地寻找这个句子可能具有的理由：这个理由只有在纳粹的北方傲慢中寻找，在他们用感情替代思考的方式里寻找。

其实，在第三帝国语言的王国里，为赋事物以矫情，完全没有必要

回头去与某个传统对接起来。它可以随意地联系上日常用语，可以使用口语里的通俗词句，也可以采取不规范的词语形式，它还可以拿过来一个看上去极为冷静的新词。

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同一天作了好几个记录：“凯姆平斯基广告报：‘普鲁士精美食品篮50马克，祖国精美食品篮75马克’，在同一张小报上登着官方的为这类‘一锅煮’（Eintopf）制定的各项指南。这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手段，用激发爱国主义情感来为一顿美餐作广告，是何等的拙劣和富有蛊惑性；新的进餐规定又加上了何等巧妙和富有联想的冠名！它把一切都囊括了进来：配制给所有人的饭菜，最日常的和最必要的人民共同体，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对于富人和穷人同样的简单化，以及用最平实的话语表达的最重要的意义！一锅煮——我们所有的人都只吃简单的、在一个锅里一起煮的食品，我们大家都从同一个锅里吃饭……”

“一锅煮”这个说法作为餐饮专有名词可能早已被广泛使用：给它灌注情感引入第三帝国语言的官方用语，则是从纳粹立场出发的一个天才举动。同样层次的还有“冬赈”（Winterhilfe）这个词。谎称为自觉自愿的、真情实感的捐赠，实际上是被强迫的交付。

在正式地说到小伙儿(Junge)和丫头(Mädel)的[不是男孩儿(Knabe)和女孩儿（Mädchen）的] 学校的时候，在强调“希特勒小伙儿”（希特勒青年团）与“德意志丫头”（der BDM 德意志女青年团）在第三帝国的教育制度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也会用上矫情手段。确实，这里的矫情手段是有意使用了负面的预示，“小伙儿”和“丫头”不仅比“男孩儿”和“女孩儿”听上去更加民间化或者更加随意，而且也更加粗鲁。特别是“丫头”，它打开了通向后来的“武装女助手”（Waffenhelferin）的道路，后者是个半遮半掩或者完全遮掩之词，断然不能与“扛枪女流”混为一谈——就像不能把“民族风暴”（Volksturm）与游击队员两相混淆一样。

当人们在最后一分钟——已经不能说最后一小时了——还要公

然地进入帮匪战时，他们为此所选择的词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有着惊悚童话的作用：帮匪战的斗士们在官方的电台里称自己为“人狼”（Werwölfe）。这又是一次跟传统的对接，而且是与最古老的传统、与神话的对接，于是那种惊人的反动最后又一次在语言上昭示出来，是返回到人类原始的、野兽般的发端的绝对倒退，也就是去了面具的纳粹主义的真正本质。

在谈到政治地理，比如说到“心脏国家保加利亚”（Herzland Bulgarien）时，这种矫情化也很明显，虽然较为无害，但也加入了更强烈一点的虚伪。表面上这只是标明一个中心的位置，指出这个国家在与周边国家群体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上的中心意义；然而背后隐藏的，没有说出口、却还是说出口的，是结交友谊的示好，对一个“心脏国家”表示好感。

最后，用于为纳粹主义服务的最强烈和最常见的感情词叫“经历”（Erlebnis）。这个通常的语言用法有明确的区分：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时刻都在生活，但是只有非同寻常的时刻成为“经历”，只有那些我们沉静在激情里的时刻，我们感觉到命运的影响的时刻。第三帝国的语言刻意地将事物扯进经历的范围。“年轻人经历威廉·退尔”，这是许多类似的标语口号中保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1935 年 10 月，帝国文献协会萨克森州会长为读书周给媒体写了一个题词，它暴露了编造这个口号的深层意图：《我的奋斗》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新德国的圣典，必须完整地“体验”（durchleben）之……

每当我踏入“追随者”大厅时，所有这些东西，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便走进我的脑海，而且真的：它们全都归属于对这一个词的追随，它们的成立全都归功于这同一个倾向……

当我在这个工厂劳动小组的日子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在犹太人居所里发现了一本畅销书《耶特兴·盖博特》的作者盖奥尔格·海尔曼（Georg Hermann）的长篇小说：《一个时代在死去》。这本书是犹太书籍联合会出版的，大概在构思时就已经受到了正在上升的纳粹主义的很大影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日记里没有对整本书的详细记载；我只记下了书里一个场景，一句句子："在他情人的悼念仪式尚未开始之前，古佩斯太太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墓地的小教堂，'她的随从虽然不那么匆忙，却也加快了速度，做着正是随从们该做的事情，他们跟着她。'"我当时视此为纯粹的嘲讽，那种受到纳粹极端憎恨的犹太式的嘲讽，因为这种嘲讽将虚伪的情感逼入窘境；我对自己说：作家把那个泡肿的词语刺破了，使它可怜地萎缩起来。如今再读这段话时我的想法已经改变，我相信，与其说它充满了嘲讽，毋宁说它饱含着深深的怨恨。因为，所有那些情感泡沫最后的目的和成果是什么？那种感情不是为感情而感情，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只是方式和途径。那种感情是为了挤走思考——思想不得不让位于麻木迟钝、意志和感觉的丧失；否则，人们从哪里弄来这必不可少的大批的刽子手和行刑施暴的奴才？

完美的追随者干什么？他们不思考，他们也不再感觉——他们跟随。

34

那一个音节

其实是直到去年，我才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而不是从报纸上的照片和收音机里见到和听到纳粹的游行队伍。因为，每当感觉到有这样的队伍到来时，即便我自己尚未佩戴黄星——而那之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总是赶紧逃到旁边的小路上，躲进安全地带；否则我就必须向我憎恶的旗帜致敬。但是在最后一年，我们被塞进了兵器库广场边的一座犹太人居所，那里一共有两座给犹太人集中居住的房子，从那个住所的门厅和厨房的窗户望出去正好就是卡罗拉大桥。那边的国王之岸经常举行盛装的庆典活动，比如穆池曼发表一个讲话，或者是弗兰肯地区领导人史特莱歇作一个致辞，冲锋队和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的方阵就会举着他们的旗帜，唱着他们的战歌穿行大桥。无论我是否愿意：那情景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每一次我都绝望地对自己说，可见，对于那些缺少批评意识的人，这种印象会怎样的强烈了。

在我们的 *dies ater*（黑色之日）前没几天，1945 年 2 月 13 日，他

们还这么走过大桥，精神焕发，歌声嘹亮。那歌声听上去与巴伐利亚人在一战中唱的行军歌有点不一样，有些不流畅，有些吼叫的味道，旋律要差一些——但是纳粹总是有那种军事的东西，而且全方位地夸张，就这样，他们依旧守着他们的秩序和信心在那下面行进着、歌唱着。多久了，斯大林格勒溃败，墨索里尼倒台，多久了，敌人抵达并越过了德国边界，多久了，领袖自己的将军们试图谋杀他——而那下面依然还在行进和歌唱，最后胜利的神话依然活着，或者说，一切依然受制于那个强迫症，相信最后的胜利！

我见识过一些文字，是我偶尔在这儿或者那儿获取的东西。那一切都是那么粗糙，那么贫瘠，与艺术和民俗文化都相距甚远——“战友们，他们红色前线和反动派击毙（Kameraden，die Rotfront und Reaktion erschossen）／行进在我们的队列里”：这就是豪斯特·维塞尔之歌的诗意。人们得费力运舌，得猜谜。也许红色前线和反动派是第一格，被击毙的战友存在于正在行进中的“棕色的营队”的精神之中；也可能——这首“新德意志礼颂”，在官方的学校歌本里叫这个名称，是维塞尔早在1927年就创作了的——，也许，这一说法与客观真理可能比较接近，这些战友因为几枪胡乱的扫射而坐了监，正在自己如饥似渴的精神世界里，与他们的冲锋队朋友们一道行进……而行进的队伍里会有谁、受众中会有谁去思考这一类语法或者美学的东西呢，还有谁会为这个内容去冥思苦想？那旋律和行进的步伐，几个面向“英雄本能”发出的固定用语或套话：“高举红旗！……为冲锋队的战士让开道路！……希特勒的旗帜迎风招展……”：这难道还不足以调动起他们想要的气氛吗？

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段时间，德国的必胜信心头一次遭到沉重打击的时候。戈培尔的宣传十分懂得如何巧妙地把这个重大的、后果可怕的失败转变成一个胜利，起码是一个精神胜利，同心同德精神的最伟大的凯旋。我当时特别记录了一则前线报道；这份东西当然早已被藏匿到外面，与先前所有的日记一样藏在琵尔纳，但此时它却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根据报道，对于俄国人的劝降，最前线的战士们给予了齐声回

答（Sprechchöre），坚定地表明了他们对希特勒和他们的使命的不可动摇的忠诚。

"齐声说"在运动开始时曾经很红过一阵，斯大林格勒之难时又在那边重新冒了出来，而在国内却几乎再也没有发出过什么声响，只有一些标语或隐或现地让人产生一些回想。而现在，那个我经常会问自己的问题又在头脑中出现：为什么"齐声说"给人的感觉比"齐声合唱"要强烈、要粗暴？

我相信是基于这样一些理由：语言是思想的表达，"齐声说"直接地、以赤拳相加的方式砸在了说话对象的理性上，意图奴役之。在歌曲里，旋律是柔和软化的包皮，理性可以绕道感情赢取。行进者的歌声实际也不是唱给马路边的听众的；听众只是被那个喧嚣声吸引住了，那个自顾自地涌动的河流发出的喧嚣。而这一涌动，这个行进旋律的同一性，相比于一个"齐声说"的共同性，更容易达成，也显得更加自然：因为在歌唱中，在旋律里，是情绪和情绪的呼应，而在众人共同说出的句子里，却应该是一个团队的思想的契合。"齐声说"更加造作，更加需要学而得之，比起歌唱，它的宣传鼓动具有更强的暴力性。

纳粹上台之后很快便在德国放弃它了，他们不再需要它了。（宗教仪式式的"齐声说"，像它不时地使用在党代会和其他的庆典场合里那样，从本质上说，肯定与游行队伍里砍伐式的句子是一个东西："德国醒来！犹大惨死！领袖发令！"等等等等）……

特别让我沮丧和感觉无望的是，人们不认为有必要背弃那些流传已久的粗俗的歌词：既不认为需要祛除"齐声说"，也不认为那些歌词中无节制的夸口和威胁需要收敛。如今闪电战变成了拉锯战，胜利变成了最后胜利，如今最后的总攻也进入了停顿，如今……然而，为什么总要继续列举这一切挫败失利呢？他们与往日一样行进、歌唱，人们与往日一样接受认可这些；在这个不知廉耻的歌声里，感觉不到任何一点退让，让人无从汲取哪怕最微弱的希望……

然而这样一个希望之形迹却是存在的，一个本来会令我这个语文学

者感到喜悦的迹象——假如这个迹象当时对他有所显露的话。这个由唯一的音节带来的慰藉我是后来才获知的，而那时它对我只剩下科学价值了。

说来话长，但是值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军认为，从我们“德国高于一切”的国歌中可以读出德国人的攻占意志。但那并没有道理，因为这个“高于世界上的一切”所表达的并不是扩张的贪欲，而只是爱国者对他的祖国所作出的情感上的价值判断。比较麻烦的是战士之歌：“我们要光荣地战胜法国、俄国和全世界。”然而，即便从这里也不能完全有效地证明出真正的帝国主义来：人们可以自辩说，这是一首全然的战争之歌；唱这首歌的人，感觉自己是祖国的保卫者，无论有多少敌人，他们都要“光荣地战胜”他们，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自己——这里并没有要占据别人领土的意思。

不妨拿一首第三帝国最富有特征的歌词进行对比，它出自于一本专集，1934 年就收入了《歌友，德国青年校园歌曲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合会帝国主管局主编”，并因此获得了官方的普遍的重要意义。“面对红色战争 / 世界疏松的骨头战栗。/ 我们打破惊惧，/ 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我们将继续前进，/ 即便一切成碎片瓦砾，/ 因为今天德国属于我们 / 明天是整个世界。”这是在领袖刚刚赢得内政方面的胜利之后，也就是说在他上任政府总理时红起来的，他当时在每一个讲话里都强调他的和平意愿。但是马上就有了从打成碎片 - 瓦砾到占领世界之说。为了使这个占领意志的明确性不容置疑，在接下来的两个诗节里又对此加以重复，一次是，我们将战斗，将“全世界变为一堆废墟”，然后是，“众世界”（复数）将徒劳地抵抗我们，同时所有三个重复句一再保证，明天全世界将归属我们。领袖发表了一个接一个的和平讲话，他的年轻国民们和希特勒青年团员则要一年又一年地唱着这个卑劣的歌词。唱着它和颂扬“德意志忠诚”的国歌……

1945 年秋天，当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谈论第三帝国的语言时，我

以《歌友》为例，并引用了战栗的疏松骨头这首歌，此时我也可以读到这本集子了。报告之后，一名感觉受到伤害的听众走上讲台，说："您为什么错误地引证如此关键的东西，您为什么要说德国人有占领世界的欲望？即便在第三帝国里他们也没有这种欲望。这首歌并没有说世界应该属于我们。"——"您明天到我这儿来，"我回答道，"您可以自己读这本校园歌曲集。"——"您肯定弄错了，教授先生，我给您带正确的歌词来。"

另一天他来了；《歌友》(1936年第6版，弗朗茨·厄尔作词，慕尼黑，"巴伐利亚文化厅批准为学校用本，并推荐用于相关场合"；但前言的日期是：拜伊洛特，1934，于叁月"）放在那里，打开了所涉及的那一页。"今天德国属于（gehören）我们，明天是整个世界"——这里不可以作狭隘的诠释……

不，是可以诠释的。那位男士给我看了一本漂亮的微型歌本，可以用一根带子系在纽扣洞上的。《德国歌曲；运动之歌》，"德国人民冬赈中心主编，1942/43。"全是纳粹主义的象征物：弯钩十字，SS-图符等等装点着封面，在那些歌曲下面也有疏松的骨头那一首，十分的粗鲁，但是关键的地方还是修改过了。诗节的重复句现在变为："……今天，德国倾听（hören）我们，明天是整个世界。"这样听起来清白一些。

然而，因为德国的掠夺欲望的确让一个世界躺在了废墟之中，又因为现在，在斯大林格勒的冬天里，完全不再有德国将取得"伟大胜利"的样子了，这个修改便还得进行强化并加以评论。于是又添加了一个第四诗节，其中占领者和压迫者企图给自己戴上和平的朋友和自由的战士之面具，并且控告别人对他们原本歌词进行恶意诠释。新诗节是这样的："他们不愿意理解这首歌，他们想到的是奴役和战争。/其间我们的庄稼成熟，你，自由的旗帜飞腾！/我们将继续前进，即便一切成碎片瓦砾，/自由在德国站起，明天世界都属于你！"

要怎样厚颜无耻才能如此罔顾事实、瞒天过海！又是要怎样穷途末路，才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不相信，这第四节诗还有过什么生命力；相对于前三节拙劣的简单直露，第四节过于纠缠，隐晦不清，而前三节原本的野蛮却仍然无法完全掩盖。不过，缩回利爪，遮遮掩掩地去掉令人生疑的音节，这似乎是做到了。

必须记住这一现象。恰恰是在“属于”（gehören）和“倾听”（hören）之间，划出了一条纳粹自我意识的界线。“ge”这个音节的失落意味着，斯大林格勒的失落，投射在纳粹歌曲这个层面。

35

交替冲淋

在清除了罗姆、平息了罗姆的追随者之间发生的小血拼事件之后，领袖让他的帝国国会为其出具证明，确认他是“依法”（rechtens）办事的。一个特别传统的德意志的表达。于是，被镇压的罗姆党徒的起义或者骚乱或者暴动或者倒戈，虽然有那么多的德语名称摆在那儿可用，人们却称其为罗姆反叛（Röhmrevolte）。这里，——语言，它为你吟诗和思考！——无意识的或者半意识的音声联想肯定也发生了作用，类似于卡普叛乱（Kapp-Putsch），这里的联想当然也延伸到思想上的东西，延伸到了“毁坏的”（kaputt）这个词汇上：尽管如此，把一个强调德语特色的本土词和另一个异域特色明显的外来词，并无必要地用于同一个事物上，依旧十分怪异。人们也以完全同样的德国腔调谈论风俗传统，而纽伦堡，党代会之城市，正式的称呼是“传统专区”（Traditionsgau）的郊区。

从流行的外来词转化过来的德语词很受欢迎：“行医证书”，人们

用“Bestallung”取代“Approbation”；“退休”，人们说“Entpflichtung”而不是“Emeritierung”；至于“利益”，说“Belange”而不是“Interessen”，是 *de rigueur*[1]；“人道”（Humanität）散发着刺鼻的犹太－自由主义的味道，德语的人性（Menschlichkeit）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相反在标注日期时，只能在与拜罗伊特这个瓦格纳城市有关系的情况下用“于叁月”（im Lenzing），古德语的月份名称在一般的语言里没有市场，尽管有各种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和胜利－万岁－叫喊。

语言上的德意志属性受到限制及其原因，我在关于追随者的思考中曾经提到过。但是这种限制本身最多只能有助于常用外来词的存续。如果相对于前一个时期，第三帝国的语言实现了外来词的增多及其更加频繁的使用，就必然又是源自于特殊的动机。而此二者，增多和频繁，就显然是这一情况。

领袖在每一个讲话、每一个公告或者通报里，都会沉湎于两个完全不必要的、而且绝不是到处都普及了的、都能为人理解的外来词：“歧视”（diskriminieren）——他很有规律地说成“diskrimieren”，丢掉“ni”这个音节——和“诋毁”（diffamieren）。“诋毁”这个已然流行起来的词，到了他的嘴里听起来却很怪异，更甚于他平日与任何一个喝醉了的家丁比试骂仗，而且总是如此。在动员1942/43年度冬季救助行动的讲话中——第三帝国语言里所有的路标指向斯大林格勒或者以斯大林格勒为起点——他把诸敌国的部长们称为“蠢羊脑袋和废物，相互之间毫无区别”；在白宫里执政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伦敦的是一个罪犯。当目光投向自己时，他断言道，不再有“从前的所谓教养了，只有坚定的战士、勇敢的男子汉这个唯一的考量，这样的人适合做他的人民的领袖”。然而涉及到外来词时，他却像前面所说的，在并不缺少相应的德语词汇的情况下，继续没有必要地借用一些外来词。特别是，他总是自称为和平的或者德意志自由的或者弱小民族独立的或者所有其他由他昭示出来

1　英语：必须的。

的好事物的保证，这个“保证”他用“Garant”（而不用 Bürger）；以某种方式增加或者反射出他的领袖光芒的东西，总是具有“无与伦比的”（säkulare）意义，不时地，他还会受到一种“弗里德利希二世风格”（friderizianisch）用语的吸引，他用卑劣的“革职”（Kassation）来威胁不顺从的官员，而德语里的“无限期开除”（fristlose Entlassung），或者在希特勒的家丁式德语里有“扔出去”（Hinauswurf）或者“赶走”（Fortjagen）本来都可以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当然希特勒词语的原材料是被戈培尔整个地抛光过、并加工好以作多重的装饰之用的。这场战争实质性地丰富了纳粹的外来语词库。

可以为理性地使用外来词建立一个十分简单的规则。这个规则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只在此刻使用外来词，在你为之找不到完全适用的和简单的德语替代词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用外来词。

第三帝国的语言从两个方面违背了这个规则：一会儿（出于已经说明的原因而较为少见）它使用接近的进行了德语化的词汇，一会儿它毫无必要地拿来外来词。当它述及“恐怖”（Terro）（空中恐怖，炸弹恐怖，当然还有反恐怖）和“入侵”（Invasion）时，它还算是活动在贯常的路径上，但是“入侵者”（Invasoren）则是新的，“侵略者”（Aggressoren）则完全多余，而可供替代“清除 / 杀死”（liquidieren）的就多得吓人了：杀死（töten）、谋杀（morden）、消灭 / 清除（beseitigen）、执行死刑 / 干掉（hinrichten）等等。包括一直在继续使用的“战争的潜能”（Kriegspotential）也都是可以分别通过“军备程度”（Rüstungsgrad）和“军备的可能性”（Rüstungsmöglichkeit）轻易地加以替代。人们不是努力做了那件事吗：把 Defaitismus（“放弃”）写成 Defäitismus，给这个词装点出一点德语味道，然后，放弃的罪孽就作为“消解国防力量”之罪（Wehrkraftzersetzung），通向绞架的道路于是通畅。

那么，这里只用了几个例子来证明的对装腔作势的外来词的偏爱，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原因正是装腔作势，首先是它，而且，如果探究那些不同的动机，一直探究到最后一个，总是离不开这装腔作势，以及

压过某些不待见的东西的意图。

希特勒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基本都是自学。（必须读一下他的纽伦堡文化讲话，那闻所未闻的胡言乱语，比这个卡尔鑫·密斯尼克式混乱更为可怕，只有那种赞叹并加以引述的爬爬虫玩意儿。）身为领袖，他为自己不受“以往的所谓教育”之累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他自学得来的知识而自豪。每一个自学成才的人都喜欢用外来词炫耀，而后者通常都会以某种方式报复他。

不过，如果只是用虚荣和了解自己的缺陷来解释他对外来词的偏爱的话，对领袖是不公平的。希特勒极其准确地了解和算计的，始终是大众的心理，那些不思考的和可以维持在无思考能力中的大众。外来词令人印象深刻，理解的人越少效果就越惊人；它在不被理解之中施行误导和麻醉，正是要镇压覆盖思考。每个人都会理解“损坏”(schlechtmachen)，只有少数人理解“诋毁”（diffamieren），但是它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显得比“损坏”更加正式和强烈。（不妨联想一下天主教弥撒仪式中拉丁语唱经的作用。）

把说民众的语言视为最高风格要求的戈培尔，同样了解外来词语的魔力。民众很愿意听到外来词，自己也喜欢用。而且，民众也期待从他们的“博士”那里听到外来词。

“我们的博士”这个戈培尔早期的头衔还与另一个考虑相联系。无论领袖多么频繁地强调他对知性、知识分子、教授等等等等的蔑视——在所有这一切符号和专指的背后，始终暗藏着同样的仇恨，那种存心不良的反对思想的仇恨——，德国国社工党需要的正是这个最危险的民众阶层。这不是仅仅靠我们的博士和宣传鼓动分子来做的，而且也需要哲学家罗森贝尔格，他体现着哲学的和深沉的风格。诸如哲学的专业术语和大众化了的哲学，我们的博士也要将它们收进他的纲要里去；比如说，对于一个直接把自己叫作运动的政党来说，还有什么比谈论活力的本质、让“活力”（Dynamik）这个词在其知识话语里占有一个高尚的地位更合适的呢？

在第三帝国语言的领域里，不仅有知识型的专业书籍、大众民俗化的文学，后者只是拿些知识教养的浮游物当作美人痣贴膜点缀的，而且人们还可以经常在所有严肃的报纸上（我首先想到的是《帝国》和《德国汇报》，《法兰克福报》的继承者）看到语言至为臃肿的文章，很多种臃肿：钻牛角尖的，矫揉造作的和充满神秘风格的，以及独特的高人一等的。

举一个例子，这几乎是从各色各样的过于丰富的材料中随意抓取的：1944 年 11 月 23 日，也就是在第三帝国非常迟暮的时候，《德国汇报》仍然能腾出很大的版面，让一个看来刚刚戴上博士帽的封·维尔德进行自我标榜。他写了一本关于“背土离乡作为心灵现实”的书。这个作家要说的东西，已经被人讲过无数遍了，可以十分简单地表述出来：如果想要改变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情况，单单支付更多的工钱是办不到的，人们必须顾及到两个方面的心理因素，把一些精神上的诱因和城市的好处带给农村（通过电影、收音机、小型图书馆等等），同时通过教育让人懂得乡村生活的内在优点。这本书和这篇文章的年轻作者，使用的是他的纳粹专业老师的语言，这一点在这里更为重要。他强调一种“乡村民众心理学”的必要性，教导说：“今天，人对于我们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经济生物，而是一个由身体和心灵组成的、隶属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作为特定种族心灵构造的载体行动的。”所以人们必须赢得“对于离乡潮的真实特性的贴近现实的见解”。现代文明“以其特有的理性和清醒意识的极端霸权”摧毁了“乡民们原本缔结的生活形式”，其自然的基础立足于本能和感情里，立足于原始的和无意识里。这些乡民们“对土地的忠实”正在遭受破坏，因为“1. 农活的机械化及其产品的物质化，也就是说极端的经营化。2. 风俗乡习的孤立和消亡。3. 乡村社会生活的事物化和冷静的城市化。”于是就产生了“那种心理匮乏症，逃离乡村就应当被视为这种病症”，如果人们正视它，以之“为心灵现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说对于它的物质帮助只不过是“表面的”，而必须要有心灵方面的治疗手段。为此，除了民歌，风俗等等还有“电影和广

播这些现代的文化资源手段，只需要将那里内部的城市化元素拿掉”。这种腔调的表述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我把它叫作在科学、哲学和艺术各个领域里都可以运用的深层次纳粹风格。这种风格不是从民众的口头学来的，它不能够也不应该被民众所理解，而是迎合了那些追求疏离的知识分子，顺着他们的口气说话。

但是，纳粹语言艺术中最高和最具有特征性的东西不在于作两种账，分别给有文化和没文化的人看，也不只在于用几个深奥的词语震一震大众。其真正的作为在于无所顾忌地混合异质的风格元素——不对，“混合”这个词不完全合适——是在最强烈的对立的跳跃里，从学者跳到无产者、从冷静者跳到布道者的声调，从冰冷的理性者跳到男人克制的眼泪流露的动情，从冯塔纳式的平实直简、柏林的不拘礼仪到信仰卫士和预言家的激情。这方面戈培尔是无人企及的大师。这就像交替用冷热水冲澡时的皮肤刺激感，就是这样强烈的物理作用；听众的感情（戈培尔的受众总是听众，即便他们是在阅读博士的报纸文章）——他们的感情从来都平静不下来，总是不断地被吸引、被推开，被吸引、被推开，没有一刻喘息的时间留给批判的理性。

1944 年 1 月人们读到一篇关于罗森贝尔格任职十周年的纪念文章。文章说，这一职位是对罗森贝尔格、这位哲学家和纳粹学说的宣讲者的一首特别颂歌，他比戈培尔发掘得更深入，达到了更高的高度，戈培尔的职责只是对大众进行宣传。其实，这些观点是从更本质的意义上宣扬我们博士的荣光，因为从所有的比较和区分中显然可以看出，罗森贝尔格只掌握了一个低音区，而戈培尔却同时掌握了这一个和一架轰鸣的管风琴身上的其他所有的音区。（此外，即便是对《神话》最为追捧的崇拜者，对罗森贝尔格的所谓无与伦比的哲学家品质，也都是闭口不谈的。）

如果要寻找戈培尔抓住人心的风格是从哪里学来的，中世纪的教会布道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的榜样，因为在那里，表达上无所畏惧的现实主义和无情的社会批判主义与祈祷心灵升华的最纯粹的激情结合了起来。

但是这种中世纪的布道风格是从纯洁的心灵涌出的，面向一个单纯的受众，要把他们从精神狭隘的窘境提升到超越的境界里。戈培尔则相反，他狡猾地以欺骗和麻醉为目的。

1944 年 7 月 20 日的谋杀事件后，再没有人能够真正怀疑民众脱蒙的情绪和觉悟了，这时戈培尔用最不拘形式的语气写道：纳粹主义是“德国人民最大的、也是唯一可能的拯救者”，对此，只有“一些从早已过去了的过去留存下来的遗老遗少”会表示怀疑。另一次，他用一句话，把被炸毁的城市苦难描绘成，以第三帝国语言可以说是：一个友善的贴近人民的日常田园：“在残垣废墟中，炉灶烟囱好奇地从木棚里伸出它们的鼻子，又重新与火苗戏耍。”这样一个浪漫的居住地简直要令人生出渴望。与此同时，人们又应该感觉内心生出的献身殉难的渴望：我们身处“神圣的人民战争”之中，我们——知识人必然也在其中，罗森贝尔格的音区不能缺少——处于“西方人最大的危机之中”，必须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Auftrag）（这里，Auftrag 比 Mission 这个外来词更加庄严，后者已经被使用消耗得过分了），而“我们燃烧着的城市是通往实现一个更美好秩序道路上的烽火台”。

我曾经通过一个特别的勾勒表明，最大众化的体育运动在这种交替冲淋的体系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戈培尔在他 1944 年 11 月 6 日的《帝国》文章中实现了——为了再一次用纳粹的语言表达——这个大一统风格（totalitärer Stil）的最卑劣的紧绷的张力。他在那里写道，人们必须努力使“自己的民族站稳双脚，永远不会趴到地上”，并紧接着这个拳击画面继续道，德国人民进行的这场战争“犹如一场上帝的审判”（Gottesgericht）。

不过，这一段文字，还可以加上一些类似的段落，之所以让我觉得尤其特别，也许只是因为我多次极为强烈地记起它来。如今如果有谁从外地来到威廉大街，到科学管理总部办事，最方便的下榻之处便是对面的阿德龙宾馆（或者说那个从前富丽堂皇的柏林宾馆遗留下来的房子）。从那里的餐厅窗户望出来，正好看见被摧毁的宣传部长的别墅，在那里

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我已经在那些窗户边站立过六次了，每次我都会想到“上帝的法庭”，那个由他、恰好是他，信誓旦旦地宣告的法庭，在这个法庭上演最后一幕之前，他从这个世界偷偷地溜走了。

36

现场检验

1945 年 2 月 13 日的早晨有命令传来，要转移最后留在德累斯顿的黄星佩戴者。因为混血婚姻而至今免遭押运命运的人，现在必死无疑了；他们必须在途中被干掉，因为奥斯维辛早已落入敌手，特莱西恩施塔特正处于万分危急之中。

2 月 13 日这个晚上，灾难降临德累斯顿：炸弹飞落，房屋倒塌，流弹潮涌，燃烧的房梁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头上发出巨响，同一个火海将犹太人和基督徒扯进死亡；然而，在这大约 70 个黄星佩戴者中间，如果有谁躲过了这一夜的劫难，那么对于他，这一夜则是拯救，因为他可以在整体的混乱中从盖世太保的手中逃脱。

对我自己来说，这场惊险的逃跑是一次关于我的语言案例的抽样检验：我至此所知道的关于第三帝国语言的一切，至少是口头的语言，都来自于德累斯顿的一些犹太人居所和工厂这样的狭小圈子，另外当然还有德累斯顿的盖世太保。而现在，在战争的最后三个月里，我们走过了

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如此多的城市和村庄，经过了如此多的火车站，待过了如此多的简陋房和防空洞，在没有尽头的公路上，总是，总是不断地与来自德国各个地区、各个角落、各个中心的人们，与各种地位和年龄的，各种教育和缺少教育的，各种思想的，怀抱不同程度的仇恨——依然是的！——和不同程度对领袖的尊崇的人们走在一起：所有的人，确确实实是所有的人，都说着这个语言，一会儿是南德的或者是西边儿的口音，一会儿是北德的或者是东德的口音，全都说这同样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就是我在家乡听到的、用萨克森方言讲的语言。我在逃跑途中往我的笔记簿添加的东西，都不过是补充和确认。

这个经历可以分三个阶段。

中间这个阶段，包括三月的三个星期——树林每天都显示出越来越浓的春天的迹象，但看上去却是圣诞节的样子，因为所有的树枝上都挂着银色的白条，满满的，地上也到处闪烁着银光，成群的敌机抛下这些银白色的东西以扰乱德国的搜索仪器。这些飞机日日夜夜在我们头顶上喧嚣，经常冲向相邻的不幸的普劳恩市——，这个阶段，法尔肯施泰因阶段，强加给我了一段安静时间，让我研究了一些东西。

但那决不是心绪上的平静；正相反，在这段时间，我尤其需要把研究第三帝国的语言作为我的平衡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因为我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新的纳粹词，写在一些战士们的袖章上，叫“人民害虫斗士”（Volksschädlingsbekämpfer）。为此，他们投入了很多的盖世太保和军事警察，因为众多休假的军人成了开小差的逃兵，众多的平民脱离了在“人民风暴”的工作。不错，人们看得出来我已经超过了服兵役的年龄，但是，那个人民风暴的谜语不就是这么说的：“什么藏银于发、藏金于口，藏铅于四肢？”在离德累斯顿相对较近的地方，也存在着有人认出我的危险，因为我毕竟在讲台上站了十五年了，持续地培训教师，在地区里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地主持中学毕业会考。如果我被抓住了，那么事情大概不会止于我的死亡，也会轮到我的太太，我们忠实的朋友。每一回走在街上，特别是每一次踏进餐馆，都是一场

折磨；每逢有人哪怕只是稍加注意地看看我，我都无法镇静地承受他的目光。如果不是完全无路可走了，我们一天也不会待在这个危险的藏身角落里。但是，不得不离开我们的好人阿格娜斯（Agnes）那里以后，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药店”的后屋便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了。所以，只要我们不是往树林里去，寻找僻静孤独的小路，我就尽可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声，强迫自己去读资料，读任何我相信可以增进我的第三帝国语言知识的东西。

或者说得更准确点：随便什么东西，只要被我的眼睛逮到，我都在读，并且随处都能看见这个语言的痕迹。它确实无处不在；这一点我在法尔肯施泰因这个地方感觉特别强烈。

我在石赫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本小书：《医生茶谱》，德国药剂师协会编，他告诉我，那本书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版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滑稽的、后来又发现它是一个悲喜剧的、最后认为它是一本真正的悲剧的文献。因为它不仅仅用言之无物的套话表达出了最为丑恶的在主宰的通行的教条面前的卑躬屈膝，而且，当它刚要提出一个绕不过去的抗议，几乎还未说出口，便以阿谀奉承的口气令之弱化、失去效用，暴露了一个科学行业整体的、自己也心知肚明的衰败。我不厌其烦地记下了几个句子。

“不难发现，在我们人民的最广大的群体中间，可以看到一种对化疗药物的抗拒心理。相反，在最近的时间里，未经过实验室和工厂企业之手的自然药材再获青睐，人们希望并且得到了这样的处方。来自于我们的草地和树林的药草和多种药草的配方，肯定拥有某种值得信赖的和不容掺假的东西，对任何人都不例外。它们在医药上的运用证明了从久远的史前时代起的传统的医疗成就，而血统与土地结合的思想支持这种对乡土药草的信任。”在这些阐述中，奇怪滑稽的元素很明显，因为通行的纳粹主义标语口号式词语和观点如此被引入科学专业文章，是很滑稽的。然而现在，在这些谦卑的作揖和 *captatio benevolentiae*（修辞手段之后）之后，人们就无法不在商业和医药的利益上维护自己。在日耳曼传统主义的、贴近自然

的和反智主义的外衣下，再加上“不时冒出的意有所指的关于化学药物毒性的说法”的助力，黑医盛行起来，并用“不经审查的”混合制作出来的德国疗效茶做生意，赶走了化学工厂的客户和医生的病人。然而这种损失通过致歉、通过退让，是如何地被大大缩小，这位勇敢的作家再一次在执政党的观念和意志面前的鞠躬行礼又是如何之深！我们持有证书和执照的药学专家、化学家和医生也使用本土草药，只是不单单使用它，不是不加选择地使用！而现在“医生表示了继续扩大草药和茶的治疗方案的愿望，所有争取进步的医生都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自然的感受。草药和茶的治疗方案，也称作植物疗法，只是医药总体治疗方案的一部分，但却是得到和保证病人信任的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人民对他们的医生的信任是不可以因为上述情况而动摇的，人民的医生要始终强调精确的、富有责任心的和以良好的业务为基础的工作方式……”从一开始的邀宠变成了几乎不加以掩饰的缴械投降。

我找出了一本本药学和医学杂志，处处撞上同样的风格形式和同样的风格之花。我作笔记道：“要回顾一下北方的数学，《自由战斗》刚开始曾经说，它是工业学院第一任纳粹校长、我们的同事考瓦勒夫斯基的成果；不要忘记对自然科学的其他分支进行第三帝国语言疫情的检查。”

当汉斯从他的私人图书馆给我拿来新的文学出版物时，我又从自然科学回到了我自己的领域。（他依然还是三十年前那个人文科学和哲学之人；药房之类，还有党徽，不过是为眼前过一点安静生活的需要，因为不这样就会遭受太多的凌辱；当然，如果要帮助一个朋友，还是得冒点风险，危及到安静的生活——只不过，如果从一般政治的角度这样去要求，就是苛求了。）他拿给我一本新的历史书和一本新的文学史；两本书都是十分严肃的著作，从其发行量看，它们属于享有特权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教科书。于是我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评论都是从第三帝国语言这个课题的视角出发的。“将来（我在笔记中写道）不会只是普遍禁止阅读这些书；人们必须向未来的教师们细致地指出第三帝国语言的特点和罪过，我要为历史学和日耳曼学教师的讨论课提供课程案例。”

首先是弗里德利希·史蒂夫（Friedrich Stieve）的《德国民族史》。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出版于1934年，1942年达到了十二版。1939年夏天以来（第九版前言），它描述了直至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收复麦迈尔兰德的诸多事件。即便此后还有新版问世（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它也几乎无法顾及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了；因为作者在新的世界大战开始前一个月，以“没有流一滴血就实现了完整的无可比拟的崛起”的欢呼声，用可怕的不祥的比喻结束了这本书：德意志帝国“正从时代的潮流中崛起，作为积蓄和恒久的大本营，作为闪亮的未来愿景，正如阿道夫·希特勒的建筑”。我拿到的那本书几乎油墨未干，其中的第一批建筑，“那些在其恢弘的、结构清晰的浑然一体之中、以闪光的完整圆满形象地体现了力量和宁静的建筑”（“注意那建筑美学上的力量炫耀，它也是第三帝国的语言”），已经在敌机的炸弹下倒塌了。

史蒂夫的书如同一个很好的诱饵，其毒素包裹在无害的整块形状之中。这本五百页的著作，虽然贯穿着激情，其中却有一些很长的章节是以某种平静的、并无暴力扭曲的风格撰写的，随便一个会思考的读者都可能对它产生信赖。但是在那些可能显现纳粹颜色的地方，第三帝国语言的一切便会展露无遗。一切——这里的“一切”并不与“许多”意义相同；这个语言是贫乏的，它无意也无法不贫乏，只能通过重复、通过总是强调相同的东西达到强化的目的。

在庆典的时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意义的庆典，当然都会搬出“血统”（das Blut）。如果“甚至有一个歌德”在拿破仑面前感到“莫名的敬畏”，那么“血统的声音便是疲软的”；如果道尔福斯政府将矛头对准了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它的矛头也指向了“血统的声音”；如果希特勒的军队这时开进奥地利，那么“血统的钟声”便终于敲响。于是从前的东部边域便“返回到永恒的德国怀抱”。

“东部边域”(Ostmark),“永恒”(ewig)和“返回到”(heimfinden)：这些本来都是完全中性的词汇，早在纳粹主义之前就已经属于德语语言多少个世纪了，也将在未来永远属于它。然而，它们在第三帝国语言的

关联中却明显是纳粹词语，属于一个特别的条目，体现了这个条目的内在和外在的特性。“东部边域”是为奥地利设立的，它体现了与传统的连接，对祖先的敬畏，无论宣称这个祖先有没有道理，其遗产是要守护的，其遗嘱是要执行的。“永恒”，它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是一根诞生于久远的史前时代的链条上的一截截链子，这根链条要通过我们继续延伸，直到最后的远方，我们过去始终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永恒”只是纳粹的数字最高级泛滥的一个特别的例子，而数字最高级泛滥本身又只是第三帝国语言一般最高级泛滥的一个特别案例。“返回到”，这是那些最早败坏了名声的滥情表达中的一个，这种滥情来自于对血统的推崇，带来了最高级的泛滥。

对于史学家来说，“传统”和“恒久”是两个过于常用和规范性的概念，不能特别地体现历史书写者的个人风格。而史蒂夫则相反，他正是作为忠实的和正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通过不停地竭力使用感情词汇来证明自己的。

“不可抑制的”（unbändige）力量驱动着西姆布赖人和条顿人，他们攻入意大利开辟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抑制的”渴望驱动着日耳曼人“与全体进行战斗”；“不可抑制的”激情解释了弗兰克人最恶劣的放纵无羁，令其可谅，而且还使其高贵。*Furor teutonicus* 被视为“土生土长的北方孩子”崇高的荣誉称号：“他们的冲锋陷阵罩着何等的英勇光芒，对周遭的险恶毫无觉察，完全定格在汹涌而来的感情的威力之中，在那种内心激荡的力量中，在冲向敌人时，那澎湃的激情令其兴奋得高声吼叫。”

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定格”（eingestellt），这个词的基本的技术含义在第三帝国的语言流行起来之前就已经一定程度地流失了。但无论如何，机械的词语与感情强烈的表达同时存在，对这种粗暴的现象，纳粹不是迟钝不觉，就是怀有正面的偏爱，这一点在史蒂夫的书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国社工党他写道：“这一使命落到了这个政党的肩上，在德国国内充当巨大能量的发动机，建设心灵的发动机，献身于行动的发

动机，为新创建的帝国坚持不懈地唤醒人民的发动机。”

但总体说来，史蒂夫的风格还是完全以单方面地突出情感为标志的，因为他将所有的和每一个东西都归结于日耳曼人的主要特性，这个被赋予了光荣和特权的特性。

这一点决定着政治层次的划分，因为一个领导者的能力是根据他的追随者的数量衡量的，而这种追随“仅仅是建立在自愿的内心的服从性上面，所以追随之众的构成可以清楚地证明，感情在日耳曼人这里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感情给予日耳曼人以想象力，赋予他宗教气质，让他尊崇自然的力量，使他“接地气”，令其以质疑的态度面对知性。

感情把他驱入无界无限之境，于是有了日耳曼性情的浪漫主义的基本倾向。

感情使他成为占领者，赐予他德意志的信仰，相信自己的职责便是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但是伴随着强调和抬举感情一起而来的是，“对尘世的强烈欲望不能抹除遁世思想的顽强存在”，一种特别的对基督文化的倾心就建立在这种遁世思想上，所有对生活的热爱崇拜和积极的入世主义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一旦历史的进程给史蒂夫以机会——而他没有在此之前就强行去做，这一点将他与其党纯粹的宣传大员区别开来——他便列举出犹太人作为感性人的扭曲的反面形象，从这时起，纳粹的专门用语就堆积起来，说得更准确点是这些用语在反面的意义上得到了补充。“破坏”（Zersetzung）现在是一个中心词。从青年德意志开始。“两位犹太诗人，海涅和黎翁·巴汝荷，后者在洗礼之后叫作路德维希·伯尔纳”，是来自这个“挑选出来的”（auserwählt）民族的第一批蛊惑者。（我认为第三帝国语言的嘲讽性引号就是从“挑选出来的”这个词出发四处出击的。）这个时代的唯物主义精神有利于遗传资质和在流亡时期赢得的陌

异种族特质，并受到外族的推助。

于是纳粹词汇可以扩展了："毁灭性的批评"（niederreißende Kritik），"消解性的知性"（zerfasernder Intellkt），"害死人的平均主义一刀切"（tödliche Gleichmacherei），"风化"（Auflösung），"侵蚀"（Unterhöhlung），"根除"（Entwurzelung），"打破"民族界限（Durchbrechung der nationalen Schranke）。用"马克思主义"替代社会主义，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希特勒特色的，而虚假的社会主义必须标志为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异端邪说。（犹太人马克思，犹太人海涅，而不单单地说马克思或者海涅，这是修辞风格上的强化手段的一种特殊运用，早在古典修饰语中就出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第三帝国语言的这一条目得到了增强，于是有了"凶恶的破坏毒素"（teuflische Giften der Zersetzung）的说法，有了"红色的煽动者"（rote Hetzer）的说法……

第三个升格出自于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斗姿态：从此，红色前线营的"阴沉的游民"冒了出来。

最终——整个作品之冠及其风格上的顶尖表现，纳粹语言管风琴的圆满之作：那位救世主、无名士兵、来自大德国的男人、领袖出现了。于是，两个方向所有的标语口号聚集于狭窄空间。在服务于第三帝国语言的过程中，基督福音的语言发生了可怕的娼妓化，它作出决定："通过他自身信仰的巨大吸引力，这个至高无上的人能够用古老的具有魔力的语句'起来并行走'将躺在地上的病人鼓舞起来。"

我称第三帝国的语言贫瘠。但在史蒂夫看来，与1937年瓦尔特·林登（Walther Linden）在其《德语文学史》中表现的语言艺术相比，它却是极为丰富的，那本文学史肯定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在很大众化的莱克拉姆出版社出版，以其超过500页的厚度还能一版再版，达四版之多，它将希特勒时代遵从旨意的和广为传播的文学观念用如此遵从旨意的表述加以归纳，所以它必然成为了大中学校学生的一本重要手册。这本书的作者幸好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前就死了。而他在二十年代曾经主编

过一本科学性非常强的《德国国情杂志》，我自己就在这本杂志里发表过几篇研究文章。后来他彻底学习改造了，他显然把这个改变搞得特别舒适方便，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从一点出发去解释一切，用一般不超过两个词、大都是捆绑在一起登场的、几乎为第三帝国的语言认同一致的（这个语言自己会说：同一化了的）话语表达所有的事情。

每一个流派，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家不是“民族性的”（volkhaft）和“有特性的”（arthaft），就是相反的；被林登拒绝给予这个评语的人，也就被他同时否定了道德的和美学的价值，否定了所有的存在的理由。书里成段成段地，有时候几乎是成页成页地，总是这样的东西。

“继君主大厅的日耳曼英雄史诗之后，在骑士文化里第二次诞生了一个创造性的、有特色的（arteigen）繁荣文化。”

“在意大利之外，人道主义成了民众性和有自己特色事物的反面。”

“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将所赢得的心灵及感性财富引导到新的、有特色的生活的有机性一体和整体之中：引导到1750年以来的德意志运动的民族性复活中。”

莱布尼茨是“一位德意志意识的有特性的世界思想者”。（他的继承者“将他的学说异质化了”。）

克洛卜施托克的“有日耳曼特性的独自情感（Alleinheitsgefühl）”。

温克尔曼对希腊古典的阐释“将特性相连的（artverbundene）两个印度日耳曼民族引导到一起来了”。

在《葛兹·封·贝利欣根》里，“源于土地的民族特性（Volksart）、家乡的权利隶属于建立在奴隶式臣服基础之上的异族（volksfremd）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实现“借助于异质的（artfremd）罗马法……”

“黎翁·巴汝荷[1]（路德维希·伯尔纳）”和“尧尔森（弗里德利希·

1 巴汝荷此处原文为Löb，前文写作Lion，为同一人。此书统一译为黎翁·巴汝荷。

路德维希·史达尔）”是同样进行了洗礼的犹太人，虽然一个是自由派，一个是保守派，在放弃“日耳曼秩序的思想”方面，在“去除具有特性的国家思维”问题上，两人犯了同样的错误。

乌兰特（Ludwig Uhland）的“民族性的抒情诗和叙事谣曲”对重新唤醒特性意识（Artbewusstsein）”作出了贡献。

“在成熟的现实主义里，有特性的－日耳曼的感觉又一次战胜了法兰西的才思妙想和犹太－自由主义的每日报道文学。”

威廉·拉伯（Wilhelm Raabe）与“异质影响下德国民族的心灵销蚀”现象抗争。

“现实主义，一个有特性的德国运动”随着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长篇小说而告结束；保尔·德·拉噶尔德（Paul de Lagarde）为“一个有特性的德国宗教”而努力；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比那位莱姆布兰德德国人“具有更加纯正的特性（artechter）”，他使“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巨人”重新走近德国人民，唤醒“日耳曼的生活观，要让它重新成为具有塑造力的民族能量”。所有这些都挤在不到六十行的文字里，而且我还忽略了“神经质的扭曲（Entartung）”，“徒有其表的文学与永恒的、具有特性的诗文之间的斗争”，以及努力“建设一种有特性的精神生活，从而让民族性文化生根”。

1900年前后，以巴尔特斯（Adolf Bartels）和利恩哈特（Friedrich Lienhard）为代表，一个“民族性的逆反潮流”开始出现。既然人们后来宣扬起了“民族性文学的伟大引路人”，宣扬迪特里希·艾卡尔特（Dietrich Eckart）以及其他所有直接与国家社会主义系在一起的人，那么，这一切都不停地围绕着“民族的”、“血统的”和“有特性的”转悠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了。

这是在那一根弦上的演奏，在第三帝国语言这根最民族性的琴弦上的演奏！我早就听到这种声响了，远在阅读这部纳粹主义的文学史之前，而且真的是从深处传来的声响。“你这个丢宗忘祖的（artvergessenes）女人！”克莱门斯这个打手每一次抄家时都对我太太这么说，魏瑟那个

碎嘴添油加醋道："你不知道啊，《塔木德》里早就说了，'一个异质的女人比一个婊子更贱'？"这话每一次都像荷马书中的航海令一样逐字逐句地重来一遍。"你这个丢宗忘祖的女人！你不知道啊……"

在这些年月里，我不断地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们竟能够背叛所有的教育，所有的文化，所有的人性？尤其是在法尔肯施泰因的那几周，这个问题出现得更为频繁和迫切，而到今天我也无法回答它。

那个打手和那个碎嘴，那都是些低级的畜生（尽管如此，他们还套在军官制服里）；对这种东西只能忍耐，直到麻木不觉。不需要绞尽脑汁去思来想去。

但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像这位文学史家！我在他的身后看见一群文人，诗人，记者，一群研究工作者。目光所及之处，全是背叛。

一个叫乌利茨（Arnold Ulitz）的人写了一名受折磨的犹太高中毕业生的故事，并将这个故事献给了他的朋友史泰芬·茨威格，而后来，在犹太人最危难的时刻，他描绘了一个放高利贷犹太人的丑恶嘴脸，以证明他追随主流方向的热情。有个德温格，曾经写了一部有关俄国战俘生活和俄国革命的长篇小说，其中没有提到任何犹太人的影响和犹太人的残酷；在整个三部曲中，两个唯一提及犹太人的地方是讲述他们的友好行为，一次是一位犹太妇女，另一次是一个犹太商人的事；而后来，在希特勒时代，却出现了嗜血成性的犹太检察官。有个叫汉斯·芮曼（Hans Reimann）的萨克森说笑高手——我是在一篇文章里找到的，收在从前相当有水平的费尔哈根－克拉森集刊（1944年年刊）里——，他发现了犹太人普遍的特性，特别是他们的笑话具有的特性："犹太人的信仰是迷信，他们的庙宇是俱乐部的餐馆，他们的上帝是一个权力无限的商场老板……过度的、激烈的倾向在犹太人的脑子里疯长，弄得常常上下不分，难以区别什么是迂腐的学智之疣，什么是低级的愚蠢之瘤。"（请注意这个在最为狭窄空间里的交替冲淋：迂腐的学智之疣和低级的愚蠢之瘤！）……

我只是对在法尔肯施泰因的那些日子胡乱读到的一些东西略作提示。与这种总是重复、总是同样难以理解的沦落叛变相比，也许较为有意思的、起码较为解释得通的、也较为悲剧的——因为精神上的病患和突如其来的罪过本身还算不上什么悲剧——是那种半无罪地滑入背叛，比如在伊娜•赛义德身上可以观察到，她是纯洁真诚地步入浪漫主义的痴迷之中的，最后落到对那个已经双手沾满鲜血的德意志救星阿道夫•希特勒奉献颂歌式的美好祝福。不过对这个问题我得作一番透彻的研究，不能在我的笔记本里随便处置……

在背叛者中间我还遇见了一位要好的老熟人，一战时期结识的——在德国政治记者中，无论敌友，他曾经享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字：保罗•哈尔姆斯（Paul Harms）。我还记得我们在迈尔库咖啡馆，当时莱比锡文学人的咖啡馆，有过长达几小时的讨论。哈尔姆斯当时刚刚从《柏林日报》转到《莱比锡新闻快报》，有一些从左向右的转向，但他不是鼓吹者，绝非走火入魔。而且他十分细致彻底，学了很多东西，头脑清晰。他知道战争意味着怎样可怖可怕的情景，对于德国奴役世界的疯狂计划他也能十分清楚地评判，因为他了解德国所面对的列强的能量。我很多年没有有关他的消息了，因为沉溺于自己的专业，我读报也仅限于家乡的报纸了。哈尔姆斯也有七十大几，接近八十了，如果还活着的话早该过退休生活了。而这时我又见到《莱比锡新闻快报》。每三四天就有一篇以从前的P.H.署名的政论文章。但那已经不再是"保罗•哈尔姆斯"了，那只是戈培尔的每周一文的几百个翻版中的一个，它们刊登在所有的德国大报上，贯穿于一周的每一天，那是世界犹太属性和荒原，是英国对欧洲的背叛，是为西方国家的和世界的自由而无私地战斗的日耳曼属性，是全部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对于我来说，是实地检验。是我的一个悲伤的检验，因为这一行行文字是通过其本人的声音对我说的，在这些话语后面是一个熟悉的声调，这些未曾料想会从这张嘴里出来的、然而又同样是熟悉的、过于熟悉的话语。当我在这之后的夏季得知，哈尔姆斯在俄国人攻进策伦多夫的几天前死去时，我几乎感觉到松了一口气；他

真的是在最后一分钟，正如那个虔诚的表达所言，逃避了尘世的法官。

第三帝国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从书本和报刊里朝我涌来，也并不仅仅是在折磨人的餐馆时刻，从匆忙的话语交流里向我袭来，我栖居的良好的医药环境里的市民阶层也都说这个语言。我们的朋友，随着年岁增长，太过倾向于把日常的事物，即便是最为可怕的事物，以某种轻微蔑视的大度，视为相应于永恒的无足轻重——我相信真的，他是说：相对于“永恒的利益”（den ewigen Belangen）——，他不去努力避开这些有毒的行话；而对于他女儿般的助手来说，那并不是特定的行话，而仍然是信仰的语言，她就是在这个信仰中长大，没有人能够动摇她的这个信仰，即便有人会敢于这样去想。年轻的立陶宛药剂师也一样——关于她，我已经在“犹太人的战争”中介绍过了。

有一次，在一轮激烈的警报中——死神的翅膀又嗡嗡作响起来，从僵硬的俗语变为现实，紧紧地贴在这个缩着头的小城市的房顶上，紧接着炸弹就在普劳恩的上空炸响——那一带的兽医跟我们待在一块儿。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不爱夸夸其谈，在大家心目中不仅十分干练、而且非常和善，他试图通过转移注意力安抚他受到警报惊吓的客户。他谈论新式武器，不，是在讲刚刚研制成功、四月份肯定要投入使用并且将决定局势的新式武器。“单人驾驶飞机，它比V2飞得还要远，它肯定将结束最大的轰炸机机群；它飞得快到超出想象，只能向后射击，因为它比发射的速度还要快，在敌人的轰炸机投射炸弹之前，它就已经将它们击落了；现在最后的测试已经完成，投入系列生产了。”真的！他就是这样描述的，跟我在这里讲述的一模一样，而且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是相信这个童话的，从听众的脸上也同样可以看出，他们对童话的讲述者也很信任——起码有几小时的信任。

“你认为这个人是在有意撒谎吗”，之后我问我们的朋友，“最起码你自己是不是根本不相信他，认为他是在传播童话？”——“不”，汉斯回答我，“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肯定听人说起过这个武器——而且，这里头为什么就不可能也有某些真实的成分呢？那些人为什么就不能拿

它自我安慰一下呢？”

第二天，他给我看了一封刚寄到的信，是他的一位在汉堡做中学校长的朋友寄来的。他说：跟昨天的那位兽医比起来，我更喜欢这个朋友，这是一位坚定笃实的哲学家，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全身心地信仰人道主义，绝非希特勒的崇拜者。我忘记说了，那位兽医昨天不仅仅讲了奇异的武器，而且还以同样的虔信谈到他屡次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即整个房子都倒塌后，只有“挂着希特勒画像”的那面墙还站立着。汉堡的哲学家和反法西斯朋友则不再相信什么武器和传说了，表示不抱有任何希望了。“但是（他写道）无论对局势怎样失望，人们都仍然要相信会有一个转折出现，会有一个奇迹发生，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理想主义是不可能被这个世界上联合起来的物质主义席卷吞没的！”

“只是少了‘被荒原席卷吞没’而已！”我说，“难道你不觉得你的朋友与当今的德国相当一致吗？因为他已经在期待这个有利于希特勒的转折了——‘转折’（Wende）是希特勒非常热爱的艺术词汇！”……

*

在我们的逃亡地图上，这个法尔肯施泰因药店所在的市民区域是与两个农民地区接壤的。也就是说我们最初去了喀门茨那儿的索布人村匹斯考韦茨。我们忠实的阿格娜斯住在那里，她是个寡居的农妇，带着两个孩子，曾经为我们服务了多年，后来，每当一个姑娘结婚了，她都从她的地区给我们送来接替者。村里人真诚地接受我们，毫无问题，几乎可以确定，不管是她还是村子里的随便什么人，都不会知道纽伦堡法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想要告诉她这一点，以便她更加小心地注意我们的安全。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特别不幸的事件，我们肯定能在那个小巢穴里潜藏下去，远离人们的视线。特别是因为那里的居民强烈地反纳粹，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如果不仅仅是源自于他们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就一定与他们的索布习俗有关，这个习俗给予了他

们免疫力：这些人依恋他们的斯拉夫语言，纳粹主义试图在礼拜仪式和宗教课上剥夺他们的语言，而他们觉得自己和斯拉夫民族相连，日耳曼人的自我神圣化使他们受到伤害——这一点我们从阿格娜斯和她的接替者那里听到了很多。如果能在那里待下去，之后就会是：俄国人到了格尔利次附近；他们马上就会抵达匹斯考韦茨，或者我们能想办法上他们那边去。

我的乐观主义根植于那种因为经历了童话般的解救而产生的兴奋情感，也根植于那一大片我们离开德累斯顿时所见到的燃烧着的废墟，因为这个毁灭性的印象让我们认为战争的终结就在眼前了。给予我的乐观主义的第一个打击，是的，打向了反面的，是区长问我是否和某个非雅利安人有亲戚关系时——我的证件自然都被“烧光了”。我费了极大的劲儿才憋出一个显得很无所谓的“没有”，我相信自己引起了怀疑。后来我得知，那是一个例行的必要的问题，那人也确实一直未对我存有怀疑。而从那时起，我耳朵里始终有一种可怕的哧哧声和耳语声，时高时低，这种感觉在法尔肯施泰因期间尤其折磨人，直到美国人在巴伐利亚拿下我们的那一天方才停止。我最初听见那声音是在1915年，每当机枪的连发子弹从躺倒的身体上扫射过去的时候，它给我身心的损害比听着诚实的榴弹爆炸声更大。我惧怕的不是炸弹，不是低空飞行的飞机，也不是死亡，只是、一直是盖世太保。我始终只是害怕有人会走在我的身后，有人会朝我迎面走来，有人会在我家里等着我，要将我带走。[“带走！”（Holen！）我也已经说起这个语言了！] 但愿不要落入我的敌人手里！这是我每日的叹息。

不过，在匹斯考韦茨也不时有一些安静的时刻，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安静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完全是反纳粹的，我感觉即便是这个地区的区长，都是很愿意与他的党和政府拉开一点距离的。

当然，纳粹的国家学说也侵入到这里。在这个小型木结构建筑的普通客厅立着一张特小的书桌，在账单、家信和一些信封、信纸之间放着孩子们学校的课本。

德国学校用的地图册非常显眼。那是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帝国总理府的官员，为整个德国学校出版的地图，一直散发到最后一个村庄，用的是复制的1942年9月的签名。当人们注意到这个迟晚的日期时才明白，这一举动是何等的狂妄：这时候，德国梦寐以求的胜利已经不再可能，这时候的问题已经只能是如何避免彻底的失败了，这时候他们却还把这样一份地图册放到孩子们的手里。在这份东西里，“大德国生活空间”包含了“华沙和雷姆贝尔格区总府”、“帝国东线管辖区”和“帝国乌克兰管辖区”；在这份东西里，捷克斯洛伐克被标志为“波西米亚和麦仁自治区”，“苏台德地区”通过一种特别的颜色标为直属帝国的区域；在这份东西里，德国城市炫耀着它们的纳粹荣誉名称，除了“运动的首都”和“党代会之城”之外还有“格拉兹，人民起义市”，“斯图加特，外籍德国人市”，“帝国农庄法庭采勒市”等等；在这份东西里，没有南斯拉夫，取而代之的是“塞尔维亚军事管理区”；在这本地图册里，一张图描绘了纳粹的直辖行政区，另一张是德国的殖民地，而这张图本身没有在任何地方有什么说明，只是在图下面的边缘处（还是在括号里）写有几个极小的字迹：“隶属托管局”。那时，在毫无抵抗的孩童时代，一切曾经是色彩鲜艳的，对于这样一个头脑，如今这个世界得是什么样的！

语言上，这本地图册体现了第三帝国语言中丰富的特殊词汇，除了这本地图册，还有一本德语算术练习册，其中的习题取自于《凡尔赛听写》和《领袖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一本德语读本，其中讲述的是感情充沛的逸闻趣事，渲染慈父般的阿道夫·希特勒对动物和孩子的热爱。

但是在同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也有对抗的因素。那就是圣人之角，那里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者（跟村庄道路边上几乎所有的塑像一样）是用索布语标示的，那里也同样放着一本索布语的《圣经》。我不知道，假如当时没有这种对自己语言的强调，单单一个天主教能否有机会作为完全的对抗因素坚持下来。除了《圣经》和那些教科书，我在这所房子里找到的主要的读物，是厚厚的一沓被读得破破烂烂的对开本的《上帝的

城市》。这是1893/94年间出版的绘本《天主教教民杂志》。针对“犹太化小团体”和反对“自由思想和社会民主派犹太奴仆”的侮辱性言论在这个杂志里俯拾即是，它一直尽可能地维护阿尔瓦特[1]的事业，到最后的时刻才与其拉开距离。关于种族反犹主义它当然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我又一次明白了，领袖是如何矢志不渝的鼓动性地（或者用其自己的语言说）、是如何贴近群众地展开行动的，以便将犹太特性塑造成一个括号，把众多他眼中的敌对因素囊括进来。

不过，把九十年代的天主教反犹主义推及到目前这个时刻，认为这是同一种立场，几乎是不公道的。怀有严肃的天主教信仰的人，现在是与犹太人紧密地站在一起的，是希特勒的死敌。

此外，这座房子里的图书室还拥有一本同样很旧很厚和读烂了的书，也完全不能从其政治立场推导出房子的居住者目前的思想观点。已故的农民曾经是一个养蜂大户，房子里留下的这最后一本书是男爵奥古斯特·封·贝尔莱谱施撰写的养蜂年鉴。书的序言落款于1868年8月15日，其作者显然不仅仅是一名相关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个道德家和善于思考的国家公民。“我认识许多人（他写道），他们在做养蜂人之前，曾经利用每一个空闲的时刻（是的，随意给自己放假），往酒馆跑，喝酒，打牌，或者通过荒唐的政治辩论弄得脸红脖子粗。而一旦他们变成了养蜂人，他们便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待在家中，好天气时和蜜蜂们一起度过闲适的时光，在老天不友好的季节里则阅读关于蜜蜂的文字、制作蜜蜂箱、修理养蜂工具——简言之，热爱家和工作。‘待在家里’，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语言特点……”

对此，阿格娜斯和她的邻居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因为每天晚上，被我们称之为“索布蜂屋”的地方总是挤得满满的，在我们看来，他们带我们进去就证明了一种真诚的信任。大伙儿都聚集在阿格娜斯的大伯

---

1 Helmann Ahlwardt（1846—1914），德帝国议会议员，反犹蛊惑家。

子那儿，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虽然，附带说，他信仰天主教，热衷于索布习俗——“我们一直延伸到吕根岛，我们的乡土原本就是这么广大！”——同时他却一直属于钢盔队[1]，直到它转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过也就这么长时间，到此为止。在这暖和、宽敞的、跟厨房一体的客厅里，人们来来往往：妇女坐着，忙着她们的手工活儿，男人们四处站着，抽着烟，孩子们跑进跑出。主角是庄严的收音机，总有一群人挤在它周围。一个人在那儿选台，其他人提着建议，讨论着刚才听到的东西，在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传来或者即将到来时，他们也会强烈地要求安静。

我们第一次走进这里时，很是嘈杂，没有人特别在意广播。那位大伯子像是表示歉意地对我说：“我们时不时耳朵里刮到的也就是戈培尔，那另一个要十分钟以后才会出现。”

那次，2 月 28 日是我最后一次听那位博士说话。与他最后一段时间所有讲话和文章的内容是同样的东西：粗野的运动画面和最后的胜利，掩饰得很拙劣的绝望。他放弃了声音的层次感；说得很慢，激烈地、完全同一频率地强调着，让单个的词语一个个掉下来，像夯锤一下接一下地落下，一个停顿接着一个停顿。

“那另一个”：是一般的对所有被禁止的电台的统称，柏洛明斯特电台（Beromünster）、伦敦和莫斯科电台（用德语播送新闻）、战士电台、自由电台，以及其他地下电台。人们对这个被指斥的、以死刑相威胁的偷听敌台的事完全清楚，了解时间和波段以及各个电台的特点，认为我们与世隔绝，因为我们还没有接触过这类“另一个”。人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在我们面前掩饰这种被禁止的收听，也没有特别神秘兮兮、小心翼翼地围挡住它。通过阿格娜斯，我们成了这个村子的一员，而村子的态度是一种整体的态度：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希特勒之流的必然终结，

1 钢盔队，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卫戍队。1934 年被同一化到国社党里。

所有人都在等待俄国人。

人们谈论着联军的一个个胜利、措施和计划，连孩子们都要插进来说几句；他们不仅仅依靠“另一个”的消息，也从外面带回新闻。不同于那些间或夹杂着已经冒出苞蕾的树木的丘陵，这里的松柏树林还挂着白雪，锡箔覆盖在上面，显得圣诞味儿更足一些。而这儿跟后来的法尔肯施泰因不同，不光有锡箔落下来，还会飘落下传单；人们不遗余力地搜集和研究它们。传单的内容本质上与“另一个”的那些电台相同：呼吁人们背离罪恶的、疯狂的政府，这个政府试图将一场无可挽回的败仗拖延下去，直到德国彻底灭亡。人们会告诉孩子们，搜集这些传单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也只是停留在重复禁令而已，满世界都在如饥似渴地、深表赞同地阅读那上面所写的东西。

有一次，阿格娜斯的尤利手里拿着一个翻开的本子来到我面前，说：“这个我们不需要烧掉，这个学校也发给我们了，完全一样的！”那是一本小册子：《戈培尔战争文集》，封面上有一个典型的纳粹战争斗士的头像（一半是鹰，一半是流氓）。左边是要学生记住的句子，右边是联军逐条的反驳。针对所谓战争是“强加在”热爱和平的领袖头上的论调，联军作了特别详尽的启发性的回答。（“被强加的战争”属于第三帝国语言中具有突出地位的程式化用语）。

还有另外两个来源可以让这个村子获得对于局势的了解：一个是由逃亡的西里西亚农民组成的凄凉的车马队伍，村里人将“姑娘营”提供给他们作短时间的居留，一个刷成了绿色的、面积很大的简易房，先前作为妇女义务的服务场地；另一个来源是大量的巴伐利亚炮兵，他们带着马匹，但没有炮车，从前线撤回来，在这里喘口气。

颇不寻常的是，在这些十分现代的启蒙中，还掺和进了一个最后的、完全另类的方式：摘引《圣经》的话——阿格娜斯年迈的、仍然精神奕奕的父亲滔滔不绝地讲述萨巴女王——这些引文都确定无疑地预言俄国人将长驱直入。我一开始想说，第三帝国语言的这个《圣经》印记是一种乡村特色，但我马上又想到了我们的巴比斯瑙杨树，此外还有在民众

和领导层中间十分流行的对占星学的爱好。

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匹斯考韦茨笼罩在一种绝望的气氛里。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特别遭受过战争的磨难，从来没有一颗炸弹落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子里，它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警报器；假如有警报声从远方传来，而这种事每日每夜都会重复发生，人们夜里照样安睡无忧，白天则从纯粹的美感出发，兴致勃勃地观赏一场美丽的表演：澄蓝的天空上，在极致的高处，手指长的银柱烟团，从云彩里纷纷探出头来，又在云彩里消失。每当这时总是会有，的的确确总是会有一个观众想起来："海尔曼说了，如果有一架敌机飞到德国来了，他就改叫玛耶！"另一个人接上来："阿道夫说要把那些英国城市抹除掉的！"

真的，这两句语录在城里和乡下同样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其他时下的废话、胡扯乱拉、笑料却只能昙花一现；而且在这其间，我是说在这些言辞容光焕发之中，还存在一个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时间差。

跟村子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杀过猪；因为即便人们对俄国人没有心怀恐惧，但是猪长大了，也还是宁愿自己吃了，而不是留给解救者处理。猪肉检查人员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屠夫及其助手在灌肠，邻居们临时过来看看，鉴定和比较一下，同时讲着笑话，猜猜谜语，屋子里挤满了人。我当时有过一种感觉与一战期间的一次经历很相似：1915 年，我在比利时弗兰德的村庄里听见一首流行歌曲 *Sous les ponts de Paris*，那是早在两年前我就在巴黎见识过的歌，是那个档期最时髦的新创作，而在此期间，在首都，它已经被当下的时事说唱给排挤掉了。现在，匹斯考韦茨人和他们的猪肉检察人员也正是这样，他们玩儿的一个谜语对于德累斯顿人，肯定也包括所有其他德国城市的人来说已经过时了，它早在跟俄国的战争刚刚开始时就悄悄传开了：香烟的牌子 Ramses 是什么意思？回答：俄国军队九月疲软（Russlands Armee macht schlapp Ende September）。但是从后往前推则是：如果英国胜利，阿道夫就完蛋了！（Sollte England siegen，muss Adolf raus！）我在笔记里写道：人们必须对这种随着时间、地点和社会阶层而出现的各种变化进行调研。有个

人曾经告诉我，有一次盖世太保在柏林散布了一个谣言，然后让人调查，这个谣言传到慕尼黑花了多少时间，通过了什么样的途径。

我也参加到屠宰庆典中，但是感觉十分沮丧，因为还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尽管自己也觉得非常可笑。那头猪本来一周以前就该杀了的；那时联军距科隆20公里，俄国人即将占领布莱斯劳。屠夫的活儿太多了，只能拒绝，于是猪存活下来。我为此打了个赌，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头猪活过科隆和布莱斯劳，那么你就能看到战争和你的屠夫的末日。现在这美味的新鲜猪肉对我来说有些败兴，因为科隆和布莱斯劳还在坚持着。

第二天中饭时，我们又吃猪肉，这时区长走进来说：刚刚下达命令，到晚间要清理这一带所有的外乡人，因为明天这里就要进驻战斗部队；五点钟将有一辆车子把我们送到喀门茨去，从那里出发再把逃亡人员往拜罗伊特地区输送。

当时，在雨雪里，站在敞篷马车里，挤在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中间，我相信我们已经身处全然无望之境；但是直到三周之后，我们的处境才是真正的无望。因为在喀门茨我们还能在窗口前注明：“家园炸毁者到法尔肯施泰因借住私房”，真的还有可以指望的人；“接收站”（Auffangsstelle）这个可怜的、但是不管怎样还能安慰人的、属于正在死去的第三帝国的概念，对我们也还适用。而当我们之后要从法尔肯施泰因离开的时候——汉斯被强迫接收两个来自德累斯顿的女药学人员，她们很可能会认识我，因为她们是在德累斯顿读的大学；被发现的危险太大了，战争的终结一直还没有到来——，对我们来说哪里还有一个安全的接收站？到处都存在着被揭发的危险。

接下来十二天的逃亡充满了艰辛、饥饿，整夜睡在火车站大厅光秃秃的石板地上，炸弹砸向行进中的火车，砸向候车厅，当我们在那里总算能有一顿饭吃的时刻，沿着炸毁的铁道赶夜路，挨着打烂的桥体在溪流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地堡里咀嚼吞咽，一会儿浑身汗湿，一会儿又在透潮的鞋子里冻得发抖，低飞的战机连发扫射——但比这一切都更为糟糕的、不停地无情地折磨着我们的是对检查、对逮捕的恐惧，汉

斯给了我们足够的钱和救助物资，但是毒药，我为了防备万一恳请他给我们的，——“别让我们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比死亡要残酷百倍！”——这个毒药他拒绝给我们。

终于，我们远远地甩开了德累斯顿，终于，德国的瘫痪和分崩离析已经不可救药，终于，第三帝国的末日就在眼前，我们生怕被人发现的恐惧平缓下来。作为逃亡人员我们被安置在艾夏河的下伯尔巴赫村，那里很奇怪地只有西里西亚人和柏林人，没有来自萨克森的，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只剩下了对不间断的低飞的敌机的恐惧，以及对逼近奥格斯堡的美国人的恐惧，怕他们碾压我们的那一天到来。我相信，“碾碎”（überrollen）是我遭遇的最后一个军队语言的新表达。它肯定与摩托化部队的不可一世有关。

1939 年 8 月，我们曾经在德累斯顿看到，部队怎样毫无尊严地悄悄地集结起来；现在我们又看到它怎样毫无尊严地悄悄地陷落下去。从崩溃的前线脱落下来一个个小群组和个人，从树林里钻出来，潜入村子，寻找食物，寻找老百姓的衣物，寻找一夜的平静。他们中间有些人仍然相信着胜利。其余的人虽然完全明白一切都已经结束，但是，在他们的谈话中，曾经的胜利者的语言依然支离破碎地夹杂其间。

在这里落脚的逃亡者和当地人，再也没有谁还会对胜利、对希特勒统治的维持怀有丝毫的迷信。下伯尔巴赫的农民与匹斯考韦茨的农民都完全唾弃了纳粹主义，充满了愤恨。但是只有索布人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种敌对性，巴伐利亚的农民起初是坚信他们的领袖的。他开头给了他们那么多的许诺，甚至还兑现了一些许诺。不过现在总是在下着失望之雨，已经很久了，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下伯尔巴赫人可以走进索布人的蜂窝里，匹斯考韦茨人也可以来到下伯尔巴赫：他们可以不懂对方的言语音声，即便匹斯考韦茨人都会说德语（虽然他们相互间从来不这么做），但是因为观点相投，人们会很快地取得一致。他们所有的人都拒绝第三帝国。

在下伯尔巴赫的农民中间，我看到了道德上的巨大差别，并不无后

悔地记载道："再也不要带定冠词说农民（Der Bauer），或者带定冠词说巴伐利亚农民（Der bayerische Bauer），要始终记着带定冠词的波兰人，记住带定冠词的犹太人！"当地的农民村长早已丢弃了他对党的热爱，但却不能放弃他的职务，他始终不懈地热心助人、乐善好施，对每一个逃亡者，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军人一视同仁，正如牧师在礼拜天祷告中描述的那样，堪称一个仁爱的样板——（4 月 22 日的关于祷告的笔记：*stet Crux dum volvitur orbis*. 完全无可挑剔的无时间性，同时又与纳粹进行了如此的清算！特殊的使命：第三帝国里的祷告，隐蔽而同时发声，与百科全书风格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那个家伙，我们第一天被安排去他那里过夜，拒绝给我们供水盥洗；他说棚子里的水泵碎裂了（后来证明那是个谎言），我们应该想办法乐观面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很多的层次；其中就有我们的房东夫妇，与其说他们偏向好的一端，毋宁说其更接近恶的那头。

但是在使用第三帝国语言的问题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他们咒骂纳粹主义，用的却是它的讲话形式。处处都在谈论转折，不管是充满希望的还是感觉无望的，严肃地，或者是嘲讽地，每一个人都狂热地投身于某种东西，诸如此类。当然，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着领袖向东线战场发出的最后的号召，引述他的话，关于"无数的新的部队"和那些布尔什维克，他们"屠杀你们的老人和孩子，蹂躏你们的妻子和女儿、令其成为军营妓女——剩下的开往西伯利亚"。

不，在战争最后的这些日子（以及后来在回家的途中），不管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去经历——是真的需要去经历，而不是仅仅在希特勒政权的欺骗性词义上去经历——，关于第三帝国的语言，我再没有找到什么添加之物了，再没有于任何地方找到区别于我长时间所研究的东西了，虽然我只是在我们受难之域的那个狭小天地里进行了研究。第三帝国的语言确实是全面覆盖的，它以完整的一致性覆盖和污染了整个大德国。

只有两个在其统治的末日显现出来的象征物还可以在这里作一笔记录。

4月28日，整整一天都在疯传谣言，说美国人已经近在咫尺；傍晚时分，村子里和村子附近剩下的部队都撤走了，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他们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是野蛮化了的男孩子，此外还有一个较高级别的参谋部，本来住在南边村口那座漂亮的现代官邸里的。夜里，重炮、流弹在村子的上空整整吼叫了一个钟头。第二天早上，我们那被炸成了两截的厕所里，摊着一个很艺术地用黑红两种墨水书写的文件，因为纸头太厚了，不适合作它的新用途，所以一直待在那里数小时之久。那是我们房东的东西，一张宣誓证书。它证明，"图偌乐·米歇尔在慕尼黑国王广场上，面对领袖的代表汝道尔夫·海斯（Rudolf Heß）"宣誓，"无条件地服从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任命的其他领导人。慕尼黑，1936年4月26日传统大区内部制作。"

再就是有几个令人不安的午间时刻，林子那边不时地传来很大的动静，有时还听见近处有枪弹的呼啸声，肯定是哪里还在进行着小规模的战斗。接着就看见我们边上的一条公路上开过来长长的一列坦克和军车——我们被碾压过去了。

第二天，善良的弗拉门斯贝克建议我们搬进空下来的官邸，因为我们又一次向他抱怨了我们在住宿和吃饭方面的境遇。他说，那里大多数的房间应该都有一只烧早饭的铁炉，用于取暖的松枝我们可以在林子里拾到，我们的午饭去他那里应该可以对付。当天下午我们就为迁进新居庆祝了一番。除了其他的好处，这个新居还带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快乐。整个一周我们都不必为松枝和干柴操心，我们有更好的取暖材料。在纳粹时代较好的日子里，希特勒青年团员和一些类似的民众在这所房子里住过，所有的房间充斥着希特勒画像，都镶上了很漂亮的镜框，满墙壁都是关于运动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旗帜和木质的弯钩十字标志。所有这一切，以及房门上巨大的弯钩十字和走廊里的冲锋者报栏，都给人取下来，放到了地上，堆成了一个巨大的、混乱的山包。主层房间以外还有一个亮堂的阁楼，我们为自己选择了阁楼，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开头的那一周我一直都在用希特勒画像、希特勒镜框和弯钩十字，

用弯钩十字旗帜的旗布烧火取暖，不断地用希特勒画像取暖，让我不断地感觉到一种喜悦。

当最后一张画像燃尽的时候，就该轮到冲锋者报栏了。但是它是由沉重的、厚实的木头做成的，我用脚踏，使尽全身力气也拿它没辙。我在房子里找到一个小斧子和一个小型的狐尾手锯，尝试着用斧子砍、用锯子锯。但是报栏坚持抵抗。那木材实在是太厚太硬了，折腾了这一大阵之后，我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了拼命下劲了。“我们还是到林子里去拾松枝吧”，我太太说，“还好玩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于是我们开始转用另一种取暖材料，冲锋者报栏依旧完好。如今，当我收到来自巴伐利亚的信件时，有时还会不由地回想起这件事来……

也作后记

“因为言论”[1]

此刻，当我们身上的重压已被卸除，我重操旧业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的时候，我应该首先去做什么，我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便开始在我脑中盘旋。当年，他们剥夺了我手中的十八世纪研究。我太太将我的研究和这些日记抢救出来，送到了琵尔纳我们的一个女性朋友那儿；也许这个朋友、也许这些文稿挺过来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希望支持这样的推测，因为医院总还是尽可能地受到保护的，而且也没有听说琵尔纳遭受过很剧烈的轰炸。但我到哪里能很快地找到必要的图书馆资料，以继续我的法国人研究呢？此外：我已经被希特勒时代的事物填满了，在某些方面它们把我翻了个个儿。也许目前连我自己都太常想着带定冠词的德国人（DER Deutsche）和带定冠词的法国人（DER Franzose），而不是去思考德国人和法

1 原文“Wejen Ausdrücken”为柏林方言。

国人的丰富性？也许只是沉湎于科学，逃避令人厌恶的政治，是一种奢侈和自私？我的日记本里有一些问号，有一些观察，一些经历，从中可以学习到这一点或者那一点。也许我应该先做这个事，整理我在受难的年代里储存下来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一个虚荣的、一个自以为是的计划？

每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捡拾松枝的时候，坐在鼓鼓的背包上休息的时候，总会有两个人浮现在我的记忆里，把我推过来搡过去，令我游移不定。

先是小凯特·萨拉的悲喜剧形象。刚开始完全是喜剧性的，而且到最后，当她的命运完全陷入悲惨境地的时候，她的形象仍然裹着一层轻微的滑稽外衣。她的确叫小凯特，她的名字就是这样登记在居民局的名册和洗礼证书上的；为了进一步表达她对这个洗礼证书的忠诚，她的项链上始终挂一个十字架，用以抗衡被强加的犹太人黄星和附加名萨拉。对于这个心脏有些肥大的六旬老者，这个娇嫩的孩童名字却也不是完全不相称，因为她像个孩子一样，笑得快，哭得也快，而且前一分钟哭，后一分钟就笑，记忆如同一个可以轻易擦拭的黑板。我们被强迫与小凯特·萨拉在一套房子里同住了两个恶劣的年头，她每天至少有一次不敲门就冲进我们的房间，星期天早晨，有时候我们醒来时，她已经坐在我们的床前，总是说："您把这个写下来——这个您必须要写下来！"接着她就用同样的口气报告最新发生的抄家，最新发生的自杀，最新停发的票证。她相信我的记载职能，在她的儿童意识里，似乎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为这个时代作记录了，因为她老是看见我坐在写字台前。

但是，紧接着小凯特孩子般急促的声音，我就听到了温和的史迪勒半怜悯半嘲讽的声音，是一次新的圈栏把他和我们圈到了一起。那时小凯特早已在波兰永久消失了。史迪勒也没有等到获救的那一天。他虽然能够在国内待下去，而且是死于一场没有盖世太保的自然疾病，却同样是第三帝国的牺牲品，因为假如没有之前的苦难，

这个散发着青春活力的人本该具有更强的抵抗力的。他的痛苦比可怜的小凯特更深，因为他的心灵不是黑板，因为他为太太和儿子操碎了心，受尽了煎熬。他的儿子虽然极为聪慧，却被纳粹的法律规定剥夺了任何受教育的权利。“您别写来写去了，还是多睡一个小时吧”，每当他发现我起得太早，总是这样对我说：“您写这些东西只会给您带来危险。您不会以为自己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吧？难道您不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比您的处境更加糟糕吗？难道您不明白，所有这一切，将会有大量的史学家去写吗？那些拥有比您更好的素材、更宽广的视野的人？以您目前的局限，您能看见、能察觉到什么呢？每个人都得去工厂，很多人都得挨打，没有人再会拿被人吐吐沫当回事了……”每当我们得空在厨房里帮我们的太太擦碗或者洗菜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个不停。

我没有因此而迷惑动摇，我每天早晨三点半起床，在工厂劳动开始之前记录下前一天的事情。我对自己说：要用你的耳朵去听，去倾听日常生活，正是要去倾听日常，倾听那些平常的和一般性的事情，倾听那黯淡无光的非英雄气概的东西……

而现在，当危险过去了，当新的生活来到我面前时，我却要问自己，我首先应该用什么来充实这个生活，如果我把自己沉浸到厚厚的日记本里去，会不会是虚荣和浪费时间。小凯特和史迪勒围着我争执不休。

直到我听到了一句话，它帮助我作出了决定。

在村子里的逃难人群里也有一位来自柏林的女工，带着她两个年幼的女儿。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交谈起来的，那是在美国人到来之前。我从她们旁边走过时，一连几天，听到上巴代利亚的土地上竟有人说这么纯正的柏林话，感到十分有趣。她很快感觉到我们之间政治观点接近。接着，她就对我们讲述了她先生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坐了很长时间的牢，现在在一个劳改营，上帝知道在哪里，假如他还活着的话。而她自己，她带着自豪的口气说，也被关了一年，如果不是监狱人满为患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她这样的女工的话，她至今还会待在里面。

“您为什么坐的牢？”我问道。“那不，因为言论……”（她侮辱了领袖，侮辱了那些第三帝国的象征和机构。）

这令我恍然大悟。这话让我明确了目标。因为言论。就为此，就由此，我将开始我的日记整理工作。我要把我的平衡木从大量其余的事物中解脱出来，只将握住它的双手一起勾画出来。于是这本书完成了，与其说是出自于荣誉心，不如说是，我希望是，因为言论。

附录

关于这一版

本版定稿依据作者生前最终审订的版本[1]，即1957年哈勒的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这一版的作者绪言如下：

> 我的*LTI*的第三版与1946年的第一版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删减、增添或者修改之处（除个别印刷错误的修正之外）。这本*LTI*是一本经历之书和对所经历的语言的记录。接下来的十年中，德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解放的德国成为一个分裂的德国，苏占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所有从目前的立场出发对本书内容或者词语的更改都将抹去其表述的历史价值。

---

1 最终审订的版本：1957年的第三版。尽管克莱普勒在“第三版绪言”里表达了一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看法：他认为对其文本的每一个改动都会明显减损他笔记中“表述的历史价值”，然而之后的大多数版本都不再刊印这一绪言。

这一版的文本保留了其历史版式、缀字法和标点，即便它们呈现出某种自觉的随意性。只有明显的印刷错误才做修改；某些错误与疏漏在与之前版本加以对比之后，得以更正。新版本付刊时与第一版（柏林：建设出版社，1947）和第二版（柏林：建设出版社，1949）进行了仔细的校对。考虑到印刷版式等因素，第三版将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某些独立的段落合并到了相应文本的上一段落，这一版对此做了修改。文本及格式上的个别地方也按照第一版和第二版做了订正。

* 具体的订正本译本不再详列。

评注

LTI，一位语文学者的笔记，要求读者至少拥有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广博知识：其一是关于德语文学和法语文学的历史及其思想史，尤其是人文主义和启蒙时期文学；其二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特别是它的反人道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历史。这两个世界曾经对维克多·克莱普勒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一注释即是试图让这两个世界在交互的映照和对比之中明朗起来。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LTI*，对于哪些地方需要加以评注都经过了仔细斟酌，然而最终的取舍依然是主观的。评注的完备性当然不是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一点在大量的史实和作者甚为宽广的背景知识面前是不现实的。目前的评注希望对*LTI*，这本笔记之书中提到的人物以及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简明、初步的解释，以期展现这一文本广阔的知识视野。对那些已经足够知名的人物不再做注，诸如歌德、席勒、路德、希特勒、戈培尔或戈林。而对犹太背景的人物给予了更多关注，以令其对于德意志文化财富的贡献得到相应的体现。遗憾的是，因为资料太多超出了预

定的篇幅，并且也影响可阅读性，所以很多地方只能不加注释。现在的评注也旨在激发对 *LTI* 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研究。

建议有意深入了解这方面研究的读者首先阅读维克多·克莱普勒的自传性作品，这些作品对理解 *LTI* 极有帮助。首先要提到的是他 1933 年至 1945 年间的日记，*LTI* 直接取材于此。其次要推荐的是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日记，这本笔记之书诞生的时期。然后是 1918 至 1932 年[1]间的日记，最后是他的《生平》[2]，从他出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881—1918），写这部书同样采用了他的日记，而在完成传记体报告作品之后他便将这部分日记销毁了。（下面将会以“Tgb”指代这些日记。）最后还要提到一套光盘，其中录有克莱普勒 1933 年至 1945 年间全部约 5000 页日记，配有大量的说明[3]。此外对于其他所有的问题还有十分完备的克莉斯汀·费舍尔-胡珀的科学评注可以参考。

在费舍尔-胡珀的评注中有上述全部自传作品的资料索引，同时也有对语言学问题的讨论、关于这本书接受史的描述等其他内容，从而令眼前的这一注释工作减轻了负担。此外，读者在那里还能找到 *LTI* 内部的相互参照呼应。这是有关人物和事物之间关联的密集网络、联想或者影射。这一点在本评注中只能举例提及，而不能完全追踪。在限定的篇幅里，要对这些关联的丰富性和密度作出哪怕只是粗略的概括，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读者基本可以确定，这里提及的一个人或者说到的一个概念在其他地方和其他关联中会再次出现。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一点，只做粗略浏览的读者则可能并不以此为必要。

外语词汇没有翻译，而克莱普勒斜体标注的拉丁文或法文常用语则译成了德语，因为这些词往往既无法依靠上下文推断，也不在外语字典

---

1 全部的书目数据参见评注中第 1 章条目“日记”。

2 维克多·克莱普勒：《生平。1900 年前后的青年时代》（*Curriculum Vitae. Jugend um 1900*），两卷本，柏林，1989。

3 书目数据参见第 1 章条目“日记”。

之中。

评注中经常要使用到纳粹表达。如果总是加引号标注，势必影响文本的可读性。因此，编者在这里总体对评注中包含的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词汇表示排斥，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带引号出现的词汇，例如其自我称谓“纳粹”，或者那个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表达“第三帝国”。

[献词]

是献给他的第一任夫人爱娃（1882—1951）的，她是一位钢琴师，正是由于她，克莱普勒才得以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保全性命。作为“雅利安人”，她坚定地拒绝与她的犹太裔丈夫克莱普勒离婚，这使其免遭灭绝集中营的命运。在做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时，克莱普勒面对献词内心感到不安，因为爱娃去世后他已再婚。1952年他和自己的学生哈德维西·柯西那结婚。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在新版中使用这个献词。

[箴言]

源自弗朗茨·罗森茨维格（1886—1929）的一封信，1935年伊迪特·罗森茨维格将这些信件公开发表。他是著名宗教哲学家，与更为知名的马丁·布博交好。克莱普勒书中记录了他怎么会注意到罗森茨维格以及他于何时计划（日记.v.1944年7月）将这句话作为箴言置于*LTI*的卷首。对于这句包含国家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词语“血液/血统”（Blut）的箴言，不同的解读相去甚远（参见费舍尔－胡珀，331页）。

[代序　英雄主义]

第三帝国的：“第三帝国”这个概念既不是出自于希特勒，也不是来自于另外某个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可考的是，这个概念早在中世纪末世论神学家那里、特别是在尤阿兴姆·封·菲奥雷斯（Joachim von Fiore）那里就已经存在。在末世论的教义里，继“圣父之国”和“圣子

之国”之后会出现“第三帝国”即“圣灵之国”。三个帝国顺序继承的观点成为(从莱辛到斯宾格勒)欧洲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成分。二十世纪，关于三个帝国的如下设想被接受:“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帝国，以及在后者消亡之后对从“种族心灵”中诞生一个“第三帝国”的希望，它首先在民族主义团体以及保守革命党人中间流行起来。阿瑟·穆勒·凡·登·布鲁克 1923 年的著作也起了《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这个纲领性的标题。第三帝国指的是一个新的国家，它要取代为民族主义圈子所仇视的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连接上前面帝国的传统。与很多极右翼的反民主主义者一样，希特勒虽然对这个概念很有保留，但最终也接受了它，并于 1933 年 9 月宣布，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体现这个第三帝国。1939 年，第三帝国的启迪国民和宣传部下令禁止正式使用这个概念。

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简写，取其负面含义。在民主德国广为使用，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范畴中包含对于社会主义体系来说神圣不可亵渎的概念，即社会主义，民主德国不愿意与纳粹共享之，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达到了对纳粹的一种贬低。

去纳粹化：战争结束后同盟国为了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从民族社会主义以及军事主义之中解放的目标之一。盟国管制委员会自 1946 年 1 月起颁布了大量的去纳粹化条款。然而在不同的占领区之间去纳粹化的进展也不同。1946 年 5 月西方国家占领区的法庭开始去纳粹化的工作，至 1949 年底将约二百五十万德国人按照以下五种类别分级：主犯、有罪、轻罪，从犯和无罪。超过半数的人被判为从犯。冷战令西方占领国对于德国进行彻底去纳粹化的兴趣明显减退。

闪电战：与持久战或阻击战相反，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歼灭敌人。由于在波兰及法国战场上迅如闪电一般的胜利，希特勒将对苏联的进攻定义为几周之内取胜的闪电战。这场战争却遭到了失败并持续了数年之久。1935 年闪电战一词即已出现在一本军事杂志上。在法国战场上的巨大胜利之后，闪电战在纳粹的宣传中得到了大肆的使用。

最终的胜利：纳粹的宣传口号。意味着对同盟国战争的最终胜利。

纳粹的军事状况越糟糕，这个词的使用就愈频繁。

登陆滩头：1944 年 6 月 6 日，诺曼底地区同盟国西线部队在此登陆（行动代号 Operation-Overlord），目的在于与德国部队作战以及向巴黎（8 月 25 日解放）和布鲁塞尔（9 月 3 日解放）挺进。

文化联盟：1945 年 6 月在苏占区的推动下“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建立。1958、1974 年分别改称“德国文化联盟”及“民主德国文化联盟”。民主德国解体后在原文化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化联盟社团”。最初参加联盟的是有意致力于文化民主建设的人士，其中包括诸如安娜·西格斯、克里斯塔·沃尔夫及阿诺德·茨威格。约翰内斯·贝歇尔担任主席直到 1958 年。克莱普勒担任德累斯顿地区负责人以及文化联盟人民议院的代表。后来文联开始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简称 SED），并发展为一个群众组织，开展诸如自然、家乡、弗里德利希·席勒等不同的兴趣活动。知识分子成员逐渐减少。

自由德意志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FDJ）的前身，1946 年 3 月初苏占区正式成立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捷克、法国和英国的流亡者中间已经存在。组织名称和稍为改动的组织徽章也为其海外的流亡组织接受和采用。FDJ 很快成为民主德国的官方青年组织，负责青少年世界观的培养，并自视为 SED 的后备力量。其官方制服是“蓝衬衫”。克莱普勒于 1950 年得到了这套制服，并穿着它上过公开课，遭到了联邦德国方面的嘲笑。他的日记表明克莱普勒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希特勒青年团之间的相似性其实是了解的，但却并无意对此作出表态（见费舍尔－胡珀，333 页）。

希特勒的奋斗书：希特勒在莱西的兰茨贝格拘禁期间写成纲领性文字《我的奋斗》（*Mein Kampf*），主题有两点，即占领“东方生存空间”以及清除犹太人。1925 年出版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 1926 年底，均由纳粹下属的艾尔出版社出版。1930 年起两个部分以一卷本的形式出版。《我的奋斗》数度再版，被译成 16 种语言，发行量达一千万卷之多。与国人普遍的观点相反，这部“国社主义圣经”也曾经获得了多方面的

认知。

冲锋队：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冲锋队，其简称 SA 更加为人熟知。1920 年起，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在纳粹党内会议期间及政治暴乱时作为武装力量行使职能。二十年代，他们在街头和集会群殴以及袭击犹太人及其商店事件中的残酷暴行家喻户晓。希特勒掌权后冲锋队自认为有权作为“第三帝国的秩序维护元素”与政治敌人进行武装清算。1934 年 4 月抵制犹太人商店运动中，冲锋队犯下了多起恐怖暴力事件。冲锋队急度上涨的权利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希特勒宣称冲锋队企图发动政变，下令处死冲锋队所有头目。冲锋队迅速衰退，国防军和党卫队的权利上升。在 1938 年 11 月的大屠杀中冲锋队再次发挥能效。

戈培尔对他的柏林之战：指的是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1932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著作《柏林之战，起点》（*Kampf um Berlin, der Anfang*）。在书中，他对自己 1926 年起作为大区长官对柏林的“征服”做了肆意的渲染和描绘。1945 年以后，这本书在阿根廷、意大利和法国引起了兴趣，译成了那里的文字出版。

“老战士”：纳粹对党员编号在 100000 以内的党员的敬称，他们以此获得了金质纳粹党徽。

我们一位朋友：指的是阿奈玛丽・科勒尔。爱娃・克莱普勒将丈夫的日记分成若干部分运送到琵尔纳市她的住处，她将这些日记在家中藏好。为此两人冒了很大的风险。这部记录犹太人所遭受迫害的记录能完好保存并传到后世人的手中要归功于这样一份勇气。

贝昂特・罗塞玛耶：1909—1938 年，当时最著名的赛车手之一，1936 年的欧洲冠军，1937 年成为首位时速超过 400 公里 / 时的赛车手。1938 年，他在赛车时试图超过当时的记录保持者鲁道夫・卡拉乔拉，却因此而身亡。他是著名女飞行员艾丽・巴因霍恩的第一任丈夫。

豪斯特・维塞尔：1907—1930 年，学生、纳粹冲锋队领袖。在世时得到了戈培尔的提拔，遭谋杀之后受到了纳粹分子的鼓吹。戈培尔使

用宗教性语言对维塞尔进行美化，将他定义为法西斯运动的殉道士。豪斯特·维塞尔之歌是纳粹重要的宣传工具。

艾丽·巴因霍恩：1907—2007年，德国早期女飞行员。三十年代在长途飞行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31年第一次飞行非洲。1932年独自一人环球飞行，1933年第二次飞行非洲。1934年飞行美国，此外还有其他的飞行记录。2007年以百岁高龄最后一次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前丘陵地带上空飞行。1938年，她丈夫去世的同年出版这部纪念著作。之后偶尔再版，半个世纪之后的1987年，该书刊印了最后一版。

总体战的学说："全面战争"这个概念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埃里希·鲁登道夫的书《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而得名。在书中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和团结性是决定战争胜利与否的关键。这种观点为纳粹特别是戈培尔所认同并加以极端化。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要求将全部资源投入"最终的胜利"。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宫殿的讲演中公开号召实施全面战争的计划。1944年夏，他被任命为"德国全面战争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战争多了一分无意义的拖延，导致无以计数的牺牲。

KZ：德文"集中营"一词的缩写，纳粹时代国家恐怖主义最主要的手段。纳粹最初将其缩写为KL。该缩写的来源不可考。纳粹将这个概念等同于劳动集中营以及灭绝集中营来使用。灭绝集中营用于系统的大规模屠杀。纳粹的集中营以此而区别于历史上的其他类型集中营或者战俘营，因此不能再用这个词来称呼仅用来集中关押囚犯的营地。纳粹时期，囚犯被投入集中营通常不需要法院的判决。囚犯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只能无助地惨遭折磨和谋杀。1933年至1945年间，曾设有二十个以上的所谓主要集中营，而千余所附属集中营有组织地隶属或附属于这些主要集中营。其中的七个是灭绝集中营，每天批量屠杀数千在押人员。据估计，六百万犹太人中的三分之二在灭绝集中营里惨遭谋杀，其中一部分也死于饥饿与疾病等等。在这些集中营中也屠杀过那些非犹太人、政治上或社会上遭受歧视的人群（同性恋、共产主义者、吉卜赛人、

社会危害分子和残疾人）。

雅利安妻子：1935年9月戈林公布《保护德意志种族及荣誉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hc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结婚。违反该法令就要被判定为“种族耻辱”并将受罚。已经存在的婚姻，即所谓的“混种婚姻”虽然并不会被强令解除，但是如果离婚或婚姻中的雅利安伴侣死亡，犹太人一方马上就被送往集中营。1942年1月在著名的万湖会议上，将混种婚姻中的犹太婚伴也纳入屠杀范围内的计划延后。1944年秋开始，他们被送往劳动集中营，1945年初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称，包括刑事警察以及政治警察。是纳粹和政治对手较量中的恐怖工具。1933年4月由赫尔曼·戈林（1893—1946）倡议组建。在德国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参见第18章“希姆莱”）、安全警察和党卫军安全部门头目（SD）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以及盖世太保警察处处长海因里希·缪勒的领导下自1936年夏起发展成为恶名昭著的恐怖机构。因为有国民的支持，其恐怖体系即便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也能发挥作用。

犹太人居所：国家社会主义语言把曾经属于犹太人的、1939年起强令犹太人搬入的一座房屋称为犹太人居所。为了实现“雅利安化”，按照1938年12月一项规定，犹太人必须变卖其不动产。1939年4月起犹太租户的法律保障被取消，最初混种婚姻中的犹太人不包括在内。1941年起犹太人只允许住在犹太人居所里，对犹太人的“集中关押”发展到了极致。之后犹太人被押运到集中营，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开始。

保尔·K：保尔·克莱特勒（参见1941.12.25日记）。据费舍尔-胡珀（第335页）的说法，保尔·克莱特勒于1942年1月被送往里加，并死于那里的隔离区。这样的情况通常要参看光盘，其中包含了克莱普勒提到的所有受害者及其施害者的身世(参见第1章“克莱门斯和魏瑟”)。

他们在非洲的日子很不好过：保尔·克莱特勒的估计很准确。1941年12月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在这个月，他们不仅要

承受在北非阿拉曼战役的失败，也遭受了东线战场上“闪电战”的失败。他们要考虑开始进行长期的持久战，由于希特勒于 1941 年 12 月 11 日向美国宣战，“最终的胜利”实际不再可能。

[第 1 章　第三帝国的语言]

曾经有过 BDM、HJ 和 DAF：纳粹大型组织“德意志女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国劳动战线”的简称。

日记：克莱普勒自 16 岁开始写日记。这一习惯保持了大约六十年。1995 年第一次出版的纳粹政权时期的日记引起轰动。批评家对这些迅速畅销的日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维克多·克莱普勒，《我要见证到最后一刻。日记 1933—1945》（*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5），瓦尔特·诺沃耶斯基编辑出版，哈德维西·克莱普勒协助整理，两卷本，柏林，1995。在日记中可读到每一个引导到 *LTI* 的记载以及在这些注释中提到的所有人。之后，克莱普勒的其他日记也陆续出版：《积累生活，不问目的与原因。日记 1918—1932》（*Leben sammeln, nicht fragen wozu und warum. Tagebücher* 1918-1932），瓦尔特·诺沃耶斯基编辑出版，克里斯蒂安·吕泽协助整理，两卷本，柏林，1996；《于是一切摇摆不定。日记 1945.6—1945.12》（*Und so ist alles schwankend. Tagebücher Juni bis Dezember* 1945），君特·彦科尔编辑出版，柏林，1996；《于是我坐在这些椅子之间。日记 1945—1957》（*So sitze ich denn zwischen den Stühlen. Tagebücher* 1945-1957），瓦尔特·诺沃耶斯基编辑出版，克里斯提安·略泽协助整理，柏林，1999；1933 年至 1945 年日记全集的校勘光盘，柏林，2007。完整的日记原件现保存在位于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州立图书馆的手稿部。

豪斯特·维塞尔：阿道夫·格拉斯布莱诺（Glaßbrenner）（1810—1876），幽默作家，由于所撰政论文经常遭受审查，曾经被判五年禁作，以假名“布莱格拉斯”出版了三十多册《柏林》系列（*Berlin wie es ist und - trinkt*）（1832—1850），当时很著名，其中几册由台奥多·霍泽

曼配有卷首画，这些就是被克莱普勒称为“我的那本格拉斯布莱诺的漂亮绘本”。这些册子的大部分以颇具柏林特征的语言对复辟政策进行了讽刺，奠定了柏林幽默市民文学的基础，与其最成功的作品《新列那狐》（*Neuer Reineke Fuchs*，1846）一起被禁，作为三月革命前最著名的民主记者之一，他被责令于1850年秋离开所在州（梅克伦堡）。

这些都是第三帝国的语言：克莱普勒对其语言概念加以拓展的很有说服力的一段，尽管他之后马上又对其进行了限定。在后来的文章里他又重新谈起了这个话题，例如在译稿正文第10页，在对“鼓手”进行描述时他意识到，甚至在这个“无声的形象”中，“第三帝国的语言”都朝他迎面击来。最新研究正是在这一语言观中发现了克莱普勒语言学论述的新颖之处。

塔列朗的句子：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由于功绩而多次受到表彰。法国极其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自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直到维也纳会议和1830年的七月革命）。无数名言都被认为是出自他的口中，其中包括克莱普勒提到的“语言被赋予人类来隐匿其思想”。

le style c'est l'hommele：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封·布封伯爵（1707—1788）于1753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使用了这句话。费舍尔－胡珀（第327页）批评克莱普勒像很多人一样误以为这句话意指一个人语言风格是其个人性格的映照，并指出克莱普勒在其他地方意旨正确地引用了这句话，即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谎言，但是在其语言风格中，他的本质会暴露无遗。（参见第21章“布封”）。

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克莱普勒以《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史》（*Geschichte der französchen Literatur des 18.Jahrhunderts*，柏林，1954）为书名发表了第一卷。第二卷《卢梭的世纪》直到他逝世后的1966年才出版。

公务员遭遇清洗：根据1933年4月7日所谓的《公务员法》犹太公务员被立即解雇。“非雅利安人”指的是那些父母或祖父母中任何一

方为犹太种族的人。这项关于人种的定义成为了将“非雅利安人”清除出各种职业、协会或组织的法律基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线战士，克莱普勒得到了短暂的延期待遇，1935 年仍然被强迫解除教职。

在德累斯顿的日本宫里：原为荷兰宫殿，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强大王）自 1722 年起将他的瓷器收藏至此，其中也包括东方的瓷器。因此该宫殿在经 1727 至 1733 年间的改造后与其名称“瓷器宫殿”一样相应地呈现出具亚洲特征的外观，自此更名为“日本宫殿”。十九世纪时这座宫殿成为选帝侯图书馆及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所在地。克莱普勒的日记如今就保存在那里。

使用图书馆的禁令：如克莱普勒 1936 年 10 月 9 日所记，作为犹太人他不允许继续使用图书馆阅览室，这明显地限制了他的学术工作。

我被扫地出户：1940 年 5 月克莱普勒夫妇被强令搬离他们自 1937 年起入住的家，并搬到一栋犹太人居所（参见代序“犹太人居所”）（参见 1940 年 5 月 26 日日记：“极其可怕的状况，一天里多次感觉生不如死”。在同一页里，他将“犹太人居所”称为“犹太囚笼”）。

佩戴黄星标志的人：参见第 13 章“黄色的犹太人星”及第 25 章。

罗森贝尔格的神话书：阿尔弗莱德·罗森贝尔格（1893—1946），纳粹主要理论家，促成反犹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着力从事反犹宣传。1918 年，发表种族主义的著作。1921 年起任《民族观察报》编辑，之后成为该报出版者。1923 年参加希特勒政变。希特勒囚禁期间为纳粹党替代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人。1933 年，纳粹外交署负责人。1934 年任“领袖专员，主管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思想及世界观的培养和教育”。1939 年成立“犹太人问题研究所”，目的在于掠取所有犹太人的图书馆以及艺术画廊。1940 年艺术品查抄组织“突击司令部”负责人，直到战争结束之时扣押和抢劫了占领国价值连城的艺术品（至 10 月抢盗的物品约 427000 毛吨位〈BRT〉）。1941 年被任命为“东部占领区帝国长官”。1946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在他 1930 及其后几年出的主要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出

版量几乎达到 200 万）中，频频著述的罗森贝尔格宣扬了新的、完全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带有攻击性的反犹及反基督教色彩的世界观（“血统的宗教”）。

克莱门斯和魏瑟：*LTI* 代序提到的“盖世太保畜生”。当盖世太保头目阿诺·维泽尔 1945 年自行结束生命时，当年党卫队突击大队队长约翰内斯·克莱门斯却成了苏联以及联邦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LTI* 书中提到的那些追杀者、凶手以及三百二十多名犹太遇难者的简要介绍请见 2007 年克莱普勒日记的光碟：维克多·克莱普勒，《日记》（*Die Tagebücher*），注释版全集，瓦尔特·诺沃耶斯基编辑出版，克里斯蒂安·吕泽的协助，DIRECKTMEDI Publishing GmbH 数字图书馆之 150 卷。

amis...porte：13 世纪中叶法国诗人吕特伯夫一首诗中的诗行。

什么是希特勒之流最强大的宣传手段？：克莱普勒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也尚未得到解答。希特勒在其奋斗书中对宣传政策及方法进行了定义，成为了纳粹宣传分子的准则。“宣传”一词对于纳粹具有正面含义，只适用于政治范畴，1933 年起，纳粹法律明文规定这个词不能用于经济领域。“宣传”的目的在于吸收新成员，并培养成员统一的思维与行动方式。为此目的，纳粹普遍使用媒体、电台和电影之类的媒介，同时也不放弃传统媒介，如建筑、文学以及音乐。

席勒的诗句：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在《信愿碑》（*Tabulae Votivae*）中让他的半瓶子醋先生说了如下几句：“因为你成功地写出了一行诗，用一种教养之语言，它为你吟诗和思考，你就认为自己是诗人了吗？”语言之无所不能是不无争议的，因此克莱普勒在接下来的下半句中对此又加以限制。也参见第 21 页。

我越是想当然地、越是无意识地将自己交付给它：新的研究将这个之前显然被忽视的从句评论为克莱普勒重要的遗嘱，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审视语言，而不应该盲目听从语言的支配。这种看法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

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代表了克莱普勒语

言观的核心。在 *LTI* 一书中，克莱普勒经常用砷化镓胶囊来比喻纳粹的语言。

将纳粹语言中的很多词语置入群葬墓坑：考虑到克莱普勒多年经受的迫害，这个愿望似乎可以理解。不无问题的是这种想象，即通过埋葬染毒的词汇使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净化。

[第 2 章　前奏]

鼓手长：指一种老式的小鼓，或者也指鼓手，一个音乐方阵的领队自称为鼓手长。1924 年初对希特勒进行叛国诉讼审讯时，他称自己为纳粹运动的鼓手长。因为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职责。在接下来的莱西河畔的琅茨贝尔格监狱拘禁期间，他改变了自我定义及其政党战略：他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领袖”，而不再是“鼓手”。

[第 3 章　基本特征：贫瘠]

宗教的痴迷神情：参见第 28 章。

《帝国》（*Reich*）：为海外保持中立的国家创办的宣传杂志。战争开始不久后，在洛尔夫·里恩哈特的倡导下创办，由作家欧根·明特勒和鲁道夫·施帕林主笔，每周出版。很快达到了一百四十多万份的发行量。1941 年起，该报每周都发表一篇戈培尔的社论。最后一期 4 月 15 日在柏林发行，1945 年 4 月 22 日的期刊没能发行。参见第 15 页。

ancien regime：（法）旧时的政府形式。狭义指的是自 1589 年起至 1893 年法国大革命之时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广义则指法国大革命前全欧洲范围内的君主专制统治时期。

威廉二世时期：指威廉二世统治德意志帝国的三十年期间（1888—1918），皇帝推行军国主义，引发了各种外交危机，但是也废除了对辱没皇上的行为实行惩罚的规定，这个规定经常是一种审查的借口。

在路易十五和十六的统治下：作为法国和纳瓦拉国王的路易十五

于1715至1774年间统治法国，压制贵族中的反对派，同时依靠审查和各项禁令制度限制议会权力。1770年，路易十五下令解散议会。他的孙子路易十六（1754—1793）虽然重新召开议会，却继续实行审查制度。1774至1791年间，路易十六为法国及纳瓦拉国王，1791至1792年为君主立宪制法国的国王，1793年1月，被剥夺王位后斩首。君主专制时期，每份手稿出版前都要接受审查机构的审查，不能通过审查的书籍禁止刊印或须焚毁。伏尔泰的很多作品都被查禁。图书出版后，图书警署负责后续审查。通常，路易十六的专制统治被看作是审查制度的极致。依照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审查制度（1791年9月13日）。拿破仑时代审查制度再度兴起，与君主专制时期相比被认为相对宽松。

《辛普里齐西木斯》（*Simplizissismus*）：1896至1944年间的一份杂志，其声誉（克莱普勒强调了这份杂志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要上溯至其1914年间尖锐的评论旨趣，社徽黑底上红色的斗牛狗为其象征。杂志社与审查制度之间矛盾重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杂志社卷入战争狂喜的洪潮，失却了最初的批判力度。1933年，纳粹拆毁了该杂志社在慕尼黑的编辑部。杂志社被纳粹控制，原班人马（除去被迫逃亡的创办者之一犹太裔托马斯·台奥多·海涅）按照纳粹的指示工作。

路德维希·福尔达：1862—1939年，著名的犹太裔舞台剧作家，1893年由于戏剧童话《护佑符》（*Der Talismann*）被授予席勒奖金。威廉二世下达禁令，颁奖仪式无法举行。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罗·海泽出于对审查制度的不满脱离席勒奖评委会。路德维希·福尔达是“自由舞台”（1889）以及普鲁士艺术学院（1926）的创办者之一，终其一生都在与审查制度作斗争。1933年5月，由于身为犹太人被清除出学院，而在这一年前，他刚从帝国总统的手中接过科学与艺术歌德奖章。当他始终无望流亡海外时，于1939年自杀。

东战区最高指挥官辖区的书籍审查局：1915年9月德国军队战胜俄国之后成立。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作为军事单位库尔兰省纳入德国的直接军事管理。军队指挥部的最高长官埃里希·卢登道夫（参见第32章“卢

登道夫”）试图在那里按照德国模式建设一个军事国家。相关措施不仅包括纯洁性，还包括一个德意志文化纲领，作家如阿诺德•茨威格以及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都参与其中。虽然要重新组建学校和教学，但却应该阻挠形成被占领民族自己的知识阶层。然而这个军事管制的所有目标都落空了。德国人遭到仇视，乌托邦式的“路登多夫模式”在军事失利之前业已失败。最新研究确认了许多通向领袖之国的延续性轨迹，从路登多夫占领区的居民区一直到希特勒对“东方生存空间”的要求。

旨在维护国家社会主义的党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正确的说法应为：旨在维护国家社会主义文献的PPK（parteiamtliche Prüfungskommission的缩写）。它负责审查所有涉及其政党及党内官员的出版物。1934年4月创办伊始，机构负责人即为菲利普•布勒。同年他成为领袖的总理府头目，战争之初下达实施安乐死，也就是大规模屠杀精神病人和残疾人。

帝国文献协会：根据1933年9月22日帝国宪法成立的帝国文化协会下属的七个部门之一。受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领导，致力于对整个文化领域的全面掌控。其筛选机器的运转就是要将政治异己分子，特别是犹太人逐渐清除出去，等同于职业禁令。

中心站：这应该是指柏林的每日媒体发布会，在发布会上被挑选出来的记者接受官方具体指示：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帝国官方媒体部门的书面指示造成各地传媒的统一性。对媒体的操控导致了面目一致的报道，导致读者的流失。

播送……《帝国》（*Reich*）文章：戈培尔相信通过自己的文章建立了一个“非直接的、面向民众的喉舌”，因为经过电台播音员的朗读，文章强烈的官方口吻得到减弱，产生了更大的效果。

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这是当时的看法，不再符合现在的研究。

[第 4 章　帕尔特瑙]

盖奥尔格·M：根据费舍尔－胡珀（342 页），此处指盖奥尔格·穆尔巴赫，女作家奥古斯特·威格哈特－拉扎尔的侄子，她也是克莱普勒夫妇的朋友。

马克斯·瑞纳·海瑟：马克斯·瑞纳·海瑟（1885—1952），医生、作家，著有十余部社会批评小说，起初受到纳粹的推崇，之后遭禁。

弗里茨·封·翁汝：弗里茨·封·翁汝（1885—1970），表现主义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服务于最高军事指挥的反动宣传写手转变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提倡民族和解，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统治。1932 年，他在戏剧《零》（*Zero*）中预言战争将要爆发，加剧了右翼分子对他的仇视，作品被禁，也正因此，他得以在纳粹夺权和自己的书籍被焚之前逃亡意大利，最终经由法国逃往美国。

张伯伦：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1855—1927），英国种族理论家，雅利安－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代表，瓦格纳的女婿。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权威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1899）吸引了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如西奥多·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及德皇威廉二世。他的“雅利安世界观”与阿尔弗莱德·罗森贝尔格及阿道夫·希特勒精神上的亲缘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两个人并没有直接援引他。

尼采：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哲学家，他的思想对于二十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似乎不是说他的个别著作，而是指其整体作品。纳粹分子对尼采的接受是双重的，一部分人将尼采置于国社先行者行列（戈培尔也阅读了“他的”尼采并持肯定态度），另一些人将尼采作为犹太人的维护者加以批判。1945 年后尼采被认为对国家社会主义负有责任。现在的研究则认为尼采的思想遭到了曲解和利用。

布尔克哈尔特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雅各布·布尔克哈尔特（1818—1897），瑞士文化史学家，受到包括尼采的推崇。1860 年

发表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成为关于此个性觉醒黄金时期的经典之作。

[第 5 章　摘自第一年的日记]

德累斯顿的教授席位：1923 年至 1935 年间克莱普勒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罗曼语学正教授。

国家庆典在波茨坦：在第一次议会会议的前一天，波茨坦的兵营教堂精心安排的庆典活动，通过民族的神话、年老的兴登堡会晤年轻的希特勒、革命德国的代表，强调体现市民阵线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

《自由之战》（*Freiheitskampf*）：与纳粹党关系密切的一家德累斯顿报纸。

威廉·温特的科学：威廉·温特（1823—1920），哲学家、心理学家，心理学学科创立者。对于他的成就评价不一，身后留下了约 490 部著作，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其他的科学家。

de rigueur：（法语）不可免除的，要求的。

“世界犹太人”：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如此称呼那些国际媒体记者，因为在 1933 年初事件中，他们对国社政府迫害犹太人进行了反面报道。这被国社宣传歪曲为可怖的宣传。

“可怖的宣传”：指蓄意散布恐怖消息。这个概念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敌对的军事双方实施心理战的手段。国社宣传早在 1933 年，战争远未开始时就拿来了这个概念，目的在于将国际媒体对于德国恐怖统治的报道指称为谎言。

抵制犹太人的生意和医生：1933 年 4 月 1 日全德国范围内首次举行的反犹抵制运动，借口是所谓国外的恐怖宣传——或如戈培尔所称的“可怖的挑唆”，对于他来说“宣传”一词内含正面含义。尤里乌斯·斯特莱歇尔（参见第 26 章“施特拉燮”）组织的抵制犹太人活动后来

逐渐演变成为抢劫和袭击事件，一天之后不得不结束，国际形象受损，宣告失败。抵制活动之后，反犹行为合法化，因此它应被看作是国家有组织的迫害犹太人行动的序幕。

《保护民族象征符号》(*zum Schutz der nationalen Symbole*)的法规：1933 年 5 月 19 日公布，1933 年 5 月 21 日生效。

第三帝国语言的界限问题：参见第1章“这些都是第三帝国的语言”。

Limpieza de la sangre：（西班牙语），字面的意思是“血统的纯洁”。这个概念如果按照克莱普勒的推断，应上溯至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仇犹思想（反犹大主义），而按照新的研究，则应上溯至十五世纪在西班牙首次出现的种族主义。西班牙城市里的犹太人，即当地改信基督的这一部分犹太人拥有了财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却招致了社会上的妒恨。必须要编造出一种新的解释，针对这些危及原本形态的犹太发达者的形成和经济权力，以图将其永远清除出去，因为至此关于犹太人谋杀弥赛亚的指控对改信基督的犹太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新的理由是 Limpieza de la sangre，也就是“血统的纯洁性”，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架。它主要建立在下述低级观点之上：犹太人的贪婪植根于血液之中，他们希望攫取权力，仇视“血统纯洁”的民族。1391 年发生反犹暴乱之后，1492 年 3 月 31 日，驱逐犹太人的皇家敕令中也应用了这个说法。该种族主义思想乍看起来与国社种族主义思想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然而就国社暴行的范围和程度来看，二者之间是无从比较的。

“犹太人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犹太物理学家和世纪天才，和平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1905 年发表了四部使世人对世界发生根本性改观的巨著，并指出空间和时间之间不可抹杀的关联，发表相对论和一条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式。1914 至 1932 年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所长，1921 年获物理学诺贝尔奖及其他各项荣誉（包括他去世后受到的各种表彰、雷根斯堡瓦哈拉的半身像、阿尔波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2005 年作为“爱因斯坦奇迹年”的百年周年被定为“爱因斯坦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爱因斯坦就遭受了

反犹分子的谋杀警告，身为犹太人与和平主义者，他感受到了威胁，于1932年离开了德国，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他再没有从（美国）普林斯顿返回德国。1933年，他的住处遭彻底盘查，著作被焚毁，1934年被剥夺国籍。出于对纳粹进攻的担忧，他建议制造原子弹。——在国社时代，像他这样的人被添加蔑视的称呼“犹太人”（“犹太人爱因斯坦”），目的在于引发听者相应的反犹偏见。这种侮辱方式也不是纳粹的发明，几个世纪之前在其他的国家类似事件均有发生（见费舍尔－胡珀，344页）。

瓦瑟曼：雅各布·瓦瑟曼（1873—1934），德国犹太裔，罗曼语学者，一度拥有很多读者，二十年代末获得世界声誉，主要是由于1928年的小说《莫里奇冤案》（*Der Fall Moritius*）。在这部小说中他以艺术化的方式表达了自己通过文学来塑造新人类的信念。1933年小说被禁。他在幻想破灭中死去。用他的文学作品创造一个无种族仇恨的更加公平、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希望被粉碎了。菲尔特市自1995年起颁发一项以他的名义命名的文学奖。

埃尔利希：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化学家和犹太信仰的医生，现代化学疗法的创始人，在战胜梅毒和白喉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创立了免疫学而获得诺贝尔奖（1908）。

奈瑟：阿尔伯特·奈瑟（1855—1916），犹太裔医生和细菌学家，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病原体（奈瑟菌）。

杨·基普拉：（1902—1966），波兰犹太裔男高音，在德国的巡回演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及时（1938）逃亡美国，他在那里主要和妻子玛尔塔·艾格特合作创作轻歌剧与电影。

胡根贝尔格康采恩：民族保守派媒体集团，1914年作为重工业宣传机构由阿尔弗莱德·胡根贝尔格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反对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宣传工具，二十年代末主要借助宇宙电影公司（UFA），一家自己的新闻社，一家出版社（舍尔）和三家日报。1933年起，几乎所有胡根贝尔格康采恩的企业都转为国家社会主义财产，胡氏获得很可

观的收益。

胡根贝尔格：阿尔弗莱德·胡根贝尔格（1865—1951），媒体大亨，德意志帝国的希特勒内阁部长，二十世纪初之后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多媒体康采恩，并借此参与了破坏魏玛共和国的活动。1928年，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DNVP），1931年，与希特勒结盟“哈尔茨堡阵线”，为后者的夺权铺平了道路，1933年1月30日被帝国总理希特勒任命为经济部长，却仅于五个月之后便被勒令退职。1945年，胡根贝尔格在去纳粹化审查中被定性为情节轻微级别。直到2005年位于莱比锡的联邦管理法院才宣判了胡根贝尔格作为国社政权的清道夫角色，其子女的赔偿要求因此遭到拒绝。

德意志民族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1918年成立，1930年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强势的右翼政党，在党主席胡根贝尔格的领导下（1928—1933）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联盟，以“哈茨尔堡阵线”的形式结成短期的民族反对派，并参加进希特勒内阁，但是其自身党派意义衰退，该党于1933年6月27日解体。

“拉特瑙清除者”：1922年6月24日两名右翼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的成员（埃尔文·科恩和海尔曼·费舍尔）射杀了帝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参见第12章“拉特瑙”）。这些政治谋杀是要动摇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机制，此外，像这个事件，也是要警告犹太人。

battaglia del grano：（意大利语）谷物之战。“谷物之战”和1925年其他的生产战役是墨索里尼的宣传措施，以提高农业的地位争取农业人口对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支持。

失业人数下降：据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33年德国有480万人失业。1934年失业人口数量达到270万；1935年210万；1936年为160万；1937年为90万；1938年40万，1939年10万。

钢盔：1918年12月成立的“前线士兵同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准军事化防卫组织。钢盔团与国防军关系紧密，在德国国家人民党会议期间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实行武装护卫，堪比国社党的冲锋

队。犹太人禁止加入该组织。自 1929 年起，钢盔团转变为民主制的敌人，要求恢复君主专制。钢盔团参与成立了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哈茨堡阵线”。1934 年整合加入纳粹冲锋队。1935 年解散。该联盟的领袖之一赛尔特在希特勒执政期间一直担任第三帝国劳工部部长。

阿奈玛丽：参见第 1 章“我们一位朋友”。

霍恩史泰因：霍恩史泰因堡里建有冲锋队在萨克森州的第一个集中营（1933 年 3 月—1934 年 8 月）。

《新语文学月刊》（*Neuphilologische Monatsschrift*）：研习盎格鲁－萨克逊和罗曼文化及其对于德国教育意义的杂志。由 W. 休波纳在莱比锡的 Quelle&Meyer 出版社出版。

血旗：这个概念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表示判处流血及死刑刑罚的高级法庭资格。1923 年希特勒政变失败，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宣称弯钩十字旗浸染了牺牲的政变分子的鲜血，将血旗概念纳入到弯钩十字旗的含义之中。它被国社宣传打造成为殉道士及圣化的象征。1926 年起，在纳粹党内会议上，所有的旗帜和党卫队四方旗都要经由一个仪式，即与这面“血旗”接触而被神圣化。参见第 106 页。

“尊贵的兄弟们……令我们疼痛”：引自康拉德·费丁南德·迈耶尔（1825—1898）的诗作《胡腾最后的日子》（*Huttens letzte Tage*）。

罗伯特·维尔布朗特：1875—1954 年，经济学家，1908 年被聘为图宾根大学的教授，1929 年起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授，理论社会主义的代表，著有相关著作，其中一部是关于 1918 年的卡尔·马克思；1933 年被解聘，之后完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

和平主义者古博尔事件：埃米尔·尤里乌斯·古博尔（1891—1966），犹太裔数学家和出版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和平主义者，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为魏玛共和国而战，并有相关著述揭露政治谋杀事件或秘密联盟如“执政官组织”，从而成为政治反动派最仇视的人。所有针对他的叛国罪行诉讼最后却都不得不撤销。1923 年，取得统计学

教授资格，之后在海德堡大学任教，后被解除职务，因为他引发了一场轰动性的事件。他公开表明自己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者是“以可怕的方式丧命的”。1930 年，他被聘为海德堡大学数学统计学副教授，1932 年夏，在发生了主要由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策划的古博尔斗殴之后，他即失去教职。尽管他拒斥了强加于他的将阵亡烈士纪念碑比作一个大萝卜的说法，他依然必须辞职。克莱普勒“和平主义者古博尔的事件”指的是那场斗殴还是古博尔所谓的比喻，抑或是他的解聘事件，不得而知。古博尔后流亡到法国，1940 年去了美国，并在纽约任教。

奥尔士基：雷奥那多·奥尔士基（1885—1961），意大利－犹太裔出身，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文学教授。1933 年被解聘，在其祖国意大利逗留之后流亡美国。尽管提出非传统的理论思考，出版多部有趣的著作，奥尔士基还是被遗忘了，是一个由于被驱除出境和流亡生活学术生涯受到严重影响的案例。

弗里德曼：威廉·弗里德曼（1884—1942），犹太裔罗曼学者，1933 年夏流亡法国。1942 年，他试图逃往比利牛斯山未果，与两年前做同一尝试的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一样，弗里德曼也同样自杀了。

史必策：雷奥·史必策（1887—1960），出身于维也纳犹太家庭的重要的罗曼学者和文学理论家，文体学的重要代表，卡尔·弗斯勒唯心主义语言学的追随者。在德国大学的 13 年教学生涯之后于 1933 年逃往伊斯坦布尔，1936 年到达美国，在巴尔的摩大学教书直至去世。

雷尔希：厄尔根·雷尔希（1888—1952），和克莱普勒一样热情地追随弗斯勒，为纪念弗斯勒，两人于 1922 年 9 月 22 日以《唯心主义新语文学》（*Idealistische Neuphilologie*）为题出版了纪念文集。1925 年两人创办了专业杂志《语文学年鉴》（*Jahrbuch für Philologie*）。1928 年与克莱普勒决裂之后，两人往来不多。1934 年，他被解除明斯特大学罗曼语系的教职，战后在科隆、明斯特和美因茨教书。

哈茨菲尔德：克莱普勒 1924 年与海尔姆特·哈茨菲尔德以及弗里茨·诺伊贝特共同出版了一本题为《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的罗曼语文

学》。

“自愿冬季救助”：由募捐、社区和家庭捐款组成，但是也包括从各人工资或薪水中抽取的部分。“自愿性”通常是通过间接强迫达到的。钱流入到冬赈服务部，最初用作救助失业的紧急款项，之后也用于国社政府大众福利的其他支出。希特勒设立冬赈服务部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培养德意志民众的牺牲精神。

Ukas：在沙皇俄国表示“公告”，现在大多含讽刺意味表示“上头的指示”。

古斯媞·W：根据费舍尔－胡珀（第346页）即奥古丝特·威格哈特－拉扎尔。

玛利亚·石特林贝尔格：根据费舍尔－胡珀（第346页）是玛利亚·石特林贝尔格－拉扎尔，一位奥地利女作家。

卡琳·米沙艾里斯：1872—1950年，丹麦女作家，1910年以其百万销量的《危险的年龄》（*Das gefährliche Alter*）打破了一项禁忌。她书写了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的性事，在男人与女人中间引发了同样的震惊和愤怒。之后她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批判言论使她的书在德国和意大利都被查禁。她在家中接待过很多流亡人士。

埃里希·米萨姆：1878—1934年，左翼政治活动家和作家，1926年正式退出犹太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施瓦宾波西米亚团体的核心人物，为讽刺杂志如《痴儿西木》（*Simplicissimus*）工作，德国无政府主义重要代表之一，在慕尼黑1918年9月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影响了巴伐利亚议员直选共和国，被判15年监禁，1924年得到赦免，对国社兴起提出最强烈的警告者之一，1933年2月18日即遭逮捕，关押集中营14个月，最后在奥拉宁堡的集中营遭受拷打，被党卫军谋杀。人们为纪念他树立了一些纪念石碑，一些街道以他命名。埃里希－米萨姆－协会出版了两本以他命名和研究他的文集。

布兰德斯：乔治·布兰德斯，本名莫里斯·科恩（1842—1927），丹麦－

犹太裔文化批评家，重新发现了尼采的意义，发表了优美的散文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专著。早在 1903 年他就公开谴责土耳其直至今日都予以否认的对亚美尼亚人的民族大屠杀以及自世界大战之初起在俄属波兰发生的暴乱，还预言了巴勒斯坦地区无法解决的矛盾和世界大战的爆发。

mot savant：（法语）学术词汇。

在布尔人战争期间……“Compounds”或者“集中营”：通常都认为英国在第二次布尔人战争（1899—1902）中首次建立了集中营来关押布尔人俘虏，其中也包括俘虏的妻子和孩子。这个概念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被遗忘，但是现在却几乎只用来指德国二战中为关押犹太人而建造的集中营，克莱普勒的假设由此得到了肯定。

选举宣传：为了 1933 年 11 月 12 日的议会选举。在一党制国家里，竞选宣传不再服务于任何一个民主机构，而是为了通过民众将专制合法化。

哗众取宠的行径：需上溯至费内亚斯·泰勒·巴尔努姆（1810—1891），美国戏剧杂耍先驱，为了宣传不惜造假甚至欺诈。他是最早的广告天才，懂得操纵公众舆论。克莱普勒视他为国社宣传工具化的象征。

公投……联想到拿破仑三世：在 1852 年的一次公民投票之后第二帝国宣告成立。当选的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1808—1873）成为拿破仑三世，他是“伟大的”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当克莱普勒说：“希特勒照理说并不愿意跟他有什么关联”时，克莱普勒可能想到了拿破仑三世不幸的下场。由于受到普鲁士霸权主义的挑衅和威胁，他对普鲁士宣战（1870 年 7 月 19 日色当战役）。几周之后战争失败（1870 年 9 月 1 日），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俘虏（1870 年 9 月 2 日），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1870 年 9 月 4 日）。

K. 夫妇：根据费舍尔－胡珀（第 347 页）是艾尔莎和卡尔·考夫曼夫妇，1936 年二人逃往巴勒斯坦。

犹太国民中心协会：“犹太信仰的德意志国民中心协会”，简称“CV”或者“中心协会”，1893 年建立，1935 年改称“在德犹太人中心协会”，

其成员数量在此时期约为七万。

戴姆伯：哈里·戴姆伯（1882—1943），犹太裔物理学家，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教授。1933年先是流亡土耳其，接着逃到美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现今颁发两项以他命名的奖金。

戈培尔安排的：戈培尔在1933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如下："一点钟鸣笛。全德国保持安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的报道效果很好。悉心准备的音响背景也好。领袖一点十分准时到来。热烈的欢呼！只有工人。一年之前还有人差点把我们置于死地。/领袖处于最佳状态。巨大的成功。几乎走不出大厅。返程是一片欢呼的海洋。数十万人。这是我的宣传部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可能是克莱普勒与戈培尔唯一一致的地方。

凌波：但丁·阿利盖利（1265—1321）在其《神曲》（*Göttliche Komödie*）中如此称地狱的第一层，表达了与中世纪神学一致的观点，即将"凌波"看作那些自身并没有罪孽却无法升入天堂的灵魂在彼岸的栖息地（《圣经》的教首们，在受洗之前死亡的孩子）。

[第6章 三个最早的纳粹词]

惩罚性袭击：现在通常将它理解为针对一个国家的由于某事而公开进行的惩罚性战争行为。这个概念产生于殖民地历史时期，首先用于对殖民地或占领区采取的军事行动。

国家庆典：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并未将"波茨坦之日"（参见第9章"国家庆典在波茨坦"）称为国家庆典。（这个概念在那42000页中的使用不到三十次。）在联邦德国只有联邦总统有权安排国家庆典（根据1966年6月2日有关国葬和国家庆典的规定）。

科罗尔剧院：1844年作为娱乐场所由约瑟夫·科罗尔（1781—1869）在柏林建造。在充满变幻的历史之后，这个经过改建的建筑群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了歌剧院，克莱普勒的一位表兄，指挥家奥托·克莱

普勒（参见第 13 章“音乐家表兄”）于 1927 年 11 月开启了它的新时代。而这个时期 1931 年即告结束。帝国议会大厦被烧毁之后（1933 年 2 月 27 日），科罗尔剧院被作为议会会场使用。在 1933 年 3 月 23 日第一次会议上，议会的权力被取消（授权法），科罗尔剧院的帝国议会从此总是上演对领袖决定的欢呼。

为第六军及其元帅举行的遗体告别：1946 年 11 月 22 日第六军（二十五万人）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其军队指挥弗里德里希·鲍罗斯于战争的最后一刻被任命为陆军总指挥，这等于命令他自杀。几个小时之后第六军投降，鲍罗斯和九万一千名士兵被俘。这次失败具有深远的军事和心理意义。

普利威尔：台奥多·普利威尔（1892—1955），畅销书作家。在 1930 年的第一部小说里，他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的状况，这足以让国家社会主义者下令焚烧他的书。1933 年辗转不同的国家流亡苏联。1943 年成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委员。1945 年出版了文献性小说《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被译成 26 种语言，取得巨大的成功。由于得到苏联的允许得以与战俘营中第六军幸存者进行了很多访谈，这赋予了他的小说强烈的真实性。他作为红军成员返回德国，在苏占区作为“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合会”代表以及出版社负责人等工作。1948 年公开与共产主义决裂。

L' Etat c' est moi：（法语）“国家即我”这个说法据称来自于路易十四（1638—1715），是专制的统治和自我理解的体现。

因为我们不再有国家：这个说法适用于 1946 年，书稿完成之年。随着 1949 年民主德国的成立，这个说法过时了。

[第 7 章　炫／扩展]

柏格森：亨利·柏格森，本姓贝列克森（1859—1941），波兰－犹太裔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曾获无数荣誉，其中包括 1927 年

诺贝尔文学奖。1940 年，贝当元帅治下的法国开始将对犹太人的侮辱和攻击合法化，他放弃了所有的头衔和奖章，公开归属犹太文化。

马努斯·赫尔施菲尔德：1868—1935 年，犹太裔性别研究学先驱，1897 年世界上首个同性恋组织“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1919 年在柏林成立世界上第一所“性别科学研究所”，坚决反对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同时倡导优生学，是种族保健协会的成员。1932 年出于安全考虑开始流亡生涯。1933 年他的研究所被封，之后遭焚毁，图书馆的图书于 1933 年 5 月在柏林剧院广场的焚书事件中被全部销毁。

萨尔地区公决：《凡尔赛条约》的一项规定，既包括萨尔地区脱离德意志帝国而隶属法国管辖 15 年，也规定应于 1935 年 1 月 13 日举行公投决定该地区归属。尽管德国流亡精英积极参与并不断向民众发出警告，最终 91% 的公民投票决定萨尔地区重新划归德国。1935 年 3 月 1 日起，萨尔地区重新归属德意志帝国。

野间清治：1878—1938 年，日本教师（1904—1908），1909 年起，成立讲谈社，出版文学书籍和漫画杂志。自 1977 年起，这个大出版社每年颁发一个相关奖项。他的回忆录题为《讲谈社。日本报业之王自传》（*Kodansha. Die Autobiographie des japanischen Zeitungskönigs*），柏林，1935。

1945 年 2 月 13 日到 14 日的夜里：在这个夜里以及接下来的两天，英国和美国的空军炸烂了德累斯顿的大部分区域。城市充斥着逃难者，陷入了极度混乱，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据目前的调研约为两万五千人），却给克莱普勒夫妇带来拯救。他们在这一夜得以逃脱盖世太保和轰炸。

毕希曼：格奥尔格·毕希曼（1822—1884），1864 年首次发表了他的名言、格言大字典《插翅飞翔的词语》（*Gefluegelte Worte*），多次再版（由不同的出版社），现在仍然在刊行，而他的名字也逐渐变成了“插翅飞翔的话语”。这本是诗人约翰·海因里希·佛斯 1821 年在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lias*）时创造的词汇。佛斯用以表达那些词语，

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插上翅膀”到达听者的耳畔的。

“超人”：哲学概念，“理想之人”的意思。这个词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在十七世纪以来的德语里可以找到。这个概念是通过弗里德里希·尼采（参见第 4 章“弗里德里希·尼采”）闻名的，尼采则是从法国哲学家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那里拿来的。尼采从中发展出一个十分复杂的、包含了违背道德的和生物学的因素。这使某些国社分子得以对其进行片面的阐释，并运用到国社统治人种意识形态中。

冯塔纳……《史代西林》（*Stechlin*）：台奥多·冯塔纳（1819—1898），诗意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作家，《史代西林》是其最后一部小说（1898），参见第 4 章“弗里德里希·尼采”。

德累斯顿文化联合会：参见代序“文化联盟”。

[第 8 章　十年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束棒：荆条束是古罗马高级官吏的标志，由其侍从举在前面。墨索里尼将其作为法西斯运动的标志。1926 年至 1943 年间是意大利国家的官方标志。法西斯主义不仅指墨索里尼发起的运动（和政党）、相应的意识形态及政府，而且在更高的意义上也包括欧洲所有 1918 至 1945 年间与其在意识形态上类似的现象，它们都导向追求极权体制。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有奥地利的、匈牙利的、罗马尼亚的、克罗地亚的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

卢梭：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瑞士哲学家、作家和教育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先驱，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之父。在诸多领域都广有建树，首先是他的国家理论著作《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1760/1761），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政治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1936 年初，克莱普勒花数周时间研究卢梭，认为卢梭是二十世纪极权理论的精神之父。

演说者／雄辩家／玩弄辞令者：克莱普勒观察演说家的演说并研

究其修辞术，计划撰写一部相关内容的著作。英国的议会文化肯定和提升演说家的价值，法国的大革命使得公开演讲获得了新的声誉，而在德国，雄辩术一直以来都更多的是受到蔑视，一些人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德国人“对于迎合群众心理的宣传演说缺乏免疫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社会主义的雄辩术被认为是对束手无策的受众的强制性说服，新的研究认为这种说法是试图开脱罪责。

博叙埃：雅克·本涅·博叙埃（1627—1704），法国主教，作为能言善辩的布道者同时也作为歌功颂德者而受到敬仰。他给出了专制主义存在的理由：承蒙上帝恩泽的君主世袭和君主制的威权作为秩序原则。

高乃依：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创立者，创作古代和历史题材作品，形式严格，是法国最重要的剧作家，后为拉辛取代。

他在科尼希贝尔格发表了讲话：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希特勒 1933 年 3 月 4 日的演讲：“报道很伟大。希特勒无与伦比。荷兰语。感谢祈祷和钟声。三千万到四千万听众。”也参见第 50 页。

德国最后的西线攻势：1945 年 1 月 16 日至 21 日的阿登反击战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当德国已经失败的时候，希特勒下令袭击美国在阿登的战线。他的目标是安特卫普港，同时要将美军和英军隔离。一百多万人参加了这场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美军参战的最大规模的反击战。在最初的胜利之后德国最终落败，双方人员和物资损失惨重（德国单方伤亡 10 人），第三帝国迅速衰亡。

史迪勒：克莱普勒在他 1943 年 12 月 25 日的日记中（不是 1944 年，如 *LIT* 中所称）记录如下：史迪勒昨天和我说：“战争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纳粹的军事补给可能已经亏空了，但是他们宣传的力度仍然还在。1922 年我就在慕尼黑听过希特勒的演讲，效果非凡。如果现在在德累斯顿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他，那么他今天过来，在这里作讲演，明天那全部百分之九十的人就会又在他的掌握之中！”

病情：克莱普勒的解释，说他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一个满是疯狂想

法的“救世主”，“德意志民族躯体”由于受到“感染”而“坏死”，国家社会主义是“德意志肉体上疯长的一种异体”，由于使用了纳粹词汇而被批评为狭隘生物学。

[第9章 狂热的]

在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参见第1章“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

Ravaillac：弗朗索瓦·拉法亚拉克（1578—1610），法国教师，普通家庭出身，非常虔诚，爱好幻想，认为自己身负使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的使命，却没有机会接近亨利四世。当亨利四世决定进攻尼德兰的时候，拉法亚拉克在其中看到了针对教皇的战争的端倪，1610年5月14日，他在大街上谋杀了亨利四世。

百科全书人：狭义指1751年6月至1765年12月间出版17卷《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Enzyklopädie ou Dictionnä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的140名编撰人员；在出版人丹尼斯·狄德罗（1713—1784）与让·勒·洪·达朗贝赫（1717—1783）之外还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百科全书》一共35卷，最后一卷1780年出版。1757年有关达朗贝赫发表的“日内瓦”条目的事件之后很多编撰人员都不再参与这项工作。

萨瓦见习牧师的信仰自白：卢梭（参见第8章“卢梭”）将这部作品作为自己教育学论著《爱弥儿或者关于教育》（*Émile ou de l'education*）的第四部，1762年首次出版。在这部关于在自然中长大而非由人类抚养成人的爱弥儿的小说中，卢梭详细论述了良好教育的根本准则，遭到了伏尔泰等人的强烈批评。

培尔：皮若·培尔（1647—1706），法国早期启蒙主义哲学家，反对迷信，反对宗教迫害，倡导信仰自由（1687）。他编纂了一本影响深远的新型词典，四卷本的《历史与批评词典》（*Dictionnä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1702），为词条增加了脚注。其中经常引用文献和作家，表述它/他们之间相互对立的观点，要求读者带着批评的眼光去思考和判断。他以此展示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即将在平实的事实及其描述之外的批评性反思和阐释视为历史学根本的任务。

鼓手：参见第2章“鼓手长”。

莱辛：戈特弗里德·埃弗拉姆·莱辛（1729—1781），启蒙时代重要作家，市民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德国市民戏剧诞生于其最重要的剧作［1766年的《明娜·封·巴恩海姆》（*Minna von Barnhelm*）、1772年的《艾米莉亚·伽洛蒂》(*Emilia Galotti*)、1779年的《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

纳旦：1783年，莱辛的戏剧《智者纳旦》在柏林首演，主题探讨宗教宽容，剧中展现了莱辛的世界观。莱辛的朋友，犹太启蒙运动的奠基者莫泽斯·门德尔松是纳旦的原型。

波萨：马耳他骑士波萨侯爵是弗里德里希·席勒1787年在汉堡首演的戏剧《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Don Karlos*，*Infant von Spanien*）中一个虚构人物。这出剧因为波萨侯爵在剧中发出要求自由的呼声（“请您给我思想自由”），而在第三帝国后期和民主德国的后期禁演。

埃利希·格里茨巴赫：第三帝国希特勒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海尔曼·戈林的亲信，先是戈林的私人顾问，之后成为某指挥部负责人。

毒汁：参见第1章“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

狂野的狂热主义：可以证明克莱普勒拥有非凡观察力的事实是，在戈培尔四万两千页日记中“狂野的狂热主义”一词只出现了一次，即在1944年11月6日，在他为《帝国》（*Das Reich*）周报撰写那篇克莱普勒引用的文章的时候。

[第 10 章　本源诗文]

约瑟夫·贝迪耶：约瑟夫·贝迪耶（1864—1937），法国罗曼语学者，1903 年成为巴黎法兰西学院院士，因其朝圣之路理论而著名，在此理论中他将英雄史诗的产生与朝圣者相联系。克莱普勒 1913 年在巴黎结识贝迪耶之前已经研究了这种史诗理论，并接受了贝迪耶的影响。

Collége de France：一个科学机构，院士均为终身，无需尽任何义务，只要求做一次公开的、完全开放的讲座。这在欧洲绝无仅有，可谓“学者仕途之冠”。

“克尔特的”来源：现在人们将“克尔特人占卜师”理解为克尔特人的宗教和精神精英的一分子。但这个词的词源不明，颇有争议。贝迪耶的讽刺意图应该也在于此。

古斯特洛夫：威廉·古斯特洛夫（1895—1936），1932 年起任德国国社德工党瑞士分部主任，发表反犹文章。1936 年，大卫·弗兰克福特想要反抗日益蔓延的反犹主义，制造标志性事件，便射杀了他。国社宣传将古斯特洛夫奉为殉道士，1937 年希特勒命令将当时最大和最摩登的豪华游艇命名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这艘国社组织“有欢乐才有力量”的游艇，本来是以希特勒命名的。1945 年 1 月 30 日，这艘游艇满载上万名惧怕苏兵的逃亡人员，沉入海底，成为航海史上最大的灾难事故。

彭萨：弗兰索瓦·彭萨（1814—1867），法国戏剧家，1850 年完成的悲剧《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遭到冷遇，彭萨所有的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未曾受到十分的推崇。1855 年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

弗兰克福特：大卫·弗兰克福特（1909—1982），医学系学生，犹太裔，出生于今属克罗地亚的奥地利－匈牙利地区。为反抗纳粹的反犹宣传，1936 年 2 月他在达沃斯杀死了纳粹分子古斯特洛夫。1936 年 12 月，弗兰克福特被判 18 年监禁。1945 年 6 月获提前释放，被驱逐到瑞士边境。1969 年撤销了对他的入境禁令。其间他在以色列找到可以维生的工作。

“食地毯者”：克莱普勒只从这个修饰语里推测出了一个传说的萌芽，费舍尔－胡珀（第 58 页）证明了克莱普勒对此是很不确定的。事实上，希特勒作为“食地毯者”（carpet-eater）的传说被英国人和美国人传播开来。这个传说很可能要追溯到威廉•夏伊勒的著作《柏林日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产生于 1938 年 9 月苏台德危机时期。

食草的尼布甲尼撒：《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中对于遭驱逐和耻辱的比喻。巴比伦的国王（公元前 605—前 502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在梦中被预言：“你的王国将被予夺，你必遭驱逐远离世人，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这句话即刻就在他身上应验了。

我们还拥有那座……小房子：克莱普勒夫妇 1934 年搬入了位于德累斯顿－德尔茨申的一座自己的房子；1941 年他们必须离开并搬入犹太人居所。

卡利科斯：根据费舍尔－胡珀（第 352 页），他是国社德工党的德累斯顿－德尔茨申的市长，1937 年 1 月去世，死因不明。

穆池曼：马汀•穆池曼（1879—1947），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者，1925 年任萨克森省部的负责人，1933 年帝国地方长官，1935 年兼任萨克森省部长会议主席，是国社德工党地方长官中特别不受欢迎的、贪污和残忍的代表。1945 年 5 月在逃亡的路上被苏联军队抓获，判处死刑。

莱比锡严重的空袭：1943 年 12 月 4 日对莱比锡的第一次严重空袭。

[第 11 章　模糊界限]

左拉：爱弥儿•左拉（1840—1902），自然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出版大量小说，大多写成连续的多部曲。他在德莱弗斯事件中（犹太人阿尔弗莱德•德莱弗斯遭受不公正的判决被定叛国罪）站在德莱弗斯一边，于 1898 年 1 月 13 日发表致国家元首的一封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件，批评反犹右派阵营，也令他名声大震。自此，“我控诉！”（“J' accuse！”）便经常被引用。这之后他遭到了右翼分子的仇视，

去世六年后被此间的左翼政府迁葬到先贤祠，也是为了纪念他在德莱弗斯事件中为正义而战的行为。

龚古尔兄弟：埃德蒙德•德•龚古尔（1822—1896）和朱利•德•龚古尔（1830—1870），法国作家、自然主义文学创始人。1896年，年长的哥哥建立了龚古尔学院，该学院自1903年起颁发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龚古尔文学奖。

托勒：恩斯特•托勒（1893—1939），犹太裔作家和革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前线战斗，1916年身体和精神双重崩溃，（与古斯塔夫、埃里希•穆萨姆一起）在巴伐利亚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被判五年监禁，发表重要的表现主义作品，如在狱中写成的戏剧《群体人》（*Masse Mensch*），1933年被剥夺国籍，流亡到瑞士、英国和美国，在那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活动中，1939年自杀。

贝歇尔：约翰呐斯•R. 贝歇尔（1892—1958），政治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作者（1949），由于曾经企图自杀而为战争无用，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升迁，1925年发表反战小说《莱维西特，或唯一正义的战争》（*Leviste oder Der einzig gereichte Krieg*），并因此被指控“文学叛国”，1932年出版《红旗》（*Rote Fahne*）。1933年经由布拉格、苏黎世和巴黎逃亡到莫斯科。1945年后，“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的组建者之一，并任联盟主席（参见第1章“文化联盟”），克莱普勒也在其中司职。1946年起任德意志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1954—1958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

尤思特：汉斯•尤思特（1890—1978），戏剧家和国社文化干部。从表现主义作家转变为国社统治集团御用的第一个剧作家。他的最大成就是献给希特勒的歌颂自由军团领袖的戏剧《史拉格特》（*Schlageter*），在国社政府曾任数职，1935至1945年任帝国文献协会主席，整体划一德国文化生活的得力干将，1945年后没有文学成就。

《行动》（*Die Aktion*）：一份文学－政治性的先锋杂志，主编为弗兰茨•普费姆菲尔特。他是文学和绘画领域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也是

现代政治作家的最重要的伯乐和提携者之一。普费姆菲尔特与妻子一道组织“行动晚会”和“行动－舞会”。《行动》是德国表现主义的催生婆，但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就失去了意义。

《狂飙》（*Der Sturm*）：赫尔瓦特·瓦尔登 1910 至 1932 年间在柏林出版的杂志之一，对于表现主义有重要意义，很多知名作家曾为杂志工作（从克努特·哈姆松到卡尔·克劳斯）。围绕着这本杂志聚集了一个“狂飙圈子”，后者组织了“狂飙晚会”等活动。

“西部咖啡馆”：又以“狂人咖啡馆”闻名。1898 至 1915 年柏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活动的场所，表现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萌发了出版杂志《狂飙》和《行动》等想法。

史黛芳妮咖啡馆：慕尼黑艺术家聚会的地方，可与柏林的西部咖啡馆相媲美，并同样以“狂人咖啡馆”之名闻名遐迩。埃里希·米萨姆、恩斯特·托勒、弗朗克·韦德金德、保尔·科雷、约翰呐斯·R. 贝歇尔等都是其常客。

1912 年的选举之夜：1912 年 1 月 12 日帝国议会选举是一战前最后一次大选，社会民主党人获 420 万选票的 34.8%，取得巨大胜利（增长率为 25%）。德国社民党因此成为帝国议会最强势的政党。

SS 纳粹国防军：国社德工党党卫队。1925 年成为希特勒的私人卫队，以国社德工党的特殊组织的名义成立，隶属冲锋队，1929 年，海因里希·希姆莱接管后，发生根本性转变，权力不断增长，1933/1934 年，所有州的政治警察均由它领导，1934 年 6 月，在参与了针对冲锋队的谋杀行动的基础上，成为准军事化的独立组织，由此战胜了冲锋队的竞争，之后全权负责集中营的管理，包括所有灭绝营地，1939 年帝国安全情报局（党卫队安全部门与盖世太保及刑警组合而成）中 12 位主要官员来自党卫军（负责落实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点，“挑选”和“灭绝”，族群谋杀和屠杀犹太人），随着战争的开始，武装党卫军成立（由党卫队机动部队的武装联队和党卫队骷髅头联队组成），犯下了不计其数的战争罪行。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被视为“大屠杀的设计师”，他力图建

立的党卫军自我意识是纯正的统治人种的精锐部队。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党卫队为犯罪组织。

SA：参见代序“冲锋队”。

古老的文字符号“胜利”：世纪之交时，民族主义运动一成员（圭多·冯·李斯特）在世纪转换之后发明了一种新的古符字母表。古符字母“S”被他定作多个不同含义单词的词首字母，其中包括“sal 和 sig” = “Heil”和“Sieg”（“万福”与“胜利”）。虽然希姆莱的鲁内文专家拒绝该字母表，但胜利符号还是在国社中流行，单写的 S 作为德意志少年团的象征，双写的 S 自 1929 年起代表党卫军。即使是在今天，除了弯钩十字，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这个胜利字符了。使用它将受到处罚。

小黑旗：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上台不久，民族青年与联合青年的黑色旗帜就随着他们的组织解散而消失，只有党卫军和德意志少年团还用它。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本名威廉·阿波利奈里斯·德·考斯特洛维斯基（1880—1918），此为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一叶重要的法国抒情诗人的笔名，阿波利奈尔是意大利－波兰裔，与诸如毕加索、亨利·卢梭等人熟识，是克莱普勒描述的图形诗的创立者，这种诗歌以“具象诗”（Calligramme）的名目进入文学史。

太阳轮……弯钩十字：几千年古老的、世界范围都曾使用过的不同文化（特别是印度人、中国人和凯尔特人）的宗教象征，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圈里再次使用，在德国首先是在青年运动（候鸟）和民族主义运动中（首先有圭多·冯·李斯特，他于 1910 年将弯钩十字定义为日耳曼古字符和雅利安智慧的象征）。从 1919 年起，随着反对革命的运动，这个符号开始获得政治意义。希特勒没有使用任何一项释义。对于他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是用于宣传的效果。弯钩十字成了国社德工党和国社统治中心的、无所不在的象征。按照希特勒的说法，这一设计，红布上白圆和倒置的黑色弯钩十字是出自他之手（参见《我的奋斗》）。

蒙田的立场：*Que sais-je*：米歇尔·德·蒙田，法国哲学家。他的

毫无偏见的、自由的思想方式对全世界众多的哲学家和著作者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有伏尔泰和尼采。出于对陈旧的条条框框的质疑，他发明了随笔的艺术形式［1580年以后的《随笔》（*Essais*）］，这种从怀疑的基本态度出发的接近真理和认识的文学“尝试”形式，克莱普勒以蒙田的主导性问题“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来定义他的基本态度，这也是他向自己提出的疑问。

勒南：厄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历史学家。他对《圣经》表述的历史真实性的怀疑遭遇强烈的批评，其发表这些观点的主要著作《耶稣的生活》（*Das Leben Jesu*）在1863年以后发行了多版。他甚至被短期取缔了教授教席，却在一年之后（1878）入选法兰西科学院。他对闪米特人的贬低遭受了各方面的驳斥，同时具批评含义的词汇“反犹主义的”在概念历史性意义上第一次出现。对1870年后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勒南予以拒绝。

[第12章　标点应用]

铁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领袖和政治家，本名约西帕·布洛茨（1892—1980），1934年，当他进入流亡南共中央政治局，从事政治地下活动时，开始使用这个假名。1937年任位于莫斯科的南共党的总书记。1941年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进攻开始之后，他成为反抗德国和意大利侵占者游击战的主要人物，1945年11月29日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理，1953年任国家总统，1955年，按照苏联－南斯拉夫协定担任不结盟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1963年成为终身国家总统。众多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参加了他的葬礼。

张伯伦：阿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他的名字至今负面地与英国的绥靖政策紧密相连。作为英国首相（1937—1940），他在1938年9月是慕尼黑协定的主要支持者，这个协定为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扫清了障碍。为了避免战争，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广受批评的错误判断，宁愿牺牲一个民主小国，助虐一个独裁的德国。

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重要政治家，贵族出身。在六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任各种政府要职，其中包括两任英国首相（1940—1945 和 1951—1955）。后世评价他为希特勒强大的对手，几乎是唯一及早看清了希特勒的意图并为击败希特勒进行了始终不渝斗争的人。1953 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历史著作。

罗斯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美利坚共和国第三十二届总统（1933—1945），民主主义者，实施经济和社会"新政"对付失业率。在美国参战（1941 年 12 月）之前他就在外交上支持同盟国作战，1945 年参与成立联合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拉特瑙：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工业家，政治家，1899 年成为经济领域（首先在 AEG）的领军人物，现代型管理者，现代工业的展望及设计师，著有多部影响广泛的书籍，德国民主党（DDP）的创建者之一，1921 年重新建设部部长，1922 年 1 月外交部长，1922 年 4 月通过缔结拉帕罗协议与苏联达成平衡，1922 年 6 月遭非法的"执政官组织"成员谋杀，参见第 5 章"拉特瑙清除者"。

海涅：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犹太裔著名浪漫派文学诗人和记者，1825 年改信新教，不久便后悔。他的诗歌闻名世界，犀利的言辞也令欧洲生畏。他热爱自己的德意志祖国并对此感到绝望，感觉自己在德国被排斥在外。在厌倦了普鲁士的审查制度后，他于 1831 年去往巴黎。其富于政治远见的表述经常被引用，例如出自 1823 年的《抒情插曲》（*Almansor*）中的这段话："这只是一个前奏，人们焚书的地方，最终也将焚烧人类。"他的书 1933 年遭到焚毁，也许，正如费舍尔－胡珀在提到瓦特时推测的，这也是克莱普勒以一个"前奏"作为 *LTI* 开篇的原因。

这些讽刺引号……属于印刷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克莱普勒的推断不同，这些引号是在十九世纪才开始使用的。克莱普勒对这些符号问题的观点请见费舍尔－胡珀，第 318 页。

[第 13 章　名字]

英国大革命：“光荣革命”（1688—1689）意味着君主专制的失败和作为议会政府体系基础的《权利法案》通过。掌握国家的不再是国王，而是议会。

清教主义：英格兰和苏格兰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运动章程是 1563 年的《三十九条信纲》（*Puritan Articles of Convocation*，运动名称由此而来）。首要目的是进行教堂的礼拜仪式和道德的革新，与天主教教义脱离而改信加尔文教义，其次也与政治要求紧密联系。

法国大革命：经过这场革命（1789—1799）君主专制制度被废除，通过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建立了新的权力和社会秩序，这对今天的民主意识很有影响。

瓦格纳崇拜：这一崇拜为瓦格纳（1813—1883）的遗孀柯西玛、毕罗前妻、李斯特的女儿所制造，在瓦格纳死后，她将这个崇拜发展了整整五十年。她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 1933 年之前很久就将瓦格纳的崇拜者圈子引向了反犹主义。克莱普勒提到的是瓦格纳热的一个方面，即对于日耳曼名字的崇拜。

青年运动……候鸟：青年中自发形成的反市民阶级的青年文化。1901 年施特格利茨（现在为柏林－施特格利茨）候鸟－协会成立，主旨是拒绝城市生活，倡导到浪漫的自然中去，在营地上点燃篝火。这是对于日益严峻的城市化给出的浪漫的回答。作为青年运动中最重要的联盟，“候鸟”对当时很多的大型青年联盟都产生了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青年联盟（“候鸟”和童子军的联合组织）取代。1933 年很多青年组织都加入了纳粹青年团，或者由于其组织被禁而转入地下。该组织的歌曲部分流传了下来。

如果纳粹青年团领袖自己就叫巴尔杜尔：巴尔杜尔·施拉赫（1907—1974），并不是他本人自称巴尔杜尔，而是在他受洗时，他富有的美国母亲为他取了这个名字；他创作了希特勒青年团团歌“旗帜飘扬引导我们向前”，是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偶像人物，将希特勒青年团发展成

为史无前例的拥有六百万青年人的群众组织，培养团员战斗、服从、献身精神以及对于“领袖”的信仰，1928 年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袖，1931 年国社德工党的帝国青年领袖，1933 至 1940 年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1940 年任帝国总督和维也纳大区长官，负责奥地利犹太人的押运事务。

《观察画报》（*Illustrierter Beobachter*）：国社德工党每周出版的画报（1926—1945），由党自己的慕尼黑艾尔出版社出版。

《人民观察家》（*Völkische Beobachter*）：1920 年起国社德工党传播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报，历任主编为：至 1923 年迪特里希·艾克哈特，1923 至 1938 年阿尔弗莱德·罗森贝尔格，1938 年起威廉·怀斯。这份日报由国社德工党的弗朗茨·艾尔出版社刊行，其发行量由开始的 8000 上升到 1944 年的 170 万。

格里尔帕策：弗兰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戏剧家，饱受三月革命前期的审查制度之苦。他的戏剧童话《幻梦人生》（*Der Traum ein Leben*）1840 年在维也纳宫廷剧院（Burgtheater）首演，他也是这家剧院的驻院作家。他对那些民族运动持怀疑态度，并概括在一个被反复引用的表述里：“从人道主义 / 经由民族主义 / 及至禽兽魔性”，这可以看做是对第三帝国的预言。他晚年得到诸多殊荣，如 1859 年被授予莱比锡大学荣誉博士，1864 年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的称号。

犹大·马加比：亨德尔最受欢迎的清唱剧，该剧在 1940 年的上演肯定需要勇气，中心人物是一名受到赞美的以色列胜利者。也参见克莱普勒 1940 年 9 月 23 日的日记。

The Chronic of Aaron Kane：作者为弗雷德里克·怀特，1936 年在纽约出版。克莱普勒提到的译本于 1939 年由波茨坦的 Rütten & Loening 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凯恩船长的编年史。新英格兰的小说》（*Die Chronik des Kapitäns Kane. Ein Roman aus Neuengland*）。

安彤·贝特斯海姆：1851—1930 年，奥地利文学家（传记年鉴和德语悼文的出版人 1887—1917），也是大量重要传记的作者，其传记作

品具有创新视角和观点，如 1886 年博马舍的传记。

《被爱的儿子们》：小说的作者是英国人霍华德·斯布林（1889—1965），克莱普勒忘记了他的名字。1919 年，为了报道爱尔兰独立战争作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前往爱尔兰。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印象融入了他大获成功的社会批评小说。1938 年出版的《我儿！我儿！》（*My Son！ My Son！*），最初的题目为《和平之父》（*O Absalom*），也拍摄了德语电影。

赫兹：频率的单位，每秒钟的波动频率，以犹太裔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1857—1894）的名字命名。

黄色的犹太人星：自 1939 年 11 月 23 日起，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犹太人必须在左胸前显眼处佩戴一枚黄色六芒星，俗称犹太之星。1941 年 9 月 1 日起第三帝国境内所有犹太人也必须佩戴此标记。按照当时警方规定，所有依据《纽伦堡法令》（*Nuernberger Gesetze*，参见第 25 章“纽伦堡法案”）被定义的犹太人从六岁开始都要佩戴六芒星，出身于所谓特权婚姻的犹太夫妻和混血儿不包括在内，而如果犹太婚伴没有子女的话，该项规定对其也适用。犹太之星事件是中世纪反犹思想的再次滥觞，当时欧洲许多地区的犹太人都被迫佩戴这种标志。国社政权引入犹太人星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对犹太人实施隔绝、歧视直至系统地灭绝。参见第 25 章。

音乐家表兄：指的是指挥家和作曲家奥托·克莱普勒（1885—1973）。1927 年是柏林科罗尔歌剧院的负责人，1933 年移民美国，成为洛杉矶爱乐乐团团长，1955 年任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家。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原本叫莱朴·布隆施泰因，乌克兰－犹太裔，俄国革命家，被流放，1902 年逃离流放地的监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给自己取的假名是 1902 年他所逃出的那个监狱的看守长的名字。托洛茨基主义是以其名字命名的政治方向，偏离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曾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红军的缔造者，1918 至 1922 年间领导了多个人民专署，

1922 年至 1929 年与斯大林发生权力斗争，失利后，1929 至 1940 年流亡，后被斯大林下令谋杀。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原名迈尔·瓦拉赫－芬克尔斯坦因，俄罗斯犹太裔。1905 至 1918 年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筹备武器和钱款，1930 至 1939 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41 至 1943 年任驻华盛顿大使。

拉爪迪亚：费欧列罗·拉爪迪亚（1882—1947），1934—1945 年纽约市市长，广受欢迎，成功实施了全面的改革措施。

卡尔·埃米尔·弗朗措斯：（1848—1904），奥地利作家，他在洛林地区的犹太家族成员依然还叫莱沃特（Levert），而在加利西亚（今属乌克兰）则自十八世纪中期开始被迫改姓弗朗措斯。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游记极受欢迎，1870 年代起多次在克莱普勒提及的《来自半－亚》（Aus Halb-Asien）出版。另有一些小说反映了东欧的犹太文化。此外，他还是格奥尔格·毕希纳作品一个早期版本的出版人。十九世纪末他搬到了柏林，其在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连接作用，令他越来越多地遭受反犹分子的抨击。

约瑟夫二世：伴随 1781 年 10 月 13 日颁布的所谓“宽容令”，约瑟夫二世（1741—1790）秉承启蒙思想，打破了天主教的宗教垄断，赋予了新教徒和犹太人以宗教自由（“约瑟夫主义”）。但是犹太人还远未得到解放。他们依旧是令人难以忍受、受人嘲笑的仆从。这在克莱普勒提到的 1787 年旨令的施行中得到了体现，根据这一法令，犹太人经常被强令使用滑稽的姓名。约瑟夫二世激进的改革措施（比如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废除了死刑以及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君主）因为旧有上层人士日益激烈的反抗而失败。

福格威德的瓦尔特：福格威德的瓦尔特（约 1170—约 1230）。德国中世纪前期文学最重要的抒情诗人，既写骑士爱情诗歌，也作道德、宗教和政治主题的格言诗。

艾申森巴赫的沃尔夫拉姆：（约 1170/80—约 1220），中世纪德语

文学最重要的叙事作家，其诗体小说《帕齐瓦尔》（*Parzival*）和《维勒哈尔姆》（*Willehalm*）不仅仅着眼于基督教西方国家，也关注异教的东方世界。也有一些骑士爱情诗在他的名下流传下来。

犹太人居所：参见代序“犹太人居所”。

犹太复国主义者：参见第 29 章“犹太复国主义”。

氏族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冠以亲缘关系研究的表达，由此作出雅利安人血统证明。依据 1933 年 4 月 1 日《公职服务法》（*Gesetz zum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只有雅利安人才能担任国家公职。1935 年纽伦堡法令颁布之后，此项证明变得更加重要，因为结婚、获得公民权利以及就业都需要该项证明。要想成为国社德工党党员、世袭农庄主、作家以及大学毕业则需要一份“大的”家族起源证明，对其家族起源的考察需要追查至 1800 年。雅利安人血统证明由帝国氏族研究办公室（1940 年起叫帝国氏族办公室）出具。种族意识在 19 世纪已经开始重新使用过时的概念“氏族”，替代“家族”，相应地用“氏族研究”取代“家谱学”。

“慕尼黑，运动之城”：1935 年，作为国社德工党的成立之地和总部，巴伐利亚州首府被希特勒授予“运动首都”的荣誉称号。

“纽伦堡，党代会之城”：1933 年希特勒将纽伦堡称为“帝国党代会之城”，正式的官方公告直到 1936 年才颁布。1927 年至 1938 年间，纽伦堡每年 9 月都要举行数百万群众参加的大型宣传集会，阿尔贝特·施佩尔（1905—1981）为此设计了相应的巨型建筑。（参见第 30 章“纽伦堡党代表大会”）

“传统大区”：传统大区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存在于 1930 年至 1945 年，其特殊地位源自于国社运动是在此地发生起步的事实。

“大区”：1925 年，根据希特勒的要求，国社德工党作地区划分，称为大区。最终，帝国领域划分为 42 个大区。“大区”的概念来源于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表示通过氏族和自然区域定义的日耳曼人的聚居地。

“瓦尔特大区”：军事袭击波兰之后波兹南军事区（1918 年之前是普鲁士的波兹南省）被划归德意志帝国。1939 年 10 月成为“帝国大区波兹南”，这个名称在 1940 年 1 月改为“帝国大区瓦尔特”，简称“瓦尔特大区”。

黎茨曼市－隔离区：1940 年 2 月作为犹太人的强行居住区而建立。1945 年 1 月 19 日由苏联红军解放。黎茨曼市隔离区（这个波兰城市洛兹 1940—1945 年间以一名德国将军黎茨曼的名字命名）与华沙和克拉科夫一起为国社政权最大的隔离区，非人的生存条件，由一个犹太委员会自我管理，其每周需列出一份押送名单。隔离区经常作为赴往灭绝集中营的中转站。灭绝政策开始于隔离措施。

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 年 11 月建立，1945 年 2 月至 4 月由于国际红十字会的交涉获部分解放，1945 年 5 月 8 日苏联军队进驻。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隔离区（此外还有同名的集中营）是国社政权的“示范点”和“老年隔离区”。基于这个特殊的地位，其生活状况与其他集中营相比相对较好，尽管如此仍然是难以想象的残酷。囚犯之中有数千名孩子和许多老年人，也有来自全欧洲的犹太名人。1943 年秋丹麦政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要求视察隔离区，国社政权为此采取了空前的很讽刺的“美化行动”，并且拍摄了一部欺骗性的宣传影片。

布痕瓦尔特：1937 年 6 月成立，1945 年 4 月 11 日由美国军队解放。魏玛附近的这所集中营关押过二十五万囚犯，囚犯主要包括政治敌人和社会边缘人如社会危害分子、同性恋和犹太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占领国的囚犯大多在此关押。

奥斯维辛：距离克拉科夫 60 公里的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和灭绝营，是国社政权最大的集中营。它的名字代表着国家社会主义对所有敌人的“清除”行动，特别是作为对约 600 万犹太人的大屠杀象征。全欧洲范围内共有 130 多万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10 多万人都被杀害，其中估计约 100 万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0 年成立，1941 年增设两个附属集中营，其中之一为法本化工集团建立，1945 年 1

月 27 日由红军解放。如今，这个日子成为世界纪念日。那里的博物馆和纪念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犹太人营地海勒贝尔格：1942 年 11 月初，国社德工党代表、蔡司－伊康厂代表和德累斯顿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领导亨利·施密特商定，赶在留在德累斯顿的 500 名犹太人按照预定要在第二年春天被押运走之前，将其中的 300 名集中到海勒贝尔格集中营，好让他们能为蔡司－伊康厂干活。1942 年 11 月 23 和 24 日盖世太保的头目亲自监督了这个集中营的设置，这个过程由蔡司－伊康厂的摄像师埃里希·霍恩呐摄制成记录片。德累斯顿犹太人在那里生活在毫无尊严的条件下。1943 年 3 月他们被运往奥斯维辛，全部被屠杀，只有十人幸存。1987 年 9 月，施密特因为被证明参与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被判处终身监禁（参见 184 页）。

德累斯顿的毁灭：参见第 7 章“1945 年 2 月 13 日到 14 日的夜里”及 36 章。

克拉佩特：参见 1945 年 3 月 27 日日记。

[第 14 章　煤耗子]

煤耗子：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反对浪费能源的宣传行动的象征。自 1942 年冬开始，一个背上或手上拿着袋子偷煤的漫画成为对浪费紧缺的取暖材料的警告。招贴画上、纸条上、火柴盒上、在电影院或电台里，煤耗子的漫画形象无所不在，使其迅速地、持续地成为民族祸害的象征。

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phosen*）：罗马诗人（公元前 43 年—公元 17 年）关于变形的神话作品，以一个浩繁的史诗（15 卷）加工了极为大量的古典和神话传说原料；每一段叙事都是围绕着变形原则（形式和内容）组织的。这是一种神祇天空和世界无所不包的历史，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敌人在偷听”：随着战争开始的宣传行动，首先在一系列宣传画中出现。其标志是投射在纸上的影子人。画面告诉你这个男子在偷听随意的聊天者。相应的文字写道：“注意，敌人在偷听！”或者“谈话时要注意，敌人在偷听！”“敌人”首要指犹太人，随着战争的继续，指向了每一个非国家社会主义意识的德国人。

阿纳托勒·弗兰思……《园丁普托伊斯》（*Gärtner Putois*）：阿纳托勒·弗兰思（1844—1924），本名弗朗索瓦·阿纳托尔·蒂波，法国颓废派文学的重要作家，法国启蒙传统下的随笔作家。在获得各项殊荣之后，1921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22 年，梵蒂冈收录了他的全集。阿纳托勒·弗兰思历经了一个从保守派到共产党人的知识人士的转变。《普托伊斯》（*Putois*）是选集《飞翔的商人与更多其他有用的故事》（*Der fliegende Händler und mehrere andere nützliche Erzählungen*）中的一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企鹅岛》（*Insel der Pinguine*）和《诸神干渴》（*Die Götter dürsten*）更为著名。

[第 15 章　不可能]

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武士遵循道德规范的生活态度（严格自律和藐视死亡），已经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典范。“柏林武士道”是克莱普勒个人的比喻，表示他对许多柏林人大胆的、批评－诙谐的态度。

世界语：一种为了实现较为简便的国际交流的人造语言，1887 年由路德维克·拉扎鲁·柴门霍夫发明。

米达斯谎言：传说中的弗利吉亚国王米达斯象征愚蠢和贪婪。古代的轶事说他祈求狄奥尼索斯给他魔力，让他碰触的所有东西都变成金子。因为他碰过的食物和饮料也变成了金子，于是死亡威胁着这个贪婪者。

HAPAG：1847 年成立的“Hamburg-Amerikanische Packetfahrt-Actien-Gesellschaft”的简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公司。

《Mitsou》：1919年出版的爱情小说，书名为 *Mitsou, ou comment l'esprit vient aux filles*（《米秋，或者姑娘们如何领悟的》），作者是斯东妮－加比耶勒·科莱特（1873—1954）。这位法国女作家（四十余部长篇小说）走红于变幻多彩剧（Varieté），并与法西斯主义的维希政权交往，是荣誉军团成员和龚古尔学院院士。法国首位获得隆重国葬的妇女。

BDM：德意志女青年团。

"Hib-Aktion"：1931年夏天的宣传攻势，戈培尔在柏林积极参与，旨在为类似于工会的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基层组织赢得工人。

MG：机枪（Maschinengewehr）的缩写，一种由理查·加特林在1865年发明的全自动速射武器，其战争投入逼迫战略战术发生全面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依然按照老战术发出的强攻命令之下，整整一代人在这种机枪的雨点般弹击中流尽鲜血。战场上的单打独斗成为历史，成批的系列方式的士兵屠杀开始了。

HJ：希特勒青年团的简称，国社德工党着统一制服并按年龄划分的青年组织（14–18岁的男青年编入HJ，14–21岁的女子编入德意志女青年团，BDM），1933年朝着一个国家青年团体发展，1936年12月关于希特勒青年团的法律使之实现。其官方目标是对男女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和体能训练。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青年领导青年"得以广泛实施，包括国社意识形态的最高准则"信仰领袖和服从"。

DAF：德意志劳动阵线。国社最大的群众组织，1938年在罗伯特·雷（1890—1945）的领导下成员数量达到两千三百万。成员数量保证了高额的收入，首先为其经济企业（居住区、保险公司、大众汽车及造船厂等）提供了资金保障。另外，德意志劳动阵线也被划分为众多部门，例如"有欢乐才有力量"，目标在于达到对德国民众工作和业余生活的操控。

[第16章　在一个独有的工作日]

毒素：参见第1章"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

打小报告：对一个人品质上的蔑称叫作打小报告，国社政权时期在盖世太保、警察或党里所做的、知道其带来政治迫害的指控。

“种族耻辱”：参见代序“雅利安妻子”。

老弗里茨：弗里德利希二世，也称“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十五场战役和连年战争的艰苦经历（七年战争）及越来越多的怨愤在这位国王身上留下印迹，令他过早衰老，但也令他以铁一般的意志坚持下来。在宗教问题上很宽容，但对其国家的统治却冷酷专制，仿佛他不了解莱辛及其人道主义似的。他那些无忧宫的宴会（参加者包括伏尔泰）召集过当时最有趣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后世人按照各自的喜好对其人其事进行加工。第三帝国给他赋予了宣传意义上的英雄光辉。在谈话和电影中他和他的追随者被拔高为“德意志坚强性格的代表”。

[第 17 章 体系和组织]

哥白尼体系：宇宙观，据此，所有的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转。也被称作日心说，由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提出。

魏玛共和国：德国的第一个议会政府体制的附加名称来自魏玛市，在其国家剧院召开了制宪会议。魏玛共和国（1919—1933）的诞生受到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的影响。二者都对这个年轻的民主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共和国的败落与国家社会主义同时期的崛起相连，后者也通过它反对共和国的斗争获得很多选票。

康德：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以其新的批判学说及道德要求（定言令式）影响巨大。几乎每一个同时代的哲学讨论都与他的思想体系交集。

史泰芬·盖奥尔格小组：史泰芬·盖奥尔格（1868—1933），象征主义诗人，集合了一批总体十分服从的崇拜者，其中包括卡尔·沃尔夫斯凯尔、路德维希·克拉格、弗里德里希·贡道尔夫以及申克·冯·斯

道芬伯格伯爵兄弟。史泰芬·盖奥尔格的目标之一，如同在最后的诗集《帝国》（*Das Reich*）中所表达的，是创造一个新人，他在这本书中宣讲解脱于现代，同样宣讲解脱于妇女。这以及他后来的形象，作为被信徒簇拥的纯粹的领袖形象，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设想。于是拉拢他进入新体系很符逻辑。据说1933年纳粹分子申报他做普鲁士文学科院主席，未果。戈培尔虽然认为他是个伟大人物，却并不通过任何方式去争取他，而对于其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盖奥尔格小组是小宗教派别或者是“犹太化了”。

“巴尔努姆”：参见第5章“哗众取宠的行径”。

“智性”：国社时期这个概念和“知识分子”的概念总体是贬义的，经常运用在反犹色彩的关联里。这个概念产生于“德莱弗斯丑闻”时期，有支持民主和自由派的正面含义。

《二十世纪的神话》(*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参见第1章“罗森贝尔格的神话书”。

德温格的卡普－政变小说：埃德文·埃里希·德温格（1898—1981），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畅销书作家，在他的小说中美化总体战争尤其是前线战场。第三帝国时期，任帝国文化参议、东线战场的随军记者，受海因里希·希姆莱全权特别委托创作一个颂扬武装党卫军的电影剧本。克莱普勒提到的小说1939年出版，题为《在半途上。关于1920自由军团》（*Auf halbem Wege. Roman über die Freikorps* 1920）。卡普政变发生在1920年，是一场极右派组织的、主要由沃尔夫冈·卡普（1858—1922）和瓦尔特·冯·吕特维茨（1859—1942）领导的反对魏玛共和国的颠覆国家的企图，导致了犹如内战情形的后果，比如帝国政府不得不逃出帝国首都。

《慕尼黑最新消息》（*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1848年至1945年的日报，一度在德意志帝国拥有最高发行量。国家社会主义上台后，报社主编和内务主管立即于1933年3月被拘留。海因里希·希姆莱，时任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总监，任命一名党卫军头目雷奥·弗里

德利希·豪斯莱特为该报的社长，后者的政治清洗一下子整掉了约五十名员工。他任命基泽尔黑尔·维尔辛为内务主管，1938 年维尔辛成为主笔。1935 年党属的马克斯·阿曼的“艾尔出版社”接手了这家报纸。该报于 1945 年 4 月停刊。

[第 18 章　我相信他]

奥斯卡·瓦尔策：1864—1944 年，奥地利的文学学者，伯尔尼、德累斯顿和波恩的教授，《新语言史和文学史研究》（*Untersuchungen der neueren Sprach- und Literaturgeschichte*，1903 年起）及《文学手册》（*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1923 年起）的主编。

雅利安证明：参见第 13 章“氏族研究”。

莱辛：参见第 9 章“莱辛”。

赫尔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魏玛古典文学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和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1774）开启了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批评性思考，为新的历史观铺平了道路。与黑格尔和康德类似，赫尔德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写到人种具有一定的特征，这使人们相信（首先是在国社党），现代的种族主义思想即由此而来。他同样被误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

奥地利加盟到希特勒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多数政治家都赞成其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加盟德意志帝国。但在凡尔赛合约（德国方面）和圣日耳曼合约（奥地利方面）里这一加盟却遭到禁止。加盟的努力转移到联邦州的层面，并在那里继续得到跟进，特别是巴伐利亚民族党十分积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即已表明合并奥地利的企图。1938 年 3 月，他通过施加各种压力以及武力胁迫实现了这项 1925 年作出的计划。1938 年 2 月 12 日，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私人住址）约会奥地利联邦总理库尔特·舒施尼克，

以军事进攻相威胁，要求撤销对奥地利国社德工党的禁令，同时要求任命国家社会主义者阿瑟·赛斯－英库阿特（1892—1946）为内务部长。舒施尼克接受了《贝希特斯加登协定》（*Berchtesgadener Abkommen*）的所有条款，但要于3月中旬举行一次全民公投。希特勒下达战时动员令，并最后通牒舒施尼克取消公投。3月11日下午舒施尼克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同日晚希特勒迫使他下台，英库阿特接任。第二天，即3月12日，他令数万官兵和警察进驻奥地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938年3月13日他命令修订《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重新统一法》（*Gesetz zur Wiedervereinigung Österreichs mit dem Deutschen Reich*），法令在同一天即生效。阿瑟·赛斯－英库阿特组建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该政府从一开始即严厉地压制犹太人和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之前的联邦总理舒施尼克也被逮捕，后来被送往达濠集中营。

大西洋防线：1942年至1944年间设计以及部分竣工的环太平洋海岸、英吉利海峡以及北海防御工事，长达2600公里。数十万人参与修筑8000多个暗堡和防御工事，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防御神话。在英国成功入侵之后，虽然仍在依靠一些暗堡进行顽强地反抗，但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西洋防御墙总体没有发挥作用。

血旗：参见第5章“血旗”。

“血祭者”：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概念。那些在为希特勒的事业奋斗而牺牲了生命的所谓殉难者，这些人被封为运动的血祭者。这些人包括那16个在1923年11月9日进攻统帅府时被枪击身亡的政变分子，以及如豪斯特·维塞尔（参见代序“豪斯特·维塞尔”）或威廉·古斯特洛夫（第10章“古斯特洛夫”）等同样武力丢失其生命的人。

血章：希特勒1934年设立的“1923年11月9日纪念奖章”的民间叫法。自1938年5月起，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被判处和赦免死刑的党员，包括被判一年以上刑期的党员所有参加1923年11月暴乱的政变分子都被授予这枚奖章，总共应该颁发了6000枚血章。

《从皇帝宫廷到帝国元首府》（*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戈培尔1934年在慕尼黑发表的经过修订的一小部分日记，时间是1932年1月至1933年5月，副标题为“日记本里的历史描述”，1944年出版了第42版。未加修改的原件刊印在：《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öbbels*）里，32卷，艾尔克·弗瑞利希出版，慕尼黑，1993—2008。

史巴默：阿道夫·史巴默（1883—195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重要的民俗学家之一。1936年被聘任为第一位德国民俗学教授。战后直至去世领导民主德国的“民俗学科学委员会”。

天意：依据基督教的宿命说（命定论），上帝预先决定了宇宙和人类的命运。希特勒宣称自己是天意的工具，天意规定了他的领袖角色。

巴尔杜尔·封·施拉赫：参见第13章“如果纳粹青年团领袖自己就叫巴尔杜尔”。

维尔·费斯泊：1882—1962年，作家、文学批评家，1923—1943年《美文学》（*Die schöne Literatur*）及《新文学》（*Die Neue Literatu*）杂志主编，血统和土地文学的反犹主义代表。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学政策的代表人物（和其他人一样在德国的22所大学城）发表了德累斯顿焚书事件的讲话。费斯泊在整个国社时期和战后都在为贝塔斯曼出版社工作，直到去世。

艾达：通常认为艾达是用古代北方的语言写成的神祇和英雄之歌，口头流传，作者不详，十三世纪时才诉诸文字。

《日耳曼圣经》（*Germanenbibel*）：《日耳曼圣经。选自日耳曼各民族圣文》（*Germanenbibel. Aus heiligen Schriften germanischer Völker*），威廉·施瓦纳出版，1904/05，7，1907年出版修订版。施瓦纳推出的出版物中还有比如1913年的《在弯钩十字下。人民教育家联盟之书》（*Unterm Hakenkreuz.Bundesbuch der Volkserzieher*）。

希姆莱：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党卫军的帝国领袖及德国警署署长，因而是国社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

1923年与罗姆的防卫联盟一起参加希特勒政变，1925年加入冲锋队和党卫军，1925至1929年担任国社诸多部门的领导，1929年1月任党卫军领导，至所谓罗姆政变之前隶属冲锋队。在他的参与下，1934年冲锋队被削权，1934年8月起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直接听命于希特勒。1936年6月全德警察集中于帝国内政部希姆莱麾下，并由于官职的一致性与党卫军联合。希姆莱作为德国警察（治安警察、盖世太保、帝国刑事警察）和整个党卫军的头目权力无边，操纵一个绝对专制的恐怖机器。他的党卫军（骷髅头联队，最后有38个师团的武装党卫军，这些完全隶属他一人）被视为教团，以精英的方式体现着国社意识形态。1939年"帝国巩固德意志民族性检察官"，驱逐和屠杀波兰人、首先是犹太波兰人主要参与者，1943—1945年，兼任帝国内政部长，1944年后援部队最高指挥官，1945年瓦西瑟部队最高指挥官，2月起，自主投降谈判全部失败。事情公开后，希特勒在自杀前一天（1945年4月29日）解除了希姆莱的全部职务。希姆莱冒名潜逃。一个月之后被捕，服氰化钾自杀。希姆莱是第三帝国最大的刽子手之一，对针对数百万犹太人、信德人、罗姆人以及同性恋者施行的具体灭绝行动，也对斯拉夫各族约三千万人口的削减，都负有重大罪责。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十五世纪起对德意志皇帝统治区域的称谓，始于十世纪的奥托王朝（当时还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历经844年之后，1806年8月拿破仑迫使皇帝弗兰茨二世退位，该帝国终结。中世纪开始，罗马－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们提出承续古罗马帝国的要求，后者建立在基督教意义的上帝神圣意志的基础上。这个帝国政治上由众多的独立诸侯国、一位共同选举出来的皇帝、帝国国会以及帝国拥有议席和表决权的人物组成。参见"代序""第三帝国"及第18章。

保罗教堂：位于法兰克福，1848—1849年间为1848年三月革命促成的第一届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的会址，184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大会会址，被称为"保罗教堂议会"或者也简称"保罗教堂"。10月国民大会投票赞成大德意志方案，即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有德意志邦国的

统一。这项决议由于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反对而失败。后来小德意志的解决方案得到实施：普鲁士领导下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如今保罗教堂是用作公共庆典的场所，例如德国图书和平奖的授予仪式即在此举行。

山地联队：由山地自由军团而来，山地联队自 1921 年起构成了冲锋队在巴伐利亚的所谓初始组织。极右的图勒协会领袖鲁道夫·封·瑟柏腾道夫是自由军团创立者，任务是消灭 1919 年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还在 1920 年投入鲁尔事件和一系列政治谋杀（参见第 5 章“拉特瑙清除者”）如谋杀部长马蒂亚斯·埃尔茨贝尔格。1923 年山地联队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其他的民族主义组织一起组成了德意志战斗联盟，参加了希特勒政变。

神父欺蒙：十八世纪流行“神父欺蒙”理论，核心围绕两个问题，即宗教的起源问题，以质疑其超验源头，以及宗教牟利的问题。普遍认为，这是神父权力及其威信的利益。对于克莱普勒来说，国社宣传与神父欺蒙类似，也见第 16 页。

［第 19 章　家庭告示］

与俄国开战：始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战争伊始就是作为歼灭战进行的。随着大部军团治安警察和党卫军的保安队伍也投入作战，其本身的任务是系统地消灭“不受欢迎分子”（特别是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干部）。参见代序“闪电战”。

人们也像对待动物那样给他们烙上了一个群队番号：第三帝国既在集中营囚犯身上烙上了一个数字（在下臂的上方），也给党卫队的国社精英成员（左上臂的下方）烙上了血型标记，这让后者难以在 1945 年后否认其党卫军成员身份。

赫拉：希腊神话中上父宙斯的妻子和妹妹。

荷马：公元前 8 世纪西方文学和欧洲文化的历史从他开始。人们认

为是他创作了世界文学最早的作品《伊利亚特》（*Illias*）和《奥德赛》（*Odyssee*）。其人的历史性和作者身份的真实性并非无可置疑。

罗兰之歌里的卡尔大帝：约1100年创作的古法兰西史诗，讲的是罗兰的英雄事迹。故事中罗兰在对异教徒（西班牙摩尔人）的战斗中死去，白发老人卡尔皇帝继续他的胜利之战。皇帝卡尔由于《罗兰之歌》（*Rolandslied*）中的高龄而被冠以白胡子之称。历史上的法兰克王国皇帝卡尔公元800年起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世之时就获得“大帝”之名，史诗中并没有对其真实的描绘。卡尔大帝在778年对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时刻还不是白发苍苍。那也不是一场对阿拉伯人即异教徒的战争，而是为了基于前者的求助帮助萨拉戈萨的埃米尔打科尔多瓦的埃米尔。在撤退时法兰克的一部分军队遭到所谓“异教徒”的打击。这就是《罗兰之歌》的主要题材。

“Geburtstag des Führers”：国家社会主义试图仿照威廉时代的皇帝生日庆典，庆祝“领袖”4月20日的生日。首先就是要让党的演讲和旗帜遍布全德国。

远程结婚仪式：国社政权下从1939年11月4日起可以举行的仪式，在新娘所在地的户籍登记处办理，需要有两名证婚人与一个钢盔，这个钢盔要放在身处战场的新郎应该坐的位子上（所以俗话也叫“钢盔婚礼”）。根据1941年11月6日领袖签署的意见，新娘也可以和牺牲或失踪的士兵结婚（所谓的尸婚）。这种耸人听闻的行为的意图在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20章　留下了什么？]

在海尔威的一首诗里：格奥尔克·海尔威（1817—1875），社会主义革命者，三月革命前文学诗人，众多杂志的合作者，有很多著名的朋友，包括米哈伊尔·巴枯宁、奥古斯特·倍波尔、海因里希·海涅、维克多·雨果、弗兰茨·李斯特、卡尔·马克思、理查德·瓦格纳和伊万·屠格涅夫，多次由于政治原因逃往瑞士，1863年起“全德工人协会”全权代理人，

为协会的成立他创作了联盟之歌，包含下面著名的诗行："所有的轮子静立，只要你强壮的手臂愿意。"但是"然后把他们九月化"这句却并非如克莱普勒所说为海尔威所作，而是出自莫里茨·斯特拉维茨伯爵的笔下（见费舍尔－胡珀，第65页）。

托布勒：阿道夫·托布勒（1835—1910），瑞士罗曼语学者，柏林教授。克莱普勒最初曾想师从他读博，但因为无法适应他的冷峻风格而放弃了这个计划。

佛斯勒：卡尔·佛斯勒（1872—1949），著名的罗曼语学者，1902年海德堡大学罗曼语哲学教授，1909年维尔茨堡罗曼语学教授，1911年慕尼黑大学罗曼语学教授。克莱普勒跟随他完成了关于孟德斯鸠的教授资格论文（见第30章"孟德斯鸠……"）。佛斯勒针对实证主义语言观的唯心主义语言观，将罗曼语学者分成了两派。克莱普勒终生追随佛斯勒的美学，这在他同样的唯心主义语言观里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达尼尔·桑德斯：1819—1897年，犹太裔语言研究者，与格林兄弟同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词典编纂者。因为其浪漫主义的德意志姿态，他拒绝格林兄弟的词典。他编纂了大量的字典，其中包括克莱普勒提到的外来语字典，1871年首次出版。

Sachs-Villatte：一部德法字典，由卡尔·弗里德里希·萨克斯和维萨伊尔·维拉特编纂，1869年至1888年由朗氏出版社出版。

德累斯顿灾难：参见第42页、186页和260页。

[第21章　德意志之根]

威廉·舍若的《德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威廉·舍若（1841—1886），奥地利文学史家，实证主义的创建者，曾在维也纳、斯特拉斯堡和柏林做教授，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日耳曼学者之一。克莱普勒提到的《德国文学史》广为流传（1883年第1版，1915年底第15版）。

统治人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中，“血统的纯正”具有关键意义。根据这种理论，首先是统治者种族的成员（北欧人）拥有这种血统，并仅凭这一点而优越于其他的种族。由此国家社会主义者自认为有权利压迫和消灭其他的、低等的种族。这种典型的国社种族狂妄，他们称之为种族卫生，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对犹太人、信德人、罗姆人或者斯拉夫各民族成员的大屠杀。

魏希斯勒的《灵感与精神》（*Esprit und Geist*）：对埃德瓦特·魏希斯勒的《灵感与精神。对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本质的探讨》（*Esprit und Geist.Versuch einer Wesenskunde des Deutschen und Franzosen*），比勒菲尔德，1927，克莱普勒撰写了负面的评论，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将德国人超越于法国人之上的民族主义的抬高，走得太远了。

塔西图：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图（约58—116），罗马历史学家和众议员；在所有著作之中他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和《编年史》（*Annalen*），特别是其中关于阿尔米尼乌斯的章节，在十五、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著作从根本上促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阿尔米尼乌斯，一位“德意志民族英雄”）。

日耳曼尼亚：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公元98年对各个不同的日耳曼部落的一种表述。他将日耳曼人优良的风俗与罗马人的颓废相比较，强调他们的忠诚、勇敢和诚实，但也包括他们的懒惰、玩心和嗜酒。塔西图将日耳曼人过度理想化，他迄今仍然常被引用并适用的grundsatz“sine ira et studio”（“不恼不躁”）可以加以质疑。

普利威尔：参见第6章“普利威尔”。

法国疾病：梅毒，一种有几百种叫法的传染病，经常随着据称的疾病发源国得名：如意大利疾病，英国疾病或者波兰疾病。法国疾病第一次记载于十六世纪。

罗慕路斯：传说罗慕路斯与他的双胞胎兄弟雷慕斯一起建立了罗马城。建城之际，兄弟二人发生了争执，罗慕路斯杀死了雷慕斯。据提图斯·

李维乌斯的说法，罗马城建于公元前 753 年 4 月 21 日。

反犹主义：这个 1879 年德国的仇犹分子发明的概念，涵盖了对犹太人各种形式的敌视。在盎格鲁萨克森和以色列的研究中，这个概念被理解为自古以来对所有“犹太的”根本性敌视（犹太人作为“人类的敌人”），经过中世纪（犹太人作为“上帝的谋杀者”或“仪式的谋杀者”）直到当代（犹太人作为“寄生虫”、“世界的阴谋家”和“民族的破坏者”），在德国的研究中一般只理解为这个概念发明以来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元素。十九世纪接受启蒙影响的市民阶层曾经寻找仇犹的科学依据，由此产生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种族主义。犹太人被认知为一个“种族”，导致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标志。

申纳勒：盖奥尔格·封·申纳勒（1842—1921），奥地利政治家，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后来的全德意志运动领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具有国际影响力，作为极端民族—种族主义排犹分子成为青年希特勒的榜样。

吕格：卡尔·吕格（1844—1910），奥地利平民主义政治家，1897 至 1910 年任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始人。专事于宣传和宗教方向的反犹主义者，以此与申纳勒一起为希特勒树立了样板。

种族主义教条：该概念本质上产生于二十世纪之初，核心意思是将人们去个体化。人们被认识为相应的种族特征的集体单位，这些特征与其他种族竞争，劣于或者优于他们，被作为在政治和社会上歧视其他种族群的工具。由此导致了种族间的仇恨乃至暴乱、人种清洗以及种族杀戮。科学已经一再证明这是现代迷信，是一种形式的科学歧途。

维利·塞德尔的《那个新达尼尔》（*Der neue Daniel*）：维利·塞德尔（1887—1934），作家，同为作家的姐姐伊娜·塞德尔（见第 23 章“伊娜·塞德尔”）更为人知。在其早期对异域风情国家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一些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他晚年的作品更应该归类于幻想文学。在其 1921 年发表的长篇《新达尼尔》中，他以极其批判的态度加工表现了自

己一战期间的美国印象。

罗兰：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最大的成就是十卷本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Jean-Christophe*，1904—1912），作品的中心意旨在于德意志能量与法兰西精神的结合，描述了德法两个邻国在一种超越意义上的理解。他为此以及和平主义文集《超然于纷争之上》（*Über dem Schlachtgetuemmel*），被追加授予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了抵制广泛散播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宣传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他创办了杂志《欧洲》（*Europa*，1919），在三十年代与国家社会主义作斗争。

戈宾诺：阿瑟·德·戈宾诺（1816—1882），法国外交家和雅利安统治人种理论的宣扬者，因写作克莱普勒提及的《论人种之不同》而获得后面的称号。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论证“雅利安种族”的、“元种族”的、也就是说北方的即日耳曼种族的优越地位，不仅在身体上也在精神方面的优越。这篇文章由拜罗伊特圈的一名成员译成德语，柯西玛·瓦格纳应当曾经向他的女婿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极力推荐过。戈宾诺的种族理论首先通过他而进入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种族意识形态。

《德国浪漫派的种族思想及其十八世纪的基础》（*Der Rassengedanke in der deutschen Romantik und seine Grundlagen im 18.Jahrhundert*）：“傻乎乎的作者”海尔曼·布罗莫的这本书1943年在慕尼黑雷曼出版社出版。战争刚一结束，这个书名就出现在“苏占区德国人民教育管理委员会”的名单上，即在“需要清除的作品名单”上。

布封：乔治－路易·勒克莱克·德·布封（1707—1788），法国自然科学家。1733年科学院院士。1739年巴黎植物园管理者，1749年起与露易丝·让－玛丽·道本彤共同撰写44卷《一般与特别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ge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阐述他们的地球诞生理论和描述各种生物，成为启蒙时期传播最广的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布封最先提出下面的观点：一个物种家庭所有的衍生后代具有同一个始祖。参见第1章“Le style c’est I’ hommele”。

赫尔德：参见 103、2 以及 127 页等。

亚历山大·封·洪堡：1769—1859 年，自然科学家，在世时已闻名世界，多所科学院院士，深受人文主义理想与魏玛古典主义影响，边研究边旅行，令人称奇地结交了全世界的专家。1799 至 1804 年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南美探险，写有 30 卷旅行考察著作，全部费用个人承担；1829 年作俄罗斯探险，1830 至 1853 年弗里德利希·威廉三世和弗里德利希·威廉四世时期在普鲁士宫廷服务，常被委任为类似“欧洲文化部长”的职务，但是被当作摆设的科学家个人境遇苦涩，因为其进步观点在保守的宫廷遭到嘲笑。1845 至 1862 年间以《宇宙》（*Kosmos*）为题出版了他的五卷本世界考察汇总。

激烈学生军团（Burschenschaften）：大学生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从 1815 年耶拿的所谓原初 Burschenschaften 而来，为许多国家提供了样板。它的精神之父有弗里德利希·亚恩、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和约翰·戈特利普·费希特。成立于反拿破仑战争之后，以制定民主宪法（在君主体制内）和一个全体德意志的帝国为目标。为了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他们在爱森纳赫附近的瓦尔特堡举办了一场纪念马丁·路德和 1817 年 10 月 17 日对拿破仑战争胜利的庆典，庆典过程中，一位来自耶拿的教授要求焚毁“非德意志的”书籍。奥古斯特·封·柯策布的《拿破仑法典》以及犹太裔作家如绍尔·阿舍尔等人的书都被扔进火焰之中。激烈学生军团团员作出禁止犹太人加入的决定，1830 年又取消了此项规定。柯策布被谋杀后，出台了所谓的“卡尔斯巴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许多团员受到国家方面的监视和迫害。随着 1830 年巴黎七月革命的发生，民主主义运动再度高涨。众多团员成为 1848 年革命的先驱。1871 年帝国统一后，他们相信目的已经达到，革命热情消退，成为国家的维护者。该团体成员与国社的关系动摇不定。1933 年的焚书事件中，国社大学生有时会把它与瓦尔特堡庆典联系起来。1934 年，所有尚未自行解散的大学生团体都被纳入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大学生联合会。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 年，抒情诗人和革命家，

充满激情地为德国统一而奋斗。1818年波恩历史教授，1820年由于其政治观点被解聘，直到1840年才受到重新聘用，1848/1849年保尔教堂的德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名誉议长。由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法及反犹信仰，国家社会主义者将其奉为自己的先驱。民主德国认为他是与俄友谊的先贤。

体操之父亚恩：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亚恩（1778—1852），倾向于民族化的教育家，推崇“体魄练习”，以使青年人为解放战争做好准备。在其1810年出版的著作《德意志民族性》（*Das Deutsche Volkstum*）中对法国人和犹太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被认为曾为1817年10月瓦尔特堡庆典上的焚书事件列出书目。1819年3月，体操运动员卡尔·路德维希·桑特谋杀了曾嘲笑过激烈学生军团的奥古斯特·封·柯策布，之后，亚恩参与组建的激烈学生军团及这类体操活动被禁止。由于亚恩被看作这起谋杀事件精神上的始作俑者，他于1820年被捕，1824年被宣判，翌年，在附加条件下无罪释放。1842年体操禁令废除，体操成为普鲁士的学校课程。1848年保罗教堂国民议会议员。

primus inter pares：（拉丁语）“同类之中的最优”，法律上与他人同等，尽管如此仍然超越其上。

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文化哲学家，现代人文科学创始人，早期浪漫派的精神核心。1808年，在研究梵文之后写作了克莱普勒提到的名著《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不是如克莱普勒所记下的“Inder”，而是“Indier”），书中他试图证明梵文为源语言，希腊文与波斯文等都源自于它。不过人们仍然更倾向于将弗郎茨·博普而不是施莱格尔视为印度日耳曼学的创立者，博普为施莱格尔的后继者。

弗郎茨·博普的《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言的连词体系比较》（*Über das Konjun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1816 年于法兰克福出版，语言比较学以及印度日耳曼学的开端之作，弗郎茨·博普（Franz Bopp，1791—1867）由此被视为印度日耳曼学的创立者。1821 年柏林副教授，1822 年科学院院士，1825—1864 年柏林的东方文学及语言学教授。

“置他们于死地！上帝的法庭／无所谓有没有道理！”：国社时期经常被引用的诗句，出自于（略有出入）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的颂歌《日耳曼尼亚致她的孩子们》（*Germania an ihre Kinder*）。原诗句“置它于死地！上帝的法庭／无所谓有没有道理！”指涉一只从其边境上眈视德国的象征性的狼——暗指 1809 年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

纳粹主义和德国浪漫派之间的最紧密的联系：克莱普勒的这一观点富有争议。

[第 22 章　阳光的世界]

施尼茨勒的《通向自在之路》（*Weg ins Freie*）：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犹太裔医生，奥地利维也纳现代派的重要作家，世纪末十分活跃的社会批评家，晚年描绘了心理学语境中的个别命运。在他众多的包括翻拍成电影的作品中，需要强调的有：《古斯特少尉》（*Lietnant Gustl*，1900），因其突出的内心独白；《圆舞》（*Der Reigen*，1921），因其引发了公愤而招致讼事；以及《通向自在之路》（1908），施尼茨勒在这里与在《贝恩哈迪教授》（*Professor Bernhardi*，1912）中一样，对在维也纳传播开的反犹思潮进行了分析批判。他让剧中各个人物张口发言，对于所谓犹太问题给出了所有可能的回答，从民族同化直到犹太复国主义。克莱普勒关于施尼茨勒的文章《长篇研究》（*lange Studie*）刊登在 1911 年 7 月 3 日的《柏林日报副刊》上。施尼茨勒的遗著，包括他坚持到临终的大量日记，得以逃脱纳粹毒手而运送到了美国。这些遗作如今收藏于瑞士布莱斯杲的弗莱堡施尼茨勒档案馆。

“从同一块耕地里／有杂草和鲜花长起”：摘自弗里德利希·马汀·封·博登斯塔特(Friedrich Martin von Bodenstedt)(1819—1892)的一首诗。

1933 年 2 月 27 日他写道：克莱普勒准确地指出，戈培尔以这些发表的日记（参见第 18 章“从皇帝宫廷到帝国元首府”）从事宣传，他引述的这短短的两行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戈培尔在其未发表的日记中不过简要地记录道：“成为极伟大的事业。”

诺瓦利斯：本名弗里德利希·封·哈登贝尔格（1772—1801）。生命虽然短暂，却是早期浪漫派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分析讨论歌德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通过诗文达到世界和谐的思考，并把这种思考融进了他的文学。他的诗作，只有一个作品例外，都是在其去世以后才出版，包括未完成的诗体小说《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恩》（*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其中的蓝色花成为浪漫派的象征。

黎莉·布劳恩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r Sozialistin*）：黎莉·布劳恩（1865—1916），本名阿玛丽·封·克莱施曼，女权主义的领袖人物、社会民主主义作家，贵族出身（一位波拿巴特的私生女，德国前总统理查德·封·维茨泽克夫人的姨婆），其两卷本回忆录《学习年代》和《斗争年代》1911 年出版。她斗争性强，树敌很多。她将工作与家庭相结合的思想，受到了无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妇女运动的抵制。

希特勒的弗朗茨·艾尔出版社：1887 年 1 月创办，当时叫“慕尼黑观察家”，1900 年 3 月被弗朗茨·艾尔竞得，弗朗茨·艾尔去世后由鲁道夫·封·赛伯藤多夫接手，1920 年 12 月被国社德工党收购，1922 年 4 月起受马克斯·阿曼领导。随着权力的增大，阿曼通过施加压力收购了多家出版社和报社。以这种方式国社德工党的中央出版社不断膨胀，在三十年代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康采恩。1933—1943 年社长为洛尔夫·利恩哈特，1943—1945 年为威廉·鲍尔，1945 年作为国社德工党的组织被禁。权利受让者是巴伐利亚自由国。

威廉·普莱尔：1901—1974 年，苏台德德国作家，创作幽默小说，

后期主要写作民族性的长篇小说，1938 年获帝国首都柏林文学奖。克莱普勒提到的作品《黄瓜树。开心的故事》（*Der Gurkenbaum. Heitere Geschichten*），1941 年出版，发行量很大。

Sonny boy：指的是 1929 年阿奇·梅奥执导的美国有声电影“桑尼男孩”。

[第 23 章　如果两人做同一件事……]

“如果两人做同一件事……”：罗马喜剧诗人特伦茨（*Adelphoi V*, 3）拉丁语谚语“如果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的前半句。

人材料：这个概念于十九世纪下半叶首次出现，作家如冯塔纳或马克思先前也曾经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词才被用到集中营囚犯身上，成为二十世纪的非词（“Unwort”，此据德国语言协会）。

大炮饲料（*Kanonenfutter*）：从英语及美语的“food for powder”（Schießpulverfutter）借来的词，出现于美国内战（1861—1865）时期，1900 年左右德语化为“Kanonenfutter”。这个词指的是训练甚少、装备很差的士兵，他们被送进敌人强烈的炮火中，势必阵亡，而敌方则丧失弹药材料。这类材料及消耗战役在一战期间的凡尔登达到了顶峰。二战时把受惩罚的连队当作“大炮饲料”投入战场。

最终解决：国家社会主义对于系统性灭绝的说法。这一“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代称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在公众生活中，直到被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极端化。“最终解脱”这个概念从 1941 年起也成为纳粹的书面用语。

德意志民族文化党人：说希特勒排斥他们是不错的，但同样正确的是，他继续发展了他们的许多东西，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东西兜售。首先是德意志民族文化党（1914—1918）的反犹主义、种族主义。该党已经提出驱逐犹太人以及实现在欧洲外交霸权的要求。它从 1917 年初开始就使用弯钩十字作为自己的象征。1918 年底该党自行解散。部分党

员加入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NVP），另一部分成立了德意志民众防御联盟，日后逐渐演化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德意志国家人民党参加希特勒暴动之后，与国社德工党一样被禁。他们将政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党”（NSBF）。两党为 1924 年 5 月的议会选举结成了一个选举同盟（“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党”），在帝国议会获得了 32 个议员席位。希特勒获释后解除了两党的结盟。在接下来的党派竞争中，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党完全失去了其短暂的意义。

史泰芬·茨威格：茨威格（1881—1942），著名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其中篇小说特别受欢迎，非常成功；他最著名的作品是 1942 年的《象棋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以一场棋局为背景，一场在一个冰冷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和一个被纳粹囚禁、与世隔绝的人之间的棋局，描绘了现代人的心灵状态。1934 年流亡到英格兰和美国而后到达巴西，在那里因为对纳粹的绝望而自杀。克莱普勒提到的《小编年史》于 1929 年出版。

fluctuat nec mergitur：（拉丁语）“为波涛所倾荡，却并不会沉没。”也指巴黎市的格言。巴黎市的市徽上有一艘船（国家之船）。

魅惑的女主角：指玛莲娜·迪特里希在影片《蓝天使》中扮演的罗拉－罗拉，影片导演约瑟夫·封·史丹贝尔格，1930 年根据海因里希·曼的小说《垃圾教授或者一个暴君的末日》（*Professor Unrat oder das Ende eines Tyrannen*）改编。

“同一化”：国家社会主义的同一化不仅包括所有州的同一化（1933 年 3 月 31 日及 4 月 7 日同一化法律规定），还包括所有社团的同一化和所有文化生活与媒体的社会或者政治组织的同一化。

佛尔哈伯：米夏埃尔·封·佛尔哈伯（1869—1952），1911 年施巴耶地区主教，1913 年受封贵族，1917 至 1952 年慕尼黑大主教，1936 年在上萨尔茨堡与希特勒会晤，1937 年传达教皇书信“充满深切的忧虑”，1940 年抗议安乐死，1944 年祝贺希特勒逃过 1944 年 7 月 20 日谋杀事件一劫，1952 年慕尼黑荣誉市民。

伊娜·塞德尔：1885—1974年，女作家，维利·塞德尔（参见第21章“维利·塞德尔的《那个新达尼尔》”）的姐姐，创作相信命运的长篇小说，“血统的秘密”是她的主题之一，其中包括她最著名的小说、1930年发表的《理想的孩子》（*Das Wunschkind*）。1932年柏林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院士，与利卡达·胡赫同为仅有的两位女院士。克莱普勒称伊娜·塞德尔为一个“可悲的篇章”，肯定是指她曾在诗歌及贺信中赞颂过希特勒。1942年致希特勒的生日祝福包含了克莱普勒提到的“电子比喻”，这封贺信在费舍尔－胡珀注释里（第373页）印出。

灵魂的工程师……列宁的表述：这个比喻因为斯大林而非列宁的使用而闻名（在1932年与高尔基的一次谈话中）。

[第24章 欧洲咖啡馆]

保尔·瓦西里：1871—1945年，法国抒情诗人和随笔作家，护守“纯诗歌”，1920年登其声名顶峰，1923年荣誉军团骑士，1925年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37年法兰西学院诗学教授。

克莱普勒的《现代法国散文》：这本教科书1923年初版时名为《现代法国散文。研习与阐释文本》，1926年再版，1948年第三版。

米斯巴赫……日报：克莱普勒此处指的是《米斯巴赫快报》（*Miesbacher Anzeiger*，1874—194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以极右面目出现。希特勒的属下迪特里希·艾卡特和贝恩纳德·斯丹姆福勒为该报撰文，另外还有路德维希·托马，他经常发表侮辱性的反犹言论。

《冲锋者》：《冲锋者。为真理而战的德意志周报》（*Der Stürmer. Deutsches Wochenblatt zum Kampf um die Wahrheit*，1923-1945），法兰克大区区长尤里乌斯·施特拉赞（参见第26章“施特拉赞”）创办和出版的战斗报纸，主要以其低劣的文字和图片形式的反犹宣传闻名。其特点是那些“冲锋者报栏”，那里可以阅读到最新一期周报。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享有

世界声誉的俄国作家，主要基于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他致力于教育改革，并撰写了很多读本。直至20年代俄罗斯的孩子们还在按照他的字母表学习。他越来越反教会和无政府主义的虔诚，严守道德，1906年被教会开除（由于1899年发表的小说《复活》），遭到警方监视。他的出逃及去世引起了欧洲范围的关注，成为欧洲首次重大的媒体事件。文学史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作品对1905年革命发生的影响，同样还有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世界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其父遭自己的农奴谋杀，他本人作为革命者被宣判死刑，在法场时才被赦免，患有癫痫病。代表作有小说《罪与罚》《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对于二十世纪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政治上也具有影响，譬如通过他的德国出版人阿瑟•缪勒•凡•登•布鲁克（参见代序“第三帝国的”）影响了保守革命党人及其对立于号称理性的、颓废的西方的民族性的东方意识形态。

沃居里的《俄国长篇小说》：欧仁•梅尔基奥尔•德•沃居里，法国作家（1848—1914），在这部小说（1886，1892第三版）中将至此一直毋庸置疑归属法国的欧洲精神主导转移至俄国。这部重要的小说使俄国文学在法国闻名，并使沃居里于1888年入选法兰西科学院。

迪斯莱利的《川克雷德》（*Tankred*）：本杰明•迪斯莱利（1804—1881），犹太-意大利裔，英国政治家、作家，1852年和1858年两度财务大臣，1868年和1874年两度英国首相。1840年代初与其他政治家结成“Young England Group”，与保守派作斗争，这也为迪斯莱利的小说包括克莱普勒提到的《川克雷德》（1847）奠定了思想基础。

洛尔巴赫：保罗•洛尔巴赫（1869—1956），新教神学家和时评家，作过无数次旅行，1897年前往突厥斯坦和亚美尼亚，1898年往巴勒斯坦、库尔德斯坦及叙利亚。最初他倾心一种“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世纪之交时，他宣扬在新的道德-宗教地位确认（“道德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新的德国世界强权政治。其主要著作《世界民族之林中

的德国》（*Deutschland unter den Weltvölkern*）代表了一种自由的帝国主义。1912年出版最著名的作品《德意志思想在世界》（*Der deutsche Gedanke in der Welt*）。他发表在德国主要日报上的文章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随着国社时代的开始，他逐渐失去了重要性。今天洛尔巴赫属于争议人物。

马克斯·克劳斯的《事实欧洲》（*Tatsache Europa*）：1943年由布拉格的民族与空间出版社出版。

寇登侯夫－卡勒基的《泛欧洲》（*Pan-Europa*）：理查德·N.封·寇登侯夫－卡勒基伯爵（1894—1972），奥地利作家，被视为第一次欧洲统一运动的奠基者，1923年起草了克莱普勒提到的题为"泛欧洲"的政治宣言。1924年泛欧洲联盟成立。

"轴心国伙伴"：按照墨索里尼1936年11月的说法，"轴心"最初仅表示法西斯意大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之间的关系。1940年9月通过三国公约扩大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所有和德国结盟的国家被通称为轴心国。

维尔弗里德·巴德：维尔弗里德·巴德（1906—1945），慕尼黑舍尔出版社的记者，1933至1945年帝国宣传部各种不同的职能，如1938年起文化政治记者招待会负责人、报刊新闻工作部负责人。这个被克莱普勒称为"年轻的唯心主义者和古典爱好者"的人，早在1933年已向他的上司约瑟夫·戈培尔敬献了一部圣人研究专著。尽管平日不停地窥视打探着成百万听众，却善于效力于各个当权者如希特勒或者希姆莱的喜好。这位投机作家将希特勒所推崇的古典世界当作欧洲杀戮的美学布景。

[第25章　黄星]

黄星：参见第13章"黄色的犹太人星"以及164页及之后。

古茨科夫塑像：卡尔·古茨科夫（1811—1878），作家、记者。其1835年出版的长篇《瓦莉这个怀疑者》（*Wally die Zweiflerin*）被禁，是

一系列针对“青年德意志”作家行动的起因(参见第36章“青年德意志”)。1835年末古茨科夫的全部作品都被查禁，在他之后还有其他作家，如海涅。1836年以“亵渎宗教罪”被判入狱，1850/51年出版九卷本时代长篇小说（约3500页）《精神骑士》（*Die Ritter vom Geiste*）。克莱普勒提及的埃默里希•安特雷森的“古茨科夫塑像”1887年在德累斯顿落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熔毁。

“隔离区黎茨曼市”：参见第13章“黎茨曼市－隔离区”。

纽伦堡法案：国家社会主义者大张旗鼓地推行1935年9月15日宣布的所谓纽伦堡法案，令所有的人都看到其绝非儿戏的反犹意识形态，他们会使其成为残酷的现实。帝国议会议员们被专门用电报从柏林召到纽伦堡，一致通过了那里的国社德工党帝国第七届党代会的法律提议，并由赫尔曼•戈林高调宣布。法令包括《保护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法》[《血统保护法》（*Blutschutzgesetz*）]、帝国公民法和帝国旗帜法。上述第一项法令禁止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结婚或发生性关系。违令者即为“种族耻辱”并被罚入狱或关押教养。帝国公民法规定，只有“德意志血统或者有亲缘关系的血统”才能成为帝国公民。其结果是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公职。1938年，基于这一法规，犹太裔检察官和医生也被禁止履职。在1935年11月14日颁布的第一个关于这项法令的执行条规中，也对全犹太人、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进行了定义。在“混血婚姻”里与受洗或未经信仰仪式的子女生活的犹太人，是所谓“享有特权”人，不需要搬入犹太人居住区，也不需要佩戴犹太星。克莱普勒不属于此范畴，因其无子女。

德温格的《在铁丝网后面》（*Hinter Stacheldraht*）：克莱普勒说到的这本书于1929年出版，名为《铁丝网后的军队。西伯利亚日记》（*Armee hinter Stacheldraht.Das sibirische Tagbuch*）。德温格（俄国母亲之子）在书中描绘了自己在俄国做战俘的经历。也见第17章“德温格的卡普－政变小说”。

腊汶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1938年11月建立，1945年4月28

日由红军解放。1941 年成立了一个附属男子集中营，1942 年夏，又紧挨着建立了乌科马克青年集中营。1939 至 1945 年间，“乌科马克青年集中营”登记关押十三万两千名妇女和儿童、两万名男子和一千名女孩子，他们分别来自二十多个不同的国家，包括犹太人、信德人和罗姆人等。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样，腊汶斯布吕克集中营是主要关押政敌以及社会边缘分子的劳动集中营，1944 年成立了一个瓦斯实验室，约五千囚犯因此遇害。很多人死于医学实验或者在 14f13 号行动中（集中营里谋杀“病人”的掩饰说法）被谋杀，其中主要为犹太妇女。

[第 26 章　犹太人的战争]

犹太人的战争：首先克莱普勒在这里指历史学家和犹太统帅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约 37—100）的七卷本古典历史著作《犹太战史》（*De bello Iudaico*）。该著作的受欢迎程度在中世纪达到顶峰，印刷术发明之后一度成为与《圣经》并列的读者最多的作品。犹太裔作家利翁•弗希特万格（1884—1958），一位在其时代很受欢迎的作家，又写了有关的三部曲，1931/1932 年第一卷的标题同为《犹太战史》。弗希特万格作为知识阶层的反对派为纳粹所仇恨，也经历了与别人相同的流亡命运。克莱普勒不仅了解这两套著作，而且还进一步认识到，希特勒的战争主要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这个论点直到近期才为一些历史学家支持。

纽伦堡犹太教堂：1874 年落成，1938 年被毁。计划中的拆除在 1938 年 3 月已经决定，8 月 10 日，也就是说在距帝国范围的 11 月暴动仅数月时实施完成。数千人围观了这座犹太大教堂和紧邻教区办公房的拆毁过程。今天在其原址建有一座纪念馆。

施特拉赟：尤里乌斯•施特拉赟（1885—1946），中法兰克大区的、1936 年起法兰克大区长官，最低级粗野的仇犹者；1922 年带领其德意志社会党地方组织约 2000 名党员转入国社德工党；1923 年因为参加希特勒政变被解除了初级中学教师的职务，同年成立反犹宣传刊物《冲锋

者》（*Der Stürmer*，1938年发行量为50万；参见第23章“《冲锋者》”），1924年当选巴伐利亚州议会议员，任职到1932年，1933年1月12日起帝国议会代表，1939年法国荣誉军团骑士，1940年被解除各项公职，1946年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第27章　犹太人眼镜]

犹太人眼镜：自从纳粹把这副转义的眼镜给克莱普勒戴上以后，也就是说强迫他把自己理解为犹太人，尽管他自我感觉完全是德国人，这之后，他就不得不通过这副眼镜去看事物。

德累斯顿的灾难之日：参见第7章“1945年2月13日到14日的夜里”。

托马斯·曼最近的讲话：托马斯·曼（1875—1955），重要作家，1929年被授予诺贝尔奖，奖励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1901）。1933年流亡瑞士，1939年到达美国，1952年重返瑞士。1941年3月至1945年5月，BBC电台在其对外节目中每月播放一个托马斯·曼致德国听众（5至8分钟）的讲话，他在其中揭露战争罪行和迫害犹太人等等，呼吁人道主义。收听“敌台”在第三帝国时期是要受到处罚的，然而还是有相对较多的德国人冒险做了。如今存有一张托马斯·曼讲演的原声光盘。

[第28章　胜利者的语言]

拉布吕耶尔－类型：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以泰奥弗拉斯特的希腊性格描写为模板，并以同时代的人物类型加以丰富。由此创造了一种高水平的文学肖像艺术。他尖锐的嘲讽的视角令这部小作品连续印刷，从1688年起迅速推出九版，作品有一个很长的标题：《泰奥弗拉斯特的诸多性格特征，译自希腊语，辅以本世纪种种性格或风俗》（*Les Caractères de Théophraste*，*traduits du grec*，*avecles*

caractères ou les mœurs de ce siècle）。克莱普勒计划也要刻画这样一系列性格肖像，出自其犹太熟人的圈子，这一点他借助*LTI*中的那只书写之手实现了，比如艾尔莎・格劳博（参见188页及之后）。

龚道尔夫：弗里德利希・龚道尔夫，本姓龚德芬格（1880—1931），文学史家，海德堡大学教授，在其友人史泰芬・盖奥尔格的影响下尝试一种新的文学释义样式，放弃科学注释而寻求对被阐释的形象进行一种再创作。在世时极具个人魅力，批评语文学强大以后，他的文学观很快过时。如今在他的名下颁发一项"海外日耳曼学奖"。

布博：马丁・布博（1878—1965），犹太裔宗教和社会哲学家，1924至1933年任法兰克福/美因茨大学犹太教教义和伦理学教授，1933年去职并放弃该校名誉教授，1935被开除出帝国文献协会，1938年在国社政权禁止其演讲之后流亡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大学教授社会学和人类学。1923年代表作《我和你》（*Ich und Du*，提出一种关于与身边人以及与上帝关系的对话原则，也包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多年处于德国－犹太对话的中心，1925年起与宗教哲学家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参见箴言）合作将希伯来语《圣经》译为德语。罗森茨维格去世后，布博独自完成《圣经》的翻译工作直至1961年。布博被授予多项很高的荣誉，包括1953年德国图书和平奖。以他和他的朋友命名的"布博－罗森茨维格－奖章"用于奖励那些推动德－犹对话的人。此外，2002年以来又有"马丁・布博－纪念章"颁发。

普林茨的《犹太史》（*die Judische Geschichte*）：约阿西姆・普林茨（1902—1988），德国犹太教经师和复国主义者，1937年流亡到美国，1939至1977年为一座革新犹太教会堂的经师（新泽西），1958至1966年担任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他的《犹太史》1931年在柏林出版，第二版书名为《配图犹太史》（*Illustrierte Judische Geschichte*），柏林，1933。

杜普诺：西蒙・杜普诺（1860—1941），俄国历史学家，自学成才，1922年逃离俄国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前往彼得堡，后经爱沙尼亚和立陶

宛抵达柏林，1925 至 1929 年间出版其代表作十卷本《犹太民族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被译成多种语言。杜普诺达到国际声望的顶峰。1933 年，他的著作被禁、焚，他再次流亡，这次去了里加，1934 至 1940 年，三卷本回忆录《生活之书》（*Buch des Lebens*）作为“犹太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深受好评。1941 年 7 月在城市被德军占领后，里加的犹太人于 10 月被集中到一个隔离区。根据目击者报告，杜普诺 12 月在那里被谋杀。今天，莱比锡大学的犹太历史和文化科学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

阿图尔·艾略塞：日耳曼学学者（1870—1938），其被克莱普勒称为“很棒的博士论文”以《莫里哀喜剧最古老的德语译本》（*Die ältesten detuschen übersetzungen Moliereschen Lustspiele*）为题。因为不接受洗礼，这位文学学者在柏林没有获得教授资格。《沃斯报》和《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的记者，1933 年后不得已为《犹太汇报》(*Jüdische Rundschau*）工作，1934 至 1937 年在巴勒斯坦，之后重返柏林，1938 年在柏林去世。

《沃斯报》（*Vossiche Zeitung*）：柏林历史悠久的跨地区报纸，其创刊史可以上溯到 1617 年，由邮政及邮递师克里斯托夫·弗利施曼创建。1910 年开始使用现在的名称，1914 年，由乌尔史泰因出版社收购，1934 年 3 月被迫停刊。乌尔史泰因出版社与其下属报纸沉湎于雅利安化。

贝尔托尔·奥尔巴赫：本名莫泽斯·巴鲁赫·奥尔巴赫（1812—1882），犹太裔作家，被取缔的日耳曼尼亚激烈学生军团成员，曾被拘禁在霍恩阿斯贝尔格堡，《黑森林村庄故事集》（*Schwarzwälder Dorfgeschichten*，1843—1854）是其写作生涯的转折点。这本书使他成为其时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对很多重要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982 年起，霍尔布市颁发一项以他命名的文学奖。

F. 泰奥铎·费佘：弗里德利希·泰奥铎·费佘（1807—1887），文学学者、哲学家，1835 年图宾根大学美学和德语文学系候补教授。教授资格论文为《论崇高与滑稽》（*Über das Erhabene und das*

Komische），1837 年副教授，1844 年受聘任新设立的美学和德语文系教席教授，因其关于泛神论的就职演讲被停聘两年，1848 年国民议会的自由党议员，1849 年失望返回图宾根，1855 年去苏黎世，1857 年出版六卷本《美科学的美学》（*Ästhetik der Wisschenschaft des Schönen*），同年发表他最为著名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同寻常的长篇小说《也是一位》（*Auch Einer*），1864 年入选巴伐利亚皇家科学院，1866 年再度受聘为图宾根大学教授，1870 年被晋升贵族，荣获各种勋章。

尼考莱的：弗里德利希·尼考莱（1733—1811），柏林新教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自学成才，书商，1759 至 1786 年与友人高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共同出版二十四卷本《关涉最新文学的信件》（*Briefe, 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此外还出版启蒙时期最重要的杂志《德意志万有文库》（*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其重要性首先是由于这里的文艺评论，一度有 150 位合作者，1759 年起与友人莫泽斯·门德尔松共同出版十二卷本《美科学与自由艺术文库》（*Bibliothek der schönen Wissenschaft und freien Kunst*）。这个能争善辩的理性主义者树敌很多，名人中有歌德、赫尔德和费希特等。

米歇尔·比尔的《帕里亚》（*Paria*）：米歇尔·比尔（1800—1833），犹太裔剧作家，吉雅哥莫·迈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的兄弟，其最为知名的作品《帕里亚》（1823 年柏林首演），是一个犹太解放运动的辩护士。

海涅的“阿尔曼索”：参见第 12 章“海涅”。

沃尔夫冈·门策尔：1798—1873 年，三月革命前作家，激烈学生军团的活跃分子，对歌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属于“青年德意志”作家（参见第 36 章“青年德意志”），遭到德国联邦议会禁令，主要作品是《德语文学》（*Die Deutsche Literatur*），一本 1828 年出版的文学史，1830 年七月革命之后成为“青年德意志”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由自由派转变为民族主义者。

伯尔纳：本名犹大·洛普·巴鲁赫（1786—1837），记者和前瞻性

的文学批评家。1818 年，在其因犹太属性而被解职之后，接受洗礼并改名，希望在发文出书时不再遭受损失。热情投身“青年德意志”运动（参见第 36 章“青年德意志”），以 1830 年巴黎七月革命为榜样，为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而斗争。其这方面的文字和批评梅特涅的杂志《天枰》（*Die Wage*）（1818—1821）被禁。1830 年起定居巴黎，主张文学只不过就是一种生存的理由，而不具有政治和道德进步的辅助功能。1993 年以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每年向政治评论作家颁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参见第 18 章“保罗教堂”）。

迪斯莱利：参见第 24 章“迪斯莱利的《川克雷德》”。

“行动的法则……出自克劳塞维茨”：卡尔•封•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队改革家和军事理论家，虽然在其代表作《关于战争》（*Vom Kriege*，1832）中使用过一次“行动的法则”这个概念，但却认为它在一个战争实施的理论框架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战争中情况复杂多变，不存在真正普遍适用的一定之规，以当得起法则之称”（第一卷，第一章）。按照被国家社会主义者滥用的词义，这个“行动的法则”应该更是追溯至赫尔穆特•封•莫尔特克 d.Ä（1800—1891）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高军事指挥部曾使用的语言。与克劳塞维茨相反，莫尔特克在其《军事著作》（*Militärische Werke*）中强调“进攻的优势”：“我们由此为敌人规定了行动的法则，他必须使他的措施适应我们的，必须寻找手段抵御我们的措施”（第 272 页）。

鲁道夫•弗兰克：1886—1979 年，犹太裔戏剧家、作家。受到克莱普勒毁灭性批评的长篇小说《祖先和孙子》（*Ahnen und Enkel*）1936 年出版，以德国犹太人的的迁徙移民为主题，受到其他方面十分肯定的评价。草稿完成不久，弗兰克即流亡奥地利，1938 年到达瑞士。1960 年出版自传《我生命中的游戏时光》（*Spielzeit meines Lebens*）。

“杜塞尔多夫诗人的故乡之歌”：指海涅著名的“罗蕾莱-诗作”“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参见第 12 章“海涅”）。

存在方式（Esse）：拉丁文的动词 esse，意思是“存在”（sein）。

[第 29 章　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这个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相似性的章节，是 *LTI* 在以色列找不到出版商的原因。

尤里乌斯·巴朴：1880—1955 年，柏林现代派剧作家，知名剧评人，1933 年德国犹太人文化联合会的组建者之一，1939 年经由法国流亡美国。

里尔克：莱内·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创作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笔记》（*Die Aufzeichnugnen des Malte Brigge*，1910）。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咏物诗》（*Ding-Gedichte*）、《祈祷书》（*Das Stundenbuch*，1905）、《杜伊诺斯哀歌》（*Duineser Elegien*，1923）和《致俄耳甫斯颂》（*Sonette an Orpheus*）两部（1923）。他的诗歌今天常常比以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欣赏。

盖奥尔格式：对史泰芬·盖奥尔格表达方式的嘲讽的影射，参见第 17 章“史泰芬·盖奥尔格小组”。

黎索尔做作的仇恨之歌：恩斯特·黎索尔（1882—1937）。其 1914 年的诗歌《憎恨英国》（*Haßgesang gegen England*）被应用于公开的战争宣传，并大受欢迎。与其他许多诗人如威尔·维斯泊和理查德·戴默尔等一起，接受了德皇威廉二世颁发的奖励战争诗歌艺术的“王冠红色贵族勋章”。战后，他被指责蓄意创作煽动性诗歌。被称为“所有犹太诗人中最德意志化者”，也感受到反犹主义，转变为一名犹太诗人。他感受到自己被打为边缘人，并以此为他最后一本书《时代转折》（*Zeitenwende*）里的主题，此前的几部作品均无反响。尤里乌斯·巴朴曾经尝试挽救他的文学声誉。

一首真正的德意志民歌吗，犹太人楚克曼写的：胡果·楚克曼（1881—1914），奥地利作家和复国主义者，因《奥地利骑士之歌》（*Österreichische Reiterlied*）成名（1915 年由弗朗茨·雷哈谱曲），克莱普勒也曾引用（但是引用不完全准确）。这首民歌开头几行是：“对

面草地边蹲着两只寒鸦，/ 我倒在多瑙河边，我死在波兰？”这两只乌鸦在第二节开头出现：“对面田埂两只乌鸦喊叫，/ 我将是第一人，被它们埋掉？”

“白鹿赶走犹太人”：白鹿疗养地，德累斯顿的一个城区，很早就不欢迎犹太人来疗养。玛格达·戈培尔等经常到那里疗养。

海尔策：台奥多·海尔策（1860—1904），犹太复国主义者、奥地利时评家。曾经作为《新自由报界》（*Neue Freie Presse*）的记者对德莱弗斯事件引发的巴黎反犹骚乱进行报道，1896年藉于这件事的印象写作《犹太国家》（*Der Judenstaat*）一书，并以此对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作出了特殊贡献。1897年巴塞尔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当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1897年创作了戏剧《新隔离区》（*Das neue Ghetto*），在维也纳创刊犹太复国主义信息报《世界报》（*Die Welt*），1899年在伦敦成立“Jewish Colonial Trust”，为收购巴勒斯坦的土地筹款；乌托邦小说《故土新国》（*Altneuland*，1902）中描绘了他想象中的理想的犹太国家。

“语言甚于血液”：参见箴言注释。

Les extremes se touchent：（法语）“对立双方交集”。这种认识可以从古典经蒙田一直追寻到拉·布吕耶。

博瑞斯·封·明西豪森的犹大叙事谣曲：博瑞斯·封·明西豪森（1874—1945），作家、抒情诗人，著名的吹牛大王（卡尔·弗里德利希·希罗尼穆斯·封·明西豪森男爵）的后代，1892至1922年间出版《哥廷根摩萨年鉴》（*Göttinger Musenalmanach*），这份杂志主要发表叙事谣曲。他的谣曲在威廉时代和魏玛共和国很受欢迎；经常谱了曲，属于当时青年运动的一部分。1933年入选德国文学学院院士，1934年被推举为议员，之后背离国社，自杀。

莫濕·黎莉恩的插图：埃弗拉姆·莫濕·黎莉恩（1874—1925），摄影师和艺术家，主要为《圣经》各种版本绘制青年风格的插图，例如他和F. 拉尔维斯一起出版的《韦斯特曼－圣经》或由雷曼 / 佩特森出版

的《圣经》。

我们是一个民族：弗里德利希•席勒《威廉•退尔》（*Wilhelm Tell*，II，2）。

《新自由报界》（*Neue Freie Presse*）：1864—1938年，奥地利跨地区的日报，由从前《报界》（*Presse*）的编辑们创刊，很快就成为奥地利最有地位的报纸，有许多名人写作者，一度聘有约500名记者，发行量曾达九万份。所谓的奥地利合并事件（1938年3月）期间，与另一家日报合并为《新维也纳日报》（*Neue Wiener Tagblatt*）。

布博的朋友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参见*LTI*的箴言以及注。

我的俚俚安式谈话：这里其实应该理解为虚构的谈话，就像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喜欢将这类谈话编织进他的文本里。他所描述的谈话，克莱普勒也加以限制道，像是真的这样或者这样进行过的，因为他马上将这些谈话记录在日记里了。

kabbala：（希腊语）一般表示“流传，传续”，特定的情况下指神在犹太人的圣典《犹太法典》里，对摩西进行启示及法律传授。犹太文化的神秘主义传统由此而来。

斯宾诺莎：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拉丁化的名字为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被归为理性主义者，是现代《圣经》批评的创始人之一。1656年由于对犹太信仰的纲领教义进行批评而被开除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教区组织。他的主要著作《伦理学》（*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去世后才发表。

[第30章　词语最高级的诅咒]

《纽约国家报》：《纽约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简称为《国家报》，1834年由德国移民创办，如今是周报，但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德文报纸，目的在于维护德美关系。《纽约国家报》之外，还有《妇女》（*Die Frau*）杂志，1906/07，Nr.14也发表了克莱普勒祝

贺阿道尔夫·维尔布兰特七十岁寿诞的文章。

阿道尔夫·维尔布兰特：1837—1911年，作家、维也纳宫廷剧院（1881—1887）负责人。克莱普勒为他作的传记名为《阿道尔夫·维尔布兰特。关于他的著作的研究》（*Adolf Wilbrandt. Eine Studie über seine Werke*，斯图加特，1907）。维尔布兰特是《慕尼黑最新消息》（*Münchener Neüste Nachrichten*）的记者，写作了多部有关慕尼黑作家圈子的解密小说以及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小说《弗里多林的秘密婚姻》（*Fridolins heimliche Ehe*，1875），这本书也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1877年获得威廉二世颁发的席勒奖，1884年晋升贵族，并获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授予的马克西米廉勋章。

纽伦堡党代表大会：国社德工党的前几届帝国党代会分别在慕尼黑（1923）和魏玛（1926）召开，其后九届都在纽伦堡举行，之所以有"纽伦堡党代会"之名，最初是由于纽伦堡的大型集会的会场，后来在接手政权后要作为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纽伦堡议会历史性衔接（参见代序"第三帝国的"）。每一届帝国党代会都有一个口号，这里提及的1937年党代会题为"劳动的帝国党代会"。这些帝国党代会都为围绕着希特勒的崇拜宣传服务，为此诞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建筑，例如为检阅十五万冲锋队与党卫队队员的检阅台/检阅场（Luitpldarena），可容纳二十五万受检阅者和七万观众的阅兵场（Zeppelinfeld），"德意志体育馆"，这个为四十万观众设计的世界上最大的场馆却没有建造。同样，可容纳五万人的大型会议厅也没有完工。该建筑目前用作纽伦堡市文献中心。帝国党代会由于莱妮·瑞芬斯塔尔拍摄的宣传片而获得广泛的知名度。

维普·米勒的《我没有看到和平》（*Ich fand keinen Frieden*）：维普·米勒（1891—1941），美国作家、记者。深入到战场和危险地区进行报道，因为他的一些报道被提名普利策奖。克莱普勒提到的《我没有看到和平》（1936）的副标题为："一名驻外记者的日记"。

埃塞俄比亚战争：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袭击（1935年10月—

1936 年 5 月）以其大量的残暴事件（大规模屠杀埃塞俄比亚民众）和战争罪行（瓦斯空袭）闻名。袭击以埃塞俄比亚被掠取、建立意属东非殖民地结束。战争的一个后果是其与英国和法国关系冷却，而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靠拢。到 1941 年 5 月，到殖民暴力统治结束，英军解放这个国家时，数十万埃塞俄比亚人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牺牲品。

在部队的战事报告中：军队高级指挥部的“部队宣传”部门负责整理战事报告，每天中午电台播报。所以高级指挥部承担战争进程日益恶化时进行夸张的责任。

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的标题：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美国作家。克莱普勒提到的长篇小说标题为《100%，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故事》（100%，*the Story of a Patriot*，1920/1921）。辛克莱的社会批评作品在二十世纪初就赢得了很大的反响。《沼泽》（*The Jungle*），1905 年的一本描写芝加哥肉类加工厂工人受剥削的直白的现实主义小说引发了十分强烈的关注，增设了新的食品法和屠宰场卫生检查法。美国总统台奥多·罗斯福将“黑幕揭发者”（“在污秽里挖掘的人”）这个模棱两可的概念用到了他以及同样勇于揭露黑暗的作家身上。他的无数作品中都包含社会改革的要求，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拒绝共产主义，是一位不受任何诱惑的时代的记录者，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尽管如此，他也直到 1943 年才被授予普利策奖。

“千年帝国”：参见代序“第三帝国的”。

陆军元帅的贬值……陆军元帅的：“陆军元帅”是 17 世纪起，众多欧洲国家军队中的最高军衔，只有拥有极其辉煌的军事政绩的人才能被授予此衔。1940 年 7 月 19 日，也即法国战役之后（不是像克莱普勒记忆的那样是波兰战役），12 人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赫尔曼·戈林被授予帝国元帅军衔，这个特别军衔专门为他设立。国社政权时期，也有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晋升这一军衔。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以在法国北部建立一个坚固的据点，并将德国人击退。这次进攻也被称为“Operation

Overload”（超负荷行动），开始于D-日（1944年6月6日），以巴黎解放（1944年8月25日）结束。参见代序“登陆滩头”。

孟德斯鸠……*plus peuple qu'ailleurs*：克莱普勒在他的日记中（1931年3月12日）记载，这里说的是查理•德•瑟贡达，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游记中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此外，这位法国专制制度的批判者还于1748年出版了国家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这是作者二十年思考的结果，1751年被教堂列为禁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基本要素，在美国1787年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成为当代所有民主国家的法律基础。克莱普勒1914年通过的教授资格论文就是一部关于孟德斯鸠的研究。

卡洛斯（Carlos）－结语：摘录自弗里德利希•席勒的同名戏剧《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Don Karlos*，*Infant von Spanien*，1787）。这个名字的写法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已不同于席勒的书写方式，而是通常以C开头了。

[第31章　从运动中走出]

阵地战：与运动战相反的一种防御形式的战争方式，大量加强防御工事。机枪和无烟火药发明之后，依靠骑兵和步兵发动强攻夺取阵地十分冒险。正面进攻于是带来惨重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称之为让敌人“战略性地流尽鲜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非常机动，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东线战场还会不时陷入僵持状态。

马利奈蒂的未来主义：菲利浦•托马索•马利奈蒂（1876—1944），未来主义的创始人，意大利作家，法西斯文化部长。在巴黎友人，象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如米哈伊尔•巴枯宁和乔治•索莱尔的影响下，他加深了对市民属性的蔑视和无政府主义式暴力倾向。这首先表现在他1909年发表于巴黎《费加罗》日报的著名的《未来主义》（*Le Futurisme*）宣言中，他在11项主张里对暴力和战争加以美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北意大利组织所谓的“未来主义之夜”，这些聚

会通常以混乱结束。1914年墨索里尼也在那里露面并发表演说。1922年，墨索里尼建立意大利法西斯政党，未来主义党便融进法西斯党。后者的党章明确表明了未来主义者的政治倾向：反教会、民族主义的、社会改革的。在关于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问题上，马利奈蒂与墨索里尼有过短时间的不合，之后马利奈蒂又重新服务于墨索里尼，1924年，后者委任他为文化部长，他担任该职直到这个政权结束。

民族风暴……1813年"国家风暴"：根据1944年9月的一项"领袖诏令"，国社党与党卫队撇开本来有此职权的国防军，把尚未上战场的16岁至60岁的男性推上前线。这些人组成了民族风暴（陆军突击队），它在宣传中可与1813年为反抗拿破仑军队组成的国家风暴相媲美。实际上，民族风暴只是为最后的战役所穷尽的力量。民族风暴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最终在东线战场投入战斗，伤亡惨重。

戈培尔的报纸叫作"进攻"：这个名称是柏林的大区头目戈培尔选定的，他将自己1927年7月创办的杂志理解为具进攻性的战斗报纸，其经常富有煽动性和诽谤性的文章主要针对民主和犹太人。当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取得胜利，戈培尔便不再主编这份杂志，《进攻报》(*Angriff*)作为德国劳动前线的日报一直出版到1945年4月。

general Danube……冬季将军……饥饿将军：*general Danube*（法语）"莱茵河将军"。如克莱普勒所书，军事强权们在战争的运气丢弃他们时很爱使用这一类"比喻将军"，以此表明人们在自然威力面前无力抗拒。

"……4月20日将是另一种情况！"：认为到希特勒的生日那天战争就会转向胜利的信念表达。

V1...V2...和...V4："V-武器"是"Vergeltungswaffen(复仇武器)"的简称。根据宣传，依靠这些武器可以"抵偿"、也就是说报复盟军的技术霸权，并带来战争的转折。军需部长阿尔伯特·史贝尔的以坚持到底的口号"更好的质量能够战胜数量"，为这种武器神话奠定了基础。V1指飞行武器的一种飞弹（Fi 103），V2指火箭导弹（A4）。克莱普勒无法获知，此外还有一种V3（一种高压炮）和V4，V4是V1变化而

来的自我牺牲－武器。

[第 32 章　拳击]

拉特瑙的信件：参见第 12 章“拉特瑙”。

卢登道夫：埃里希·卢登道夫（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军事将领，1916 年起，与兴登堡共同实行军事专制，是导致德国战败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此后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他在一战中强调宣传效应，创办了宇宙电影公司的前身，将列宁和其他革命党人遣送俄国，以致俄国局势动荡，被普遍认为是幕后操控手，在遭受军事失败的同时，经历了心理梦魇，其结果是政治上走向极端化，转向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积极参加卡普政变和希特勒政变，在接下来的审判中被宣判无罪，与希特勒截然相反。两人分道扬镳，卢登道夫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国社德工党被禁期间建立的替代党）在帝国议会的议员，而希特勒虽然被囚禁，仍将领导权抓在手里。在竞选帝国总统的结果令其丢尽颜面之后（1.1%），卢登道夫退出政坛，越来越沉湎于接近妄想症的阴谋论，其中他的第二任妻子马蒂尔德起了决定性作用。1933 年，他的尚存余的组织被取缔，他本人遭到了政界的疏远，直至去世。国家社会主义者违背他本人和他妻子的意愿为他举行了国葬。1935 年他发表了《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于是成了为戈培尔提供关键词的人。

1936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该奥运会 8 月 1 日至 16 日在柏林举行。正如克莱普勒的观察，除了运动成绩之外，它首先特别在，国家社会主义者利用其为自己的海外形象大作宣传。而柏林成为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却完全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功劳。这是 1931 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决定。在奥运会的准备阶段，出现了抵制行动，然而当时美国国家奥委会主席艾福瑞·布兰德埃（Avery Brundage）能够保证美国参加奥运会，绝大多数国家纷纷效仿。卡尔·迪姆提议的火炬接力是奥运史上一项创新。在希腊点燃奥林匹亚圣火引导三千多名火炬手来到柏林参加开幕仪式。奥林匹亚颂歌由理查德·斯特劳斯谱曲。东道主一共夺得 89 块奖牌，

超过美国和匈牙利，位居榜首。

荷莱娜·玛耶：荷莱娜·玛耶（Helene Mayer，1910—1953），犹太裔女击剑选手，外号“金发荷”，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得主，1929年、1931年欧洲冠军。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五名，1933年被开除出奥芬巴赫的击剑俱乐部，并由于“种族原因”被取消运动资助，流亡到美国。迫于美国公众以及国际奥委会的压力，荷莱娜·玛耶代表德国参加1936年奥运会比赛并争得一块银牌。1952年重返德国。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亚村一条街以她命名。

施瓦茨·凡·拜尔克：汉斯·施瓦茨（1890—1967），1935年为《进攻报》（*Angriff*）、后为《帝国》（*Reich*）编辑，1939年进入宣传部的“特别编辑部”。

[第33章 追随者]

不戴黄星者的特权：参见第13章和25章注中国家社会主义对于“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的定义。

铜绿事件：也被称为“帝国水晶之夜”或者“十一月暴乱”。赫舍尔·菲博尔·戈闰斯潘（1921年出生；去世年代不详），波兰犹太人，为抗议所遭受的侮辱于1938年11月7日在巴黎刺杀德国外交官员恩斯特·封·拉特。这为希特勒1938年11月进行镇压提供了有利的借口。戈闰斯潘没能在法国得到居留权，17岁的他也不能返回在德国的家。此外他又于10月底获悉家人的命运，他们被送往波兰（但波兰却拒绝接收他们，于是他们只能与其他数千同命相连的人一起挨在两国边境处度日），这时，他在巴黎找到了德国大使馆，并朝那个外交官开了枪。关于戈闰斯潘行刺的动机有很多猜测。他表示是在巴黎的同性恋场所认识了他的牺牲品；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宣扬的公审计划因此而取消。

拉伯雷：弗朗索瓦·拉伯雷（约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为著名的非韵文作家。首领被扔到大海里的故事出现在关于两个巨

人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幽默多部集小说《巨人传》（*Gargantua und Pantagruel*，1532-64）第四卷第八章。

BLUBO (Blut und Boden)：国社意识形态里的一对中心概念思想，这标志着一种以种族定义的社会与其定居空间的共属性。日耳曼北方种族的理想化的农民生活形式与犹太人的居无定所情况被鲜明地对立起来。这种意识形态元素 1933 年 9 月在帝国继承法中获得了法律表述。与这种政治方向对应，发展出一种歌颂血统和土地的艺术，吹捧"纯种的农民的领导种族"。

迁徙队伍：低地德语：Treck（由 Trekken 演变而来），一长队人或步行或骑马或坐大蓬车，并持续一段时间。紧接着克莱普勒提到的由移居者组成的 1944 年夏天的迁徙队伍，1944/1945 年冬天又开始了的从东部前线逃向西边的第一批逃亡者迁徙队伍。

希特勒引领萨尔返回：参见第 7 章"萨尔地区公决"。

木马山上举行丰收庆典：丰收感恩节，也称作帝国农民日，每年一度在哈摩尔附近举行，属于 1933 至 1937 年间国社时代最大型的民众宣传活动，开始约有五十万来自德国各地的参与者，主要为农民，1937 年超过了一百万人。阿尔伯特•施贝尔负责修建这个超大型的、覆盖草坪的、坡面的、最后达到十八万平方米的庆典广场，广场中间从下至上铺出一条宽阔的装配了麦克风的所谓"领袖之路"，从这条路上，希特勒在巴登维勒进行曲的演奏中缓缓地踱步（走过这不到 600 米路他需要 45 分钟），迈向容纳三千名客人的观礼台。演讲在下面金字塔形状的讲坛上进行。丰收感恩庆典以一场礼花以及后来几年的带弯钩十字的气球升向天空结束。为了参加这场庆典，有些人不惜赶三十个小时的路程。1934 年 2 月 28 日的法律宣布丰收感恩节成为国社政权国家节日，在"血统与土地"的意识形态下，农民对于国社帝国的重要性需要格外强调。庆典活动的操办由帝国宣传部负责。

在他的（肯定为公众狡猾地处理过的）日记：戈培尔确实对其日记为《从皇宫到帝国总理》一书做了修订，但是并不能说是狡猾的动作；

对此进行查验是在未修正过的日记出版之后才成为可能的。也参见第18章“《从皇帝宫廷到帝国元首府》”。

《为柏林而战》：参见代序“戈培尔对他的柏林之战”。

“一锅煮”：与克莱普勒的推测相反，这个概念在1933年之前并不存在。国社政权时期，一锅煮是一种宣传手段，以展示有效运行的民族共同体。从1933年10月1日的第一个“一锅煮星期日”开始，帝国政府通过法律要求每个家庭与饭店在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里的每月第一个周日烹饪一次“一锅煮”，其中每人的花销不得超过50芬尼。周日食品节省下来的钱应当捐赠给冬赈工程。以此方式在几年内聚攒了数百万帝国马克。但是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教育人民要有牺牲精神。1942年“一锅煮星期日”的概念由“牺牲星期日”替代。

冬赈：参见第5章“自愿冬季救助”。

“人狼”：在神话和诗文里，“人狼”指那些在夜里变成狼的人。海尔曼·伦斯在其长篇小说《反抗狼》（*Der Wehrwolf*, 1910）中用这个名字称谓三十年战争期间起来反抗烧杀掠抢士兵的一伙农民。二战中希姆莱作为替补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计划建立一个人狼组织，由在游击战争中积累了经验的党卫队高级领导和武装党卫队将军（“党卫队帝国领袖身边的专门防御总监”）汉斯·普律茨曼负责。1945年1月起在临时开设的人狼学校中以战术教材《人狼。狩猎小分队指南》（*Werwolf. Winke für Jagdeinheiten*）培养战斗小分队的头目，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人狼行动是1945年3月25日谋杀盟军委任的亚琛市长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戈培尔才介入并给了人狼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含义。当希姆莱还在依靠有些军事素质的部队时，戈培尔已经要求每一个老百姓都要投入战斗，直至自我毁灭。

盖奥尔格·海尔曼：本名盖奥尔格·海尔曼·博尔夏特（1871—1943），成功的犹太裔作家。特别是他的小说《耶特兴·盖博特的故事》（*Jettchen Geberts Geschichte*, 1906-1909）和《亨利特·姚克必》（*Henriette Jocoby*, 1908），描绘了一个犹太家庭1840年前后的状况，反映了那

个时代柏林的自由精神，印刷了超过 250 次。1933 年流亡荷兰，1933 年 5 月他的书被公开焚毁。荷兰被德军占领后，盖奥尔格·海尔曼在经历不同的临时转运站后，于 1943 年 11 月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在那里去世。柏林－符黎登瑙区为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花园。

[第 34 章　那一个音节]

dies ater：（拉丁语）黑色之日。转义表示一个不幸的日子；这个拉丁俗语可能追溯到一个祭献禁令，为纪念公元前 390 年一次失败的战役在某些特定日期禁止贡献。

豪斯特·维塞尔之歌：维塞尔（参见代序“豪斯特·维塞尔”）创作，在他 1930 年被谋杀后，被宣布为党歌。国社统治时期在党的庆祝活动中先唱德国之歌，继而唱这首歌，但是希特勒没有同意将它作为国歌。克莱普勒引用的第一段最后几行完整的结尾是：“……在精神上行进在我们的队列里。”

当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谈论第三帝国的语言时：那是在 1945 年 11 月 8 日。

疏松骨头这首歌：国社时期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歌曲，汉斯·鲍曼(Hans Baumann，1914—1988) 作词 (1932 年) 作曲。意义明确的诗行“今天德国属于我们”在 1936 年丢掉了第一个音节“ge”，于是“属于”变成“倾听”，估计是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歌词的含义进行了柔化。

[第 35 章　交替冲淋]

罗姆反叛：为了党卫军和国防军的利益，1934 年 6 月 30 日冲锋队被削权。希特勒下令处决冲锋队头目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首当其冲的是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公开的理由是他们策划政变。参见代序“冲锋队”。

卡普叛乱：参见第 17 章“德温格的卡普－政变小说”。

第三帝国语言里所有的路标指向斯大林格勒或者以斯大林格勒为起点：克莱普勒认为，正如斯大林格勒意味着一个军事上的转折，语言上亦复如此，这个论点有争议。

胡言乱语：混乱的东西，废话。

卡尔鑫·密斯尼克："永远的三年级生"的艺术形象，达维德·卡利士（David Kalisch）为柏林讽刺杂志《可拉得拉达迟》（*Der Kladderadatsch*）而作。

我曾经通过一个特别的勾勒表明：参见第32章关于"拳击"，第230页起。

被摧毁的……尸体：戈培尔在通往所谓的领袖防空洞的院子里自杀。他的尸体也在那里被发现。

[第36章　现场检验]

至今免遭押运命运的人，现在必死无疑：读者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以为克莱普勒也会遭遇这种命运。他回避说自己被排除在押运名单之外，甚至受命负责传达押送命令，参见费舍尔－胡珀第396页。——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1月27日获得解放，1945年5月8日红军进驻特莱西恩施塔特，参见第13章"特莱西恩施塔特""布痕瓦尔特""奥斯维辛"。

人民害虫斗士：那些被国社政权蔑视每一个所谓利用战争牟取个人好处或其他钻战争空子危害公众利益的人，把他们打为"人民害虫"。依照1939年9月人民害虫规定，抢劫犯、破坏分子都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或者死刑，战争的最后阶段时也包括逃兵等，特别是那些被"当场"发现的。民事法庭的许多死刑判决均是依据这项法令。

"人民风暴"：参见第31章"民族风暴……"。

阿格娜斯：阿格娜斯·舒尔茨，克莱普勒夫妇曾经的一位家务女工，帮助二人逃跑。

在石赫的办公桌上：指的是汉斯·石赫。他和妻子特鲁德是克莱普

勒夫妇的朋友，并助其逃亡。

captatio benevolentiae：修辞手段，演说家及作者希望藉此获得听众或读者的好感与注意力。

弗里德利希·史蒂夫：1884—1945 年，历史学家。

条顿人（Teutonen）：罗马资料描述发源于日德兰半岛的条顿人生性格外凶残。即便在罗马人公元前 102 年彻底击败条顿人之后，这种描述依然附着在他们身上。如今，在表示德国人的好斗性情时，人们还是会说“Furor teutonicus（拉丁语）”。

Furor teutonicus：（拉丁语）“条顿人的怒火”：进攻性情，罗马人视之为公元前一世纪条顿人的日耳曼氏族性格。

青年德意志：“青年德意志”，三月革命前文学运动的称谓，持自由的思想方向，反对梅特涅和德意志邦联反动政治。这种思想引导他们通过文学的道路促成了 1848/1849 年的市民革命。1835 年 12 月，德意志邦联议会决定禁止“青年德意志”的发表物（官方将从未自认为是其成员的海因里希·海涅也算在其中，另外还包括卡尔·古茨科夫等）。

伯尔纳：参见第 28 章“伯尔纳”。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异端邪说：卡尔·马克思（1888—1883），最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对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发生了最巨大的、同时也是最为不同的影响。马克思出身犹太经师家庭，他的父亲由于职业原因改信新教，1824 年，他的孩子们也都改变了宗教信仰。他本人不断被指责具有反犹思想，主要由于他不加分析批评地使用“暴利”和“肮脏的交易”等概念；在其著作《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中，他是主张犹太人法律上平等的。

瓦尔特·林登：1895—1943 年，文学史家。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1700 年前后的全面学者和重要哲学家，一生遍游欧洲，与超过十五个国家的众多科学家保持频繁的书信交往。他的 Theodizee（面对世界上的邪恶和

苦难为上帝辩护）作为富有批评价值的理论成为启蒙哲学的（尤其是法国启蒙哲学的）一个出发点。

克洛卜施托克：弗里德利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作为经历诗与非理性主义的开创者，对敏感与狂飙突进时期的文学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千悼念者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温克尔曼：约翰·约阿西姆·温克尔曼（1717—1768），考古科学以及艺术史科学的鼻祖，为不同的艺术捐助者工作，1763 年作为第一个外国人被教皇克莱门斯十三世任命为罗马文物总监。1755 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关于在绘画和雕塑艺术中模仿希腊作品的思考》（*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 Griechishc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1763 年的一部论文集成为艺术理论的基础著作，1764 年发表《古代艺术史》（*Die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1768 年在特里斯特被刺杀。他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确定理想主义的古希腊图景，以此影响了德国古典主义的美的概念和人文主义的希腊人理想。

弗里德利希·路德维希·史达尔：1802—1860 年，1819 年从犹太教改信路德新教，1840 年起在柏林任法律哲学教授，为路德教会的独立性斗争，《依据新教学说和权利的教会法》（*Die Kirchenverfassung nach Lehre und Recht der Protestanten*），埃尔兰根，1840。

乌兰特：路德维希·乌兰特（1787—1862），主要为叙事谣曲诗人，1829 年图宾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0 年后作为编外学者返回图宾根，施瓦本浪漫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谣曲在十九世纪深受欢迎，包括在国外。

威廉·拉伯：1830—1910 年，诗意现实主义作家，在中断了中学学业和学徒生涯后，1854 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麻雀巷编年史》（*Die Chronik der Sperrlingsgasse*），为其最杰出的成就。（戈培尔也很看重这部小说。）在后来将近五十年中发表八十六部中长篇小说，表面上都

在歌颂田园生活，实际是社会批判作品，但是无一达到了处女作的流行程度。他生前收获了极多的荣誉，2000 年以来他曾居住长达四十年的布伦瑞克市以他的名字颁发一项文学奖。

冯塔纳的长篇小说：特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药剂师，不同报社的记者，其中有柏林的《十字报》（*Kreuzzeitung*）和《沃斯报》，诗意现实主义杰出的代表性作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勃兰登堡边区漫游记》（*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1862-1888）、《迷惘与混乱》（*Irrungen, Wirrungen*，1888）、《燕妮·特赖布尔夫人》（*Frau Jenny Treibel*，1892）、《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1894/1895）、《史代希林》（1898）。

保尔·德·拉噶尔德：本名保尔·安东·波提歇尔（1827—1891），东方学家，文化哲学家，德国排犹主义的先驱，1869 年哥廷根东方语言学教授，哥廷根科学协会会员。因其早期著作中表达的信念，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统一的障碍，他被视为德国反犹主义的先锋。

莱姆布兰德德国人：这个绰号属于尤里乌斯·朗贝恩（1851—1907），文化批评作家，因为匿名发表《作为教育家的莱姆布兰德》（*Rembrandt als Erzieher*）——仿照为他所尊崇的尼采及其第三个《不合时宜的观察：叔本华作为教育家》（*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 Schoppenhauer als Erzieher*）——而得到的。这本书谈论的是对立于现代派、启蒙思想和城市化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设想。他视这个画家为那种浪漫－神秘矛盾对立统一实现，从画家的精神中应该延伸出一种通过艺术的“民族重生”。朗贝恩恰好抓住了反现代主义的精神，他的作品是畅销书，朗贝恩一版又一版地不断对之加以修订，并强化其中的反犹主义。这中间的以及其反智主义里的不可小视的对德国青年运动的影响，被国家社会主义者进行了相应的宣传。

巴尔特斯：阿道夫·巴尔特斯（1862—1945），作家［1898 年的小说《迪特马尔森人》（*Die Dithmarscher*）获得成功］、带有民族－种族主义倾向的文学史家。军事反犹思想贯穿其很多作品，例如 1919 年

的《种族与民族性》（*Rasse und Volkstum*）、1925 年的《犹太裔与文学学》（*Jüdische Herkunft udn Literaturwissenschaft*）、1928 年的《莱辛与犹太人》（*Lessing und die Juden*）。1933 年 70 岁时在耶拿获得期待的教授职位和国社政权对于他的其他表彰。

利恩哈特：弗里德利希·利恩哈特（1865—1929），作家，此外从 1900 年起与阿道夫·巴尔特斯共同出版杂志《德意志家乡》（*Deutsche Heimat*），1905 年创办另外一家杂志《前往魏玛之路》（*Wege nach Weimar*），1920—1928 年文化杂志《守塔人》（*Der Türmer*）的主编。大量的长篇小说中有几部发行量很大，如 1913 年的《游戏人》（*Der Spielmann*）。在他的发表物中，他推崇与文学上的现代派唱反调的"家乡"，主张回望魏玛古典主义。这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血统和土地意识形态的根源之一，尽管他的作品 1933 年后没有再版。

迪特里希·艾卡尔特：1868—1923 年，时政评论家，希特勒的早期赞助人，第一个公开称其为"领袖"的人。

《塔木德》（*Talmud*）：犹太饱学之士编纂的犹太律法集，两个版本（《巴勒斯坦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流传自公元五世纪及六世纪：根据犹太《圣经》，《塔纳克》（*Tanach*）之外犹太教最重要的立教法典，以评论和对话两种形式阐释和探讨早期犹太属性的教义和教条的立规。

乌利茨：阿诺德·乌利茨（1888—1971），教师、作家，在其历史小说中反对战争，因而纳粹在 1933 年将其著作[如《阿拉拉特》（*Ararat*）、《长镰柄耳》（*Worbs*）和《遗言》（*Testament*）]列入焚毁清单。也许这是他促使尝试国社－政权宣传主题的一个原因，克莱普勒对此进行了指责。

德温格……有关俄国战俘生活：参见第 25 章"德温格的《在铁丝网后面》"。

汉斯·芮曼：1889—1969 年，幽默作家，主编讽刺杂志[《龙》（*Der Drache*）1919-1925，《豪猪》（*Das Stachelschwein*）1924-1929]，因为

想要恶搞希特勒及其《我的奋斗》，他与纳粹交恶。于是他在热映电影《火钳酒》（*Die Feuerzangenbowle*）的共同署名权也被剥夺。克莱普勒提到的杂志中，芮曼确实以《放大镜下看犹太笑话》（*Jüdischer Witz unter der Lupe*）为题写了这个反犹段落，载于：Verlhagen & Klasings 月刊 58（1944）第 255 页。

保罗·哈尔姆斯：1866—1945 年，记者。

菲利普·布勒：参见第 3 章“旨在维护国家社会主义的党务监察委员会主席”。

Stet Crux dum Volvitur Orbis：（拉丁语）“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十字架就应站立”。指卡尔特会修士会的格言，只是格言是直陈式的——“*Stat crux dum volvitur orbis*”：“十字架站立……”

百科全书风格：指的是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的方式，批判性内容因为审查制度只能在字里行间传达。

冲锋者报栏：参见第 24 章“《冲锋者》”。

[也作后记　“因为言论”]

当年，他们剥夺了我手中的十八世纪研究：克莱普勒在经历了十二年“苦难的年代”之后，没有继续这本书的写作，而是开始撰写 *LTI*。参见第 1 章“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

代后记

《第三帝国的语言》（*LTI*）曾经是维克多·克莱普勒最为成功的著作。该书在六十多年间出版了三十多版，大约40万册，还没有将国外出版的各种版本计算在内。它，LTI，指这个语言，和它，*LTI*，指这本书，终于给克莱普勒带来了他长久渴望的声誉。在其身后，他1933年到1945年期间日记的发表，令他收获了更为巨大的成功。1995年秋季，这些日记被视为文学领域的爆炸性事件，受到人们的欢呼，甚至在当时的电视节目“文学四重奏”里被称作“世纪之作”，在绍尔兄妹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马丁·瓦尔泽的致辞也给予了类似的评价。这部日记虽然短时间里略微遮蔽了*LTI*，但其巨大成功的光芒也洒落到*LTI*的身上，最主要的就是，人们可以借助日记的信息重新阅读和评价这本书。对于本书的书名，某些读者眼中的一个谜，克莱普勒自己作了解释：“LTI：Lingua Tertii Imperii，第三帝国的语言”。“在我的日记本里，LTI这个符号最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

成为所有苦难岁月的一种紧急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1]“紧急救助”，“紧急防卫”，“苦难岁月的”“SOS呼叫”，这些听上去不像是理性的语言分析，倒更像是痛苦的、需要整理把握的经历。*LTI*是一本多层面的书，也是一本艰难的书，它在诞生之际已经为其作者制造了很多难题，他既无意视它为辞书，也不想当它是语言学作品，而愿意以之为经历之书。

这本书来自于对日常观察的记述，自然包含许多自传成分。了解作者的生平对于阅读*LTI*会富有启发，但这里无需对此多费笔墨，作几笔简略的勾勒足矣。维克多·克莱普勒1881年10月9日在瓦尔特河畔的琅茨贝尔格出生，是一位犹太教经师的第九个、也是最小的孩子，他的几位兄长成就斐然，他却并没有表现出要追随他们的势头。克莱普勒中断了在柏林的中学学业，接下来开始的商务学徒也半途而废，虽然补考拿到了高中文凭，却又同样中断了哲学、日耳曼学和罗马语文学的大学学业，1904至1912年过了八年的记者生活。1913年，他在慕尼黑的教授弗朗茨·蒙克和海尔曼·鲍尔那里提交了一部博士论文，结束了他的高等教育，并仅于一年之后，同样在慕尼黑，向卡尔·佛斯勒递交了研究孟德斯鸠的教授资质论文。卡尔·佛斯勒的唯心主义语言观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他的典范，这一点在*LTI*中表现得很清楚。1914年，在那不勒斯做了短时间的讲师之后，克莱普勒于1915年自愿报名参战，并以巴伐利亚十字勋章结束兵役。1921年他成为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罗曼语文学教授。于是，几乎到他四十岁一直给予他经济资助的兄长们，这时可以停止付账了。

早在1903年维克多·克莱普勒就已经改信新教（1912年第二次），原因之一是仕途（那时犹太人既不能做军官，也不能成为德国大学教授），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极深的信念。在这一年他坚定地明确表示，如果在德意志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有选择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说前者代表着全部，而后者毫无意义。这个1935年还在宣称自己永远都是德国人、纳粹是

---

1 *LTI*本版的第1章第1页。

非德意志的人，被纳粹借助法律剥夺了德意志身份，并被其定义为犹太人。1935 年纳粹把他从教授职位上赶走，两年后禁止他使用图书馆，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面对自己的职业最终束手无策。于是他集中全力到日记的写作上，他从 16 岁（1897）开始就认真担负起这个记录者的责任，并一直持续到 1959 年复活节，距他 1960 年 2 月 11 日逝世仅剩几个月。六十年来总共有约 15000 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篇保存下来。在这些日记中，克莱普勒记录了国家社会主义迫害犹太人的令人心悸的事实：被排挤出社会的羞辱，种族迫害的各种危险，被驱赶出自己的房屋，而所有这“地狱般的十二年生活”中最恶劣的经验是 1941 年 9 月 19 日被施加耻辱的犹太星标记，从这一时刻起，在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要将它明显地佩戴在衣物上，而最主要的则是那时时刻刻的死亡恐惧，一个最终注定要被消灭的人心中持续的恐惧。他最后没有走到这一步要归功于爱娃·施莱默，他 1906 年迎娶的钢琴师和非犹太人。这个所谓“混血婚姻”保护了他，使其免于被送往灭绝集中营。而爱娃的功绩不仅是拯救了他的生命，还挽救了他的日记，她将它们分成若干部分送往一个不被怀疑的女友处。1951 年爱娃去世以后他与日耳曼学者哈德维西·基尔希纳结婚，后者为传播他的著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爱娃和维克多·克莱普勒利用盟军轰炸德累斯顿造成的混乱，于 1945 年 2 月 13/14 日逃亡成功。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了自己在德累斯顿-德尔茨申的家，克莱普勒恢复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在接下来的数年间，他同时也在格莱弗斯瓦尔德、哈勒以及柏林授课。尽管心怀某些疑虑，这一对夫妇还是在 1945 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称为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因为他们对党寄予希望，特别是寄希望于彻底的去纳粹化和文化、精神上的革新化。尤其在文化政策方面，克莱普勒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做了“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合会”的主席团成员，并以此身份成为 1950 到 1958 年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成员。1952 年他获得三级国家奖章，1953 年入选科学院，1956 年获祖国功勋银质奖章。在此期间，克莱普勒似乎丧失了他对语言的所有敏锐，他像

其他许多人一样使用着共产党人的宣传套话，并对斯大林极尽颂扬。而他有些时候一定是十分绝望的，这仅从他战后日记的标题上就不难看出：《我就这样坐在所有的椅子之间》。他曾经在*LTI*中如此令人信服地表明，大众簇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原因在于批评能力的缺乏，他曾经以一本充满道德勇气的力作从恐怖的受害者的强压境地跻身为远见卓识的棕色专制的“文化史记述者”，但最终，他在面对一个红色专制的意识形态陷阱时束手就擒，以一种几乎悲剧性地令人心动的方式，败倒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歧途上。

借助他的日记，可以追溯了解*LTI*是如何诞生的。1933至1945年是最初的积累阶段，接着是1945年夏至1946年底的写作阶段。克莱普勒首先搜集单个的国家社会主义词语，并将对这些词语的观察置于他的语言观念主义的和民族心理学的思考中心。从佛斯勒关于语言现象是精神的表达的论点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导思想：“语言使之大白于天下。”换言之，语言彰显人的观念；克莱普勒的兴趣在于语言，而并不在于以此危及他自己论点的那个可能性，因为他像其他受害者一样也使用被他批判的毒化的纳粹词汇。在迫害和生存威胁的压力下，克莱普勒有所偏离那些词汇表，也偏离其过时的、由民族的观念定义的语言概念，并且扩大了这个概念，因为他将一种交流情境的整体关联作为观察对象，也就是说，他的全部的日常环境都成为他的观察视域：政治演讲，致意的新方式，文章和广告，收音机里的战事报道，行进的队列和国社举办的其他的大型活动，《冲锋者》和国社顶尖政治人物的发表物，并且也包括高速公路及新的掌权者的庞然建筑，甚至议会大厦之火。“这一切都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他在*LTI*中总结道，同时以此为一种新的语言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批评奠定了基石，而他这样做与其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毋宁说是下意识的，并且，限于这本笔记之书的语文学框架，他也未有充分展开这种分析和批评。这里，两种语言观，狭义的语言和扩展意义上的语言，直接并列在一起。看来，克莱普勒首先而且主要把*LTI*视为一本“教育之书”，它要达到给语言去毒、清洁语言的作用，这对他

来说与去纳粹主义同样重要。相比于推出一种新的科学上成熟的语言分析，这应该是他更为关切的。他那时就坚定地表达出这个目标：确认“日常之暴戾”（1944.4.8. 日记）；这一观点同样证明了克莱普勒远远走在他的时代前面。

这本书的方案在作者观察的进程中经历过多次大的变动，他自己评价说这是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书”（1946.12.25. 日记）。早在 1942 年他就清楚地知道，不会有“超过两打的词汇和用语”（1942.5.11. 日记）可供他用于“*LTI*”的写作，他必须以他的经历扩充和衔接自己对于语言的观察与思考。1945 年夏他决定从日记“现有的材料里”剥离出“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1945.7.23. 日记）。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里，他从日记里摘出许多页，并据此写出了全部的章节——有些是一气呵成——用一些相遇、回忆、轶事等等使叙述风格生动化。于是一个“语文学和（传统小说式环环相扣的）日记”（1946.1.27. 日记）充满艺术感的混合体诞生了。可以说克莱普勒面对他的“LTI”的一种不确定感，而源自于这种不确定感的东西最后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保障。

继 1947 年夏第一版之后，1949 年有过一个违背克莱普勒意愿的、删除了“犹太复国主义”一章的、也就是说经过审查的版本，仍然是由建设出版社出版。在 1957 年作者审订的最终版本里，在哈勒的尼玛耶出版社的版本，复国主义一章又包含在内了。此后即是眼前的这个版本，它与上一个最终确定的版本词语上一致，在拼写和标点符号方面也基本一致。这部作品的印刷历史是，在 1947 年建设出版社的第一版和一次再版之后，哈勒尼玛耶出版社出了第三版，从 1966 年起在莱比锡的莱克拉姆出版社出了 21 版；1966 年达姆斯达特的梅尔策出版社出了一个西德版，外加 1969 年 dtv 出版社的简装版。罗德贝尔格出版社获得了莱比锡莱克拉姆在联邦德国出版其图书的授权，推出了 1975、1982、1985 和 1987 四版。2007 年以来 *LTI* 经历了莱克拉姆简装书社的第 22 和 23 版。在这 32 个版次中还算上了国外的出版和 1996 年推出的一个供盲人用的听读版。

这个骄人的版次数量与这本笔记之书在读者中的知名度相符。在

“东边”（在苏占区及民主德国）该书得到了几乎完全是积极的反响，除了个别的批评（大多为匿名的）来信。在这些反馈中有人建议克莱普勒最好再写一本 *LQI*（《*Lingua Quati Imperii*》），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四帝国的“官话”。克莱普勒真的也已经定制了相应的词汇表。1966 年起，*LTI* 通过莱克拉姆出版社价格低廉的版本首度得到了真正普遍的传播，并随之进入民主德国民众的“文学记忆”。而当 *LTI* 在民主德国升级为一种为人膜拜的图书时，在“西边”，在联邦德国，它却几乎默默无闻。在这里，1966 年也是对于 *LTI*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因为 *LTI* 在联邦德国首次出版。然而销售数量上升得很慢，与民德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到转折前民德发售了 250000 册，而在联邦德国其销售总量还不到 30000 册。

在转折到来之前，*LTI* 不时陷入冷战战场，既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也作为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工具，用于相互诋毁。从联邦德国的视角出发，国社与民德的语言使用有很多的可比性。民主德国则表示坚信联邦德国继承了国社政权的语言遗产。然而无论何时，无论在哪一边，东边还是西边，*LTI* 的历史价值从未受过质疑。在德累斯顿，在一次对被克莱普勒称之为“盖世太保畜生”的审判中，它甚至作为证据材料被接受。所以说司法界也将这本书视为历史时代的真实文献。克莱普勒一方面以他的 *LTI* 揭露了一个个当地对于他那些苦难岁月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另一方面他在 *LTI* 中成功地为这些畜生的几位受害者竖立了一座荣誉纪念碑，令他们永远摆脱遗忘。在这些年里，作为最早的一份关于迫害犹太人罪行的亲历者报告，*LTI* 登上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我们今天深知它的价值。

然而对这本书价值的认知还经历了多次的重心转移，比如在 1980 年代，当人们发现了历史学中的日常之时，在德国重新统一的时期，而尤其是 1995 年他的日记发表之后；他的日记令克莱普勒在西边一下子名声大震，*LTI* 也真正红了起来。那种把它作为一个“亲历报告”或者“历史文献”的阅读视角更多地退到后台，而 *LTI* 所包含的“语言批评”走

进了研读的中心。在对 *LTI* 重新发现的过程中，学者们认识到，仅仅局限于“第三帝国的语言”的阅读过于肤浅，这本书更应该理解为“社会语言学分析”的最初尝试。克莱普勒的日记发表后，人们对 *LTI* 的这种新评价就更加明确了；这一评价认为，对于作者来说，一切都是国社语言，无论是纳粹的言语表达还是非言语的表述。因为将非语言的事物纳入意识形态传播，克莱普勒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分析的先驱。

未来的人们也许还将会看到 *LTI* 没有被认识到的价值，并在书中找到专门针对他们的问题的新答案。正如艺术品的情况，在经历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它们仍然不断地向一代代后人发出新的挑战。克莱普勒成功地把他的笔记作成了这样的艺术品：文学上高难度地、以骇人而真实的方式呈现出国家社会主义残忍的日常性，令所有的历史书籍在它面前相形见绌。克莱普勒以他的 *LTI* 和他的日记本身书写了历史。它毫无疑问地是一部伟大的普遍意义上的 *document humain*，而首先，它是无望年代里的一个自我解救。克莱普勒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实现这个解救的，以及他的 *LTI*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的日记在这些年里一直是我的平衡杆，没有它我早已经摔下去上百次了。在感到恶心和渺无希望的时候，在机械的工厂劳动无尽的荒凉中，在病人和死去者的床边，在一个个墓碑旁，在自己内心的困窘中，在极端耻辱的时刻，当心脏在物理意义上停止工作时——总有这个自我要求来帮助我观察、研究、记住正在发生着什么——明天它就会是另一副样子，明天你对它的感觉就会不同；记下它现在的样子和表现。然后很快，这一呼唤就会密集起来，它要我将自己凌驾在那个境遇之上，维护内心的自由，进入那个始终发挥着效用的秘密公式：LTI，LTI！”[1] 这种生存策略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它和维克多·克莱普勒的全部自传作品一样，应当获得广泛的传播。

---

1 本版正文第 2 页。

译后记

承接这本书的翻译，是我主动请缨的，因为看到启之先生评论徐贲先生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其中表达了能够读到《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文版的愿望。经历了几个小曲折，启之先生找到了严搏非先生的“三辉图书”。

但我还是低估了翻译这本书的难度，拖拉甚久。一位了解这本书的保加利亚同行直接问：“这本书能翻吗？”一位德国作家朋友听我说花费了几乎两年的业余时间，问道：“给你带来乐趣了吗？”我都只能非是非非地回答。

本来非是非非。

这样一本书，当一个词往往有数层原意需要用译入语表达时，翻译是很吃力的，只能勉为其难。与此同时，克莱普勒的句子比较冗长繁琐，和所有的译者一样，我也面临如何平衡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平衡作者和读者的问题。在原著风格和本土阅读习惯之间，不同的译者会选择不同的、自以为最佳的平衡点。我不研究翻译理论，爱读译家体会。

我以为说得最到位的是草婴先生的这句话："好的翻译应该是让异国读者读译文的感受与本国读者读原文的感受相当。"我追求的就是这个，追求到什么水平则另当别论。如果我因为一个问题向德国学者朋友请教，他们都要多读几遍，认为其文字艰涩难解，我为什么要让中文读者感觉那么顺畅轻松呢？那还是克莱普勒吗？于是，我虽然作了一定程度的"可读化"努力，比如改造了一些太长的句子，但是并没有刻意为达到流畅的阅读而罔顾作者本来的写作风格，就像我在翻译贝·施林克时也不会对他原本的日常语言加以修饰一样。

乐趣与费心耗时也并不总是相悖的，只要过程中有翻译的历练和认知上的收获。关于这本书及其作者，编者写了很多了，译者无意在此赘言。*LTI* 先前在东德连续再版，在西德却比较落寞，直到 1995 年作者日记出版且引起轰动，它才进而成为德国人的共同记忆，并于 2010 年以这个新的评注版本面世。在评注者的"后记"里，弗瑞利希提到克莱普勒对后一个极权时代的语言丧失敏锐性，这一点尤其令人深思。我在翻译过程中曾经不时感受到此处与彼地、这时与那时的平行，也曾经在国际研讨会上评述过这些平行现象，会后交流时德国、匈牙利的学者对我的发言流露关切。我告诉他们，中国幸而已经容纳多种不同的语言并存。前不久，张维迎著文提出了消除语言腐败的问题，译者希望《第三帝国的语言》的翻译出版能够与之呼应。

最后，还有一个译文的技术处理问题需要在这里做个交代。本译不仅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作法，在所有外国人姓名的中译之后用括号标出了原文，而且用括号给出了许多第三帝国语言中词汇的原文，以方便读者对照阅读。后者之所以必要，也因为当时一些词语的用法如今已经消失或者发生了改变。

此外，我还想对我的学生于东辉表示感谢。本书的评注部分曾请她作过初译，添累她不少，不过我最后还是逐条进行了校改。

印芝虹

2012 年夏于南京

三辉图书

“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 普勒在
可怖的生存环境中、在德累斯顿的犹太人居所里 ，语言
是如何走向堕落的。作为一部诞生于恐怖年代的 式呈现
出纳粹统治残忍的日常性。

这部“世纪之作”既是历史书写的杰作，也是一流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一位语言和文学家在无望的纳粹时代实施的自我拯救，令所有的历史书籍在它面前相形见绌。

在我的日记本里，LTI 这个符号最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成为那全部苦难岁月里的一种正当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 SOS 呼叫。

—— 维克多・克莱普勒

ISBN 978-7-100-09990-5



定价：52.00 元